

三

ノ

ミ

一

話

書

唐史史料學

黃永年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史史料学 / 黄永年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12
ISBN 7-80622-782-2

I. 唐... II. 黄... III. 史料学—中国—唐代
IV. K24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83993号

封面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竺金琳
封面设计 程 钢

唐史史料学

黄永年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mm 1/32 印张 10 字数 210 千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80622-782-2 / K · 156

定价: 25.00 元



黄永年，江苏江阴人，1925年10月出生，195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为陕西师范大学退休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古籍版本学》。

自序

这部《唐史史料学》，是为攻读唐史者提供的教材，同时也可作为研究工作者的参考读物。

研究唐史为什么必须学习唐史史料学，或者说得广泛一点，研究历史为什么必须学习史料学？这个问题应该从认识论的高度来回答。

认识来源于实践。对研究历史来说主要是接触史料来获得感性认识。感性认识积累多了，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发展到理性认识，即抓住历史事物的本质，找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在理论上作出贡献。这就是历史研究者所承担的任务，所以当年恩格斯曾强调地指出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查审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史料学者，正是讲需要掌握哪些史料，并研究这些史料的源流、价值以及利用方法的一门学问。很难设想，研究某个历史事物时对所需要掌握的史料都不甚了了，却能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也很难设想，对这些史料的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一无所知，却能很好地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作。

这部《唐史史料学》，就是本着如上的理解来撰写的，希望通过它告诉人们研究唐史应掌握哪些史料，以及这些史料的源流、价值和使用方法。

为了能够实现这样的意图,在撰写上我作了如下的考虑。

首先,应该掌握哪些史料?也就是说应该讲哪些史料?这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作为蓝本。因为不仅建国以来大专院校里不曾开设过唐史史料学的课程,不曾出版过教材、专著,就连建国以前也没有这样的著作,国外也未听说过有为唐史研究撰写的史料学专著。这就只好自起炉灶,自定取舍标准,即凡研究唐史真正用得上的就应该讲,否则就不必讲。这和史学史不一样,史学史只要是史学著作都得讲,不管这部著作有没有提供不见于其他文献的史料;史料学则不论是否史学著作,只要有史料价值就要讲到。例如北宋时范祖禹的《唐鉴》,只是一部对人君说教的史书,并无史料价值,史学史可以讲,讲唐史史料学就不必提出;又如《文苑英华》,是诗文总集而不是史学著作,史学史里不能讲,但唐史史料学却必须讲,因为它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唐史史料。当然,也不是书里有一点唐史史料的都得讲,这样范围太广了,反易使读者有目迷五色之苦。因此只能就重要的、即书中全部或大部分是史料的来讲。对现代著作也是如此,凡是给有史料价值的文献作校勘、注释、订补、辑佚的,以及提供其他有用史料的,如唐长孺先生的《唐书兵志笺证》、岑仲勉先生的《元和姓纂四校记》等,都应该讲到;否则,即使是公认的史学名著也只好割爱。

用这样的标准来择取,要讲的还是比较多,因而需要有个次序先后,即分个类。但图书馆通行的几种分类法在这里都用不上,因为这些分类法很多地方是借鉴于国外的,用来分现代的书藉、尤其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书藉固然很好,分我国的古籍就不甚合适。就历史书来说,这些分类法一般都是先世界史,再国别史,国别史里的中国史则是先通史,再断代史,结果《史记》、《南史》、《北史》、新旧《五代史》分在通史,其他《汉书》等等按朝代分别安插进断代史里,一部“二十四史”被拆得七零八落;在通史里,纪传体的《史记》、编年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以及现代

的通史著作甚至教科书、通俗读物都可以统统混杂在一起,有些史学名著如讲典章制度的《通典》、《文献通考》等却又分到历史以外的政治大类里。我认为,在编制出真正同样适用于我国古籍的新分类法之前,还不如老老实实承用过去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这是古代学者根据当时书籍的实际情况来制订的,而且随着书籍品种的增减还作过多次调整,如常用的《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和过去的四部分类已有许多不同,后来《书目答问》的分类和《四库全书总目》又有出入。当然,今天看来,这些四部分类法还是存在若干毛病的,因此在这部《唐史史料学》里又作了点调整。

所列举的书籍从哪几方面来讲述?过去《四库全书总目》是书名、卷数、作者姓名和简历、内容优劣,有时也讲几句版本。现在既是史料学当然有所不同,除书名、卷数、作者外,有些与撰著此书并无关系的简历就可以省略不讲。版本也只讲常见的或有关系的,用不到像《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邵亭知见传本书目》那样把所有旧本一一缕陈。书的内容则主要从史料角度来讲,力求把所提供史料的源流、价值以及应该如何利用讲得清楚些。此外,有关的知识性东西也适当附带讲一些,使没有机会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的爱好者可以把它作为自学的入门指导书。

在考虑怎样把这部史料学写好时,我常常想起前辈学者的几部入门指导著作。首先是吕思勉师的《经子解题》,这是半个世纪前我开始接触古籍的启蒙读物,它为我打开了研究古代文献的大门。以后我还阅读过梁启超先生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陈垣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也都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不仅由于他们学问精深渊博,更重要的是他们撰写这些入门书时态度诚恳,不敷衍,不打官腔,处处为读者着想,对读者讲老实话。要知道,介绍古籍这件事,如果不负责任,本来是很容易做的。上者可以摘抄原书的序跋、目录,打几句“此书内容丰富,有一定参考价值”之类的官腔就了事;下焉者更可找几本性质相同、相近的

书来东拼西凑地乱抄一通,不用付出多少劳动。至于这本书究竟应该怎样读,怎样用,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却绝口不谈。这也难怪,因为有些编写者自己就没有读过、用过这些书,哪来经验可以对人家传授呢?上面所说的前辈学者这几部著作则不然,所介绍的书都认真读过或用过,有些还作过深入的研究,不曾过目的书决不说,研究得不深的也决不乱说,决不用官腔来敷衍塞责。同时,自己研究的心得和取得的新成果、新见解,则尽量告诉读者,毫无保留。尽管这些心得见解不一定都能成为定论,但比以谨慎为借口,不敢或没有能力讲出自己的见解者要高出万万。因为不讲自己的见解,一味陈陈相因,那读者看前人或别人的书好了,又如何必读你书里那么一点转引人家甚至抄袭人家的东西呢?这点抄来的东西对读者能起什么启发诱导作用呢?我的学问自不敢和这几位前辈学者相比拟,但撰写这部《唐史史料学》时,在不说假话、不打官腔、以诚待人、无保留地把个人心得公之于众这些方面,总力求向前辈学者看齐,以期读者看了这部史料学能真正知道点新东西,对研究唐史能起点作用,而不致感到失望,感到上当受骗。

这部《唐史史料学》的初稿是1979年写出的。当时我刚调到陕西师范大学任教,史念海教授要我指导中国古代史专业唐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需要给他们讲授唐史史料学的课程。因为等着印发讲义,只花了不到20天时间,写成10万字左右的急就文章,其苟简率略自无待言。因此在实际讲授时已需大事损益,到1982年把它兼作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教材时就决心彻底重新改写,只是由于其他教学、科研工作较重,不久又兼任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在写毕了纪传类后就再也挤不出时间。这样拖延到了1986年,国家教委所属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把它列入重点项目,并拨付了专款,再不完成这个改写任务将无法交待。于是商请贾宪保讲师代我充实纪传类以下的篇幅,新增加的一类书、敦煌吐鲁番文书两类则全部由宪保讲师撰写,再经我审阅润

色,我还增写了书目一类。由我和宪保讲师共同署名,送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公世。当然,详略失当甚至错误之处总在所难免,希望同行包括青年同行给我指出,后来居上本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本书正文中提及前辈学者及友好之处,均直书姓名,不用字号,也不再加师、兄、先生、教授等称呼,因为加了易有亲疏尊卑之嫌,不如一律不加为妥。

黄永年 1989年春节,2001年6月5日稍作修改

这部《唐史史料学》1989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学术界评论还不坏,认为比较实用,1992年且承国家教委给予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优秀奖。但彼时只印了1500册,过不很久就售缺,以致海峡两岸我国学人有复印了来阅读使用的。近上海书店出版社知悉此情况,决定由他们重印新版,以应需要。

1989年版付印前,由于校阅时间匆促,精力也欠集中,印成后自己就不甚满意。这主要是对贾宪保讲师代我充实的部分。平心而论,宪保讲师是出了力的,但思路以至行文习惯总不能和我完全相同。再是诗文类的别集部分我本来只是开了个书目及其版本,作者生平和可作为史料的举例都出于宪保讲师手笔。举的这些例子自然没有错,但集子里有用的史料实际上并不止这一些,而且严格一些讲也未必有代表性,杂史杂说小说类中所充实的例子也存在同样的毛病。不过这部分如果重写则工程过于浩大,且字数增加太多也恐非本书之所能容纳,这样就只好姑仍其旧,只是请使用本书者切莫局限于书中所举例子而得直接从原书寻找更多的史料。至于思路行文和我不合拍处,我就径行修改,多事润色,如类书的开头部分还重新写过。这几年新问世的有关出版物,也得择优录入本书。遗憾的是,宪保讲师在多年前移居国外,且从事其他

工作,上述这些改动已无机会再和他商榷。从文责自负这点考虑,这次新版就由我单独署名了。

本书最后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一类,也是贾宪保讲师代我撰写由我改定的。这次为慎重起见,再商请敦煌学专家、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的荣新江教授费神审阅,承新江教授作了多处增改,于此谨向新江教授致谢!

黄永年 2001年6月12日

目 次

自序	1
纪传类	1
旧唐书 新唐书 隋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新旧唐书合钞 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 新旧唐书合钞补注 唐书注 唐书兵志 笺正 新唐书纠谬 廿二史考异 十七史商榷 陔余丛考 廿 二史札记 新旧唐书互证 唐将相大臣年表 唐功臣世表 唐 边镇年表 唐镇十道节度表 唐宦官封爵表 武氏诸王表 唐 诸蕃君长世表 唐藩镇年表 唐方镇年表 唐折冲府考 唐折 冲府考补 唐折冲府考校补	
编年类	55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补 大唐创业起居注 顺宗实录	
典章制度类	64
通典 宋白续通典辑本 唐会要	
职官类	72
大唐六典	
仪注类	77
大唐开元礼 大唐郊祀录	
法令类	79
唐律疏议 唐令拾遗	
诏令类	84
唐大诏令集	
地理类	88
括地志 元和郡县图志 太平寰宇记 两京新记 长安志 长	

- 安志图 河南志 游城南记 雍录 类编长安志 唐两京城坊考 隋唐两京丛考 大唐西域记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唐大和上东征传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中国印度见闻录 蛮书 北户录 桂林风土记 岭表录异
- 谱牒及职官姓名类…………… 120
- 元和姓纂 翰林志 承旨学士院记 翰林学士记 翰林院故事 翰林学士院旧规 重修承旨学士壁记 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 郎官石柱题名考 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 唐仆尚丞郎表 登科记考 唐人行第录 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 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
- 杂史杂说小说类…………… 131
- 贞观政要 魏郑公谏录 安禄山事迹 高力士外传 奉天录 李相国论事集 朝野僉载 教坊记 隋唐嘉话 封氏闻见记 唐国史补 大唐新语 次柳氏旧闻 刘宾客嘉话录 明皇杂灵羯鼓录 因话录 大唐传载 幽闲鼓吹 松窗杂录 酉阳杂俎 本事诗 杜阳杂编 桂苑丛谈 尚书故实 云溪友议 玉泉子 北里志 乐府杂录 东观奏记 开天传信记 唐阙史 资暇集 刊误 唐摭言 中朝故事 金华子杂编 开元天宝遗事 鉴诫录 北梦琐言 贾氏谈录 锦里耆旧传 南部新书 近事会元 太平广记 唐语林 续谈助 类说 说郭
- 诗文集…………… 187
- 王梵志诗 东皋子集 幽忧子集 王子安集 杨盈川集 骆宾王文集 陈伯玉文集 张说之文集 曲江张先生文集 孟浩然集 李太白文集 王右丞集 高常侍集 颜鲁公文集 刘随州文集 杜工部集 岑嘉州诗 昼上人集 元次山集 毗陵集 钱考功集 韦苏州集 孟东野诗集 陆宣公翰苑集 寒山子诗 (附丰干拾得诗) 权载之文集 韩昌黎集 张司业诗集 刘梦得文集 吕和叔文集 李文公集 柳宗元集 欧阳行周文集 白氏文集 元氏长庆集 皇甫持正文集 沈下贤文集 李文饶文集 张承吉文集 贾浪仙长江集 李贺歌诗编 玉川子诗集

樊川文集 姚少监诗集 李义山诗集 李义山文集 樊南文集 补编 温庭筠诗集 刘蛻集 丁卯集 孙樵集 皮子文藪 唐 甫里先生文集 司空表圣文集 司空表圣诗集 桂苑笔耕集 郑守愚文集 玉山樵人集 香奁集 徐公钧砚文集 唐黄先生 文集 甲乙集 谗书 两同书 广陵妖乱志 罗昭谏集 白莲 集 禅月集 浣花集 文苑英华 全唐诗 全唐文 全唐文纪 事	
类书类	254
初学记 白氏六帖 白孔六帖 太平御览 册府元龟 玉海	
金石类	267
集古录 金石录 金石萃编 金石续编 金石萃编补正 八琼 室金石补正 唐代墓志汇编	
书目类	275
旧唐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崇文总目 辑释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 中兴馆阁书目辑考 中兴馆 阁续书目辑考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 直斋书录解题 宋史艺 文志	
敦煌吐鲁番文书类	284
敦煌石室遗书 敦煌石室真迹录已 鸣沙石室佚书 敦煌零拾 敦煌石室碎金 敦煌掇琐 敦煌遗书 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 煌杂录 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 流沙遗珍 敦煌石室画像题 识 敦煌秘籍留真 敦煌曲子词集 敦煌曲校录 敦煌曲 敦 煌变文汇录 敦煌变文集 敦煌变文新书 敦煌资料 西域文 化研究 吐鲁番考古记 吐鲁番出土文书 中国古代籍账研究 敦煌宝藏 敦煌丛刊初集 敦煌古籍叙录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书名索引	304

纪 传 类

我国最早的史书,如以《春秋》命名的鲁史,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的魏史,都是编年体。到西汉时司马谈、迁父子撰写史书,才参考战国时人的《世本》把内容扩大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门,后人称之为《史记》。接着东汉初班固撰写《汉书》,改书为志,又省却世家,此后这种纪、志、表、传就取代编年体而成为撰写各个朝代的史书的正式体裁。虽然有时也略事增损,如有的没有表,有的没有志、或改志为考,还有的增加一门载记,但纪和传这两部分迄无变动。因此,在唐代就有人称这种体裁为“纪传体”,如中宗时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名著《史通》的《古今正史》篇里,就以编年和纪传并称,韩愈的弟子皇甫湜更撰有《编年纪传论》(《皇甫持正集》卷三),说“古史编年,至汉史司马迁始更其制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易之”。

由于这种纪传体成为史书的正式体裁,因此也通称之为“正史”。这个名词出现得比“纪传”还早一些,唐贞观时官修并编入《隋书》的《五代史志》中的《经籍志》,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史部就以正史居首。不过,当时只要是纪传体的都视为正史,《史通》的《古今正史》篇更把编年等不属于纪传体的也一并讲述,并没有把纪传体中的某几部算作正史,余外不算。这到宋代书目中才开始加以区别,如《郡斋读书志》把《南史》、《北史》列入杂史,《直斋书录解題》又把《南史》、《北史》、《高氏小史》、《古史》等列入别史,都不作为正史。这种区分越到后来越严格。本来,早在魏晋时就以《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唐代以范曄的《后汉书》取

代《东观汉记》，又增加《三国志》以试弘文、崇文生，为后来清人称《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为“四史”的滥觞。宋人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为“十七史”（详《十七史商榷》卷九九“十七史”条）。明人又增加《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为“二十一史”。清乾隆时增加新刊刻的《明史》，又增加《旧唐书》为“二十三史”，修《四库全书》时又从《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旧五代史》而成为“二十四史”，此外一律不算正史。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就说：“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以至后来柯绍忞撰《新元史》，要有当时的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明令才列入正史，成为“二十五史”，而《清史稿》虽也有人把它和正史并列，有“二十六史”之称，但也许由于未有明令，这个“二十六史”的叫法就并不通行。为了避免误解，避免人家认为正史而外都是“不正之史”，在今天可以不再用“正史”这个名词而代之以唐人早就使用的“纪传”一词，称之为纪传体史或纪传史。

纪传体史书主要包括纪、志、表、传。纪是以皇帝纪年的编年史，一般有一个皇帝就编写一个纪，纪里按年、月、日记载国家大事和皇帝的政务活动，包括颁行制度法令、任免大臣以及灾异天象、战争、皇帝出巡等，相当于一种本朝大事记。志是关于典章制度以及天文、历法、地理、水利、财经、文化等的专门记述。记述这类内容的还有其他专书，有些专书的史料比志更原始，但全面系统而且头绪清楚的还首推正史里的志。表大体有三类，一种是考虑到分裂时期的史实错综复杂，因而编制了以年、月为纲的年表、月表。一种是把当时的王侯、功臣、将相以及重要的地方军政长官列成表，因为这些人数量太多，除特别重要的另行立传外，一般都编进表里，这样既节省篇幅，又便于查考。另一种是世系表，如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之类。传在正史中所占的篇幅最多，一般有专

传、类传和所谓四裔传。专传是为有地位、有影响的重要人物立传。类传则以类相从，如《旧唐书》就有后妃、皇子、外戚、官官、良吏、酷吏、忠义、孝友、儒学、文苑、方伎、隐逸、列女等类传。四裔传是给兄弟民族和外国立传。

纪传体史书后来多出于官修，虽然难免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之类的曲笔，但总是以实录、国史以及诏令、奏议、行状、家传等比较原始的史料为依据，一般还不致凭空编造捏合。可以说，纪传体正史提供的是最基本的、最成系统的史料。研究历史，必须首先认真阅读纪传史，打好基础，然后才可能正确利用杂史、小说、诗文和出土文物等资料。由于唐代的档案保管和修史制度已趋严密，唐代正史记载更为完整可靠，所以对唐史研究者来说，精熟纪传史就更为重要。认真阅读纪传史，打好研究历史的坚实基础，这是过去我国史学家的老传统。吕思勉曾通读“二十四史”好几遍，杨树达对《汉书》精熟到据说可以全部背诵。陈寅恪精通好多种语言，熟悉敦煌文书、佛教文献，但所撰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引用的主要还是有关的几部纪传史。这些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记取。

提供唐史史料的纪传体史书主要是“二十四史”里的《旧唐书》和《新唐书》，在这里重点介绍这两部书。此外，唐以前的《隋书》，唐以后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也略作讲解。后人对新、旧《唐书》所作的笺注、校勘、考订、补缺等著作，也在这里分别介绍。

《旧唐书》二百卷 后晋刘昫等撰

书名和篇目 此书凡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合二百卷。本名《唐书》，《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以及南宋绍兴刻本都题《唐书》而没有“旧”字。由于北宋时欧阳修、宋祁等重修《唐书》而在这部后晋时所修《唐书》前冠一“旧”字，应是南宋以后的事情。明嘉靖时闻人铨刻本就题《旧唐

书》，沿用至今。今天写文章时如果前面已提过《旧唐书》，后面再提也可省称为“旧书”，和《新唐书》并提，可合称为“两《唐书》”。

唐代记述史事保存史料的制度和成果 要弄清《旧唐书》的史料来源，应先了解唐代记述史事、保存史料的制度。据《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门下省有起居郎二员，“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国史焉”；中书省又有起居舍人二员，“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损益，季终则授之于国史”。所谓“授之于国史”，就是说送交中书省所属的掌修国史的史馆。作为制度，执行起来当然有时认真、有时马虎，如《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起居郎”条所说，贞观初“每仗下议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阁，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高宗时许敬宗、李义府为相，“命起居郎、舍人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复闻机务矣”。武周长寿中，“宰相姚珣建议，仗下后，宰相一人录军国政要，为时政记，月送史馆。然率推美让善，事非其实，未几亦罢。而起居郎犹因制敕稍稍笔削，以广国史之阙；起居舍人本记言之职，惟编诏书，不及他事”。文宗大和九年，“诏入阁日，起居郎、舍人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可见起居郎、起居舍人基本上还是能克尽厥职，并无间断，只是与闻机务的程度不同而已。至于由宰相记录军国大事、撰写时政记的措施，除了武后朝外，德宗、武宗和宣宗等朝都曾实行过。

除起居郎所记的起居注和起居舍人所编的制诰德音按季送史馆、宰相所撰的时政记按月送史馆外，其他部门也根据规定按时把有关材料送交史馆，如《唐会要》卷六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所记：“祥瑞（礼部每季具录送），天文祥异（太史每季并所占候祥验同

报),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蕃夷入寇及来降(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堡、伤杀吏人、掠虏畜产并报),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太常寺具所由及乐词报),州县废置及孝义旌表(户部有即报),法令变改、断狱新议(刑部有即报),有年及饥并水、旱、虫、霜、风、雹及地震、流水泛滥(户部及州县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赈贷、存恤同报),诸色封建(司府勘报,袭封者不在报限),京诸司长官及刺史、都督、都护、行军大总管、副总管除授(并录制词,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刺史、县令善政异迹(有灼然者,本州录附考使送),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京诸司长官薨卒(本司责由历状迹送),刺史、都督、都护及行军副大总管已下薨(本州本军责由历状,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谥(考绩录、行状、谥议同送),诸王来朝(宗正寺勘报)。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又记:“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史馆奏,前件事条虽标格式,因循不举,日月已深,伏请申明旧制,各下本司。从之。大历十四年正月已后至今年十月已前,所有事迹各限制到一月日报,从此已后,外州县及诸军、诸使,每年一度附考使送纳,在京即每季申,便为恒例。敕旨依。”可见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定期向史馆送纳史料,也已成为制度,尽管有时执行得不认真,史馆还能提出来加以整顿,这样就可以保证史馆进行工作。

史馆撰述的成果是实录和国史。实录是由史馆里的史官根据起居郎所记的起居注和起居舍人所编的制、诰、德音撰修的。一般在新皇帝即位后不久便修成老皇帝的实录,有的皇帝在位时就叫史官撰修自己的实录,有时出于政治原因还一修再修。为了修好实录,史官还先编纂日历。如《唐会要》卷六三所载,宪宗贞元元年九月“监修国史宰臣韦执谊奏,……窃见自顷以来,史臣所有修撰

皆于私家纪录,其本不在馆中,褒贬之间恐伤独见,编纪之际或虑遗文,从前已来有此乖阙,自今已后,伏望令修撰官各撰日历,凡至月终即于馆中都会,详定是非,使置姓名,同共封锁,除已成实录撰进宣下者,其余见修日历并不得私家置本,仍请为永式。从之”。据南宋初汪藻所说,这种日历就是把起居注等类次而成的,在皇帝去世后将日历修订一下就成为实录(“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见《宋史》卷四四五文苑汪藻传)。据《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所记载和《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起居注类所著录,从唐高祖到武宗,包括武后在内的十六朝都已修成了实录,其中太宗、高宗、武后、睿宗、玄宗、德宗的实录先后修了两种到三种。昭宗大顺二年,敕修宣宗、懿宗和僖宗实录,但“逾年,竟不能编录一字”。又据《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所记,僖宗咸通中修武宗实录时还修过宣宗实录,昭宗大顺以后的光化初年还在修僖宗、懿宗实录,都未见流传,可能同样没有修成功。

关于撰修国史,《唐会要》讲得不多,据《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卷七三顾胤传、卷一〇二刘子玄吴兢韦述传、卷一四八柳登传、卷一七六崔龟从传的记载,高宗永徽时令狐德棻、顾胤等撰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玄宗朝吴兢撰成八十多卷,韦述再增修成一百一十二卷,肃宗朝柳芳又增补为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止肃宗乾元。以上国史皆为纪传体。后来柳芳又撰成编年体的《唐历》四十卷,起高祖迄代宗大历,宣宗朝令崔龟从等续修三十卷《唐历》,止于宪宗元和末。

由此可知唐代史馆的成果有:从高祖到武宗的实录,从高祖到肃宗乾元时的纪传体国史,从高祖到宪宗元和时的编年体《唐历》。这些就是五代时正式撰修《唐书》的主要凭藉。

《旧唐书》的撰修 《旧唐书》的正式撰修,始于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二月,“诏户部侍郎张昭远、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吏部郎中郑受益、左司员外郎李为光等同修唐史,仍以宰臣赵

莹监修”(《旧五代史》卷七九晋高祖纪)。不久,贾纬居丧停职,又增加吕琦、尹拙。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六月,全书修成,由宰相刘昫领衔进上。这是《旧唐书》传本所题“臣刘昫等奉敕修”的原因。

《旧唐书》的撰修只费时五年,但搜集唐代史料的工作却从后梁时便开始了。梁末帝龙德元年二月,史馆奏请“敕内外百官及前资士子、帝戚勋家,并各纳家传,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术德业灼然可考者,并纂述送史馆。如记得前朝会昌以后公私,亦任抄录送官,皆须直书,不用文藻”(《旧五代史》卷一〇梁末帝纪)。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九月,“以都官郎中庾传美充三川搜访图籍使。传美为蜀王衍之旧僚,家在成都,便于归计,且言成都具有本朝实录,及传美使回,所得才九朝实录及残缺杂书而已”(《旧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纪)。长兴二年四月,“禁人毁废所在碑碣”。五月,“都官郎中、知制诰崔棣上言,请搜访宣宗已来野史以备编修。从之”。长兴三年十一月,史馆奏“大中以来迄于天祐四朝实录尚未纂修,寻具奏闻,谨行购募。……其两浙、福建、湖广伏乞诏旨,委各于本道采访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历、银台事宜、内外制词、百司沿革簿籍,不限卷数,据有抄录上进。若民间收得或隐士撰成,即令如列姓名,请议爵赏”(《五代会要》卷一八“史馆杂录”)。梁、唐二朝这样费心地收集史料,显然抱有撰述唐史的打算。尽管都无建树,但所收罗的史料多少会被后晋史官利用。

虽然前朝史馆已尽力搜罗史料,到后晋开始撰修唐书,仍感资料缺乏。于是监修者赵莹大张旗鼓地征集史料。天福六年四月,赵莹奏称“今据史馆所阙《唐书》实录,请下敕命购求。……请下三京诸道及中外臣僚,凡有将此数朝实录诣阙进纳,请量其文武才能,不拘资地,除授一官。……自会昌至天祐垂六十年(案:这是指武宗会昌以后至唐亡缺少实录的一段时间),其初李德裕平上党著武宗伐叛之书,其后康承训定徐方有武宁本末之传,如此事类,

记述颇多,请下中外臣僚及名儒宿学,有于此六十年内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史馆日历、制敕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指阙进纳”(《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在征集史料方面,不能不说后晋史官已不遗余力。

《旧唐书》的撰修成功,首先得益于历朝反复征集史料,其次归功于赵莹的精心组织,在天福六年的上奏中,他提出了周密的计划和具体的安排。为了撰修本纪,“请下司天台,自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天祐元年甲子,为转年长历一道”;为撰修列传,“请下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两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于官”;为撰修十志,请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部门,具录各方面典章制度的增损沿革。这样安排既扩大了史料来源,又加快了撰修进程。此外,编修者贾纬在诏修唐史之日,即上所撰《唐朝补遗录》(即《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对《旧唐书》的撰修当亦有积极作用。

史料来源和价值 对《旧唐书》这样重要的史书,最好把它的史料来源逐篇逐条都弄清楚,但完全做到这样目前还困难。这里只能粗一点,就纪、志、传几个部分,大体介绍其史料来源并作评价。

(1) 《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条记载了贾纬进上所著《唐朝补遗录》的奏文,其中讲到史馆中“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案:即哀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实录一卷,余皆阙略”。这里所说的“至代宗已有纪传”显系柳芳续撰的国史,“德宗亦存实录”者是德宗以下没有纪传体国史唯存实录之谓(原奏当作“德宗以下”;今本《会要》有脱误),也就是说从高祖至武宗以前都有完整的实录,所以下面说武宗唯有实录一卷,这一卷是会昌元年正月二月,见南宋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衢本卷六实录类(《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起居注类虽著录有韦保衡监修《武宗实录》三十卷,但艺文志序已讲明“今著于篇,有其名而亡其书者,十

盖五六也”。这三十卷《武宗实录》即“有其名而亡其书者”，所以宋敏求补中晚唐列朝实录要从武宗补起。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辑本卷四起居类虽有《唐武宗实录》三十卷，但解題中已说“《邯鄲书目》惟存一卷”，与《五代会要》、晁《志》相合)。因此，可以断定《旧唐书》本纪从高祖到文宗这部分是根据实录撰写或直接抄自国史，而国史本纪也摘自实录，所以《旧唐书》这部分本纪实际上都是实录的节本。所谓实录，当然并非名副其实的如实记录，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真相一般是不会写进去的，为政治需要还经常歪曲事实，即所谓“曲笔”，不过事情发生的年月日一般不致有太大的误差，因为实录是根据逐日记载的起居注和月终详定的日历编写的。就这点来说，实录和实录的节本《旧唐书》武宗以前的本纪就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宋以后唐代实录除顺宗一朝外都已佚失，仅《资治通鉴考异》引用若干片断，因此这武宗以前的本纪就更可宝贵。

(2) 武宗的实录已大部分佚失，宣宗以下的实录并未修成，更无国史、《唐历》可为依据，因此武宗到昭宗以至哀帝的本纪之撰修，只能是根据征集到的残存的日历、制敕册书、诸司吏牒以及时人撰述如贾纬的《唐年补录》之类。《廿二史札记》卷一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指出，宣宗“本纪书吴湘狱案至千余字，咸通八年并将延资库计账贯匹之数琐屑开入，绝似民间记簿，其除官必先具旧衔，再入新衔，如以其官某人为某官，下至刺史亦书于本纪，是以动辄累幅，虽邸抄除目无此繁芜也。然亦有未可轻訾者，凡本纪只略具事由，而其事则详于列传，此书如庞勋之乱，黄巢之乱，李茂贞、王行瑜等之劫迁，朱温之篡弑，即于本纪详之，不待翻阅各传，已一览了如”。今天研究历史要求史料越详细越好，则这部分武宗以下的本纪虽不如前此源出实录之有权威性，却仍有参考价值。

(3) 赵莹奏中提出了十志，即礼志、乐志、刑法志、天文志、律

历志、五行志、职官志、郡国志、经籍志、食货志。撰成的《旧唐书》略有变动，礼志改称礼仪志，律历志改称历志，郡国志改称地理志，又另立舆服志成为十一志。其史料来源当即前引《唐会要》“诸司应送史馆事例”和赵莹奏中所请各部门编录的资料，如《旧唐书》经籍志只“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和赵莹奏中所说“唐初以降，迄于开元，图书大备”云云相符合。当然，记载典章制度的在撰修《旧唐书》时已有《大唐六典》、《通典》和苏冕《会要》、杨绍复《续会要》等专书，但《六典》只记到玄宗开元，《通典》、苏冕《会要》只记到德宗，《续会要》只记到宣宗大中。因此虽然不能排除《旧唐书》的某些志参考过以上这类专书，但肯定有很多是直接采用诸司提供的档案史料，其价值当不亚于这类专书。

(4) 列传一般讲有四个来源。一是实录，实录中本附有重要人物的小传，如今存《顺宗实录》贞元二十一年四月癸酉附张荐传、五月辛卯附令狐恒传、六月乙亥附张万福传可证。二是国史中旧有的列传，赵翼《陔余丛考》卷一“《旧唐书》多国史原文”条列举唐绍传、徐有功传、泽王上金传中称玄宗为“今上”，窦威传、郭元振传称开元时为“今”，陈少游传、曲环传称德宗为“上”，都是《旧唐书》列传承用国史的证明。《廿二史札记》“《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又举出刘仁轨传后有史臣韦述曰云云，而刘仁轨、郝处俊、裴行俭传后史臣曰称仁轨曰刘乐城、行俭曰闻喜、处俊曰甑山，不称名而称爵邑，也是“韦述当日尊呼前辈之称，且非易代后史官之词”。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章第四节也指出：“卢杞、裴延龄等传赞‘史臣曰：臣读陆丞相论延龄疏’，田承嗣等传赞曰‘臣观开元之政’，亦显见为唐国史原文。”这类痕迹如仔细留心还可以发现一些。如刘幽求、钟绍京、郭元振、张说传的史臣曰称刘徐公、郭代公、张燕公，又如郭子仪传后有“史臣裴埴曰汾阳事上诚荅”云云一大段议论。裴埴宪宗元和四年监修国史，已在柳芳撰成国史之后，而陈少游、曲环等传记德宗时事，也非止于肃宗乾元时的柳

芳国史所能包括,可见柳芳以后撰修的国史至少列传部分在后晋时还有若干未毁失,得为《旧唐书》采用。三是征集到的私家传状、谱牒,据《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考功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谈及行状,若死而传于史官,谥于太常,则以其行状质其当不,其欲铭于碑者,则会百官议其宜述者以闻报其家。”又《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载史官李翱奏:“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今之作行状者,非门生即其故吏,……”(《李文公集》卷一《百官行状奏》同)可见国史旧传除采访外多依据行状和据行状撰写的家传、碑碣(后唐长兴三年之禁人毁废所在碑碣就是怕史料损失),再加上采访所得,子孙的名字、官职则本诸谱牒。四是文武显贵官以外的列传,其事迹当如《唐会要》“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所说:“刺史、县令善政异迹(有灼然者,本州录附考使送),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旧唐书》中良吏、孝友、隐逸、列女等类传即是根据国史旧传及史馆所存这类史料,再加采访所得写成,而国史旧传的根据也无非是送史馆的这类史料。以上这几方面构成列传的史料,都是很可宝贵的,因为实录、本纪只有个骨架子,全凭列传来充实血肉。其中出于行状、家传、碑碣的年月多凭事后追记,往往有差错,所记事实也难免有所讳饰,如《廿二史札记》“《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指出的,“褚遂良传不载其倾陷刘洎之事,李世勣传不载其瞻徇立武后之事,辛云京传不载其激变仆固怀恩之事,田神功传不载其先为贼将之事,李勉传不载其逃弃汴城之事”。有些地方还能用采访来加以补救,如很多文武显贵官的列传在夸饰其事迹后往往说几句失德的事情,作点贬词,这就是采访所得。

(5) 给兄弟民族以及外国所立的突厥、迴纥、吐蕃等所谓四裔传,则不同于一般列传、类传。《唐会要》“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中所说“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

并其主名字报),蕃夷入寇及来降(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堡、伤杀吏人、掠虏畜产并报)”,以及实录中有关记载,应是四裔传史料的主要来源。用四裔传和今本《唐会要》互相对勘,发现所纪事实大段符合,有些连文字都一样,但又互有详略,可见既非撰修四裔传者袭用苏冕《会要》、杨绍复《续会要》,也非北宋初王溥修今本《唐会要》时袭用四裔传,而应是二者同出一源。这种史料当然极可宝贵,尽管难免带有民族偏见。

怎样阅读 《旧唐书》既有如上所述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纪传体内容又较全面,因此有志研究唐史者必须以此书为主,认真阅读,打好坚实基础。这里提出一些系统阅读《旧唐书》的方法和建议,供读者参考。

(1) 先读列传,不要一上来就读全书最前面的本纪。因为本纪虽重要,但只记简单的事实,没有写出事实的过程以及前因后果,只有骨架而没有血肉。先读本纪既抓不住头绪,又加深不了印象,因此不如先读列传。列传除后面的类传和四裔传外,文武显贵官即政治舞台上重要人物的都是按时代编排的,可以分单元来阅读,如把高宗、太宗时代的人物作为一单元,高宗、武后、中宗时代的人物作为一单元,睿宗、玄宗时代的人物作为一单元,等等。在阅读每一单元的列传时,可时常查对一下本纪,弄清时间和事件顺序,还要注意在类传如外戚、宦官、良吏、酷吏等传中找到同一时期的人物一起阅读。由于同一事件会在相关的许多人传中都有记载,只是详略程度、叙述角度不同,这样,读完一个时期的列传,就会对较大的事件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掌握了记载某事哪条史料最详最可信据,便于日后研究时利用。然后,再将这一时期的本纪仔细阅读一两遍,以本纪为纲整理一下阅读列传所获得的丰富史实,形成条理清晰、全面系统的认识。接着便可以进入下一个单元的阅读。

(2) 有区别地阅读志。志有其特殊性,牵涉到各方面的典章

制度和各种专业知识。就《旧唐书》来说,职官志、地理志、食货志最为重要。官制、地理几乎每篇列传都遇到,必须把这两种反复通读,并随时翻检查阅。但职官志里的官制职掌只是规定如此,实际其权力之大小常随政治斗争而有变化,读列传时应加以注意,用实例来丰富职官志的内容。食货志则是集中讲财政经济,研究唐代财政首先要通读,同时在读列传时注意搜辑这类事例。刑法志是唐代的法制史,经籍志是书目,和类传里的儒学传、文苑传都是研究学术史的好资料,也都应该通读。礼仪志牵涉到原始宗教信仰和南北朝时期最盛行的三《礼》之学,在这两方面没有基础不易真正读懂,一般浏览即可。舆服志对研究唐代服饰者宜精读,并结合出土文物进行研究,否则只需浏览。天文志、历志讲天文、历法,没有这方面知识者无法读懂,翻翻知道其中写些什么就可以,不必浪费精力。五行志是用“天人感应”学说记载灾异,如果排除迷信成分,所记水旱灾、虫灾、地震等倒是有用的史料,应该浏览。

(3) 阅读的同时就进行研究,这样既易产生兴趣,又易读得深入。可以先从记述史事的矛盾入手,作一些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考辨工作。由于《旧唐书》本纪多出于实录,列传多出于行状、家传,而此人的行状、家传与彼人的又互不相谋,再加上各种途径的采访,《旧唐书》本身讲同一件事就往往有出入,有矛盾。此外《新唐书》、《通鉴》以及其他记载和《旧唐书》之间还互有矛盾。当然,有些矛盾是无关紧要的,或很容易解决的,如《旧唐书》卷五一高宗废后王氏传,先说王皇后和萧良娣被废后,武后“令人皆缢杀之”,后面又说武后把他俩“截去手足,投于酒瓮,……数日而卒”,人哪能死两次呢?很明显,后者是采自传闻,而且太不近事理,当系武后的反对派编造以甚其恶。至于无关紧要的小矛盾更到处可见,既无关紧要,就不必浪费精力去考证,考证应放在关系重大的事情上。如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临死之前,据《旧唐书》本纪,在位的宰相只剩下长孙无忌、褚遂良。死后第二天,皇太子高宗方增加于志

宁、张行成、高季辅三人为宰相。据卷七八张、高的列传，却在太宗死前就做了宰相。本纪源出实录，任命宰相这样的大事所纪年月一般不会有差错，《新唐书》卷六一宰相表也全同《旧唐书》本纪，《旧唐书》张、高传应是根据行状、家传而出了差错。一般宰相早当一年迟当一年无关紧要，但在这里却说明了一个重要史实：长孙无忌是太宗的妻兄，又是和太宗一起发动玄武门之变的首要人物，褚遂良资历浅，是靠检举揭发他人有功而被不次升擢的，都是太宗极端亲信的私党。只让这样的私党当宰相，说明太宗晚年的用人圈子已越来越缩小，而高宗上台后必然要千方百计去掉先皇的这两个私党，以维护自己的权力，长孙无忌、褚遂良后来被贬杀有其必然性，并非高宗听信了武后才这么做。这样的考证才对揭示历史真相有帮助。还有些被有意歪曲了的史实也需要作考证，如高祖的太子建成、四子元吉在《旧唐书》的多数地方被说得毫无功劳，《新唐书》、《通鉴》等书也是如此，这显然是玄武门之变后史官秉承太宗的意旨歪曲伪造了历史，如《旧唐书》太宗本纪讲平定东都后只说太宗带了人马凯旋，卷六七李勣传说“太宗为上将，李勣为下将”带人马凯旋，故意抹掉元吉的名字，但事实上元吉是在这次战役中立了大功的，当李世民分兵去对付窦建德时，元吉就承担了包围洛阳、钳制王世充的重任，使李世民无后顾之忧。这个事实在《旧唐书》元吉传里透露了出来，《通鉴》卷一八九据柳芳《唐历》写凯旋时的情况也作“世民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将从其后”，可见一手终难掩天下目，只要仔细钩稽，被歪曲了的历史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恢复本来面目的。除了考辨史实外，还可以选择专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这样在研究中熟悉史料、驾驭史料，将会产生最佳的阅读效果。

版本 古书经过传抄重刻，往往会产生脱漏差错，时代早的版本一般善于后来的重刻本，但如果重刻时作过认真的校勘，或找到更古的善本作依据，则重刻本又可成为善本，胜于时代较早的版

本。可供研究唐史的史料书除新编印者外,凡属古书一般都不止一个版本,究竟用那个版本好,那个版本较为易得,都需要给读者作介绍。这里先介绍《旧唐书》的版本:(1)宋代有刻本,但由于《新唐书》盛行,此书读者少,印本流传不广,到清代只残存南宋绍兴时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六十九卷,旧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建国后归北京图书馆。(2)元、明到清初此书的地位长期为《新唐书》取代,甚至被挤出了正史行列,因此历久不见重刻,到明嘉靖时重刻古书成为风尚,此书才有嘉靖十八年的闻人铨刻本(以下简称“闻人本”)。据闻人铨刻书序说所据“遗籍俱出宋时模板”,则是用宋本重刻,但与现存南宋绍兴残本在文字上又间有异同,因此有人认为系“别据一宋刻”(如《十七史商榷》卷六九“《旧唐书》各种本不同宜择善而从”条所说)。又有人认为仍是出于绍兴本,与宋刻间有异同当系闻人铨所据宋刻不全而用抄本补缺的缘故。不管怎样,自有闻人本后,《旧唐书》才能以完整面目流传下来,不再有如《旧五代史》原本那样失传的危险。现在闻人本又已成为难得的善本书。(3)至乐楼抄本,不知是明抄还是清初抄,每卷卷后所题校勘人名和绍兴本相同,可能即从绍兴本传抄。清初藏书家叶万据以校闻人本,但只校了一半,可能抄本本来就不完全。其后抄本和叶校原本均不知去向,仅铁琴铜剑楼藏有清中叶顾之逵临校叶本,即校于闻人本上,建国后归北京图书馆。(4)清乾隆四年校刻“二十三史”,收入《旧唐书》与《新唐书》并列,重新恢复《旧唐书》的正史地位。清前期中期撰修刊刻书籍的地点在武英殿,因此通称武英殿刊刻的书籍为“武英殿本”或简称“殿本”。殿本正史除《明史》外每卷后面都附有考证,殿本《旧唐书》的校刊考证都出于沈德潜等人之手,据书后沈德潜用“上言”形式所写的跋语,是用闻人本为底本,再用《新唐书》、《通鉴》、《通鉴纲目》、《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文苑英华》、《唐文粹》和《新旧唐书合抄》等加以校勘考证。沈德潜本是诗人,不懂史学,从上述用以校勘的书籍之杂乱无章,

就已显示其浅薄,在跋语中竟说闻人本“表全散轶”,认为《旧唐书》原是有表的,岂非绝大笑柄!因此,所附考证也只能引用一些《新旧唐书合钞》的陈说,敷衍塞责,很少自己的心得,正文则往往据他书随便改窜,若干地方失去了《旧唐书》本来的面貌,实在不如闻人本。殿本“二十三史”在乾隆四十九年增刻辑本《旧五代史》成为殿本“二十四史”,覆刻和影印的本子极多,常见的有咸丰时广州陈氏覆刻本,光绪时成都书局覆刻本,光绪时同文书局、五州同文书局两种影印本,图书集成局扁铅字排印本,竹筒斋剪贴影印本,民国时商务印书馆剪贴影印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排印本,开明书店“二十五史”影印本。“二十五史”是影印殿本“二十四史”加上退耕堂原刻《新元史》,在每种史后都附有参考书目,惜去取不尽确当,更欠完备。此外,同治、光绪时金陵(在南京)、江苏(在苏州)、浙江(在杭州)、淮南(在扬州)、崇文(在武昌)五书局合刻本“二十四史”则“十七史”覆刻明末毛晋汲古阁本,其余重刻殿本,《旧唐书》为浙江书局重刻殿本。(5)清道光二十年扬州岑建功惧盈斋刻本,校刻工作则由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文淇等人主持。这个本子是根据殿本仿照汲古阁“十七史”版式重刻的,大概由于殿本是官书的缘故,其实用闻人本重刻才对,这是岑本的最大缺点。但书后所附刘文淇等人撰写的校勘记六十六卷,用闻人本和其他史料校殿本,远胜殿本沈德潜的考证。书后所附逸文十二卷,则多辑自《太平御览》里标名为《旧唐书》、《唐书》的文字,虽然这《旧唐书》、《唐书》未必真是刘昫进上的《旧唐书》(岑仲勉认为是旧国史、实录之类,见所著论文《旧唐书逸文辨》,载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但汇集到一起也方便阅读。(6)民国时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主持下编印了一部汇集各种旧刻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旧唐书》用南宋绍兴刻残本六十九卷影印,缺卷用闻人本配印,绍兴本久属孤本,闻人本亦已难得,有了这个百衲本,一般历史研究工作者才能见到这两种旧刻本的真面目。另外,张元济还撰

唐書列傳卷第十八

劉

响

等修

尉遲恭德

秦叔寶

程知節

段志立

張公謹

尉遲恭德朔州善陽人大業末從軍於高陽討捕羣賊以武勇稱累授朝散大夫劉武周起以為偏將與宋金剛南侵陷晉煇二州恭德深入至夏縣應接呂崇茂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唐儉等武德三年太宗討武周于栢壁武周令恭德與宋金剛來拒王師於介休金剛戰敗奔於突厥恭德收其餘眾城守介休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恭德與尋相舉城來降太宗大悅賜以曲宴引為右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於東都既而尋相與武周下降將皆叛諸將疑恭德必叛囚於軍中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咸言恭德初歸國家情志未附此人勇健非常繫之又久既被猜貳怨望必生留之恐貽後悔請即殺之太宗曰寡人所見有異於此恭德若懷翻背之計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

有《校史随笔》二册(商务印书馆本),用札记的体裁记述各种旧刻正史的源流,以及百衲本所据旧刻的优点,很值得一读。百衲本“二十四史”建国后商务印书馆又出过缩印精装本。台湾也影印有仁寿本“二十六史”精装七十册,其中除《史记》改用北宋景祐监本,并增添《新元史》和台湾“国防研究院”修订本《清史》外,均一仍商务百衲本之旧。(7)建国后60年代起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70年代已出齐,其中多数比较好,在“十年动乱”中点校出版的则有少数不理想,1975年出版的新旧《唐书》即是颇不理想的两种,《旧唐书》点校底本不用保存旧刻面目的百衲本,而用经沈德潜等改窜过的殿本的岑建功重刻本,已是失策,而且点校也极草率。校的问题一是并无严格的校例,如卷一九〇下文苑李白传“山东人”下竟出校勘记引用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的考证来否定李白是山东人之说,完全超出校勘文字的范围,照此办理则前人近人对《旧唐书》失实之处的考证都得统统收进校勘记里,可是又未这样做,这岂非自乱其例?二是继承了殿本改窜文字的坏作风,根据《新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等随便改动原书,仅在卷后的校勘记里说明一下,有些《旧唐书》的记载本来与《新唐书》等不同,也硬要用《新唐书》等来改《旧唐书》,这是给原书作修改,哪是在作校勘?此外,校点分段之错误失当就更常见,个别地方还出现整个句子被漏掉未印的情况。至于书前出版说明之大讲“儒法斗争”,则倒是“十年动乱”中司空见惯的官样文章,不足为怪。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 北宋欧阳修、宋祁撰

书名和篇目 此书凡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合二百二十五卷。本来和《旧唐书》一样也叫《唐书》,今存各种南宋刻本、明刻本的卷首大题(即书名)还都不加“新”字。正式在卷首大题加“新”字作《新唐书》是始于清武英殿本。但《新唐书》这个名称的出现倒还是很早的,书成三十年后吴缜对此书作

纠谬即称之为“新书”，题所撰曰《新唐书纠谬》；司马光撰《通鉴考异》引用此书本纪、志、传时也称为新本纪、新纪、新志、新传；以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也都径称为《新唐书》，以与《旧唐书》区别。今天写文章时如前面已提过《新唐书》，后面也可省称为“新书”。

撰修 有了后晋时官修的《唐书》，北宋时为什么重新官修一部《新唐书》？这在《新唐书》卷首的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六月曾公亮进书表里讲得很清楚，是认为后晋所修的“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并说这是由于撰修者身处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隳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后来绍兴元年吴缜进《新唐书纠谬》表中也说，后晋撰修《唐书》者“辍辑旧闻，次序实录，草创卷帙，粗兴规模，仅能终篇，聊可备数，斯盖时异光华之旦，人非宏杰之才，辞采不足以发挥幽潜，书法不足以耸动观听，记述取舍，乖戾舛差”。可见这是当时共同的看法，即认为《旧唐书》撰修者水平不高，书的质量差，所以要重修。总之是出于学术原因，而不是像唐代重修实录那样是出于政治原因。

重修《唐书》的建议是宰相贾昌朝向仁宗提出的。第二年，即庆历五年（1045年）五月，仁宗下诏开局重修。关于参加修撰的人员，曾公亮进书表提到了一些，但并不完备，精熟宋、元史的清代学者钱大昕编写过《修唐书史臣表》，收入所著《廿二史考异》卷五六里，按《新唐书》撰修的年月备列提举官、刊修官、编修官姓名。提举官即主持重修工作的，照习惯由宰相担任，先后担任的有贾昌朝、丁度、刘沆、王尧臣、曾公亮。刊修官有点近似后世的总纂、总编，前期以宋祁为主，后期则多由欧阳修承担。编修官协助刊修官撰修，人数多一些，比较重要的有吕夏卿、宋敏求、刘羲叟、范镇、王畴。这个阵营是很强大的，两个刊修官都是当时的大文豪，编修官

中不少是唐史专家。如吕夏卿“学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宋史》卷三三一本传）。宋敏求“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百四十八卷，他所著书甚多”，“王尧臣修《唐书》，以敏求习唐事，奏为编修官”（《宋史》卷二九一本传）。即使这样，撰修工作仍费时十七年之久，在仁宗嘉祐五年六月修成全书，正值曾公亮担任最后一任提举官，遂领銜呈上进书表。关于撰修的分工，宋人赵彦卫说“本朝修《唐书》，曾鲁公提举，欧阳公分修帝纪，宋祁公修列传，而志、表则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分修”（《云麓漫钞》卷五），又史载刘羲叟修《唐书》时“专修律历、天文、五行志”（《宋史》卷四三二本传）。书成题名时当然不能这么琐碎，因欧阳修主撰纪、志、表，宋祁主撰列传，所以并题二人名，但这已是破例了，“旧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欧阳公官高当书，公曰：‘宋公于传功深日久，岂可掩其名，夺其功。’于是纪、志、表书公名，而列传书宋公”（《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五欧阳发等述《事迹》），今《新唐书》传本即如此分题。又据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书进上后朝廷还付裴煜、陈荐、文同、吴申、钱藻校勘，然后颁行。

新旧《唐书》优劣之争 《新唐书》的撰修者当然认为重修的《唐书》远胜于《旧唐书》，曾公亮进书表就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把“文省事增”作为《新唐书》的一大优点。此外，《新唐书》的编修官吕夏卿还撰写了四卷《唐书直笔》，前三卷主要是仿照《公羊传》、《谷梁传》解释《春秋》一字褒贬的方法，来讲述《新唐书》某些行文措词的理由，即所谓“书法”，第四卷“新例须知”则主要讲新书废掉旧书哪些列传，增添哪些列传。据《郡斋读书志》衢本卷七史评类《唐书直笔》条说：“此其在书局时所建明，欧、宋间有取焉。”则并非根据修成的新书所撰写，而只是修书过程中的建议，因此其中确有许多和新书不相吻合的地方，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唐书直笔》已经四库馆加案语指出“新例须知”中列传增损和新书颇

有异同,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唐书直笔新例》也指出《直笔》中所讲书法和新书不合。但至少说明撰修《新唐书》时确有志于讲究书法,否则吕夏卿不致在四卷建议中几乎用了三卷来讲书法。赵翼《陔余丛考》卷一〇“新旧《唐书》本纪书法互有得失”条、《廿二史札记》卷一六“新书本纪书安史之乱”条就找出欧阳修撰写本纪的若干书法。这种书法在《旧唐书》以及前此的纪传体正史里都是不甚讲究的,《新唐书》开始讲究,以远绍《春秋》自期,在撰修者欧阳修等心目中当然也认为是一大优点。

但《新唐书》颁行不久即引起不满。吴缜写了《新唐书纠谬》,在找出新书事实上大量差错的同时,并认为撰修者是“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他主张“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为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为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案:似当作‘书’)。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书之病,正在于此。其始也,不考其虚实有无,不校其彼此同异,修纪、志者则专以褒贬笔削自任,修传者则独以文辞华采为先,不相通知,各从所好,其终也遂合为一书而上之,故今之新书,其间或举以相校,则往往不啻白黑方圆之不同,是盖不考事实不相通知之所致”。此外,吴缜对“文省事增”的事增也提出异议,他认为增出的事“多采小说而不精择”,而“唐人小说类多虚诞”(均见《新唐书纠谬》序)。吴缜这些看法为后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承用,晁《志》说“议者颇谓永叔(欧阳修)学《春秋》,每务褒贬;子京(宋祁字)通小学,惟刻意文章,采杂说既多,往往抵牾,有失实之叹”(袁本卷二上、衢本卷五),陈《录》说“本纪用《春秋》例,削去诏令,虽太略犹不失简古,至列传用字多奇涩,殆类虬户铄溪体,识者病之”(辑本卷四)。

尽管有些不满的议论,在宋代以至元、明到清前期一直是《新

唐书》占优势,其间只有明嘉靖时闻人铨重刻《旧唐书》时文徵明所撰写的叙里,沿用晁《志》、陈《录》旧说作了点扬旧抑新之论。到了清代中期,主张新、旧不可偏废之说才转而占上风。乾隆四年将旧书和新书同时刊刻,恢复了旧书的正史地位,《四库提要》说“正史之中二书并列,相辅而行,诚千古至公之道”。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九“二书不分优劣”条说“平心观之,二书不分优劣,瑕瑜不掩,互有短长”,又说“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旧书则纪、志、传美恶适相等”。赵翼《陔余丛考》卷一〇、一一、一二,《廿二史札记》卷一六、一七、一八更花了大量篇幅对旧书和新书的增损优劣作了探讨论述,这些论述对阅读《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有启发帮助。

今天若要判定优劣,只能从史料角度来衡量。如果从史的角度来衡量,则无论旧书、新书都不符合今天的要求,都是不合格的。就新书来说,虽然列传的编排比旧书较有秩序,但总是用封建正统的观念来归类,如把黄巢和发动内乱的军人安禄山、史思明、朱泚等同列,还特地加上“逆臣传”的总名。本纪的所谓“书法”,也都是以维护封建正统的立场来进行褒贬,这和《公羊传》、《谷梁传》之解《春秋》一样早为识者所抛弃,更不能看作是新书的什么优点。从史料角度来衡量,则由于本纪和列传的史料来源不同,不仅旧书纪、传间有矛盾是合理的,新书仍而不作统一也合理,因为统一了反而使异说有湮没的危险,对于今天探讨史实的真相极为不利,吴缜找出这些矛盾是很好的,对此攻击则是不对的。新书本纪学《春秋》写得那么简,甚至把旧书本纪里的诏令统统删掉,这种“文省”都是不对的,这将丢失很多宝贵的史料,如果保存这些史料的旧书不幸真的失传,新书这么做岂不造成绝大的损失!新书在承用旧书列传的同时增添了若干史料,并且增添了旧书所没有的大量的列传,尤其旧书所最缺略的中晚唐人列传,这种“事增”当然是好事,缺点是不注所增史事的出处,也不像《通鉴》那样另有“考异”以

说明其史料来源,但不注出处、不作考异本是撰写正史的传统办法,新书不能突破自可原谅。新书列传最大的问题仍是“文省”,硬把旧书列传的文字压缩,往往压掉了有用的史料。再一个大问题是一味追求古雅,把旧书原来文从字顺的文字改成涩体,甚至把原来用骈体文写的诏令、奏议也改成涩体,还喜欢用许多早已死去的古字来更替常用字,弄得满纸佶屈聱牙(《陔余丛考》卷一一“《新唐书》文笔”条就举了很多这类怪例子),这样就容易使原来的史料走样,而读起来困难、甚至读不下去倒还是小事。

当然,这样评论不是完全抹煞古人,古人的史学水平总难免受时代所局限。如史与史料的区别,是清代乾嘉时的章学诚首先提出来的,但仍未被同时学者所认识接受,以致像赵翼这样认真读史的学者,在评论旧书、新书的优劣时还未能把史料和史区别开来立论。因此需要在这里重作如上的评论,使读者在接触这个新旧《唐书》优劣公案时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样对阅读《新唐书》也会带来方便。

怎样阅读 弄清楚新旧《唐书》的优劣,自然知道要以阅读《旧唐书》为主,因为《旧唐书》保存的史料较为原始,不像《新唐书》那样大肆改窜过。而《新唐书》则不应孤立地从头到尾读,应该结合《旧唐书》来读,也就是说,在读《旧唐书》的同时用《新唐书》来对勘补充。说具体点:

(1)《新唐书》本纪由于学《春秋》,讲书法,求简,弄得字数不到旧书本纪的三分之一,而且失去了实录的原来面貌,当然不能作为主要依据,而必需依据实录的节本旧书本纪。不过旧书本纪既是实录的节本,在去取上不可能十分精当,有些有用的史料会被旧书本纪弃去不录。而撰修新书时旧书所利用的高祖到武宗以前的实录仍存在,可以被新书本纪所利用。因此从高祖到武宗以前新书本纪比旧书本纪多出的条目当是出自实录,可用来补旧书本纪的不足。至于武宗以下,修旧书时无实录可凭,而新书的编修官宋

敏求却补撰有武宗以下六世实录一百四十八卷(《郡斋读书志》未著录,《直斋书录解题》起居注类著录,但今辑本《解题》文字有脱误,不足据,《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编年类则作武宗二十卷,宣宗三十卷,懿宗二十五卷,僖宗三十卷,昭宗三十卷,哀帝八卷,合一百四十三卷),可作为撰修新书武宗以下本纪的依据。宋敏求“家藏书三万卷,皆略诵习,熟于朝廷典故”(《宋史》本传),所补实录在史料采择上自有胜于旧书武宗以下本纪之处,因此武宗以下本纪不能以旧书为主,要新、旧并用。新书本纪有时增出条目,有时还纠正旧书本纪的错误。如僖宗广明元年黄巢攻占长安后,官军反扑,唐弘夫等曾一度突入长安,为黄巢歼灭,其事旧书本纪记于中和二年二月,宋补《僖宗实录》、新书本纪则为中和元年四月(《通鉴》从后者,见卷二五四并《考异》),今据当时身在长安的韦庄所写的《秦妇吟》,证实宋《录》和新书本纪是正确的。这类事例尚多,读本纪时必需注意。

(2)《旧唐书》十一个志,《新唐书》十三个志,即将《旧唐书》的仪、音乐二志并为礼乐志,新增仪卫、选举、兵三志,另将旧书的舆服志改名车服志、职官志改名百官志、经籍志改名艺文志,历、天文、五行、地理、食货、刑法六志的名称则一仍旧书。撰写这十三个志,确实花了很大的气力,《十七史商榷》说新书的志和表在全书中最佳是不错的,它不是像列传那样把旧书列传的文字压缩一下,有时再添加点史料就成为新传,而是全部另起炉灶,不仅新创立的三个志,和旧书名目相同或相当的十个志也都彻底重新写过。这十个志在内容上和旧书出入最大的是艺文志,旧书经籍志只记到开元时,新书艺文志则记到唐末,因此查考唐人的著作主要用艺文志。地理志则新书较旧书也有很多增损,旧志总序说“今举天宝十一载地理”,河北道末也说“今记天宝承平之地理”,但记州县沿革时仍间或提到元和、长庆、大中、景福以至天复、天祐时的情况,新志据《十七史商榷》卷七九“天祐”条推测,“叙各道

疆域则以开元十五道为正,叙户口则以天宝为正,叙州郡建置沿革则以天祐为正”,但实际上出入仍很多。史念海撰《两唐书地理志互勘》(分载《禹贡半月刊》第三卷二至六期及第九期),可供阅读新、旧两地理志时参考。旧书职官志开头有自高祖到肃宗至德时职官的增损沿革,有正从九品上下阶的职事官、散官、勋官、爵的名目和所作的解释,新书百官志则概行删削,而写了一大段宰相制度和翰林学士制度的沿革,这些都很有用,都应细读,其他职官名称及职掌的大框框虽无甚出入,所述细节及所附加的小注仍多异同损益,也可互相校勘补充。新书食货志较旧书增多一卷文武官禄米、职分田、公廩田、俸料钱等制度沿革的记述,其他记述则两志互有详略,亦间有异同,如租庸调制“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之说就仅见于新志。新书礼乐志乐的部分将旧书音乐志所载乐章全部删去,礼的部分则按吉、宾、军、嘉、凶五礼次序全部重写。此外新书车服、历、天文、五行、刑法五志和旧书也均有详略异同,都得同时参考阅读,不宜偏废。至于新书新增的三个志,选举志写得还算好,和其他记述唐代选举的文献相比较,《通典》选举典只讲到盛唐,《唐会要》选部、贡举二门所录原始史料虽多,也苦于零散而无条理,新书选举志则对将近三百年的始末沿革大体讲出了个头绪,而且所讲又是关系到唐代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大事,应该认真阅读。兵志讲唐代兵制、马政,当然也是大事,《唐会要》所录兵制史料太零散,《通典》兵典又只讲战例不讲制度沿革,新书增加兵志自很有必要。可惜志中议论多而条理并不清楚,史料也不够充实,如说“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为弘骑,弘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就和事实不甚相符,弘骑在唐代兵制演变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而节度使的部队来源于“健儿长住边军”这点,在兵志中竟完全没有提到,直到唐长孺撰写《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才予以解决(唐文原载 1948 年 12 月《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吕思勉《隋唐五代史》

第二〇章第九节已择要引用),可见这个兵志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当年新书的编修官吕夏卿就另行撰写《兵志》三卷,见《郡斋读书志》衢本卷六杂史类,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唐长孺则另撰有《唐书兵志笺证》四卷(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引用大量文献,对新书兵志的史料来源作了考索,对其中的错误作了纠正,是阅读新书兵志、研究唐代兵制的必备参考书。新书新增的还有个仪卫志,可供研究仪仗服饰参考,不必细读。

(3)《旧唐书》无表,《新唐书》恢复了《史记》、《汉书》有表的老传统,编撰了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种表。这种所谓“旁行斜上”的表当然无从通读,只能粗粗地翻一遍,知道表里有点什么,以后需要时去查。这四种表中,宰相表是继承《汉书》百官公卿表制作的,按年记载某月某日宰相的任免,有姓名和具体职称,宰相一格下面还附有三师、三公各一格,记载三师、三公的任免,以后有表的纪传体史几乎都仿照此格式编制宰辅表(《宋史》、《明史》)、宰相表、三公表(《元史》)以至七卿表(《明史》),来表明中央执政者之任免递嬗。不足之处是唐代的宦官从玄宗开元时起已成内朝权力之执掌者,成为和外大臣宰相并称的内大臣,新书没有编制个详细的宦官表,把重要的内职如内侍监、枢密使、左右神策中尉等按年月日姓名表列出来(旧书宦官传、新书宦者传所传的人总嫌太少,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另外,翰林学士后来也有“内相”之称,比徒有虚衔的三师、三公重要得多,新书也没有在宰相表里给它增加一格位置。这些可能是修新书时没有考虑到,也可能是史料缺乏,不像宰相任免有实录、本纪可资依据。现在新书的宰相表和本纪是大体相同的,但使用时也要随时参阅本纪包括旧书以注意其有无违异。方镇表是根据中晚唐藩镇割据的特殊情况编制的,并溯源到盛唐,分别各个藩镇,按年详记其沿革,包括名称的增损更易和管区的盈缩,把纷如乱丝的藩镇割据初步清理出头绪,研究唐史尤其研究中晚唐史检读有关节度使

的列传时要随时参考这个方镇表。不过这个表所记沿革“与旧地志所列至德后四十七使及杜氏《通典》州郡门皆有互异处”(《十七史商榷》卷八三“方镇表与他家互异”条),和《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所记也有出入,使用应该注意。这个表的缺点是没有把各镇历任节度使的姓名列上,直到近代吴廷燮撰作《唐方镇年表》才弥补了这个缺陷。宗室世系表和宰相世系表性质相同,不过宗室世系表是就李唐宗室分房表列世系,宰相世系表是按任职的先后分别列出各姓宰相的先世后裔,每一格列一代,如第二格为第一格之子、第三格为第一格之孙则二表相同。我国自魏晋时代士族地主兴起以来,社会上即重视门阀谱牒,《隋书》经籍志在史部专门设立了“谱系”这个类目,著录了许多帝王谱、百家谱、某氏某家谱,到唐代士族地主虽日见衰败,讲门阀、修谱牒之风还未完全消歇,旧书经籍志和新书艺文志里都有谱牒类著录了前代以及唐人所编撰的大量谱牒书,因此新书编制这两个世系表既有必要,也有足够的资料作为凭藉。现在唐人所编撰的谱牒书除林宝《元和姓纂》外都失传了,因此这两个世系表就更可宝贵,和《元和姓纂》有同样的价值,可供研究唐代显贵人物的家族关系以及考证是否士族抑庶族之用。缺点是这一家族中必须有人作过宰相才能名列宰相世系表,没有人做宰相的家族世系在这个表里就无从查考。再一点是当时因为讲究门阀,伪造世系给自己拉些阔祖宗的事情也屡见不鲜,世系表和《元和姓纂》以及出土的唐人墓志上所载世系往往有出入,就有出于伪造的可能,这点在利用世系表时也需要注意。

(4)《新唐书》的列传从史料来讲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完全根据《旧唐书》列传节略改写,这就专读旧传即可,引用时也只能引用旧传而绝对不能引新传,因为尽可能引用比较原始的史料是从事科研撰写论文必需遵循的原则。一种情况是新传承用旧传,但另外增添了一些史料,有时增添的史料还比较多,有时根据别的

史料来写和旧传有所不同,《陔余丛考》卷一二开头一条的标题就说“新书列传内所增事迹较旧书多二千余条”,《丛考》这一条以及《廿二史札记》卷一七“新书增旧书有关系处”、“新书增旧书琐言碎事”诸条还列举了新传增添史料的大量实例。此外清人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中用新传来增补旧传之处也可参考。问题是新传所用的这些新史料是从哪里来的,《廿二史札记》卷一七“新书立传独详处”条曾指出“刘晏、李泌、陆贽、李绛、高骈、高力士六传所增于旧书几至倍蓰,盖刘晏传则本于陈谏所论刘晏之功有二害二利也,李泌传则本于李繁所作《邺侯家传》也,陆贽传则本于《宣公奏议》也,李绛传则本于蒋偕所撰遗事七篇也,高骈传则本于郭廷海《广陵妖乱志》也,高力士传则本之《巫山记》也(案:当作《高力士外传》),亦可见景文采辑之勤矣”。当然可以查考者还不止这几个传,如新书安禄山传就很明显抄自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其他也最好再能考出一些,因为史料来源不同,其可信程度也不相同,如《安禄山事迹》、《高力士外传》和《陆宣公奏议》等固都可信,李繁所作《邺侯家传》则新书繁传已说“言多浮侈不可信”,只是“掇其近实者著于传”,其实“近实”与否还不是出于修新传者主观臆断,因此使用有关李泌史料时宁相信旧传而不应随使用新传。还有一种情况是旧书无传而新书增添的传,为数极多,计有卷七七后妃懿宗淑妃郭氏、懿宗恭宪皇后王氏,卷七八宗室李从晦、李戡,卷八一三宗诸子嗣薛王知柔,卷八三诸帝公主(其中惟平阳公主、太平公主二传已分别见于旧书柴绍传、外戚传),卷八八姜宝谊、元仲文、秦行师,卷九一温佶、温庭皓,卷九五高重,卷九九李安静,卷一〇六杜咸、赵来章,卷一〇七赵元,卷一〇八裴稹、裴倩、裴均,卷一一〇史大奈、冯子猷、契苾明、泉男生、泉献诚、论弓仁、论惟贞,卷一一二韩思彦,卷一一六王搏、陆希声,卷一一七裴仙先,卷一一八韦维、韩朝宗、宋务光、吕元泰,卷一一九武平一,卷一二〇卢袭秀、崔碣,卷一二二韦縯,卷一二四姚合、姚勛,卷一二五苏洵、苏震、苏幹,卷

一三一宗室宰相李夷简、李廊，卷一三二柳冕，卷一三六荔非元礼、李国臣、白孝德、张伯仪、白元光、陈利贞、侯仲庄、柏良器、乌承玘，卷一四三元结、戴叔伦、徐申，卷一四五严郢，卷一四六李栖筠，卷一四八康日知、牛元翼，卷一五一董溪，卷一五九樊宗师，卷一六二独孤及、独孤庠、顾少连，卷一六四卢景亮、王源中，卷一六五郑珣瑜、郑裔绰，卷一六六杜孺休、杜凯，卷一七一石洪，卷一七六皇甫湜、卢仝、贾岛、刘义，卷一七七郑薰、敬晦、韦博，卷一八二萧邺、卢简方、韦琮、裴坦、郑延昌、王溥、卢光启、韦贻范，卷一八三韩偓，卷一八六周宝、王郢、邓处讷、雷满、陈儒、刘巨容、冯行袭、赵德湮、赵匡凝、杨守亮、杨晟、顾彦朗、顾彦晖，卷一八七王珙、王珂、高仁厚、赵犇、赵昶、赵珣、田颀、朱延寿，卷一九〇刘建锋、成汭、杜洪、钟传、刘汉宏、张雄、王潮、王审邽、刘知谦、卢光稠，卷一九一忠义王行敏、卢士睿、李育德、吴保安，卷一九二忠义贾循、雷万春，卷一九三忠义张兴、蔡廷玉、孟华、周曾、黄碣、孙揆，卷一九四卓行何蕃，卷一九五孝女张士岩、焦怀肃、张进昭、张公艺(以上四人附序末)、任敬臣、支叔才、程袁师、武弘度、宋思礼、郑潜曜、沈季诠、许伯会、赵师举、徐元庆、余常安、梁说、康买得(以上五人附张琇传末)、侯知道、程俱罗、何澄粹、李兴(以上二人附侯、程传末)、许法慎、林攢、陈饶奴、王博武、万敬儒、章全益，卷一九六隐逸朱桃椎、秦系、张志和、陆羽、陆龟蒙，卷一九七循吏罗珣、韦丹、卢弘宣、薛元赏、何易于，卷一九九儒学沈伯仪、彭景直、张齐贤，卷二〇〇儒学徐安贞、陈贞节、施敬本、卢履冰、王仲丘、康子元、侯行果、赵冬曦、尹愔、陆坚、郑钦说、卢僎、啖助、韦彤、陈京、畅当、林蕴，卷二〇二文艺吕向、郑虔、苏源明、梁肃，卷二〇三文艺李观、欧阳詹、欧阳柅、李频、吴融，卷二〇四方伎袁客师、杜生、邢和璞、师夜光、罗思远、姜抚，卷二〇五烈女房玄龄妻卢、李畬母、汴女李、贤贞节妇李、符风妻玉英、高壑妻秦、王琳妻韦、卢惟清妻徐、饶娥、金节妇、高愍女、杨烈妇、贾直言妻董、李孝女妙法、段居贞妻谢、杨含妻萧、郑孝

女、李廷节妻崔、殷保晦妻封徇、窦烈妇、山阳女赵、周迪妻、朱延寿妻王，卷二〇六外戚郑光，卷二〇七宦者骆奉先、马存亮、严遵美、仇士良，卷二〇八宦者刘克明、刘季述、韩全海、张彦弘，卷二一〇藩镇魏博田怀谏、何弘敬、何全皞、罗绍威，卷二一二藩镇卢龙杨志诚、史元忠、李茂勋、刘仁恭，卷二一三藩镇淄青横海程怀信，卷二一四藩镇宣武彰义泽潞邓惟恭、吴少诚、李佐之、李师晦、李丕，卷二一七下拔野古、仆骨、同罗、浑、契苾、多览葛、阿跌、葛逻禄、拔悉密、都播、骨利幹、斛薛、鞠、俞折、跋马、大汉、黠戛斯、坚昆，卷二一八沙陀，卷二二〇流鬼、儋罗、达末娄、达妮，卷二二一上朱俱波、甘棠、喝盘陀、摩揭陀、那揭、乌荼、章求拔国、悉立，卷二二一下安、东安、东曹、西曹、中曹、石、怖捍、米、何、火寻、史、那色波、宁远、小勃律、吐火罗、挹怛、俱兰、劫、越底延、谢颀、帆延、石汗那、识匿、似没、役槃、俱蜜、护蜜、箇失蜜、骨咄、苏毗、多弥、伊吾城、师子、陀拔斯单、俱位、新城、末禄、苦、都盘、勃达、阿没、沙兰、罗利支、怛满，卷二二二下罗刹、婆罗、殊奈、哥罗、拘婆蜜、扶南、投和、瞻博、千支、哥罗舍分、修罗分、甘毕、多摩菴、室利佛逝、名蔑、单单、罗越、两爨蛮、昆明蛮、松外蛮、西洱河蛮、西原蛮，卷二二三下奸臣蒋玄晖、张廷范、氏叔琮、朱友恭，卷二二四下叛臣朱玫、王行瑜、陈敬瑄，卷二二五下逆臣董昌。以上是据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四一“新唐书目录”条所开列，再加以订补的一个单子（钱氏所列颇有遗漏，尤以附传为多，因为有的附传文字不多，且未提行，统计时很容易被忽略），抄在这里供读者使用。这些传里的史料绝大多数是不见于《旧唐书》的，其来源前人只找到很少一些（见《廿二史考异》同条），大部分应是和《旧唐书》中晚唐列传一样根据私家传、状、谱牒或采访所得，其价值不亚于中晚唐旧传，应该配合有关的旧传仔细阅读。

版本 （1）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因此《新唐书》宋以来的

唐書一百一
瑞列傳第二十六

唐書一百一

刺撰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以女兄為隋晉
王妃故入長安瑀愛經術善屬文性硬急鄙遠浮華嘗以劉孝標
辨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為人稟天地而生而謂之命至
吉凶禍福則數系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
諸葛穎歎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晉王為太子授右千牛即帝位
妃為后而瑀浸親寵頻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感
末疾不呼醫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為遁階矣后聞瑀言謂曰爾亡
國後不安小官而高為怪語罪不測瑀復治疾良已拜內史侍郎
數言事時世稍見息帝至鳳門為突厥所圍瑀謀曰夷俗可賀致
與兵馬事沈義威公主以帝女為之若走介使鐻喻宜不戰而
解又眾商陛下已平安服方復事遼東故急不肯戰願下詔款高

刻本远多于《旧唐书》，流传至今较有名的南宋刻本，有十四行残本，旧藏吴兴陆氏皕宋楼，后归日本静嘉堂文库；有同上刻元补版印残本，藏北京图书馆；有十六行残本，旧藏傅氏双鉴楼，建国后归北京图书馆；有建阳书坊魏仲立刻残本，旧藏吴兴刘氏嘉业堂。

(2)元刻本，书版明代入南京国子监(即所谓“南监”)，修补印行，有些大图书馆收藏有此版的明南监修补印本。(3)明成化南监刻本，后与其他各史刻版配合成“二十一史”印行，世称南监本“二十一史”，现在所见到的一般都是明嘉靖以后到清代初年的递修印本。

(4)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即所谓“北监”)据南监本重刻“二十一史”，也称北监本“二十一史”，版式改为一律，不像南监本那样存在杂配的痕迹，现在所见到的一般都是明末到清初的递修印本。

(5)明崇祯末常熟毛晋汲古阁刻“十七史”本，毛晋是大藏书家，还是我国历史上私人刻书最多的一家，刻这部“十七史”多参考宋、元旧本，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南北监本。清中期有席氏扫叶山房覆刻“十七史”本。

(6)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二十三史”本，用北监本重刻，不算好本子，所附考证也出于沈德潜等人之手，和《旧唐书》考证一样不甚高明。殿本的各种覆刻本、影印本、排印本已在讲《旧唐书》版本时讲过。开明本“二十五史”中《新唐书》的参考书目全同《旧唐书》。五局合刻“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则也是浙江书局所刻。

(7)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是影印几种拼配的南宋本，以静嘉堂藏本为主，配以北京图书馆、双鉴楼及嘉业堂藏本，保存了《新唐书》旧刻的真面目，胜于殿本。建国后又有商务馆缩印精装百衲本和台湾仁寿本“二十六史”影印百衲本。

(8)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本，底本用百衲本，比《旧唐书》之用岑本高明，其他毛病则一同点校本《旧唐书》。

历史不能割断，分期、断代只是为了研究方便，在研究时往往要上溯前朝或下联后代。如要弄清楚唐初是否还存在关陇集团，就得上溯到形成关陇集团的西魏、北周的史事。有些专题研究时

上溯下联得还更远。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很多纪传史以及其他看来与唐史无直接关系的文献在研究唐史时都有可能利用到。但这样来讲唐史史料学会失之太广、太泛。因此只能讲几部紧接着唐代的纪传史,即唐前的《隋书》和唐后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因为这几部书里都有直接记述唐史的史料。下面讲这三部书时也就着重讲其中的唐史史料,而不像前面讲两《唐书》时作全面详尽的介绍。

《隋书》八十五卷 唐魏徵、长孙无忌等撰

书名篇目和撰修 凡帝纪即本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共八十五卷。撰修过程略见于《唐会要》卷六三“修前代史”、《旧唐书》卷三太宗纪、卷四高宗纪、卷七一魏徵传、卷七三令狐德棻传及《史通》外篇“古今正史”。武德四年令狐德棻请修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五年下诏撰修,以封德彝、颜师古任隋史,数载不就。贞观三年复敕修撰,以魏徵及孔颖达、许敬宗任隋史,房玄龄与魏徵复总监诸代史。贞观十年,五代史撰成进上。当时这五代史可能合为一书,以后分别单行,本当时习惯,各以“书”称,隋史即名为《隋书》。这时的《隋书》仅有纪、传,志是贞观十五年诏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另外修的,也是包括梁、陈、北齐、周、隋五个朝代统在一起,叫《五代史志》,显庆元年修成三十卷,由长孙无忌进上,后来附《隋书》流传,不明究竟者往往误认成专为《隋书》撰写的志,其实今传本《隋书》仍于纪、传题魏徵上,而志题长孙无忌等撰,分别得很清楚。

研究唐史时怎样利用 (1)隋朝统治前后只有三十八年,而且唐刚建国就着手撰修《隋书》,撰修者都长期生活在隋朝,隋事是耳闻目见,加以有关隋史的其他史料都已不复传世,因而《隋书》就有更高的史料价值,历来读史者对它很少有不好的批评。(2)唐初很多典章制度都因袭隋旧,因此在阅读两《唐书》志时,最

志第十八

隋書

卷二十五

太尉楊州都督驤國史正柱國趙國公重農長孫無忌等奉勅撰

五行下

洪範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知厥咎舒厥罰常燠厥
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羽蟲之孽故有羊禍故有目疾
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常燠

後齊天保八年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劉向五行傳曰視不
明用近者賢者不進不肖不退百職廢壞庶事不從其過
在政教舒緩時帝狂躁荒淫無度之應

元大德饶州路儒学刻本《隋书》史部高要官做《并
是，和志《并觀》西刻圖亦出因，田南矣因帶製歸章典送那阿神(2)

好附带读一读《隋书》相应的志,这对溯源来说有好处。(3)唐初将相大臣中有许多是隋代贵族的子弟,他们父兄的传见于《隋书》,还有很多在《隋书》列传里的人物实际生活到唐初,研究初唐史事往往需要参考《隋书》里这些人的传。众所周知的如李密、如王世充,更是在两《唐书》和《隋书》里都有传(《隋书》避唐太宗讳称王充)。据《旧唐书》魏徵传,修五代史时“徵受诏总加撰定,众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而徵早期又曾参加过瓦岗军,追随过李密,因此《隋书》中李密传以及和李敌对的王世充传等肯定经魏徵审定,其史料价值自在两《唐书》李、王诸传之上(《隋书》李密传叙事止于归唐,以后叛唐被杀之事不复记人,也可能是魏徵有意为故主讳饰)。《隋书》李密传的内容绝大部分被抄入两《唐书》李密传,成为后者的重要史料来源。所以,读两《唐书》时务必要参读《隋书》。

版本 (1)南宋刻残本小字、中字两种,均藏北京图书馆。(2)元大德饶州路刻十行本、元至顺瑞州路刻九行本,今传世印本均不止一部,北京图书馆即藏有几部。(3)明南监“二十一史”《隋书》万历刻本,以及明北监“二十一史”本、汲古阁“十七史”本、清殿本、覆刻影印殿本等均同前述两《唐书》,五局合刻《二十四史》中《隋书》则系淮南书局刊刻。(4)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隋书》系影印元大德本,台湾仁寿本“二十六史”又影印百衲本。(5)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本用南宋刻小字本与元大德本、至顺本互校,并参校其他刻本和《通典》、《册府元龟》等有关文献,惜校勘记中只记《隋书》与这些文献在文字上的异同,不记《隋书》本身版本的文字异同,是一个缺点。书中避唐讳字一般不改,劫独把讳丙为“景”的“景”字回改,亦殊可不必。

《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北宋薛居正等撰

书名篇目和撰修重辑 五代各朝对撰修本朝实录、国史都是

比较认真的，对此《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有一些记载，《廿二史札记》卷二一“薛史全采各朝实录”条并钩稽《旧五代史》、《宋史》有关纪、传，对当时撰修实录的经过作了考证，指出：“五代诸帝本各有实录，薛居正即本之以成书，故一年之内即能告成。”至于书名及撰修人员、成书时日，则见于《宋史》卷二太祖纪、卷二四六薛居正传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衢本卷五正史类、王应麟《玉海》卷四六艺文引《中兴书目》（太祖纪：开宝六年四月戊申“诏修五代史”，七年闰十月甲子“薛居正等上新编五代史”。薛传：开宝五年〔案当作“六年”〕“监修五代史，逾年毕”。晁《志》：“开宝中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居正监修。”《中兴书目》：“开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戊申诏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宜令参政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穆、李昉等同修。七年闰十月甲子书成，凡百五十卷，目录二卷，赐器帛有差，其事凡纪十四帝、五十三年，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为稿本”。其书列传多云“事见某书”或“某书有传”，则原本纪传可能断代称某书，而全称据上引诸记载则曰“五代史”，《廿二史札记》卷二一“薛居正五代史”条说“其曰‘五代史’者乃后总括之名”是不对的。

由于欧阳修《新五代史》盛行，此书到明代已传本稀少，入清后遂失传。幸亏《册府元龟》及明成祖时所修《永乐大典》各韵中尚大量引用，清开四库馆时馆臣邵晋涵等重新搜辑整编，在乾隆四十年进呈。辑本按照《中兴书目》所说仍编成本纪六十一卷、列传七十七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其编次则先梁、唐、晋、汉、周五书，每书中先本纪后列传，五书后以割据诸国为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契丹等为外国列传，志则列在全书之末。至于书名，前此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题解》、《宋史》艺文志等均止称《五代史》，辑本冠以“旧”字称《旧五代史》，以与欧阳修《新五代史》区别。由于

搜辑者邵晋涵是有水平的史学家,这个辑本是编得不坏的,卷首有编定凡例,对如何编辑讲得很详细。

研究唐史时怎样利用 五代分裂局面,实际上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研究晚唐政治、经济以至文化各个方面的专题,都得涉及五代,而《旧五代史》是目前保存五代史料最丰富、最全面的纪传体史。更为宝贵的是,《旧五代史》还大量记录唐代史事,尤其是开头的“梁书”部分。因为梁太祖朱温本身就曾是黄巢军中的大将,后来转化为地方割据势力,以节度使身份夺取中央政权而改唐为梁。梁太祖本纪从唐僖宗时写起,唐代的内容就占了两卷篇幅。“梁书”列传中以及世袭、僭伪传中多数人也是在晚唐时期就从事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下至“唐书”中的太祖李克用也是影响晚唐政局的重要人物,传中都记载了他们在唐代的事迹。这样,《旧五代史》就自然成为研究晚唐历史的必读之书。晚唐人物在两《唐书》中事迹不详的,在《旧五代史》里往往可以找到列传,如昭宗时曾控制过中央政权的华州节度使韩建及著名诗人罗隐、杜荀鹤等。因此可以说《旧五代史》是两《唐书》晚唐部分的补充。

版本 (1)乾隆四十年进呈的辑本都用小字标明出处,如《册府元龟》卷几、《永乐大典》卷几,有关史实的考证订补也用小字附注正文之下,当时收入《四库全书》的《旧五代史》就是这样抄写的。但到乾隆四十九年武英殿正式刊刻、和乾隆四年本“二十三史”合成“二十四史”时,徒求与“二十三史”整齐划一,竟把出处统统删去,使人无法稽考。而且正文也有增删更改,尤其是当时认为需要避忌的字眼如“杀胡林”改为“杀虎林”、“俗皆辫发,性凶悍”改为“俗尚质朴,性强悍”之类,大失原书的本来面貌,从史料学角度来讲实在是一个很不好的本子。此后覆刻影印殿本者一仍其失(五局合刻本系崇文书局刊刻),其中同文书局影印时由于所用殿本原缺《旧五代史》,竟据别本仿写后影印,书口上误作“乾隆四年校刊”,更不能使用。(2)民国元年邓邦述购得孔继涵校传抄邵晋涵

原辑本,章钰借校于殿本上。(3)熊罗宿得武英殿进呈写本(或拟进呈而未用之本),民国十年影印。(4)民国初年刘承幹嘉业堂购得卢氏抱经楼旧藏抄本,大体同于熊本,民国十四年用殿本校补后刊刻,商务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即用此刻本影印,台湾仁寿本“二十六史”又影印百衲本,原抄本建国后归北京图书馆。(5)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本,以熊本为底本,再用殿本、刘本、章钰校本和北京图书馆藏乾隆时馆臣彭元瑞抄校本、抱经楼旧藏抄本校勘,还用宋刻残本《册府元龟》、《五代会要》等参校,重要异文均录入校勘记。此外,辑本将书中少数民族人地名用乾隆时官修《三史国语解》所译改过,失去原书面貌,中华本也已回改,所以这是一种较好的本子。(6)至于《旧五代史》的原本,明万历时连江陈氏《世善堂书目》著录有一部,清初黄宗羲也曾有过,见《南雷文定》附录吴任臣书,但均已毁失。商务在辑印百衲本时曾搜求过,近人汪德渊说藏有金刻本,民国四年因国事货于粤估,见张元济《校史随笔》,张氏信有其事,但除汪氏自信外,并无任何人目睹其书,恐亦文人好奇,故弄狡猾以自嬉而已。

《新五代史》七十四卷 北宋欧阳修撰

书名篇目和撰修 此书为欧阳修私人撰修,和他后来奉诏撰修《新唐书》之为官书者不同。书成后欧阳修未加序跋以说明撰写始末,只有《欧阳文忠公外集》卷一七《与尹师鲁(洙)书》里讲到他和尹洙商量如何撰修五代正史的事情,这通书信是他贬降为夷陵县令的第二年即仁宗景祐四年写的,这景祐四年可以作为他开始撰修的年份(现在有些书上说是景祐三年前,当是连前此所作的《十国志》也统算在一起;但据《与尹师鲁书》,《十国志》虽在景祐四年经欧阳修删削,存其大要,但只是作为撰修正史的准备,而正史实须另行动笔撰修,因此是否能把《十国志》当作《新五代史》的初稿,还当慎重考虑),又据《欧阳文忠公书简》卷六仁宗皇祐五年《与

梅圣俞(尧臣)书》，讲到“整顿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则皇祐五年可以作为书成的年份，上至景祐四年前后共十七个年头，比修撰《旧五代史》之前后只用两个年头要长得多，这由于欧阳修是独立创作，不像《旧五代史》是官书出于众手且大体承用五代时实录、国史的缘故。此书撰成后并未立即进上，《玉海》卷四六艺文引《中兴书目》说“修没后，〔神宗〕熙宁五年八月十一日诏其家上之，十年五月庚申诏藏秘阁”，《郡斋读书志》说“没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袁本卷二上、衢本卷五），则已成为半官书性质。嗣后与《旧五代史》并行而欧书渐占优势，金章宗泰和七年“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金史》卷一二章宗纪），明代南北监本“二十一史”中就只有欧书而不再有薛史。

至于欧书的名称，欧阳发等所述《事迹》（《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五）、吴充所撰《行状》（附录卷一）以及源出《行状》的韩琦所撰墓志铭（附录卷二）、苏辙所撰神道碑（附录卷二）、还有《事迹》所引《神宗实录》熙宁五年八月丁亥条都作“五代史”，这只是“五代之史”的意思，并非正式书名。正式书名则孝宗淳熙间进《四朝国史》本传（附录卷四）、《中兴书目》、《郡斋读书志》以及传世宋、元刻本下至明汪文盛本、南监本都作《五代史记》。但《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四、《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已作《新五代史》，当是便于和薛居正的《五代史》相区别。以后北监本、汲古阁本、殿本都作《五代史》，去掉“记”字。《四库提要》称本名《新五代史记》，则系馆臣杜撰。今则都称之为《新五代史》，中华书局标点本即迳以《新五代史》标题。

此书凡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共七十四卷，体例不尽同于薛史。薛史五代各自独立成书，先本纪、后列传；此书则五代史统在一起，只是在纪、传中按五朝次序排列，如梁本纪、唐本纪……，梁家人传、唐家人传……，梁臣传、唐臣传……，这当然无关紧要。其较大的差别是

此书无志，取代志地位的是司天、职方二考。司天考的内容大体相当于历、天文、五行志，可观五代时期的自然变化；职方考则是用表的形式排出五代各自所辖的州，反映五代各朝的疆域变化。至于有关五代的典章制度，此书几乎没有提供像样的史料，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所增者为十国年谱一卷，相当于十国年表，与职方考一样简明扼要，倒还有其特色。另外，此书附有欧阳修门生徐无党的注，分散卷中，不另单行。

研究唐史时怎样利用 欧阳修重修五代史、撰写《五代史记》的目的，欧阳发等所述《事迹》讲得最清楚，所谓“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其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书成，减阳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文省而事备，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可见主要是学《春秋》，用书法来达到褒贬善恶的目的，这从卷二梁太祖纪、卷一〇汉隐帝纪后公然提出《春秋》作为标准来议论书法，以及徐无党注里对书法的种种解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后来他修《新唐书》本纪，也同样用这种《春秋》笔法。不过《新唐书》是官书，不能全凭他个人的意志办理，而且列传还是由宋祁负责，而撰写《五代史记》是修私史，可以更自由地贯彻个人意志而已。书于五代列传之外别出死节、死事、一行、唐六臣、义儿、伶官等类传，又以历仕数朝的人作为杂传，把四夷抑为附录，都是为贯彻《春秋》笔法而别出心裁的做法，从史料学来看当然毫无意义。但这部书在史料上还是有其用处的，因为欧阳修并非简单地根据《旧五代史》一书来重写，而是另外参考了其他大量文献。《廿二史札记》卷二一专门写了“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条，对欧史所参考过那些书籍作了推测，虽没有举出很多实证，从情理上说是大体可以成立的。对照薛史，此书的确增添不少史实。如唐六臣传是唐朝仕梁大臣六人的传，其中三人在薛史中就无传。再如有关十国的事迹，此书也远多于薛

五代史記卷第九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晉本紀第九

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為唐莊宗騎將早卒高祖以其子
 重貴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重
 貴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
 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高祖為契丹所立謀以
 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
 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原尹北京留守知河

元宗文书院刻、明递修本《五代史记》

史,薛史记十国事为世袭、僭伪列传共五卷,而此书的世家则有十卷,还有十国年谱一卷。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七云:“僭伪诸国,皆欧详薛略。盖薛据实录,实录所无,不复搜采增补,欧则旁采小说以益之。”所以《事迹》所说“文省而事备”,是大体讲对了的。但是“文省”的结果必然要把《旧五代史》原有的内容精简掉许多,而且《旧五代史》承用五代时的实录、国史,其史料价值一般讲总高出《新五代史》所据以增补的其他文献。因此用两《五代史》来补充两《唐书》不足时,仍只能以旧史为主,新史则用来参考并补充。

版本 (1)由于《新五代史》成为半官书后逐渐占得优势,讲究做古文的人也常要读它,因此它的宋、元、明旧本流传下来的也就稍多一些,著名的有傅增湘、周暹递藏而在建国后归北京图书馆的号称北宋实为南宋刻残本,有傅增湘藏南宋建阳刻本(有“庆元五年鲁曾三异校定”字样,但未必即是曾刻真本,很可能是建阳重刻曾本),有杨守敬从日本购归的南宋刻小字本,有元宗文书院刻本。还有明嘉靖汪文盛刻本,但并不好,有整段的脱漏。(2)明南监“二十一史”万历刻本,北监“二十一史”本,汲古阁“十七史”本,清殿本及覆刻影印本,五局合刻本系崇文书局刊刻。(3)刘世珩玉海堂覆刻南宋小字本。(4)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阳刻本,台湾仁寿本“二十六史”又影印百衲本。(5)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本,以百衲本为底本,自言“对校了贵池本(清贵池刘氏景印南宋本)、殿本、南昌本(清南昌彭元瑞《五代史记注》),参校了明汪文盛本、南监本、汲古阁本、鄂本(清崇文书局本)、徐注本(清徐炯注补《五代史记》抄本)”等等(见出版说明)。宋刘世珩是景刻南宋小字本,并非“景印”,贵池是他的籍贯,书并非贵池所刻,也不宜说是贵池本,以彭元瑞为南昌人说所撰《五代史记注》是南昌本也同样不妥。又原书正文间的小注大多数是徐无党的注,作“曾三异校定曰”则是庆元时曾氏刊刻时所加的校

语,点校本只在内封面印上“宋徐无党注”,而在出版前言中只字不提徐注并曾校之事,更不说明原文中小注凡不具名者都是徐注,可见点校者对版本校勘均不甚内行。至于所提到的徐炯是康熙时的昆山人,所注《五代史记》只有抄本未曾刊刻;彭玩瑞是四库馆臣,所撰《五代史记注》题与刘凤诰同撰,有道光刻本,彭注全收辑本《旧五代史》,并参考其他文献,有参考价值。

利用两《唐书》的史料时还应参考历代的笺注、校勘、考证和补缺。下面分类介绍。

关于笺注。这种笺注实际上也是校勘、考证、补缺性质,而不是一般著重文义训诂的注释。过去两《唐书》一直没有笺注过,清人才开始在这方面下功夫,目前所知的笺注有三种。

《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

《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十二卷 清沈炳震撰

此书原题《唐书合钞》。有清雍正癸丑(十一年)柯煜序,煜为沈炳震之师,称沈氏“用十年之心力,再四削稿而成之”。

沈氏撰作此书时正史只有“二十一史”、“十七史”,《旧唐书》仅闻人本单行,不在正史之中。此书“钞例”一开头就说:“新书列于正史,旧书几等稗野,因当主新书而旧书附焉。然新书简严而旧书详备,势不能以新书为本而分注旧书。”足见沈氏深于史学,洞悉两《唐书》得失,能断然以旧书为主,用新书校补,这是此书最大成功之处。“钞例”并分别说明去取钞注的办法,其要点有:(1)“本纪、列传,一以旧书作大文而新书分注”,“新书分注,但取其事为旧书不载或互异者,若事同而文有详略,概不复录”,这很对。(2)“旧书所阙志、传,从新书增”,这也对。(3)“惟旧书诸志多所阙略,其阙者固当从新书增入,他如天文、五行、地理诸志疏漏殊多,不如新书之整齐也,故转以新书作大文而旧书分

注”，这也可以。(4)“两书事既互异，容有一讹，惟纪、传相参可以折衷者，则用‘案’以正之，其他书虽有确据，以事在正史，宁两是以阙疑，不敢援为左证”，这前半对，后半就不妥，把史料的对勘局限于两《唐书》，不引用其他如《大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通鉴》等以为佐证，以资补正，正是此书的最大缺点。也许这样做工程浩大，非个人所能完成，故不得不从简。尽管如此，沈书排比对勘了两《唐书》的内容，总汇了二书的史料，指出了二书的异同，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其功劳还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版本 (1)清乾隆查世倓刻本。(2)清同治十年吴氏清来堂用查刻修补印本。(3)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查刻本，仍题《唐书合钞》。

《新旧唐书合钞补注》二百六十卷 王先谦撰

王氏撰著，多汇集前人注说作集解，如《荀子集解》、《庄子集解》，也有汇集不同版本注本作合钞、合校，如《合校水经注》、《合校郡斋读书志》。纪传史中则撰《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是前一种性质。此《新旧唐书合钞补注》，当作在两《汉书》之后。因两《唐书》前人注说少，故《合钞补注》是用《唐会要》、《册府元龟》等给沈氏《合钞》作注，正好弥补前面所说《合钞》不援其他书为佐证之缺憾。

此书迄未付印。张舜徽《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谓“从前听说王氏后人拟交商务印书馆付印，迄未出版”。前在北京听谢国桢说建国后此书稿本归中国科学院，经审阅认为编纂太粗糙，学术价值不高，不拟付印。此稿本未见过，但知道王氏学问本未超越时流，《汉书补注》凭藉多，而且成书在先，王氏精力够得上，故质量尚好，《后汉书集解》成书在后，质量已差，此《合钞补注》盖晚年所作，精力已竭，仅付子弟门生为之，自然更差。

《唐书注》十卷 唐景崇撰

此书金毓黻《中国史学史》谓“不过就沈书加以剪裁订补之功，以云胜之，则病未能”。案此书自不能满人意，但说“就沈书加以剪裁订补”，则大非。此书是为《新唐书》作注，与沈书之以《旧唐书》为主者不同。金氏撰《中国史学史》时可能手边无书，遂为此影响揣测之词。

此书有清宣统元年唐氏自序，谓“拟仿彭氏元瑞之注《五代史》而变通其例，盖彭注全录薛史，此则旧书过繁，第择其足资参证且应增补者录要附入而已”，并以为沈氏《合钞》“不惜破坏原书”，“余之注例，则取《史记》之三家注、《汉书》之颜注、《三国志》之裴注、《通鉴》之胡注参酌，而订三义，曰纠缪、曰补阙、曰疏解”。民国二十四年其弟子张书云序谓：“参考搜采之书，自正经、正史、唐贤专集、历代普通类书、典制学术诸专书、史部考证书，旁及金石、野史、小说，逾数百种。”则此书较沈书参考博，不局限于两《唐书》，是其优点。但拘于彭元瑞注《五代史记》之陈例，舍史料较原始、较详密之《旧唐书》而为《新唐书》作注，则大失策。

此书迄未完成，民国二十四年其甥余荣昌刊书序谓：“计最完全之稿为本纪十卷、礼乐志十二卷、历志九卷、天文志三卷、五行志三卷、地理志七卷、百官志五卷，有稿不全者为食货志三卷、仪卫志一卷、车服志一卷，表稿虽全，尚未整理，其中尤以列传为最缺，先生所手订者仅十数卷而已。”缪荃孙有艺文志注传抄本，当即抄自唐稿，后归傅增湘，见傅氏《藏园群书题记》大公报馆印本。1982年编印的《中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目》中有此书稿本四十册，存卷一至二二、二五至三〇、三七至四三、四六至四七、五一至五三、七〇，共四十一卷。

版本 民国二十四年余荣昌排印本，止本纪十卷四册。余序谓“筹资次第刊行”，但迄未见续出。

《唐书兵志笺正》四卷 唐长孺撰

《新唐书》兵志撰写得不能令人满意,已如前所说。唐氏此书即广徵《大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以及《旧唐书》等文献中有关记载,以事考订。得此不仅可以弄清楚唐代军事制度的本来面目,且能知晓兵志哪些记述成问题,而不致为其误导,在笺注史志中目是高水平之作。

版本 1962年中华书局版。

关于校勘、考证。主要有以下六种。

《新唐书纠谬》二十卷 北宋吴缜撰

此书有元祐四年吴缜自序,谓:“窃尝寻阅新书,间有未遍则必反覆参究,或舛驳脱谬则笔而记,岁时稍久,事日益众。深怪此书抵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盖修书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责任不专,二曰课程不立,三曰初无义例,四曰终无审覆,五曰多采小说而不精择,六曰务因旧文而不推考,七曰刊修者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惟务苟容(以下逐事申说从略)。……从宦巴峡,僻陋寡闻,无他异书可以考证,止以本史自相质正,已见其然。意谓若广以他书校之,则其穿穴破碎,又当不止此而已也。”案所指摘新书八失,是从修史角度出发,和我们评论新书不尽相同,所说也有过于苛求官书之处,但尚大体允当。“止以本书互相质正”,是所谓“本证法”,清汪辉祖撰《元史本证》及近人陈叔陶撰《新元史本证》等均用此法,这非熟于本史者做不到,比用新旧《唐书》对勘要难得多,所以此书的成绩是主要的。《十七史商榷》卷六九“新唐书纠谬”条说此书“可笑是并旧书亦绝不一参时,为太省事耳”。其实止用旧书参对反而省事得多,吴氏不参旧书是地僻无书之故,自序已交代清楚,何能

新唐書糾謬序



史才之難尚矣游夏聖門之高弟而不能贊春秋一辭自秦漢迄今千數百歲若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之徒方其著書之時豈不欲曲盡其善而傳之無窮然終亦未免後人之詆斥至唐獨稱劉知幾能於脩史之外毅然奮筆自爲一書貫穿古今譏評前載觀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爲古今絕倫及取其嘗所論著而考其謬戾則亦無異於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難豈不信

以“可笑”轻之？

《四库提要》“新唐书纠谬”条说：“王明清《挥麈录》称欧阳重修《唐书》时，缜尝因范镇请预官属之末，修以其年少轻佻拒之，缜鞅鞅而去，及新书成，乃指摘瑕疵为此书。”案此说见《挥麈后录》卷二，实妄说不足据。吴氏序谓“自《唐书》颁行，迄今几三十载”，明非新书成后即作此书以指摘瑕疵。

《提要》又说此书“初名《纠谬》，后改为《辩证》，而绍兴间长乐吴元美刊行于湖州，仍题曰《纠谬》，故至今尚沿其旧名”。案此书今本卷首有吴氏进书表，谓“初名《新唐书正谬》，寻以未尝刊正，止是纠摘谬误而已，遂改为《新唐书纠谬》”。《提要》作者很可能是看到《郡斋读书志》著录此书题《唐书辩证》而妄为此说（《提要》此条尚有引用《郡斋读书志》处，可见其撰作此条时必曾参考《读书志》）。其实《读书志》所云《辩证》或是别本，或是传写致误，自当以吴氏本人进书表为准。《提要》作者连进书表都不细看，可见其撰作之匆促草率。

版本（1）南宋绍兴刻本已不存。有明影宋抄本，旧藏周暹处；有清影宋抄残本，旧藏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今均在北京图书馆。（2）明万历赵开美刻本，有错简误字。（3）清乾隆鲍廷博刻《知不足斋丛书》本，已校正错简，但仍有误字。又有民国十年古书流通处影印《知不足斋丛书》本。（4）民国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据鲍本。（5）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明万历赵刻本，又于赵刻错简脱误处附印清影宋抄本单页以资勘正。

《廿二史考异》一百卷 清钱大昕撰

此所谓“廿二史”是“二十一史”加上《旧唐书》，无《旧五代史》，因为作《考异》时《旧五代史》尚未辑出。另外目录中因《后汉书》的志是用司马彪《续汉书》，所以别列《续汉书》一目，以致看上去好象有二十三史。其中卷四一至五六为《唐书》考异十六卷，卷五七至

六〇为《旧唐书》考异四卷,足见其用力在新书,可能是旧书后得的缘故。

钱氏是清乾嘉时第一流学者,学博而精,在训诂、音韵、史学、金石各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此书有乾隆庚子(四十五年)自序,谓:“予弱冠时好读乙部书,通籍之后尤专斯业,自《史》、《汉》迄金、元,作者廿有二家,反复校勘,虽寒暑疾疢未尝稍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丁亥岁乞假归里,稍编次之,岁有增益,卷帙滋多。戊戌设教钟山,讲肄之暇复加讨论,间与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可见这是一部读书札记的汇编,重在个别文字、史实的校勘,对《新唐书》的缺漏和纪传之间的矛盾也有所指摘。

钱氏在史学上对宋、元两代功力最深,这是当时其他史学家所及不到的,唐代以上的成就则不算怎么突出。《考异》的体例又太谨严,除校勘外对各史的得失不多作评论,因此读《考异》的反不如读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的人多。

版本 (1)清乾隆四十五年钱氏潜研堂刻本。(2)清光绪十年龙氏刻《潜研堂全书》本。(3)清光绪官刻《广雅书局丛书》本。(4)民国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据《广雅》本。(5)建国后商务印书馆本,用《丛书集成》旧版。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 清王鸣盛撰

此书除“十七史”外还包括《旧唐书》、《旧五代史》。卷六九至九三为新旧《唐书》商榷二十五卷,分量超过了钱氏《考异》的两《唐书》考异。

王氏与钱氏同是江苏嘉定人,钱是王的妹夫,又是会试同年,在学问上各有成就。总的说来,王氏学识稍不及钱,但此书价值不在《考异》之下。书前有王氏自序,谓:“‘十七史’者,……海虞毛氏汲古阁所刻行世已久,而从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而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释蒙滞,审覆踳驳,以成是

书,故名曰《商榷》也。”这说明此书内容包括两项,一是诠释典章制度,一是考校史文脱讹。其实尚不止此,如对两《唐书》的修撰经过、内容得失等均有所论述,在考校史文上并能利用不同版本。他主张“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他认为此书在诠释典章制度上对读史者最有帮助,说:“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章茫昧,事迹糅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瞶,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少助也与。”这都是讲的实在话,试读卷七七至八三关于志的部分,有许多条的确讲得头头是道,引人入胜,真使我们今天读史者对之感激不尽。

版本 (1)清乾隆五十二年王氏洞涇草堂刻本。(2)《广雅书局丛书》本。(3)《丛书集成》本,据《广雅》本。(4)建国后商务印书馆本,用《丛书集成》旧版。

《陔余丛考》四十三卷

《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补遗一卷 清赵翼撰

这二书都是赵翼的读书札记,《丛考》成于乾隆五十五年,《札记》成于六十年,均在钱氏《考异》、王氏《商榷》之后,其中且引及《商榷》之说。《丛考》有乾隆五十五年赵氏自序,谓:“自黔西迄养归,问视之暇,仍理故业,日惟手一编,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得四十余卷,以其为循陔时所辑,故名曰《陔余丛考》。”所考自经、史、诗文外还广及掌故、风俗、宗教、器物,卷一〇、一一、一二条均考两《唐书》。《札记》卷一六至二〇为新旧《唐书》札记五卷,与《丛考》条目内容互有详略。两书有关条目前论《新唐书》时均已择要录出。曰《廿二史札记》者,以《旧唐书》合《新唐书》为一史,《旧五代史》合《新五代史》为一史,故虽上起《史记》、下及《明史》,是读“二十四史”的札记,而书名仍曰“廿二史”,与钱氏《考异》的“廿二

史”不是一回事。

赵氏治史的方法与钱、王二氏不同。《札记》有赵氏乾隆六十年自序，谓：“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裨乘胜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徵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是以此编多就正史记、传、表、志中参互勘校，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则吾岂敢。”又有钱大昕嘉庆五年序，谓：“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都讲出此书撰述要旨，而且也同样是讲了《陔余丛考》史考部分的撰述要旨。此两书其实都模仿《日知录》，不象《考异》、《商榷》那样校勘文字，而用所谓“属辞比事”的归纳方法将有关史料搜辑到一起以说明问题。所说明如钱氏所讲有两方面，一是正史编纂的得失，一是历史现象的评析。前者讲两《唐书》时已提到，实比较详密平允。后者更常为民国以来撰述中国通史者所袭用，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教给我们如何从大量史料中发现问题及研究问题的方法。因此，此二书尤其是《札记》可说是读纪传史的入门书。至于自序信正史不取稗乘之说自有所偏，不足为定论，《丛考》的其他部分也常引稗乘，并不局限于经、史。

晚清李慈铭《越縕堂日记》说《陔余丛考》和《廿二史札记》是乾嘉时一老儒所撰，赵氏据而有之。案赵氏此二书的文笔思路与他另一部著作《瓯北诗话》完全一致，此二书是窃据别人的，难道《诗话》也是窃据别人的？李氏好诋毁前贤，《日记》所云不知是那里得来的道听途说，绝不足凭信。

版本 《丛考》：(1)清乾隆五十五年赵氏湛贻堂刻本。(2)清光绪三年刻《瓯北全集》本。(3)民国文瑞楼影印湛贻堂本。(4)建

国后商务印书馆本,据湛贻堂本。《札记》:(1)清嘉庆五年湛贻堂刻本。(2)清光绪三年刻《瓠北全集》本。(3)《广雅书局丛书》本。(4)光绪二十八年湖南新化西畚山馆本。(5)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云据原刻本。(6)《丛书集成》本,据《广雅》本。(7)建国后商务印书馆本,用《丛书集成》旧版。(8)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用原刻本、《广雅》本和西畚本互校,又核对所引用史文,可称精善。

《新旧唐书互证》二十卷 清赵绍祖撰

此书撰成在前四书之后。以《新唐书》为主,用《旧唐书》对勘,用纪、志、传互勘,又用《通鉴》、《通鉴考异》及《新唐书纠谬》等校勘,在文字史实上下功夫,与《廿二史考异》相近,而条目尚多于《考异》。

版本 (1)清嘉庆十八年赵氏古墨斋刻本。(2)《广雅书局丛书》本。(3)《丛书集成》本,据《广雅》本。

其他前人尤其是清人的读书札记,如顾炎武《日知录》、阎若璩《潜丘札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与《诸史拾遗》、劳格《读书杂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等等,都有有关两《唐书》及唐代史事的校订考证,清人文集中也常有这类文章,都可资参考。

关于补缺。主要指补表、志,都已收入民国二十四年开明书店编印的《二十五史补编》(建国后曾由中华书局重印)中,有:

《唐将相大臣年表》三卷

《唐功臣世表》一卷

《唐边镇年表》一卷

《唐镇十道节度表》一卷

《唐宦官封爵表》一卷

《武氏诸王表》一卷

《唐诸蕃君长世表》一卷 清万斯同撰

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清初著名的史学家,《明史》最初的纂修工作实际由他主持。他著有《历代史表》,只刊刻了五十九卷,其余未刻稿本,抗战前藏宁波冯孟颀伏跗室,开明书店借得,全部印入《二十五史补编》,唐代部分即是以上七种,均为五十九卷本所未收。《唐将相大臣年表》将中晚唐的重要职官也列入,如神策中尉、枢密使、盐铁转运使等,很有用,惜仍有缺漏,且有些似仅凭臆测,并无实据,应重加考订。《唐边镇年表》表太宗贞观十六年至玄宗先天元年,即设置节度使之前,《唐镇十道节度表》表睿宗景云二年至玄宗天宝十四载即安史乱前,都具列都护、节度使姓名,以弥补《新唐书》方镇表不记节度使姓名之缺失。

《唐藩镇年表》一卷 清黄大华撰

黄氏清末人,此表列肃宗宝应元年至梁末,大体和万表衔接。《补编》据稿本印。

《唐方镇年表》八卷考证二卷 吴廷燮撰

吴氏曾预修《清史稿》,是编制史表的专家。此表按方镇表列自始置至废灭的历任节度使姓名及任免年月,并附注史料及出处,其史料分歧需辨订者则入考证。所搜集史料,据自序谓:“开成以前,徵诸旧纪可得八九,会昌以后,旧书断烂,新纪高简,旁搜类书(《册府元龟》之类),博采地志(《嘉泰会稽志》之类),广徵诗文,兼涉碑碣杂史,稗官有可信者,亦所不遗(诗文如《文苑英华》、《唐大诏令》、《唐文粹》、《全唐诗》、《全唐文》及专集之类,碑碣自《宝刻类编》、《丛编》至《金石萃编》之类,杂史如《东观奏记》、《摭言》之类,

稗官如《玉泉子》、《因话录》、《北梦琐言》、《唐语林》之类)。”故有此表万、黄二表实已可废。但此表亦非尽善,常有缺漏、误填及史料错讹之处,不能盲目依赖。《补编》据排印本。中华书局 1980 年又出版点校本,附岑仲勉《唐方镇年表正补》(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五本)及方镇人名索引。

《唐折冲府考》四卷 清劳经原撰

《旧唐书》无兵志,《新唐书》有兵志而空疏,对唐府兵制度未讲清楚。《新唐书》地理志所记折冲府名也零落不全。劳氏是清道光时人,创著此书,首卷备列有关府兵史料,以下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长安志》以及文集、碑志等详考府名。其子劳格复事增补。《补编》据徐乃昌《鄮斋丛书》本印。

《唐折冲府考补》一卷拾遗一卷 罗振玉撰

罗氏收藏墓志拓本极富,此二书据唐墓志中所纪府名,旁及造象、虎符等资料,以补劳考。《补编》据罗氏《辽居杂著》乙编及丙编本印。

《唐折冲府考校补》一卷 谷霁光撰

谷氏著《府兵制度考释》一书,建国后出版。此《校补》是其早年所撰,主要据墓志等石刻拓本补劳、罗所考,并附以总结性的“折冲府志略”。《补编》据稿本印。

编 年 类

我国正式的史书最早都是编年史。从《春秋》到战国魏王墓出土的《竹书纪年》，以及司马迁写《史记》时所根据的《秦纪》，所有这些列国祝史们记载的官史都是编年史，战国前期人编写的《左传》也是更详细的编年史。可以说编年史比纪传史的撰作要早得多。不过纪传史由于体制完美后来居上，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虽仍有人断续地编写编年史，其地位早不如纪传史重要，一般都是私撰而非官修。到北宋时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这部杰作，才恢复了编年史的声誉，读唐史的人已把它的唐纪部分和两《唐书》同等重视。

东汉起史臣给在位的皇帝记起居注，逐日记载皇帝的言行和国家大事。南朝又开始修实录，在皇帝死后史官根据起居注及诏制敕册等来纂修，在记述到大臣名人时还附有其生平事迹。以后修国史就主要以实录为依据，如本纪即是实录的节本。这些在讲《旧唐书》时已讲到。起居注和实录都是编年体。《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于史部立起居注类，以著录起居注和实录，因为当时起居注和实录都很多。《郡斋读书志》编纂时实录尚多而起居注只存《大唐创业起居注》一种，故立实录类而将起居注并入编年类。《宋史》艺文志则索性将起居注和实录都并入编年类，以后公私书目都照此办理。现在所能看到的唐代实录也只存《顺宗实录》一种，当然和《大唐创业起居注》一起并入编年类来讲。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司马光撰 元胡三省音注

此书通常省称“《通鉴》”。撰著者司马光是人所共知的政治家兼史学家。早在北宋嘉祐时，司马光就准备编写一部接续《左传》从三家分晋起到五代末北宋建国前的编年通史（见刘恕《通鉴外纪》后记），以后修成前八卷到秦二世，题名《通志》，在治平三年进呈，随即受诏开局正式编修，到元丰七年书成进呈，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前后历时十八年，协助者有刘攽、刘恕、范祖禹，而由司马光一手主持并删定全书，其中唐纪部分则由司马光和范祖禹合作，司马光最后删定。此外司马光还撰成《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与《通鉴》同时进呈。关于此书纂修的详细过程，二刘一范如何分工合作之类，自清人全祖望以来多有所考证，《文史》第五辑有曹家琪《资治通鉴编修考》，写得较好，可参考。关于评价此书的专文专著近人也写了不少，对此书在史学上的贡献以至文学上的成就也都有所讲述。这里只就此书的史料方面讲几点：

（1）在司马光时隋以前的较原始史料如起居注之类多已失传，所以此书隋纪以上只能以纪传史即正史为主，这部分只是编写得好，从史料上讲多无特殊的价值，一般作研究工作的应该引用正史，此书只在去取正史、以及对正史记载分歧的考订上有参考价值。

（2）唐纪和五代诸纪则和隋以上不同，五代时纂修《旧唐书》以及北宋时纂修《旧五代史》、《新唐书》、《五代史记》所依据的史料如实录、国史、诏制敕册、史馆吏牒以及传状谱牒、野史杂记等，在司马光纂修《通鉴》时还都存在，仍可充分利用，因此这唐纪、五代诸纪和两《唐书》、两《五代史》有同等的史料价值，甚至比《新唐书》、《五代史记》的史料价值还高一些，因为司马光不象欧阳修、宋祁那样学《春秋》笔法对较原始的史料大删大改。而且由于此书纂修在两《唐书》、两《五代史》之后，又可用这些已经提炼加工过的纪传史作参考，所以此书对史料去取之审慎精当一般还应在两《唐书》、两《五代史》之上，往往两《唐书》、两《五代史》记载错误而此书正确。当然也不能说此书唐纪、五代诸纪就尽善尽美，我们今天仍须重新考索判

断,此书对则从此书,此书不对则从两《唐书》或其他文献。

(3) 两《唐书》等正史本身都不注明史料来源,要我们花大气力研究推测。此书本身虽也不注明,但有《资治通鉴考异》在,将史事之有重大分歧者,先备引诸说,再讲明去取的理由。这样一则可以知道《通鉴》如此记载是根据何书。再则所引之书绝大部分今已失传,靠《考异》引用才保存了若干片断。遗憾的是《考异》的条目还太少,有很多《通鉴》所记与两《唐书》不同者,并未作考异。苟有异必考,统统汇入《考异》,则不仅《通鉴》唐纪的史源可不劳探索就大体清楚,而且将给我们留下更多的佚书片断。

(4) 目前有一件应作的工作,即把《考异》唐纪部分所引用的书统统编出来,并根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及宋代的公私书目考证其书名、卷数、撰人及其他有关事项。这样一则在《旧唐书》外可以增添不少较原始的史料,再则根据这些史料去对勘《旧唐书》,还可以多少弄清楚一部分《旧唐书》的史料来源。这个工作做起来并不太难,不知前人为什么没有想到。

《通鉴》有胡三省音注,通称为“胡注”,这是史书注本中最负盛名的一种,过去常与《汉书》的颜师古注并称,其实颜注比胡注差得太远。胡三省是宋、元之间人,以毕生精力注《通鉴》,入元后才完成。最初仿《经典释文》的办法,注单行,因兵乱稿失重注,才把注和《考异》都散入《通鉴》正文之下。胡注详于地理、制度,对史事之前后贯通也特别注意,这些都对读《通鉴》有极大的帮助。抗战时陈垣著《通鉴胡注表微》一书,最初发表在抗战胜利后的《辅仁学志》第一三、一四卷上,建国后科学出版社印单行本,《表微》从胡注评论胡氏史学成就及爱国思想,也可一读。

版本 《通鉴》宋、元旧刻之传世者尚有好多种,今只举通行易得的本子:(1)民国商务印书馆影印傅增湘藏南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配其他五种宋刻即所谓百衲本。(2)《四部丛刊》影印南宋建阳书坊刻本。(3)清嘉庆二十一年胡克家仿元刻本,有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魏紀八

起昭陽作噩盡朔
蒙大用獻凡三年

邵陵厲公下

嘉平五年癸酉春正月朔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循起刺禕殺之禕其性汎愛不疑於人越雋太守張疑嘗以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為警禕不從故及禍詔追封郭循為長樂鄉侯使其子襲爵王昶母丘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大將軍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

通鑑卷七十六

元至元魏天祐刻本《資治通鑑》

胡注,流行最广,并有覆刻本、缩印本、排印本多种。但此刻所据元本本身文字即有脱误,即胡三省音注时所用元兴文署刻本亦有脱误,应用传世的宋刻和明嘉靖二十四年孔天胤仿宋刻本等旧本来校正,清末至民国有张瑛《资治通鉴宋本校勘记》《元本校勘记》、熊罗宿《胡刻资治通鉴校字记》、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字记》先后问世,都是做这项工作。(4)建国后古籍出版社出版点校本,在校勘上吸收了章钰等的成果,标点分段也花了一番功夫,尽管还有些差错,比“二十四史”校点本中的两《唐书》要好得多,今由中华书局重印。此外,《考异》虽随胡注散入《通鉴》正文下,其单行原本仍有南宋刻本和明嘉靖孔天胤刻本传世,有可校正胡克家本中《考异》的脱误处。常见的《考异》单行原本有《四部丛刊》影印南宋刻本。

自从《通鉴》问世后,到南宋时就有人作种种改编工作,比较好的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通鉴》是编年体,一件事情首尾分隔好多卷,初读者往往弄不清头绪,因此袁枢改以事为主,将全部《通鉴》归结出二百三十九事,每事下按年月先后备列《通鉴》原文,此外太零星的记事则舍弃掉。这样就在我国史学领域里开创了与纪传、编年鼎足并列的纪事本末体。初学读《通鉴》困难,可先读此《通鉴纪事本末》,但此书本身并未提供任何新史料,无史料价值,做研究工作仍必须引用《通鉴》,而且此书是南宋时所编,当然没有胡注,也是一大缺憾。此外,南宋时有以朱熹名义编的《资治通鉴纲目》,清康熙时编选《古文观止》的吴乘权、吴大职也编有《纲鉴易知录》,康熙时还有官修的《御批通鉴纲目》,乾隆时又有官修的《御批通鉴辑览》,不仅毫无史料价值,去取也多欠考虑。《纲鉴易知录》过去在村塾中很流行,建国后又重印,所以要在这里打个招呼。

《资治通鉴补》二百九十四卷 明严衍撰

《通鉴》也难免有疏略失误,明末严衍用功数十年,以旧史比勘《通鉴》,撰成此《资治通鉴补》。钱大昕认为严氏“与史学皆实事求是

是,不肯妄下雌黄,其所辩正皆确乎不易”,“有功于《通鉴》者,胡身之(三省)而后,仅见此书”。但此书用旧史补充《通鉴》处多无太大意义,而且严氏所据史料今天都还能看到,倒是订正《通鉴》正文及补充胡注有参考价值,且由此可知《通鉴》所取某些史料的原来面貌。

版本 (1)有清咸丰童氏木活字本和光绪二年盛氏思补楼木活字本,惜均不易得。(2)清人张敦仁曾择其补正《通鉴》正文处撮抄成《通鉴补正略》三卷,有道光时陈氏独抱庐刻本和民国商务印书馆本。(3)近年齐鲁书社又出版《通鉴严补辑要》,按校点本《通鉴》页码汇列严氏补正《通鉴》正文及补充胡注的主要内容。

《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 唐温大雅撰

魏晋南北朝的起居注都早亡佚,唐代的起居注也因实录纂成后即不被重视而湮没,仅存的只此一种,使我们还能看到所谓起居注的面貌,故至可宝贵。此书记唐高祖起兵到正式称帝三百五十七日的事情,因此叫“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起义旗至发引凡四十八日”,即大业十三年五月癸亥至六月乙己,其实从大业十二年未李渊任太原道安抚大使起记叙;卷二“起自太原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即七月壬子至十月壬戌;卷三“起摄政至即真日凡一百八十三”,即十一月甲子至次年五月甲子。撰人温大雅在太原受李渊礼遇,起兵后引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李唐建国后任黄门侍郎,掌机密,又与李世民关系密切,太宗朝擢礼部尚书。此书所记悉耳闻目见,较诸两《唐书》、《通鉴》殊多出入。如从此书看李渊是太原起兵的首谋和组织者,而两《唐书》等均说出于李世民倡议;此书记载大郎建成和二郎世民作用大体相埒,世民别无殊勋,而两《唐书》等几不记建成功绩;此书肯定裴寂功绩,如说“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人启,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而两《唐书》裴寂传不载。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因此,此书不仅提供太原起兵到李唐建国时的历史真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上

影宋本七行十九字

唐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上柱國樂平郡開國公臣溫大雅撰

起義旗至發引凡四十八日

初帝自衛尉卿轉右驍衛將軍奉詔為太原道安撫
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稱職者並委帝黜陟選補焉
河東已來兵馬仍令帝徵發討捕所部盜賊隋大業
十二年煬帝之幸樓煩時也帝以太原黎庶陶唐舊
民奉使安撫翻論奉封因私喜此行以為天授所經
之處示以寬仁賢智歸心有如影響煬帝自樓煩遠
至雁門為突厥始畢所圍事甚平城之急賴太原兵

創業起居注卷一

一

清乾隆吳翌凤抄本《大唐創業起居注》

相,且可借以考索唐初纂修实录、国史时如何遵太宗意旨篡改史实。

版本 除旧抄本外久无单行刻本,刻本都在丛书里,有:(1)明万历胡震亨刻《秘册汇函》本。(2)明崇祯毛晋刻《津逮秘书》本,即用《秘册汇函》旧版。民国十一年博古斋影印《津逮秘书》本。(3)清嘉庆张海鹏刻《学津讨原》本。(4)清光绪时缪荃孙刻《藕香零拾》本。缪本用黄丕烈旧藏影宋抄本等校订后付刻,比较好。(5)《丛书集成》本,据《津逮》本。(6)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单行点校本,以《津逮》本为底本,参校他本及《通鉴考异》。

《顺宗实录》五卷 唐韩愈撰

唐列朝实录除此《顺宗实录》外均已失传,惟此《顺宗实录》因为是韩愈所撰,尚保存在《昌黎先生外集》里,由此可看到唐人所修实录的真面目,与《大唐创业起居注》之保存起居注真面目同为极珍贵的历史文献。

此书纂成后因政治纠葛曾有刊正之举,南宋魏仲举编《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外集》卷六“顺宗实录”题下注:“樊[汝霖]曰:旧史公传云:‘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系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别撰《顺宗实录》三卷。’且公进《实录》表状所云,乃‘监修李吉甫以韦处厚所撰未周悉,命臣重修’,而旧传反谓所撰不当,处厚别撰三卷,误矣。新史又云:‘自韩愈为《顺宗实录》,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全篇。’按[新史]路隋传:文宗嗣位,隋以宰相监修国史,‘初,韩愈撰《顺宗实录》,书禁中事大切直,宦寺不喜,訾其非实,帝诏隋刊正,隋建言卫尉卿周君巢、谏议大夫王彦威、给事中李固言、史官苏景裔(胤)皆言改修非是,夫史册者,贬褒所在,匹夫善恶,尚不可诬,况人君乎?议者引雋不疑、第五伦为比,以蔽聪明,臣[李]宗闵、臣[牛]僧孺谓史官李汉、蒋系皆愈之婿,不可参撰,俾臣得下笔。臣谓不然,且愈所书已非自出,元和以来相循逮

今,虽汉等以嫌,无害公议,请条示甚谬误者付史官刊定。有诏摘贞元、永贞间数事为失实,余不复改,汉等亦不罢。’由是观之,则公于元和十年夏进此《实录》后才一刊正,是文宗朝所特改者贞元、永贞间数事耳。旧史以为韦处厚别撰者固非,而新史又谓‘卒窜定无全篇’者亦非也。司马温公《考异》云:‘景祐中编次《崇文总目》,《顺宗皇帝实录》有七本,皆五卷,题云韩愈等撰(案:即如《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顺宗实录》五卷下所题‘韩愈、沈传师、宇文籍撰’),五本略而二本详,编次者两存之,其中多异同。’然则是非取舍后世安所折衷耶,终之,唯公之信而已,此新史所以采摭无遗,且以公为知言也。”案此《考异》是《通鉴》卷二三六永贞元年正月壬子李师古胁滑州条的《考异》,《考异》还说“此李师古胁滑州事,详本有而略本无”,而今《外集》本《顺宗实录》就无此壬子李师古胁滑州事,可见已是略本。此李师古事与宦官无关,不会在文宗朝所特改的贞元、永贞间数事中,难道真是所谓“窜定无全篇”之本?这些都有待研究。

此书记录顺宗朝国家大事,并有涉及德宗朝之处。如记罢宫市,就列述德宗时宫市的危害;遇有大臣逝世便列一小传,顺宗朝特殊人物如王伾、王叔文等也有小传,均涉及德宗朝或其前的史事。因此此书不仅为研究顺宗朝史事者所必读,即上溯德宗朝亦可参考。两《唐书》、《通鉴》记述此段史事多取材此书,可逐条比勘,并结合上述详、略本的问题,以研究两《唐书》、《通鉴》纂修时对《实录》如何去取。

版本 自宋以来即收入《昌黎先生外集》,为《外集》卷六至一〇。《昌黎先生文集》附《外集》者宋以来注本刻本极多,今常见的有:(1)民国商务印书馆影印八千卷楼旧藏南宋庆元六年建阳书坊魏仲举编刻《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2)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建阳坊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3)蟬隐庐影南宋廖莹中世綵堂编刻《昌黎先生集》。廖刻又有明万历徐时泰东雅堂重刻本,清光绪江苏书局重刻东雅堂本,《四部备要》据江苏书局本排印本。魏仲举本音注最繁,为廖本所取材。

典章制度类

记载典章制度,起源于《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单独编纂典章制度自成专书,则是唐中叶安史乱后才开始的,最早是《通典》,稍后是《会要》。《新唐书》艺文志把《通典》、《会要》入类书,《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等也如此。从形式上看分门别类罗列资料自有点像,实际上和类书之天地万物、人事动植无所不包而且专为词藻采撷之用者显然不同。《直斋书录解题》把《通典》、《会要》改入典故类,《四库提要》则入政书类的通制之属,自较为合理。今改用史学上常说的“典章制度”一词为类目。

《通典》二百卷 唐杜佑撰

杜佑是中唐时著名的政治家、理财家,《旧唐书》卷一四七、《新唐书》卷一六六均有传,旧传并载其进《通典》表,《通典》卷首复有李翰序及自序,都是研究《通典》的第一手资料。《十七史商榷》卷九〇“杜佑作《通典》”条即据以考《通典》成书经过,略谓:“左补阙李翰撰杜佑《通典》序云:‘淮南元戎之佐曰尚书主客郎京兆杜公晋卿’,‘以大历之始实纂斯典,累年而成。’案旧书佑传,佑以荫入仕,补济南府参军、剡县丞,润州刺史韦元甫奏为司法参军,元甫为浙西观察、淮南节度,皆辟为从事,深所委信,累官至检校主客员外郎。此检校主客即元甫所奏署者,其时尚在元甫幕下,故翰称为‘淮南元戎之佐’。旧书于此下乃云:人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管经略使,杨炎入相,徵入朝,历工部、金部二郎中,并充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时

方军兴，馈运悉委于佑，迁户部侍郎，判度支，为卢杞所恶，出为苏州刺史，佑母在，苏州忧阙，换饶州刺史，未几，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徵为尚书左丞，又出为陕州观察使，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丁母忧，特诏起复，累转刑部尚书检校右仆射。十三年，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卒，其子愔为三军所立，杜佑以淮南节制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泗节度使，委以讨伐，及诏以徐州授愔，而加佑兼濠泗等州观察使，在扬州开设营垒云云。十九年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德宗崩，佑摄冢宰，进检校司徒，充度支盐铁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宏文馆大学士。顺宗崩，复摄冢宰。元和元年，册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国公，元和七年，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十一月薨，年七十八。此下总论佑生平为人，因及作《通典》事，则云‘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并载其进表云‘自顷纘修，年逾三纪’云云。考佑以大历之始纂斯典，大历元年佑年三十三，贞元十七年进书佑年六十七，相距恰三十年，故云‘三纪’。翰作序时佑为淮南幕僚，及书成上进则自为淮南主帅矣。实更三纪，而〔李序〕但云‘累年而成’者，其实官使府时粗就初稿而已，尚未成也。佑入仕虽早，亦当弱冠，历佐卒两处方得入元甫幕，佐幕之时大约已近三十，时方草创此书，在幕阅数任方为主客，而初稿乃成，故云‘累年而成’。翰天宝中已以进士知名，代宗初年为侍御史（见旧书文苑传），于佑为先达，佑欲借‘皇甫士安’重其《三都》，故以初稿急求为序，厥后改润，大约屡易稿方定。”

《旧唐书》佑传又谓：“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所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案：秩，刘知几子，附见旧书卷一〇二刘传，又一一一房琯传记陈涛斜之役琯临戎谓人曰‘逆党曳落河虽多，岂能当我刘秩等’，即是此刘秩）。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其书大

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案刘秩《政典》盖仿开元时官修《大唐六典》,以《周礼》六官比附,而通述古今制度。杜佑《通典》则完全打破此不合理陈式,另起炉灶,《通典》自序:“佑少尝读书,而性且固蒙,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徵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案:唐人避高宗讳易‘治’为‘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原注:十二卷),选举次之(六卷),职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礼又次之(百卷),乐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边防末之(十六卷)。或览之者庶知篇之旨也(本初纂录止于天宝之末,其有要须议论者,亦便及以后之事)。”这是自序的全文,从撰作的宗旨讲到全书的体制,并明确了断限。如所周知,安史乱后唐朝的全盛局面已一去不返,今后如何办,杜佑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将施有政”。杜佑的政治观点是以“足衣食”即解决经济财政问题为本,然后才是“精选举”、“审官才”、“兴礼乐”、“用刑罚”、“列州郡”、“置边防”,这样来确定此书的篇第,不仅远远超过《政典》之拘乎《周礼》六官的陈腐方式,而且比后来《会要》之首帝号也高明得多。这种观点在杜佑着手纂修此书初稿时就早已确立,所以李翰给初稿作序就说“凡有八门,号曰《通典》”,与自序所说一致,而晚年成书上表时说“书凡九门”,已如今本将兵、刑分列,则自序之以刑统兵刑,仍为八门者,定在成书以前非最后手笔(在这“八门”、“九门”问题上《十七史商榷》“杜佑作《通典》”条并没有讲清楚)。从初稿到成书三十年中杜佑曾历任青苗使、水陆转运使、度支郎

中、和籾等使、户部侍郎判度支等财经要职,说明此书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所发的某些议论实际上还是撰者阅历之言,不同于一般的书生空谈。

今天从史料角度来看,此书隋以上多采自正史和其他经、子古籍,没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唐代部分则收集唐令格式及诏敕、奏疏以及重大纪事(当本诸实录、国史),都是比较原始的第一手史料,应和今存的《唐会要》、《册府元龟》唐代部分以及《大唐六典》等同样重视使用。许多重要史料唯见于此书,如食货典中的诸色仓储粮数、仓部格,刑典中的开元格等。有些记载与他处不同,如州郡典中各道、州郡的户口数与《元和郡县图志》、两《唐书》地理志不同,节度使辖军和兵马数与地理志亦不一致,这就为探讨唐代各种制度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线索。书中还收录了許多人评说制度的奏疏论议,如刘秩论考课、刘祥道等论选举,从中不仅可知当时人对现行制度的看法,也能考见所规定的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的情状。至于杜佑自己的议论如上所说,是中唐时著名政治家、理财家的经验之谈,当然更值得倾听。如食货典中对安史之乱前后财政税收的评论,兵总序对安史所以酿乱的议论,对研究唐史者都有很大的启发。遗憾的是兵门只讲战例,未述兵制沿革,这对当时之用兵频繁自有其需要,但在今天研究兵制者看来则不免失望(《通典》不述兵制,旧书不修兵志,是今天研究唐兵制所以困难的主要原因)。

此书的另一价值是保存了一些佚书的部分内容,如兵典中的《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两《唐书》志及以后书目均未著录,估计在晚唐便残佚,而《通典》兵典中保存了不少。边防典中保存的佚书片段,如隋《西域图记》、唐杜环《经行记》、屈繆《道里记》、《广志》、《外国图》、《突厥本末记》等,也很有价值。

版本 (1)南宋刻本,日本藏全部,北京图书馆有几部残本。(2)明嘉靖刻本有几种,其中李元阳刻本增入诸议论。(3)清乾隆

武英殿刻《九通》本,另附考证,但很简陋。(4)清光绪浙江书局重刻殿本《九通》本。(5)清光绪二十七年图书集成局扁铅字排印殿本《九通》本。(6)清光绪二十八年鸿宝书局缩印殿本《九通》本。(7)民国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中《十通》缩印殿本附《十通索引》。但殿本本有脱误,应用宋刻本校补。(8)近时日本影印宋刻本。(9)1984年中华书局影印《万有文库》本。(10)1988年中华书局出版王文锦等点校本,颇精审。

《宋白续通典辑本》八卷附“解题” 日本船越泰次编

杜佑《通典》止于唐天宝末,中晚唐典章制度的沿革尚付阙如,因而到北宋时就有续修之举。《玉海》卷五一载:“咸平三年十月,监修国史李沆请命官续修《通典》。己未,诏翰林承旨宋白、知制诰李宗谔编修,白等又请命舒雅、杨亿、李维、石中立、任随同编修,杜镐检讨。四年九月丙戌书成,白等上之,凡二百卷,目录二卷。”所纪自唐至德初至五代后周显德末,门类一仍杜佑原录。但流传不广,仅宋、元间胡三省注《通鉴》曾多次引用,明以来即告失传。日本船越泰次据《通鉴》胡注所引辑成八卷,以《宋白续通典辑本》的书名出版(1985年日本汲古书院版),前七卷都是原书州郡里的有关地理沿革的佚文,第八卷是边防及其他佚文,附带还从南宋洪遵《泉志》中辑出四条五代时铸钱的佚文。这些史料对查考中唐以至五代的地理沿革等仍不无用处。

此外,清乾隆三十二年官修《续通典》,四十八年修成进上,仍续杜佑《通典》,起肃宗至德元年迄明崇祯末年,一百五十卷,体例大体仍《通典》而略有变动。其中唐代部分的史料多本正史、《大唐六典》、《唐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山堂考索》等书,又从唐人文集、《唐文粹》、《文苑英华》、名臣奏议中择取议论,但皆未注出处,对唐史研究没有参考价值。

《唐会要》一百卷 北宋王溥撰

王溥北宋初人,《宋史》卷二四九有传。此书实以唐人所撰《会要》、《续会要》增修而成。

此书卷三六“修撰”,记唐人两次撰修《会要》之事:“〔贞元〕十九年二月,淮南节度使杜佑撰《通典》二百卷上之,……又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弁与兄冕纘国朝故事为是书。弁先聚书二万卷,皆手自刊正。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芸阁焉。”“〔大中〕七年十月,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崔铉上《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瑒、薛逢、郑言等,赐物有差。”《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则作“苏冕《会要》四十卷。《续会要》四十卷(原注:杨绍复、裴德融、崔瑒、薛逢、郑言、周肤敏、薛廷望、于珪、于球等撰,崔铉监修)。”《新书》卷一〇三苏世长传附苏弁传兼纪苏冕事迹,未言撰《会要》事。从上引《唐会要》纪弁、冕撰《会要》事与杜佑《通典》相衔接为一条来推测,成《会要》当亦在贞元时,《郡斋读书志》衢本卷一四《唐会要》条谓其“叙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损益之制”,自亦可信。至《唐会要》谓苏弁与兄冕撰,新志、《读书志》等却都说是苏冕撰,当是《新唐书》所题衔名苏冕以兄居首之故。从《唐会要》所说此苏氏《会要》本是私撰,后来《续会要》才是官修,故有监修及修撰官名目。其续成进上年月,据上引《唐会要》是大中七年十月,而《郡斋读书志》衢本则称“大中七年诏崔铉等撰次德宗以来事至宣宗大中六年以续冕书”,是否不到一年此《续会要》就修成进上,抑《读书志》所说是据《唐会要》大中七年进上而随手写来,不足为凭。今本《会要》卷四六有“崔氏曰”,云苏冕所载封建篇如何,今如何,可知崔铉曾躬身其事,非徒挂名。至王溥监修《唐会要》事见《玉海》,谓:“建隆二年正月丁未,司空平章监修国史王溥等上新编《唐会要》一百卷,文简理备,太祖嘉之,诏藏史馆,赐物有差。”案苏氏《会要》已有四十卷,《续会要》又有四十卷,王溥监修的《唐会要》只将前二书合并统编,“又采宣宗以后事共成百卷”(《读书志》),则所增

实亦寥寥，观今《唐会要》所纪高祖至德宗时事最详，德宗至宣宗已稍简略，宣宗以后所纪益稀可证。因此王溥等在《唐会要》上出力并不多，首创《会要》此体并纂修成书应归功于苏氏弟兄。

《新唐书》苏弁传称“弁通学术，吏事精明”，又历判度支，和杜佑同样是理财家，撰作《会要》和进上《通典》又大体同时，所取材也多据唐令、诏敕奏议和其他纪事，不过《通典》是通代，《会要》是断代。但从今王溥本来看，所列类目多至百十四，又不设部门以为统属，未免过于琐碎，先后次序也不如《通典》之能秩然成理，间附“苏氏议曰”云云也不如《通典》杜佑议论之精审，这都是《会要》不如《通典》之处。但《通典》只纪到安史之乱前后，《会要》则一续再续纂成有唐一代典要，而且类目范围毕竟比《通典》广，大量不见于《通典》的史料可在此书上找见，急剧变化的中晚唐制度得据以考索，这是此书最可贵之处。

前面说过，纪典章制度始于纪传史的书志，到《通典》、《会要》撰成才有纪典章制度的专书。而这两书既问世，尤其是《会要》问世，又转可为纂修纪传史所凭藉。

版本 (1) 宋刻本早不传，仅有抄本，《四库提要》谓：“脱误颇多，八卷题曰‘郊议’，而所载乃南唐事，九卷题曰‘杂郊议’，而所载乃唐初奏疏，皆与目录不相应，七卷、十卷亦多错入他文，盖原书残缺，而后人妄摭窜入，以盈卷帙。又另一本所阙四卷亦同，而有补亡四卷，采摭诸书所载唐事，依原目编类，虽未必合溥之旧本，而宏纲细目，约略粗具，犹可以见其大凡，今据以录入，仍各注‘补’字于标目之下，以示区别焉。”这就是《四库全书》本。(2) 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即据《四库》本用木活字排印。以后有几种覆刻本。(3)《丛书集成》本，据《聚珍》本。(4) 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用《丛书集成》版。(5) 建国后中华书局本，也用《丛书集成》旧版。以上各本使用时对其七、八、九、十这后人所补的卷要区别对待，这四卷是用两《唐书》、《册府元龟》、《文献通考》等所补，与宋

徐天麟《两汉会要》以来补撰《会要》的做法相同,对此只能引用两《唐书》、《元龟》等原书。(6)北京图书馆藏有明抄残本,此四卷亦在缺卷中,又藏有清抄本两部皆百卷不缺,不知与《四库》本有无异同。(7)张忱石据中华书局本编《唐会要人名索引》,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甚便检索。

职 官 类

职官类的书,今所存最古的自推《周礼》,一向入经部,实际上是战国时人根据现行列国官制加以系统化、理想化的作品,其中不仅讲设什么官,还详述官所职掌,是一种政治设施蓝图。以后汉魏六朝有“官议”、“百官名”、“百官阶次”、“百官簿状”之类实际行用的职官书,都已失传。唐令中的“官品令”、“三师三公台省职员令”、“寺监职员令”、“卫府职员令”、“东宫王府职员令”、“州县镇戍岳渎关津职员令”也近于上述性质。专门模仿《周礼》体制编成职官专书则是玄宗时的《大唐六典》。

《大唐六典》三十卷 唐张说、张九龄、李林甫递监修

此书也可省称《唐六典》,当时则径称《六典》。今本无序、无进书表,记述其纂修情况则有《新唐书》等书。《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六典》原注:“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诏集贤院修《六典》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案:即治典,唐人避高宗讳易‘治’为‘理’)、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张说知院,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奭、余庆、咸廑业、孙季良、韦述参撰,始以令、式象《周礼》六官为制。萧嵩知院,加刘郑兰、萧晟、卢若虚。张九龄知院,加陆善经。李林甫代九龄,加苑咸。二十六年书成。”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著述”：“时张说为丽正学士,以其事委徐坚,沈吟岁余,谓人曰:‘坚承令已曾七度修书,有凭准皆似不难,惟《六典》历年措思,未知所从。’说又令学士毋奭等检前史职官,以令、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像周官之制,然用功艰难,绵历数载。”《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

六《唐六典》条引韦述《集贤记注》：“上手写白麻纸凡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张说以其事委徐坚，思之历年，未知所适。又委毋煨、余钦、韦述，始以令、式分入六司，像《周礼》六官之制，其沿革并入注，然用功艰难。其后张九龄又以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至今在书（案‘书’应作‘直’）院，亦不行。”《唐会要》卷三六“修撰”：“〔开元〕二十七年二月，中书令张九龄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百官称贺。”从这几条记载并看今存《大唐六典》实际内容，可知：（1）玄宗的所谓理、教、礼、政、刑、事六典，本出《周礼》大宰，郑众以为即《周礼》六官，最多相当于唐尚书省属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门下及其他职官无从容纳进去，故惯修官书如徐坚者亦思之历年不知所适。（2）张说令毋煨改变办法，仿照前史职官志，把唐代颁行的令、式分入职官名下，徐按《周礼》六官把六部比附上去外，其余不属六部无法比附者则与六官并列，借《周礼》六官之名仍名其书为《六典》，以敷衍玄宗，实则全书并不分为六个典，不符玄宗的原意。历代及本朝沿革则入小注。（3）此后先后监修者为历任知集贤院事的张说、萧嵩、张九龄、李林甫。张说发凡起例，李林甫书成进上，故今传本题“臣李林甫等奉敕注上”。进上的时间韦述、刘肃说是开元二十六年，《唐会要》说是二十七年二月，或是二十六年年终进上二十七年二月宣示其事百官致贺。新志、《新语》都说张九龄委陆善经，李林甫委苑咸，独韦述说“张九龄委苑咸”，无李林甫姓名，似“张九龄委”下脱去“陆善经，李林甫委”七字。然《会要》也说“中书令张九龄等撰《六典》三十卷成”，则监修之功当以张九龄为多，张九龄二十四年罢政事，寻谪荆州，故李林甫以继知院监修而进上（其中或据开元二十五年新颁令校改过）。因此此书如循其实，当曰张说、张九龄、李林甫递监修。（4）此书修成后如韦述所说“亦不行”，即并不像唐令的官品等令那样施行。《四库提要》亦谓：“考《吕温集》有代陈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一篇，称‘宣示中外，星纪六周，

有明诏施行’，……与韦述之言相合，唐人所说当无讹误。”但此书所述既为现行职官，不同于《周礼》之多设想成分，而所引令、式又为当时的正式法令，故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道州民”条引白居易《道州民》“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谓“《六典》一书，自大历后公式文中可以徵引，与现行法令同一效力”。(5)惟此书中确有准备办而实未办之事。如卷五兵部郎中条谓“凡天下之节度使有八，其一曰关内朔方节度使，……其二曰河东节度使，……其三曰河北幽州节度使，……其四曰河西节度使，……其五曰陇右节度使，……其六曰剑南节度使，……其七曰碛西节度使，……其八曰岭南节度使，……”此与《通典》卷一七三州郡典、《旧唐书》地理志所列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九节度多寡名目皆有不同，岭南在安史乱前一直是岭南五府经略使从未升格成节度，可见《六典》此处所说只是准备照此调整的拟议，并未付诸实施。

《十七史商榷》卷八一有“新旧官志皆据开元《六典》”条，谓：“旧书职官志总论云：自高宗以后，官名品秩屡有改易，今录永泰二年官品，总其改易品秩者，注于官品之下，若改官名及职员有加减者，则备附之本职云。……杜佑《通典》第十九卷职官门官制总序，历说上古至唐制，而终之云至开元二十五年刊定职次著为格、令。注云：此格皆武德、贞观之旧制，永徽初已详定之，至开元二十五年再删定焉。据此则《通典》全以开元二十五年为定矣。而旧志于‘兵部郎中’一条云凡天下节度使有八，此开元制也，……然则旧志虽言永泰，其实仍据开元。……官制之明备，莫过于九龄之《六典》，为《通典》之本，旧书亦本之，则知其均据开元也。新志虽不言其所据何时，要新[书]官志皆本《六典》、《通典》，则必亦以开元为据。”同卷“《六典》外官无节镇”条也说：“新、旧官志之所以多同者，以其皆用《六典》为蓝本，而稍增损之故也。”案《商榷》此说实有逻辑混乱之病。《旧唐书》职官志明谓“录永泰二年官品”，讲“天下节

大唐六典三府都護州縣官吏卷第三十

御撰

集賢院學士兵部尚書無事書今修國史在國開國臣李林甫等奉

教注上

京北河南太原三府官吏

大都督府中都督下都督官吏

上州中州下州官吏

京縣畿縣天下諸縣官吏

大都護上都護府官吏

鎮戍嶽瀆關津官吏

度使有八”自是根据《六典》，但这和志中注上大历、元和、会昌等改易官名秩是同样的办法，都是以永泰二年为主，附记其他时间的情况，如何能以偏概全，据此“节度使有八”一点就说《旧唐书》职官志是据《六典》、用《六典》为蓝本。《通典》则据唐先后几次颁布的格、令记述职官，是否一以开元二十五年颁布的格、令为定尚待对勘研究。即使如《商榷》所说“全以开元二十五年为定”，也和开元二十七年进上的《六典》是两回事，不能因《六典》和《通典》同样根据这些格、令就说《通典》本诸《六典》。至于《新唐书》百官志既“不言其所据何时”，更不能想当然地说它出于《六典》。《商榷》此说实不能成立。

版本 (1) 南宋绍兴四年温州州学刻本，残存一至三、七至一五、二八至三〇共十五卷，原分藏北京图书馆及李盛铎、傅增湘处，今分藏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南京博物院。(2) 明正德十年席书、李承勋刻本。(3) 明嘉靖二十三年浙江按察司刻本。(4) 清嘉庆五年扫叶山房刻本。(5) 清光绪二十一年广雅书局刻本。(6) 日本享保九年(雍正二年)近卫家熙刻本，据正德本又用嘉靖本及《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通典》等书校补，尚称精审，缺点是未得宋本参校，致卷七“屯田郎中”条有大段脱文。(7) 日本缩印享保本。(8) 日本广池千九郎训点、内田智雄补订本，1973年刊行。此本在享保本上用北图所藏宋残本校注，脱文也据宋本补入，成为目前较完善之本。(6) 1983年中华书局《古逸丛书三编》影印现存的十五卷残宋本。(7) 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陈仲夫点校本，书名用《唐六典》，校勘颇精审。

仪注类

这是《旧唐志》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早已使用的类目。《四库提要》则改为政书类典礼之属。唐代这类书现仅存两种。

《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 唐萧嵩监修

此书纂修原委见《通典》卷四一礼总序：“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岩上疏请改撰《礼记》，削去旧文，编以令事，集贤院学士张说奏曰：‘《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但今之五礼仪注，已〔贞观、显庆〕两度增修，颇有不同，或未折衷，请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制定之。’于是令徐坚、李锐、施敬本等检撰，历年其功不就。说卒，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修之。二十年，新礼成，凡百五十卷，是为《大唐开元礼》。”《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所纪略同，当即袭《通典》，并谓“二十年颁所司行用焉”。

《四库提要》谓：“其书卷一至卷三为序例，卷四至七十八为吉礼，卷七十九至八十为宾礼，卷八十一至九十为军礼，卷九十一至一百三十为嘉礼，卷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五十为凶礼。凶礼古居第二，而退第五者，用贞观、显庆旧制也。贞元中诏以其书设科取士，习者先授太常官，以备讲讨，则唐时已列之学官矣。新、旧《唐书》礼志皆取材是书，而所存仅十之三四，杜佑《通典》别载“开元礼纂类”三十五卷，比《唐志》著详，而节目亦多未备。……《新唐书》艺文志载修《开元礼》者尚有张烜、陆善经、洪孝昌诸人名。而《通典》“纂类”中所载五岳四渎名号及衣服一门，间与此书相出入者，盖传写异文，不能画一。”所论大体

允当。此书记载的唐代礼仪制度为《旧唐书》礼仪志、《新唐书》礼乐、仪卫志所本,并更为详尽,可以据以考知许多礼仪规范的细节,还可以由此了解唐代社会,如、衣食、器用和乐舞之类。

版本 (1) 宋刻早失传,有传抄本。今北京图书馆尚藏清抄本两部,其一附李璋煜辑王念孙等辩证一卷。(2)清光绪十二年洪氏公善堂刻本。(3)1972年日本影印公善堂本,池田温解说并编制《大唐开元礼·通典对照目录》(4)《通典》卷一〇六至一四〇“开元礼纂类”实为此书的节本。

《大唐郊祀录》十卷 唐王泾撰

此书清《四库全书》及阮元进呈《宛委别藏》均未收入。《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仪注类有之,谓“贞元九年上,时为太常礼院修撰”。今本卷首有进书表,谓:“谨集历代郊庙享祀之要及圣朝因革沿袭之由,伦比其文,各标篇目,裁为《大唐郊祀录》十卷,其中义有异同,皆随文注释,神位升降并写而为图,祝史陈告之词、工歌大雅之什亦俱编于此。”计凡例三卷,祀礼四卷,祭礼一卷,飨礼二卷。“神位升降写而为图”之图已不存。卷九荐献太庙迎神第二奏注“元缺,臣陈致雍补”,《适园丛书》本张钧衡跋(当缪荃孙代作)考知为南唐太常博士,见陆游《南唐书》卷一三后妃传、马令《南唐书》卷一九潘佑传,吴任臣《十国春秋》复为列传。

所谓郊祀,即在《大唐开元礼》的所谓吉礼中,但此书并非《开元礼》的节本,其正文所载当为贞元年间通行制度,与《开元礼》比勘可见开元之后的变化。篇幅超过正文的案语则更有价值,不但叙述历代沿革包括有唐一代的变化,而且引用令、式、奏疏、诏制等多未见于他书。

版本 (1) 一向仅有传抄本,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两部。(2)民国四年张钧衡刻《适园丛书》本。(3)1972年日本影印《适园丛书》本,附《大唐开元礼》之后。

法 令 类

这在《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都称刑法类，易和今日刑法、民法的概念相混淆。《直斋书录解题》改为法令类，《四库提要》则为政书法令之属，都比较好。今从之曰“法令”不曰“刑法”。

唐代的法令有律、令、格、式四种。《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刑部”：“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条同）这不太好懂，所以《新唐书》刑法志改易为：“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从律。”可见律是一类，是讲惩处的，而令、格、式又是一类，是讲制度规则的，亦即《太平御览》卷六三八杜预《律序》所说“律以定罪名，令以存事例”。其中令又是主要的，格、式是细则事例。

唐代编纂的律、令、格、式为数极多，其名称及编纂原委以《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所纪最详（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〇章第一〇节引旧志并以旧纪、新志、艺文志等校注，可参考）今存完书止一《唐律疏议》，另外令有辑本《唐令拾遗》。

《唐律疏议》三十卷 唐长孙无忌等监修

此书卷首有永徽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长孙无忌等进《律》表疏。《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谓“永徽初敕长孙无忌等撰定律、令、格、

式。……三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于是成三十卷，四年十月奏之，颁之天下”（旧书卷四高宗纪作“十一月”，此作“十月”，“十”下当脱“一”字），即是此书。旧书卷四六经籍志作《律疏》三十卷，是此书本名。新书卷五八艺文志作《永徽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作《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知唐、宋时不附疏的《律》十二卷与《律疏》三十卷同时并行。《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七著录《律》十二卷音义一卷，谓“本朝天圣中孙奭等立撰音义”，今尚有南宋刻本传世。至于今所见旧刻《律疏》，均题《故唐律疏议》者，“故唐”是宋人所加，“议”则缘每条律文下都标“疏”，疏语开头作“议曰”，宋人误把“疏议”连读，遂在原书名下加一“议”字，成为《故唐律疏议》。清《四库全书》著录时又删去“故”字称《唐律疏议》。今《唐律疏议》之称已约定俗成，虽不通亦不便径复旧名（又 1885 年日本学者佐藤诚实于《国学院杂志》第五卷第一三号发表《律令考》，对《唐律疏议》之为永徽律提出怀疑，1931 年《东方学报》一、二册发表仁井田陞、牧野巽《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进一步认为是开元二十五年所颁行的《开元律》的律疏，信从者颇多，其实所提出的证据都不能成立，《文史》第五辑有杨廷福《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后又收入所著《唐律初探》，对此作了驳正，可参考）。全书计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凡十二篇、五百条。在每条律文下都有疏，引用律、令、格、式及其他文献解释律文，或设问作答，示以范例。

日本当年大化革新，向唐朝全面学习，曾于大宝元年（武周大足元年）仿照唐律、唐令编制自己的律令即《大宝律令》，养老二年（唐开元六年）又加修订称《养老律令》或《大宝养老律令》。《养老令》沿用到明治维新才废止，而《养老律》久已失传，需依靠唐律来研究日本古律。在国内，唐以后的五代、宋、辽、金、元都基本上沿用唐律，到明洪武时制订《大明律》，唐律才不再行用（参考杨廷福

名例四

凡八條

犯罪已發問答一

諸犯罪已發及已配而更為罪者各重其事

論曰已發者謂已被告言其依令應二審者初告亦是發

訖及已配者謂犯徒已配而更為答罪以上者各重其後犯之事而累科之

即重犯流者依留住法決杖於配所役二年

論曰犯流未斷或已斷配訖未至配所而更犯流者依工

樂留住法流二千里決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決杖一百三十流二千里決杖一百六十仍各於配所役二年通前犯流

《唐律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收入《唐律初探》。

研究唐史，《唐律疏议》当然是重要依据，可据此考知当时某些制度和社会情况，可珍史料甚多，贵在利用。

版本 由于唐律在宋、元时仍生效，因此宋、元刻本均有流传，入明后才不再刊刻，到清代则作为古文献又重刻。(1)南宋刻元修补本《律》附音义，又有据此本之影抄本，均藏北京图书馆。(2)传为南宋刻本实为元刻本，旧藏潘氏滂喜斋，今不详所在。(3)元至正建阳书坊余志安勤有堂刻本。(4)清嘉庆孙星衍《岱南阁丛书》覆元至正刻本，此本流行最广，有影印本、重刻本。(5)《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滂喜斋藏本并附印影宋抄本《律》十二卷后的孙奭撰音义一卷，又用孙刻本与宋本对勘作出校勘记附后。(6)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本《律》附音义。(7)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刘俊文点校本，用诸旧本校勘并利用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写残卷，允称善本。

《唐令拾遗》 日本仁井田陞辑

唐令据《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卷四六经籍志及《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有《武德令》三十卷，《贞观令》三十卷(艺文志作二十七卷)，《永徽令》三十卷，《开元七年令》三十卷，《开元二十五年令》三十卷。《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止著录《开元二十五年令》三十卷，《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七止著录《开元七年令》三十卷，宋以后即全部失传。但《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很多都采自唐令，两《唐书》、《大唐开元礼》等引用唐令也不少。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将以上各书加之其他古籍中所引用的唐令片断统统搜辑出来，均详注出处原文，并附《养老令》等参考条文，按唐令旧目分官品令、三师三公台省职员令、寺监职令、卫府职员令、东宫王府职员令、州县镇戍岳渎关津职员令、内外命妇职员令、祠令、户令、学令、选举令、封爵令、禄令、考课令、宫卫令、军防令、衣服令、仪制令、卤簿令、乐令、

公式令、田令、赋役令、仓库令、厩牧令、关市令、医疾令、捕亡令、假宁令、狱官令、营缮令、丧葬令、杂令三十三门,计七百十五条。和《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条所说开元七年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相比,所得已近半数。固然唐令之见引比较集中于《六典》、《通典》、《会要》等书,搜辑稍易,同时搜辑中也难免发生个别差错,但著者治学之勤苦、作风之谨严实值得钦佩。

此书对研究唐史极有用处。研究唐史时凡从其他书中引用唐令,都应用此书查对一下,看所用是否有遗漏,是否有更完整的引文。研究唐代典章制度不仅要引用《六典》、《通典》、《会要》、《册府元龟》和两《唐书》志,更要引用第一手的唐令。此书解说都用日文,懂日文查阅使用更方便。

版本 1933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初版。1964年、1983年东京大学出版会又曾两次出版缩印本。

诏令类

诏令是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文告命令，在唐代因用途不同而有诏、制、敕、册、赦、德音、批答等名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把诏令附在起居注类之后，因为起居注纪事，诏令纪言，都算是记皇帝的言行，而且和起居注放在一起、据起居注与日历等纂修的实录中便附有诏令。《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因为诏令也是文章就放到集部总集类里，实为欠妥。《直斋书录解题》另立诏令集，比较合适。《四库提要》把诏令奏议合为一类，自亦可以。

《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著录唐人编纂的诏令集有温彦博《古今诏集》、李义府《古今诏集》、薛克构《圣朝诏集》、《唐德音录》、《太平内制》、《明皇制诏录》、《元和制集》、马文敏《王言会最》、费氏（《宋史》卷二〇九艺文志作“费乙”）集《唐旧制编录》等，均已失传。今止存北宋人编纂的《唐大诏令集》一种。此外，清嘉庆时官修《全唐文》中所谓皇帝的作品实多系臣下代笔诏令，亦应利用。

《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 北宋宋敏求编

此书有北宋熙宁三年宋敏求序，谓：“《唐大诏令集》者，先君宣献公景祐中书第三□所纂也。先公以文章名世，更内外制之选，而朝廷典册多以属之。及入陪宰政，仁宗数面命撰述。……机务之隙，因哀唐之德音、号令非常所出者汇之，未次甲乙，未为标识，而昊天不吊，梁木遽坏。小子不肖，大惧失坠，秘其书于家楹者盖有年矣，仆射王文安公累以为问，谓当垂世不朽，乃绪正旧稿，厘十三

类,总一百三十卷,录三卷。文安见许序而名之,未果而公薨。治平二年,先皇帝简拔孤陋,置在西掖,固欲澡雪蒙滞,而钻仰众制。方缮写成编,会忤权解职,顾翰墨无所事,第取《唐大诏令》目其集而弃藏之云。”则此书集于敏求之父宋绶,而成于敏求,故《宋史》卷二〇九艺文志、《玉海》著录編集者皆题宋绶,今传本则题宋敏求。

《四库提要》谓:“敏求尝预修《唐书》,又私撰唐武宗以下《实录》一百四十八卷,于唐代史事最为谙悉。……其书世无刊本,辗转抄传,伪误颇甚,中阙卷第十四至二十四、八十七至九十八凡二十三卷,参校诸本皆同,其脱佚盖已久矣。……其中不尽可解者,如《裴度门下侍郎彰义军节度使宣慰等使制》,据《旧唐书》,其文乃令狐楚所草,制出后度请改制内‘剪其类’为‘革其志’,改‘更张琴瑟’为‘近辍枢衡’,改‘烦我台席’为‘授以成算’,宪宗从之,楚亦因此罢内职,是当时宣布者即度奏改之辞,今此集所载尚仍楚原文,不从改本,未详何故。又《宝历元年册尊号赦书》,据敬宗本纪,时李绅贬官,李逢吉等不欲绅量移,乃于赦书节文内但言左降官已经量移近处,不言未量移者宜与量移,翰林学士上疏论列,帝命追赦书添改之,今此集所载只及诏罪一条,而无左降官量移之文,疑亦有所佚脱。又《旧唐书》所载诏旨最多,今取以相校,其大半已入此集,而亦有遗落未载者,如纪号则纪元天祐诏,除授则尹思贞御史大夫、李光弼兵马副元帅诸制,追赠则张说赠太师、杨瑁、颜真卿、李绛赠司徒、郭暖赠太傅、郑朗赠司空,田布赠仆射诸诏,优礼则杜佑、萧俛致仕诸诏,奖励则劳解琬、奖李朝隐、褒美令孤彰、奖伊西北庭二镇诸诏,谪降则王毛仲、韩皋、吕渭、张又新、李续之、熊望贬官诸诏,诛窜则决杀长孙昕、流裴景仙、裴茂诸敕,皆关朝廷举措之大者,而此集并阙而不登,以敏求博洽,不应疏于搜采,或即在散佚之中,亦未可定也。”案《提要》此条颇下了些对勘功夫,写得较好,但说《旧唐书》有而不见此书的诏令都在缺卷之中则未必尽然。宋绶編集此书本仅“哀唐之德音、号令非常所出者”,敏求据绶旧稿稍

唐大詔令集卷之二目錄

痊愈

太上皇康復詔

又疾愈德音

卷之二

遺詔上

神堯遺詔

太帝遺詔

代宗遺詔



疾愈德音

救恤百姓僧尼勅

太宗遺詔

肅宗遺詔

德宗遺詔

清乾隆抄本《唐大詔令集》

事增益,亦并未表白此书于唐诏令已广搜无遗,观自序文气自知。其实此书不但不是唐代诏令全集,就是所选入的诏令也多有删节。今天自可从《旧唐书》及《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书搜辑今存全部唐诏令,以此书为基础重事校补,编出一部更完善的新《唐大诏令集》。

诏令都是第一手史料,对研究唐史极为有用,如有些重大举措,就在赦文中发布施行。

版本 (1) 本书一向只有传抄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几部残抄本,其一四至二四、八七至九八诸卷均原缺。(2) 民国三年张钧衡刻《适园丛书》本,用明抄三本互校。(3) 建国后商务印书馆校点本,以北京图书馆藏顾广圻校旧抄本为底本,用《适园》本校勘,是较好的本子。但书前的出版说明间有失误之处,如说“李湛(敬宗)之死,本为宦官所杀,旧书隐讳不载(新书亦仅称‘〔宝历二年〕十二月中官刘克明反,辛丑皇帝崩’,而本书一一四《江王下教》(文宗李昂)却透露了这件事的秘密”。其实此事本非秘密,《旧唐书》敬宗纪即谓宝历二年十二月辛丑“帝夜猎还宫,与中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瑞打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等二十八人饮酒,帝方酣,入室更衣,殿下烛忽灭,刘克明等同谋害帝,即时殁于室内,时年十八”,所说比《江王下教》还具体得多。又如说“日人仁井田陞有《唐令拾遗》之作,于唐令的搜集下过一番功夫,可是编者意图不单是校补《唐大诏令集》的残缺,所收范围很广,把法令、律令也包括在内,和本书体例是不相同的”。其实仁井田陞的《唐令拾遗》是拾已佚的“律令格式”中唐令之遗,此“令”既非诏令之“令”,与《唐大诏令集》初不相干,而且也没有把令以外的律收进《拾遗》里,唐永徽律即今本《唐律疏议》完好无损,本不用拾遗。

地 理 类

唐代有关地理著述的全貌,以及在地理学上的成就,是属于地理学史的研究范围。这里仅就现存的包括残存的几种和研究唐史有关的地理著述作讲述。

按全国行政区划记述的地理书即《四库提要》史部地理类的所谓总志,除《旧唐书》和《新唐书》里的两种地理志和《通典》的州郡典外,现存的有《元和郡县图志》和残存的《括地志》,《太平寰宇记》虽是宋代地志,但有不少唐代资料,也可一并讲。

《括地志》 唐魏王李泰撰 清孙星衍辑本八卷 贺次君《括地志辑校》四卷

李泰为唐太宗第四子,撰《括地志》是封魏王时事,后以夺嫡见遣,最后封濮王。《旧唐书》卷七六太宗诸子传有濮王泰传,谓:“〔贞观〕十二年,司马苏勖以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劝泰奏请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就府修撰。……十五年,泰撰《括地志》功毕,表上之,诏令付秘阁,赐泰物万段,萧德言等咸加给赐物”。《唐会要》卷三六修撰:“〔贞观〕十五年正月三日,魏王泰上《括地志》五十卷,上嘉之,赐物一万段,其书宣付秘阁。初,泰好学,爱文章,司马苏勖劝泰表请修撰,诏许之,于是大开馆宇,广召时俊,遂奏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人物辐辏,门庭若市,泰稍悟过盛,欲速其成,于是分道诸州,披检疏录,凡四年而成。”可见此书是李泰为要结声誉招集诸文士所纂集,与

高宗时章怀太子李贤招集张大安、刘讷言等注《后汉书》之事相类似,又经奏请,是半官书性质。《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作五百五十卷,序略五卷,《会要》所说五十卷上当脱“五百”二字。此后宋人引用或称《坤元录》,《玉海》卷一五引《中兴书目》及《宋史》卷一五七艺文志均著录魏王泰《坤元录》十卷,已非《括地志》五百五十卷之旧,以后并此十卷本也失传。清代先后有几个辑本,以孙星衍辑本较为通行。孙辑有嘉庆二年自序,谓:“其书称述经传山川城冢皆本古说,载六朝时地理书甚多,以此长于《元和郡县图志》,而在其先。……其残文时时见于传记所引。张守节作《史记正义》,不能博考书传,独特此疏证古地名。《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亦引之,或称为《坤元录》。《路史》注引有《括地象》,按其文亦即此书,罗泌仅从他书抄撮,故讹“志”为“象”字。《玉海》所引多于《史记正义》者,其时据《史记注》善本,王应麟亦不见本书也。序略起魏武时置郡,惟见《初学记》,盖其下卷,余书未见引据,……此本既辑取传注,但依序略所载诸州编次为八卷,非原书卷第之旧。”案孙辑即以《初学记》州郡部所引序略残文为卷一(但孙序谓此残文为序略之“下卷”,则有语病,因为序略本共五卷,此残文当是《初学记》撮要抄录,不必定在一卷之中,更不能说是“下卷”),卷二至八各州县残文则大多从《史记正义》所引辑出排比而成。近年贺次君《括地志辑校》,以序略为卷首,诸州县分四卷,较孙辑多出几十条,自较善于孙辑。

此书据《会要》所说是“分道诸州,披检疏录”,多根据过去的旧地志资料,详于历史沿革,因此《史记正义》多引用它来解释古地名,所辑出的多是这方面的资料,这对研究唐史用处不大。但既纂修于贞观时,对当时的行政区划州县设置自必逐一记述,这倒是研究唐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可惜这些资料多未被《正义》引用。

版本 (1) 孙辑本刻入《岱南阁丛书》中,有原刻本、民国博古斋影印本。(2) 清光绪湖北崇文书局《正觉楼丛书》重刻孙辑本。

(3)清光绪朱记荣《槐庐丛书》重刻孙辑本,附补遗一卷。(4)1980年中华书局版贺次君《辑校》本。

《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 唐李吉甫撰

李吉甫是赵郡李氏,父栖筠代宗时御史大夫,子德裕文宗、武宗时宰相,吉甫本人宪宗元和时宰相,是唐代著名的世家大族,传见《旧唐书》卷一四八,其中说到他的著作有:“〔一〕尝讨论《易》象异义,附于一行集注之下;〔二〕及缀录东汉、魏、晋、周、隋故事,论其成败损益大端,因为《六代略》,凡三十卷;〔三〕分天下诸镇,纪其山川险易故事,各写其图于篇首,为五十卷,号为《元和郡国图》;〔四〕又与史官等录当时户赋兵籍,号为《国计簿》,凡十卷;〔五〕纂《六典》诸职为《百司举要》一卷。皆奏上之,行于代。”除第一种外都是有关当前政治、经济的大著作,和安史乱后杜佑之撰作《通典》同一意图。对此李氏《元和郡县图志》卷首进书表也讲的很清楚,说:“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握枢秉圣,承祧立极,祖尧舜之道,宪文武之程,皇王之遐踪行之必至,祖宗之耿光寝而复耀,天宝之季,王途暂艰,由是坠纲解而不纽,强侯傲而未肃,逮至兴运,尽为驱除,故蜀有阻隘之夫,吴有凭江之卒,虽完保聚、缮甲兵,莫不手足裂而异处,封疆一乎四海,故鄯卫风偃,朔塞砥平,东西南北,无思不服。臣吉甫当元圣抚运之初,从内庭视草之列,寻备袞职,久塵台阶,每自循省,赧然收汗,谟明弼谐,诚浅智之不及,簿书期会,亦散材之不工,久而伏思,方得所效,以为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所以前上《元和国计簿》,审户口之丰耗,续撰《元和郡县图志》,辨州域之疆理,时获省阅,或裨聪明。”所谓“睿圣文武皇帝”是指宪宗,宪宗削平吴、蜀,有恢复中央威权的企图,身为宰相的李吉甫就撰作《元和国计簿》和《元和郡县图志》为之服务。进书表又说:“况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

徵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兵饷山川,功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圣后之所宜周览也。”明确指出《图志》是重在“兵饷山川,功守利害”,和已往的地志包括《括地志》等撰作目的不同。进书表无年月,据《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元和八年二月辛卯“宰相李吉甫进所撰《元和郡国图》三十卷,又进《六代略》三十卷,又为《十道州郡图》五十四卷”。《唐会要》卷三六“修撰”称“〔元和〕八年二月,宰臣李吉甫撰《元和州县郡国图》三十卷、《百司举要》一卷成,上之。吉甫又常缀录东汉、魏、晋、元魏、周、隋故事,纪其成败损益,因为《六代略》,凡三十卷。分天下诸镇绝域山川险易故事,各写其图与篇首,为五十四卷,号为《元和郡国图》”(《十七史商榷》卷九〇“李吉甫作《元和郡国图》”条漏引《会要》,《四库提要》则止谓“据宋洪迈跋,称为元和八年所上”,并旧纪、《会要》皆不一检,更为疏略)。元和九年冬十月丙午李吉甫卒(《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是此书撰成进上已在其晚年。但旧纪分《元和郡国图》三十卷和《十道州郡图》五十四卷为两书,《会要》又分《元和州县郡国图》三十卷和《元和郡国图》五十四卷为两书,《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又作“《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四卷,又《十道图》十卷”,进书表则明谓“谨上《元和郡县图志》,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并目录两卷,总四十二卷”,书名、卷数皆不同。进书后一年李吉甫即卒,今四十卷本又不很可能在进书后再有所改并,只好存疑。

《元和郡县图志》和《元和国计簿》本来是相辅而行的,《国计簿》久已亡佚,《元和郡县图志》的图也已失去,《四库提要》谓:“后有淳熙二年程大昌跋,称图已亡,独志存焉。故陈振孙《书录解题》惟称《元和郡县志》四十卷。今此本阙第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卷、二十六卷(应为三十五卷)、三十六卷,其第十八卷则

阙其半,二十五卷亦阙二页,又非宋本之旧矣。”但即使如此,今存本仍有很大价值:

(1) 唐代的几种地理总志,《旧唐书》地理志大体以“天宝十一载地理”为据(《旧唐书》卷三八,又卷三九河北道条也说“今记天宝承平之地理焉”,并可参考《十七史商榷》卷七九“天宝十一载地理”条),又间或添补安史之乱后的沿革。《新唐书》地理志据《十七史商榷》卷七九“天祐”条推测,“叙名道疆域则以开元十五道为正,叙户口则以天宝为正,叙州郡建置沿革则以天祐为正”。《通典》州郡典称郡不称州,也是据天宝时的情况。而《元和郡县图志》则详记元和时的情况,如各州下记有元和户数、乡数,各州贡赋下记有元和贡物名品,道以下以节度使为一地方行政单位,详记其治所、管州,这都是其他总志所没有的资料(这户数、贡物等还可能是《国计簿》所有而转载于《图志》的)。

(2) 《旧唐书》地理志记天宝户口数和旧户口数(当是唐初户口数),《新唐书》地理志只记天宝户口数(与旧志同,若照旧志“今举天宝十一载地理”所言,似此户口数当为天宝十一载户口数,但新志京兆府条却云“天宝元年领户”,恐有错讹),《通典》也只有一个户口数(当是天宝初户口数),而《图志》除元和户数、乡数外还记有开元户数、乡数。这样就能见到唐代各州郡五个时期的户数,即唐初、开元、天宝初,天宝十一载、元和年间的户数,对比这些户数,可知从唐初到天宝十一载户口一直在上升,经过安史之乱到元和年间户数便锐减。

(3) 两《唐书》表、《通典》均不记州境,此《图志》记州境东西若干里、南北若干里。旧志只记当州在京师何方若干里,去东都若干里,新志不记,惟《通典》和此《图志》记有东至何地若干里等所谓“八到”,二者又有出入详略。又县以下的山、川、宫、戍、故城等小地名也远比两《唐书》志、《通典》多。依靠两《唐书》志、《通典》解决不了的往往可从此《图志》得到解决。

版本 宋本久失传,清代流传的抄本缺卷与《四库提要》所述相同,印本则有:(1)《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用《四库全书》本排印,但《四库提要》谓“考《水经注》本四十卷,至宋代佚其五卷,故水名阙二十有一,南宋刊版仍均配为四十卷,使相联属,今用其例,亦重编为四十卷,以便循览,仍注其所阙于卷中,以存旧第”,则已更动原书卷第,又因图缺,改称《元和郡县志》,实非善本。(2)清孙星衍《岱南阁丛书》本,有嘉庆元年孙氏刻书序,谓:“此本假得于曲阜孔氏,……孔农部继涵尝以江南进本及翁学士方纲藏本合校,补正讹脱,周梦棠又刺取传记,附阙卷逸文及补目录于后,今并刊行之。”又针对《四库》本之更动卷第书名,说“今刻此书不移其卷,以存史阙文之义,图虽亡,仍题《元和郡县图志》以从其朔。”实较《四库》、《聚珍》本为善。有影印本、光绪六年金陵书局重刻本。(3)清光绪五年王灏刻《畿辅丛书》本,据《岱南阁》本,每卷附有张驹贤考证,《丛书集成》即据此本排印。(4)清乾隆四十年严观据《通典》、两《唐书》等补今本《图志》缺卷为《元和郡县补志》九卷,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附重刻孙本后。(5)清光绪缪荃孙又辑《元和郡县志阙卷逸文》三卷,刻入《云自在龕丛书》。(6)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贺次君点校本,用金陵书局本,吸收张驹贤考证成果,附缪辑《元和郡县志阙卷逸文》。

《太平寰宇记》二百卷 宋乐史撰

乐史北宋初人,事迹见《宋史》卷三〇六其子乐黄目传。此书前有进书表,以“朝奉郎太常博士直史馆赐绯鱼袋臣乐史”题衔,按《宋史》载其雍熙末年直史馆、转太常博士,是书当成于此时。《四库提要》谓:“宋太宗时,始平闽越,并北汉,史因合輿图所隶,考寻始末,条分件系,以成此书。始于东京,迄于四裔。然是时幽、妫、营、檀等十六州晋所割以赂辽者,实未入版章,史乃因贾耽《十道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之旧,概列其名,盖太宗置封樁库,冀复

燕云,终身未尝少置,史亦预探其志,载之于篇,非无所因而漫录也。”书名冠以“太平”二字,或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同撰于太平兴国年间,前二书为官修,撰作者众,故成书迅速,而此书私撰,遂延至雍熙年间始成书。

北宋初州县建置大体仍唐之旧,变革无多(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已在此书修成之后),此书本大可利用唐代地志和已修成的《旧唐书》地理志,但乐史志在超越《元和郡县图志》等书,其进书表谓:“虽则贾耽有《十道述》,元和有《郡国志》,不独编修太简,抑且朝代不同,加以从梁至周,郡国割据,更名易地,暮四朝三,臣今沿波讨源,穷本知末,……至若贾耽之漏落、吉甫之阙遗,此尽收焉。”故此书不仅详述沿革、广徵史迹,而且依方志旧例增补风俗、姓氏、人物等类目。所记内容多为宋以前事,其中唐代占很大比重,而且在篇幅、类目、时限等方面都超过了《元和郡县图志》,所以可供研究唐史时利用。其一,此书记叙了唐代元和以后的建置沿革,这是《元和志》和《旧唐书》地理志所缺的内容,虽然《新唐书》地理志对此有所记述,但此书早于新志,记载与新志又互有详略。其二,今本《元和志》淮南道全阙,河北、山南、岭南、江南各阙数州,此书可以补缺,如此书所记唐开元户数均抄自《元和志》,可赖此书保存《元和志》缺卷的元和户数(惟《元和志》所阙河北道幽州等在此书中却记天宝户数,《元和志》所缺山南道数州在此书虽记元和户数其实为天宝户数,似乐史所用《元和志》已有缺残)。其三,记载山川、城池、祠庙、陵墓、楼台、渠堰等故地遗迹,《元和志》已详于两《唐书》志,此书则更加详,特别是唐代兴建的,往往《元和志》不载而此书记述。如卷一〇陈州商水县条“颍歧渡夹河月城,在县东北三十里,贞元元年刺史曲环筑以备李希烈之乱”,就不见于他书。

另外,此书务在详博,若干已散佚之书在此书中保存片段,如李泰《括地志》、贾耽《贞元十道录》、《郡国县道记》、韦述《两京新记》之类,均属珍贵史料。此书因重视人物事迹,在记叙建置沿革、

工程兴建时保留了主事者姓名,有时还录其言词诗文,可补正史的疏略。如卷一载“唐武德三年李勣于酸枣县置梁州,乃昨城、酸枣二县以属焉,于时东州未平,人思效节,县新创立,故以孝节为名,至四年废”,此不仅《元和志》、两《唐书》志失载,即李勣本传亦未述及。又如卷八引《唐国史》叙汝州叶县的沿革,其中有崔沔开元二十一年的议论,亦为本传所未及。

此书卷一七二至二〇〇为“四夷”计二十九卷,篇幅超过《通典》边防典,所记少数民族多于《通典》及新、旧《唐书》四夷传,其中也有不少唐代史实。

版本 (1)南宋刻本,残存不足一半,藏日本枫山文库。(2)《四库全书》本,仅一百九十三卷,缺卷一一三至一一九共七卷。(3)清乾隆江西万廷兰刻本,所据底本除同《四库》本缺卷外,又缺卷四,刊刻时缺卷用陈兰森的《太平寰宇记补阙》填补,(4)清乾隆江西宜黄乐氏刻本,缺卷同万刻本,(5)金陵书局刻本,据乐刻本。(6)清光绪时黎昌庶、杨宁敬影刻日本藏宋本所存、国内所缺的卷一一三至一一八(其中卷一一四有缺页),题《景宋本太平寰宇记补阙》,收入所刻《古逸丛书》。(7)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万刻本,附《古逸丛书》本《补阙》。

长安、洛阳两京是唐政治、经济以至文化的中心,记述这两京的地志对研治唐史极有关系,现存的自唐至清有下列几种:

《两京新记》五卷存第三卷残卷 唐韦述撰

这是记述唐两京的最早的著作。韦述是玄宗时著名的史官,《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谓:“述在书府四十年,居史职二十年,嗜学著书、手不释卷。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继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并史例一卷,……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槧,虽御府不逮

兩京新記

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撰

東吳 曹元忠輯

西京

西京隋文帝開皇二年夏自故都移今所帝以長安故城

漢來舊邑宮宇蟲朽謀欲遷都僕射蘇威等議合帝旨太

史令庾季才奏當遷都帝曰吾乃今知天道開皇二年六

月十八日移入新邑在漢故城之東南萬年縣界南亘終

南山子午谷北枕龍首原 太平御覽一百五十六 玉海

南他子午谷漢都城在長安鄉鄉在渭水南杜縣地隋唐都城在龍首原蓋漢城東南十三里也

兩京新記

兩京新記

一

清光緒刻本《兩京新記》

也。……所撰《唐职仪》三十卷、《高宗实录》、《御史台记》十卷、《两京新记》五卷，凡著书二百余卷，皆行于代。”《两京新记》五卷只见于《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和《玉海》引《中兴馆阁书目》，以后公私书目均不见著录，可见此书早已亡佚。现存残卷是日本镰仓时代抄写的尊经阁卷子本，存日本金泽文库，宽政、文化间由日本天瀑山人林衡刻入所辑《佚存丛书》中。据日本学者推测，《两京新记》原书内容应为：卷一京师总说及宫城、禁苑、皇城，卷二京城总说及万年县所领诸坊，卷三长安县所领诸坊，卷四东都总说及宫城、皇城、东城及诸坊，卷五诸坊。现存卷三残卷，述京城西半部长安县所领的五十坊和西市，卷首残去五坊即朱雀街西最北的五坊。所述以坊内的重要寺观、官舍、府宅为主，略仿北魏时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旧式，尤详于寺观，叙及创置时间和轶事传闻多神秘色彩。

版本 (1)日本宽政、文化间《佚存丛书》本，是今残存本的祖本，以后所有各本都从此出。(2)清光绪八年上海黄氏木活字排印《佚存丛书》本。(3)民国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影印《佚存丛书》本。(4)清伍崇曜辑《粤雅堂丛书》咸丰三年重刻《佚存》本。(5)清光绪崇文书局《正觉楼丛书》重刻本。(6)《丛书集成》本，据《粤雅》本。(7)曹元忠辑本，除《佚存丛书》本外还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玉海》等辑出若干条，分西京、东京编为两卷，收入《南菁札记》中。(8)民国二十五年西京筹备委员会铅印陈子怡校正本，据《长安志》校正错简。(9)周叔迦《订正两京新记》，对原卷的错简和误字多有校正，载1936年日本出版的《服部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文集》。(10)《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载岑仲勉《两京新记卷三残卷复原》，校补亦颇精密，惟未载原文。(11)日本福山敏男《校注西京新记卷第三及解说》本，纠正错简后按原卷格式排印，校勘更为精审，日文注记和解说亦有价值，载1953年10月日本《美术研究》第170号。(12)最近辛德勇辑校此书，在前人基础上又有创获，已写

定待刊。

《长安志》二十卷 宋宋敏求撰

《长安志图》三卷 元李好文撰

以上两书,明以来一向合刻,因此放在一起来讲。宋敏求是《唐大诏令集》的编者,传见《宋史》卷二九一,关于其著作只说“补唐武宗以上六世实录百十八卷,它所著书甚多”。《郡斋读书志》袁本卷二下著录其所著《东京记》三卷、《河南志》二十卷,卷五上附志著录《长安志》二十卷,《直斋书录解題》辑本卷八同,《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作《长安志》一十卷(当为“二十卷”之误),又《东京记》二卷、《河南志》二十卷。《东京记》记开封,已佚。《河南志》记洛阳,原记亦不存,其内容则大体保存在元人所修《河南志》内,《藕香零拾》刻有徐松辑自《永乐大典》之本。惟《长安志》仅存。《四库提要》谓:“是编皆考订长安古迹,以唐韦述《两京记》疏略不备,因更博采群籍,参校成书,凡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至风俗、物产、宫室、寺院,纤悉毕具,其坊市曲折,及唐盛时士大夫第宅所在,皆一一能举其处,粲然如指诸掌,司马光尝以为考之韦《记》,其详不啻十倍。今韦氏之书久已亡佚,而此志精博宏赡,旧都旧事借以获传,实非他地志所能及。”所论尚为详允。志卷一为总序,述分野、土产、土贡、风俗、四至、管县、户口,卷二述雍州、京都、京兆尹、治县官,卷三至五述历代宫室,卷六述唐宫室,卷七至一〇述唐皇城及京城各坊,卷一一至二〇述京兆府所管长安、万年等二十四县,均以唐代遗事旧闻为多。宋敏求为著名的藏书家(详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一),又是研治唐代文献的专家,志中所记多有不见于其他唐代文献者,今日都可作为第一手资料引用。

《长安志图》三卷,《四库全书》本有李好文自序,谓:“及来陕西,由潼关而西至长安,所过山川城邑,或遇古迹,必加询访。尝因暇日出至近甸,望南山,观曲江,北至故汉城,临渭水而归,数十里

中举目萧然，瓦砾蔽野，荒基坏堞，莫可得究。稽诸地志，徒见其名，终亦不敢质其所处，因求昔所见之图，久乃得之，于是取志所载宫室池苑、城郭市井，曲折方向皆可指识了然，千万世全盛之迹如身履而目接之。图旧有碑刻，亦尝镵附《长安志》后，今皆亡之，有宋元丰三年龙图待制吕公大防为之跋，且谓‘长安故图’，则此图前世固有之，其时距唐世未远，宜其可据而足徵也。然其中或有后人附益者，往往不与志合，因与同志较其讹驳，更为补订，厘为七图。又以汉之三辅及今奉元所治，古今沿革废置不同，名胜古迹不止乎是，泾渠之利泽被千世，是皆不可遗者，悉附入之。总为图二十有二，名之曰《长安志图》，明所以图为志设也。”结衔题“至正二年秋九月朔中顺大夫陕西诸道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东明李好文序”。此序已将此书撰作时间、缘由、依据等讲说详尽，但《四库提要》却推断此书为李好文至正四年再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时所撰，并认为此书本不为《长安志》而作，图、志两不相应，又据《千顷堂书目》怀疑此书原名《长安图记》，明李经与《长安志》合刻时始改今名。今对照自序，皆不攻自破，岂《提要》撰作时所据为缺失自序之本，因而臆说如此。

版本 宋敏求《长安志》据李好文《志图》序所说当本有图，同为宋敏求所撰《河南志》据元人增续本之有图也是佐证，但宋刻《长安志》原本已失传，元刻《长安志》和《志图》也无可寻觅，今所传都是明以来的合刻本，宋《志》的图均早已佚失。其中(1)通行的是清乾隆四十九年毕沅灵岩山馆校刊本，收入所刻《经训堂丛书》中，又有清光绪十三年同文书局影印《经训堂丛书》本，民国时陕西通志局据毕刻铅印本。此本虽附校语(名为“沅案”，实出幕客孙星衍手)，仍多误字(有极明显的尚未校出)，且所据底本实非善本。《志图》实存二十一图，佚失卷上极重要的“唐宫城坊市总图”、“唐皇城图”、“唐京城坊市图”三图(全部共计二十四图，李氏自序云二十二图者，是把“唐骊山宫图”上、中、下图并为一图而言)。(2)明成化

長安志卷第六

宮室四

唐上

京城即隋文帝開皇二年自故都徙其地在漢故城之東
 南屬杜縣周之京兆郡萬年縣界南侵終南山子午谷北
 據渭水東臨灊澹西枕龍首原命左僕射高穎總領其事
 大子左庶子宇文愷創制規模將作大匠劉龍工部尚書
 鉅鹿郡公賀樓子幹大府少卿尚龍義並充使管建
 右創都章終

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一十三里一百
 八十步崇三十六尺南即皇城北抵苑東即東宮西有掖
 庭宮



明成化邵陽書堂刻本《長安志》

四年邵阳书堂刻本。杨氏海源阁的藏书志《楹书隅录》卷二著录此本，有黄丕烈跋，谓：“李好文《长安志图》、宋敏求《长安志》，近日灵岩山馆曾有刊本，其所据依者乃汪文升家藏钞本也。汪本藏吾郡香严书屋中，昔孙伯渊（星衍）居毕昇山（沅）幕，校刻此书，曾借之，改易行款，并所脱叶而连之，其大误者也。余向收璜川吴氏钞本，借香严本勘之，行款已改易，然缺叶痕迹尚存。……余续收嘉靖辛卯武功康海序、知西安府南埠李侯（经）刻本，彼此参校，所失叶在焉，……参校才毕，适某书友以郡中某故家藏成化刊本来，取香严本勘之，知即出于是本，特失去成化重刊一叶，久不知汪钞本为何本耳。”据此，则毕刻出香严书屋藏汪文升钞本，汪钞出明成化本，而成化本实非善本而有脱叶。（3）明嘉靖十一年李经刻本。《四库全书》本即抄自李经刻本，《提要》“《志图》”条谓：“此本乃明西安府知府李经所锓，列于宋敏求《长安志》之首，合为一编”，惟《四库全书》仍将两书分别著录。仅取《志图》与毕刻对勘，除同缺“唐宫城坊市总图”第三图外尚缺“奉元州县图”，且连目也不存，仅多出李好文自序一首，另外卷下也无《泾渠图说序》，可见李经刻本仍欠精善。（4）又民国二十四年西京筹备委员会印陈子怡《西京访古丛稿》，其中有《宋次道长安志系明人重辑本》一篇，认为《长安志》原本已失传，今本系明人重辑。但明前期人一般无辑书本领，明本多脱缺不尽原本旧式是事实，重辑则决不可能（又陈氏此文谓“经训堂本付梓时以康刻为底本，而以《四库》本校勘之”，但今经训堂毕本止有后加的乾隆五十二年王鸣盛序，并未说根据何本，当信黄丕烈跋所说，此《隅录》黄跋盖为陈氏撰文时所未见）。

《河南志》四卷 北宋宋敏求撰 元缺名增续

此书刻于缪荃孙辑《藕香零拾》中，有缪氏清光绪戊申刻书跋，详述来历渊源，谓：“光绪壬申，袁漱六前辈（芳瑛）卧雪庐藏书辇来厂肆火神庙，……见《河南志》抄本一巨帙，无卷数，用《全唐文》格

子,封面题《河南志》,识是徐星伯先生(松)手笔,城池宫阙自周至唐悉具,知是……星伯先生修《全唐文》时所录者,……后探知归常熟师(翁同龢)所,因乞归录副而细校之,开卷即云‘河南府路罗城’,方知《大典》所录为《元河南志》,而仍是宋志原文,至述元时寥寥数言,必是星伯先生止录宋志,元代事则置之耳。唐朝最详,《东京城坊考》(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之东京部分)全取于此。北魏朝校以《伽蓝记》,颇有益处,周汉魏晋只能以正史、《寰宇记》校之。……甲辰,交梓人丁德洲刻于金陵,三年始毕。今春门人陈横山徵君(善馀)忽觅得阮文达公(元)所刻“魏晋四朝洛阳宫殿图”,云出自《大典》,……实则摹从此志,阮仅以“汉晋洛阳宫城图”标题,而宋西京图亦附存焉,人之此志,丰城剑合矣。……若唐宫城图见《东京城坊考》不必转摹。惟宋次道《河南志》二十卷李氏《得月楼书目》尚有其书,倘一旦复出世间,此数卷书留覆酱瓿亦所愿矣。”案今宋志原书已不可能复出,则徐松之抄、缪荃孙之刻对保存宋志实有极大功绩。

《河南志》原书体例应与《长安志》相同,当包括河南府所辖诸县在内,但徐松的兴趣是考订唐两京宫阙城坊,故所抄内容只限于洛阳城区。此部分主要依据韦述《两京新记》的东京卷,书中有十数处直接引述韦记,也徵引其他文献,如《洛阳志》、《河洛记》、《河南图经》、《封演见闻录》、《明皇杂录》等,堪补韦记之缺并备韦记之后的变化,其详密自然超出韦记。韦记失传,此志便成为研究唐东都最原始的资料。

版本 (1)《藕香零拾》本。(2)徐抄原本一册不分卷,今藏北京图书馆,有徐松及张穆校。

《游城南记》一卷 北宋张礼撰并注 金、元间缺名续注

此书衢本《郡斋读书志》卷八始见著录。《四库提要》谓:“礼字

茂中，浙江人，元祐元年与其友楚人陈明微游长安城南，访唐代都邑旧址，因作此记而自为之注，凡门坊、寺观、园囿、村墟及前贤遗迹见于载籍者叙录甚备，……能据目所见而考辨之，其徵据颇为典核，所列金石碑刻名目，亦可与《集古录》诸书互相参证。每条下有续注，不知何人所增，中有金代年号，其‘荐福寺’一条又有‘辛卯迁徙’之语，案辛卯为金哀宗正大八年，史载是年四月元兵克凤翔，两行省弃京兆迁居民于河南，所云迁徙当即此事，盖金末元初人也。”案此书不是一般的游记，而是长安城南唐代遗址的实地调查记录。北宋哲宗元年距离唐亡不到二百年，唐代遗迹保存尚多，张礼等用七天时间进行仔细踏访，因此所记比较详实可信，是研究唐长安城南郊区地理遗址的重要文献。从中知道大雁塔曾经“涂圯”，小雁塔曾有“缠腰”，大宦官仇士良在城南有别业，庄名仇家庄，墓也在附近等等。

版本 (1) 明万历陈继儒刻《宝颜堂秘笈》本，民国十一年文明书局石印《宝颜堂秘笈》本。(2) 清道光排印《学海类编》本，民国九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学海类编》本。(3)《藕香零拾》本。(4)《丛书集成》本，据《宝颜堂》本。

《雍录》十卷 南宋程大昌撰

程大昌南宋前期人，《宋史》卷四三三有传，《四库提要》谓：“是编考订关中古迹，以《三辅黄图》、《唐六典》、宋敏求《长安志》、吕大防《长安图记》及绍兴秘书省图诸书，互相考证，于宫殿、山水、都邑皆有图有说。谓《三辅黄图》由唐人增续，初非亲生汉时，目睹汉事，故随事立辨，不以其名古而不敢置议。《长安志》最为明晰，然亦时有驳复。吕大防图凡唐世邑屋宫苑已自不存，特其山川地望悉是亲见，今故本而言之，若与古记不合，亦复订正。其参校亦可谓勤矣。”此书体例不像《两京新记》、《长安志》那样分街坊记述，而是提出若干专题讲述考辨，并附绘若干地图，内容仍是偏重唐代。

其特点是注重与政治制度、军事活动有关的地理位置,设有许多军政机构、交通路线的专题,如政事堂、唐两省、吏部选院、神策军、延英召对、阁门慰贺、南北学士、唐高祖入关、明皇幸蜀之类。但不少专题只是转引资料,并无考辨。所绘地图虽多至三十二幅,也粗疏简略,不足饜读者之望。

版本 宋本已失传,今传世都是明本。(1)明嘉靖十一年李经刻本。(2)明嘉靖无锡安氏刻本。(3)明万历吴琯刻《古今逸史》本,较两嘉靖本转少脱误。(4)民国商务印书馆影印《古今逸史》本。

《类编长安志》十卷 元骆天骧撰

骆天骧《元史》无传,据本书知是长安世家,曾任京兆路儒学教授,元成宗元贞二年撰成此书,成书后复有增补。此书是把宋敏求《长安志》分类改编,并增添金、元的若干史实而成。骆氏学识不如程大昌,更不如宋敏求,这部书在分类上、材料去取上都有毛病,但所述金、元史实则是不见于其他文献的。卷一〇所增元代长安地区碑刻存佚情况,对研究唐代碑刻也有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今本宋志因转辗抄刻而颇多脱讹,有赖骆氏此书订正,如宋志朱雀街西第一街第一、二坊的坊名久已脱失,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臆补为光禄、殖业,据骆氏此书才知道是善和和通化。

版本 元刻本久已失传,传世仅有清人的传抄本,虽保存元刻行款,而卷二前后秦宫殿至后周正武殿一叶已脱去,诸本皆同,无可补缀,此外错字、脱字更多至不可胜数。黄永年应中华书局之约于1981年点校完竣,大体可复旧观,1990年付印问世。

《唐两京城坊考》五卷 清徐松撰

徐松是清嘉庆、道光时第一流学者其专长主要在唐史和西域史,著有《唐两京城坊考》五卷、《登科记考》三十卷、《汉书西域传补

注》二卷、《新疆赋》一卷、《西域水道记》五卷。此《唐两京城坊考》尤为著名，常为研读唐代文史者所引用，几视为与《长安志》有同样史料价值。

此书有徐松自序，谓：“古之为学者左图右史，图必与史相因也。余嗜读《旧唐书》及唐人小说，每于言宫苑曲折、里巷歧错，取《长安志》证之，往往得其舛误，而东都盖阙如也。己巳之岁（嘉庆十四年），奉诏纂辑唐文（《全唐文》），于《永乐大典》中得《河南志图》，证以《玉海》所引、《禁扁》（元王士点撰）所载，灼是次道旧帙（宋敏求《河南志》），其源亦出于韦述《两京记》而加详焉。亟为摹钞，爰同球璧。校书之暇，采集金石、传记，合以程大昌、李好文之《长安图》，作《唐两京城坊考》，以为吟咏唐贤篇什之助。”案这段自序是说明此书的资料来源，但由于前人文字简质，不易读懂，致引用此书者对资料来源仍不甚清楚。经用《长安志》、《雍录》、《长安志图》及其他资料大略勘对，才弄清楚：（1）此书长安部分的图系根据《长安志图》和《雍录》的图重新绘制。（2）长安部分的文字是照录宋敏求《长安志》原文，但《长安志》还旁及长安郊区及属县，上及周、秦、汉以来沿革，此书只记述长安城坊，其他一概删去。（3）洛阳部分的图和文字都录自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元河南志》中的宋敏求《河南志》部分。（4）再将唐人诗文、小说以及碑志中有关两京城坊的史实和其他记载，摘出补入有关城坊之中。据卷五陶化坊“张軫宅”条张穆案语所说“星伯（徐松字）先生卒于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此条则将属纟之前四五日手书示穆，令补入书中”，可见此增补工作一直做到逝世之前。（5）此书刻本题“大兴徐星伯撰，平定张穆诵风校补”，可见张穆在增补上也下了功夫。

但此书在今天看来，也有不足之处：（1）宋敏求《长安志》、《河南志》的原文和徐松所增补的没有加以区别。（2）徐松所增补的有时没有详注出处，更没注明引书的卷数。（3）诗文、碑志所记某人

唐兩京城坊攷卷之二

大興徐松星伯譔

平定張穆誦風校

西京

外郭城

外郭城隋曰大興城唐曰長安城亦曰京師城前直子午谷

後枕龍首山左臨灊岸右抵灃水東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

五步舊書地理志云長六千六百六十南北一十五里一百

七十五步地理志廣五千周六十七里地理志周二萬四其

崇一丈八尺隋開皇二年築永徽四年率天下口稅一南面

錢更築之開元十八年四月築西京外郭南面連筠移叢書

住某坊是实事,而小说如《太平广记》中的则颇多虚构,徐松对此一视同仁,未加区别。(4)宋志本身的阙误以及今本宋志的阙误更未能补正。因此,目前有一件工作可以做,即先照录宋敏求《长安志》、《河南志》原文并加以校正,然后将徐松所增补各条查明注出引书卷数后有区别地录入各坊宋志之后。清光绪二十三年缪荃孙刻有程鸿诏撰《唐两京城坊考补记》一卷(收入缪辑《藕香零拾》中),也可分别查注引书卷数后补入。还可据诗文、小说和新出碑志作增补。这样做出一部新的《唐两京城坊考》,当比徐松原书更有用处。

版本 (1)清道光二十八年灵石杨尚文刻《连筠篻丛书》本,是此书第一个刻本,其校勘实出张穆手。(2)《畿辅丛书》本,即据《连筠篻》本重刻。(3)《丛书集成》本,据《连筠篻》本排印,图影印。(4)1985年中华书局点校本用《连筠篻》本,参校北大图书馆藏部分稿本,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绘制的《唐长安城复原图》、《唐大明宫图》和《隋唐洛阳城图》,并编制全书地名索引。

《隋唐两京丛考》 辛德勇撰

此书于1991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分上下篇,上篇西京四十六条,下篇东都十三条,都是用札记的形式,考订前人留下来的问题,其中或则填补前人研究的空缺,或则纠正前人以至今人的失误。如宋敏求《长安志》在西京外郭城末附载昌化、延平、修仁、正平四个坊,但不知坐落何处,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亦未能解决。今《丛考》上篇第十三条考知昌化坊是广化坊的别称;延平坊本作“延平坊街”是“延平门街”之误,本不是坊;修仁坊是“修文坊”之误;正平坊本在东都而不在西京长安。宋敏求是北宋时公认的文献专家,尤熟于唐事,他弄不清楚的这四坊问题,今人辛德勇能逐一解决,足见学识功力。此外书中为《唐两京城坊考》及今人论述作补正处尚多,实是考两京城坊及隋唐史

事者必备之书。

以下几种是有关唐代边疆以及邻邦的。

《大唐西域记》十二卷 唐玄奘撰(玄奘口述,弟子辩机笔录)

玄奘姓陈,名祜,洛州缑氏人(今河南偃师缑氏镇),其生平事迹、西行取经始末,具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杨廷福撰《玄奘生平简谱》(收入1986年齐鲁书社版所撰《玄奘论集》中)更作了精密的考证。据所考证,玄奘当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八月离长安西行去印度,贞观十九年(645年)返回长安,高宗麟德元年(664年)逝世。《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说:“贞观十九年春正月……壬辰,法师谒文武圣皇帝于洛阳宫。二月乙亥,见于仪鸾殿,……帝……谓法师曰:‘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二十年……秋七月,……前又洛阳奉见日,敕令法师修《西域记》,至是而成。”此书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二题作“三藏沙门玄奘奉敕撰”,而今本均作“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大总持寺沙门辩机撰”,“译”字欠当,实际上是玄奘口述,由其弟子辩机执笔写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载陈垣《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论文(今收入1980年中华书局版《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对撰述经过及辩机事迹考证详尽。

此书记述高昌以西玄奘所经历的一百十个和传闻所知的二十八个以上的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不仅是研究唐代西域、印度等史地以及所谓“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而且对印度等国来说,还是他们研究本国古代史的主要依据。

版本 因为收入佛教的大藏经中,因此版本极多,现在通行易得的有:(1)《四部丛刊》影印南宋吉州资福寺刻梵夹本。(2)1955

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明末《径山藏》本，此书经明人窜乱，实不是好本子，影印本附有陈垣《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一文。(3)1957年金陵刻经处刻本。(4)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章巽校点本，将全书分章重新整理，每章又分大节及小节，补加标题，便于阅读，只是校勘各本文字异同后只选录了一部分作校勘记，说是“为了避免烦琐考证”，实不成理由。(5)1985年中华书局《大唐西域记校注》本，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校印出版的《高丽新藏》本作底本，用多种版本校勘，并由季羨林等注释，是较好的本子，不足之处是序言过于枝蔓，且论述亦有失误。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 唐慧立原本，彦棕撰定

这是玄奘的传，和《大唐西域记》一样也因收入大藏经而完好地保存下来。卷首有武周垂拱四年彦棕序，谓：“传本五卷，魏国西寺前沙门慧立所述。立……睹三藏之学行，矚三藏之形仪，钻之仰之，弥坚弥远，因循撰其事，以贻终古。及削稿云毕，虑遗诸美，遂藏之地府，代(世)莫得闻。尔役思缠痾，气悬钟漏，乃顾令门徒掘以启之，将出而毕卒，门人等哀恸荒鯁，悲不自胜，而此传流离，分散他所，后累载搜购，近乃获全，因命余以序之，迫余以次之。……余再怀惭退，呻吟久之，执纸操翰，泛澜臆臆，方乃参犬羊以虎豹，糅瓦石以琳缡，错综本文，笺为十卷，庶后之览者无或嗤焉。”今传本题“唐沙门慧立本，释彦棕笺”，是慧立所撰原本，经彦棕整理增补而写定，所谓“笺”不是一般笺注的意思，是整齐条理的意思。

此书前五卷记玄奘西行前情况和西行十九年的经历，后五卷记回长安后到逝世在佛学上所作的贡献。因此全书虽是传记，前五卷也可作为地理行记来读，和《大唐西域记》可互相证补。如《西域记》只从高昌以后讲起，而此书详记离长安到高昌的经历，对这

段交通上的困难和西陲边防镇戍情况有详细记述,对研究所谓“丝绸之路”也是很有用的资料。后五卷载有不少玄奘和太宗、高宗之间的诏敕、奏疏,涉及玄奘的宗教活动也记载颇详,从中可了解唐初的宗教政策和京城的佛教活动。如谓贞观二十二年“海内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每寺允增度五人,“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之类。关于唐长安慈恩寺、大雁塔及西明寺的营建,此书也提供了详实可信的史料。

版本 除各种大藏经均收入外,今通行的有:(1)民国十二年南京支那内学院刻本,此书不著校者姓名,实出欧阳渐手,卷首有校勘凡例,谓:“本稿凡经三次校勘,第一校依日本《弘教正藏》(案即《大正藏》)对勘丽、宋、元、明四本,……第二校用可供《音义》第二十六卷、慧琳《音义》第一卷第八十三卷对勘,……第三校用奘师《西域记》、唐道宣《续高僧传》、智昇《开元释教录》、唐冥详《玄奘法师行状》、刘轲《大遍觉法师塔铭》、靖国本《玄奘法师表启》六种对勘,……”校勘异同即附记本文之侧,简端又附记摘要行年,颇为精审。民国十三年10月《东方杂志》第二一卷第一九号载陈垣《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今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辑),指出此书及《续高僧传》、《行状》等说玄奘行年本有错误,提出玄奘西行应在贞观三年八月,并校正此本其他月日差失,但据杨廷福考证西行仍当在贞观元年八月。1954年,此本又经吕澂重校,将原版剜改印刷,附刊误并附录奘师表启补遗,但仍有失校之处,且旧印本卷首附有玄奘法师像及玄奘五印度行迹图,行迹图颇便读者,1954年印本均删去,不知何故。(2)1932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影印《高丽藏》本二册,用北宋崇宁、南宋绍兴两藏本和几种日本古抄本校勘,题《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附考异、索引各一册,在校勘上允称精善之本。(3)1983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以支那内学院本为底本,校以日本影印《高丽藏》本和南宋《碛砂藏》本,但日本影印本之长处仍未能吸取,标点亦有失当处,转不如影印本及

内学院本之具学术价值。

《唐大和上东征传》一卷 日本真人元开撰

“唐大和上”是鉴真，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人(今江苏扬州)，生于唐中宗嗣圣五年(688年)，是佛教律宗的大师，以传法于日本而知名。他应邀东渡先后失败过五次：(1)天宝元年十月，日本遣唐学问僧荣睿、普照赴扬州请鉴真东渡，二月四日因被随行高丽僧如海诬告与海盗有勾结而失败。(2)第二年十二月到长江口遇飓风船坏失败。(3)船修好后到舟山海面触礁，被救后至宁波阿育王寺安置。(4)天宝三载从宁波到天台国清寺，计划从天台经福州出海，到黄岩又被追回扬州。(5)天宝七载六月自扬州新河(运河)到今舟山群岛，再出航又遇飓风，流到海南岛南端，经陆路北返。最后，第六次出发，于天宝十二载十月从扬州出长江口，十二月到日本，明年二月抵当时日本首都奈良。在日本先任东大寺戒坛院戒和上、大僧都，后被尊为大和上，创建唐律招提(唐招提寺)，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逝世。由于鉴真对中日文化交流有贡献，今天已成为知名的历史人物。

鉴真的传记有他的弟子唐僧思托所撰《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今已失传，仅存残文；有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四“唐扬州大云寺鉴真传”，太简略。详备而完整的是这卷《唐大和上东征传》。作者真人元开是日本奈良时代的文学家淡海三船(是天智天皇后裔，真人是他的赐姓，唐玄宗开元十年生，德宗贞元元年卒)，在代宗大历十四年用汉文撰写此传。传中对佛教讲得不多，而详记鉴真六次计划东渡的曲折经历，对当时我国国内以及海上交通的情况，和所经过的大城市、大佛寺，都有详细的记述。如记海南岛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处也”；记海南岛崖州“十月作田，正月收粟；养

蚕八度,收稻再度。男着木笠,女着布絮。人皆雕蹄凿齿,绣面鼻饮”;记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州城三重,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天子,紫绯满城,邑居逼侧”。这些均为鉴真一行亲见亲闻,自属可信。

版本 过去一直在日本流传,有各种旧抄本、刻本。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汪向荣校注本,附有《鉴真简介》、《唐大和上东征传作者及版本简介》及思托传逸文、赞宁传、年表等,较便使用。但注释没有尽量徵引文献原文,考证上也欠精博,如传中有“将轻货往福州买船”的话,“轻货”见《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日本安藤更生译本解释为绢帛金银,还是可以的,汪氏却认为“不类”,在“轻货”下注“不详”。可见此传尚有重新笺注的必要。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 日本圆仁撰

日本僧圆仁于唐文宗开成三年(日本承和五年)六月从日本太宰府出发来中国,经扬州、登州、青州、魏州到五台山,开成五年三月入长安。此时文宗死,武宗即位,次年改元会昌,尊道反佛。圆仁在会昌五年被迫伪装还俗,五月离长安谋归国,次年即宣宗大中元年(承和十四年)九月渡海回太宰府。前后往还合十年。本书是圆仁用汉文按年月日自记此十年中见闻,所记内容涉及唐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风俗、交通、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极有史料价值。其记述也十分详尽,有关文书都通篇抄录,对各种礼仪、活动的细节也不厌其烦地描写,因而保存了不少微此则难以知晓的唐代情状。其中较重要的史料有这样几类:(1)唐代地理交通情况。圆仁仔细记录了所经过的州县、村镇、河流、山峰、海岛、港湾及每日行程和食宿驿店,甚至记载到道路上的里程标志,所谓“唐国行五里立一候子,行十里立二候子,筑土堆,四角,上狭下阔,高四尺、五尺、六尺不等,曰

之‘里隔柱’”。(2)唐代的行政制度。如各级政府的行政公文,州县长官早、晚两次开衙办公制度,地方长官接受诏书的隆重仪式。在圆仁一行企图滞留唐土,并申请游历佛教胜地的过程中,反映了各级政府的权限和州县之间的行政关系。(3)武宗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通鉴》开成五年正月记载“时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乐工及内侍得幸于文宗者,诛贬相继”,此书则记“闻开成天子今年正月三日崩,天下三日举哀着服。又闻新天子上位,城中杀却四千余人,先帝时承恩者也”,由此知这次屠杀波及之广。此后如武宗灭佛、围剿泽潞、查抄仇士良家产等均有详细记载,可补史书的不足。(4)关于神策军和神策中尉的情况,圆仁在京城居住期间,曾赴左神策中尉衙院会见中尉仇士良,又记录不少传闻,从中可知神策军的机构、神策中尉的职权、神策中尉和皇帝的关系、神策中尉任职仪式等,特别是讲出了神策军的重要作用,所谓“左、右神策军者,天子护军也。每军有十万军,自古君王频有臣叛之难,仍置此军已来,无人敢夺国位”。(5)唐代社会经济状况。圆仁在书中记载了途经诸县的粮食价格,制衣、赁驴的功钱,市易砂金、绢帛的价钱,以及禁卖铜铁的执行情况等,都是有价值的经济资料。(6)唐代佛教情况。书中记载了各地寺院的建筑、陈设、僧众人数、宗教仪式,日本僧人在唐求学情况,特别是记录了唐武宗会昌灭佛的详细过程,成为研究这一问题的第一手资料。(7)唐代的时令风俗。开成、会昌年间从元日到冬至的节庆活动在此书都有记载。当然,由于反佛的缘故,圆仁对武宗十分仇恨,其中往往有带着偏见的记述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同时,由于圆仁是外国人,对当时某些事情也往往记述得不够确切(如把被武宗剿除的昭义节度使刘稹误作刘从简,其实刘稹是刘从谏的侄儿),引用时宜有所别择。

版本 长期在日本抄传,明治以后始有刊本,较通行的有:(1)1918年日本佛书刊行会出版《大日本佛教全书》游方传丛书第一收入此书。(2)1926年日本东京东洋文库影印京都东寺观智院所

藏的最早抄本,作为《东洋文库论丛》第七附篇。(3)我国此后虽也曾有印本,但流传不广。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据东洋文库本。(4)1992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校注日本小野胜年原撰,我国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于注释多有补充,用力至勤,遂成精善可用之本。

《中国印度见闻录》二卷 阿拉伯佚名撰

此书是用阿拉伯文撰写的游记。原书既未题书名又未署作者,从内容看是汇录一些商人、水手的见闻而整理成书。据卷二的记述,卷一先撰成于回历二三七年(851年7月至852年6月)。卷二语及黄巢事,则应在唐末或此后不久成书。书中主要谈印度和中国的见闻,也谈航海经历,而以述唐代情况的篇幅为多。其中卷一杂录中国人衣食住行的生活习惯和某些社会制度,卷二主要叙述黄巢起义和一个阿拉伯人会见中国皇帝的故事。从中可了解唐代重要外贸口岸广州的情况,如记黄巢攻下广州城,“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由此可知广州各国侨民之多。这些侨民又各有自己的管理者,“在商人云集之地广州,中国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这是照中国君主的特殊旨意办的”。来中国的阿拉伯人主要是来经商的,而在广州管理外贸的是由宦官充任的市舶使,所以本书记述了不少宦官的事迹。另外关于长安朱雀街东是官僚居住区、街西是庶民商人居住区的记述,也是很有意义的。因而此书虽是写得杂乱无章,仍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当然也有些是传闻讹误,如说在中国“凡属偷盗,不论多寡,一律处死刑”之类。

版本 (1)1937年中华书局版刘半农、刘小蕙父女合译本,从法译本译出,名《苏莱曼东游记》(因卷一有“商人苏莱曼提到”云云)。(2)1983年中华书局译本,用今名,卷一自法译本译出,卷二

自日译本译出,各附原译本注释。

《蛮书》十卷 唐樊绰撰

此书是记述唐云南地区少数民族南诏的专著。作者樊绰事迹见本书及《通鉴》。唐懿宗咸通三年蔡袭任安南经略使,樊绰为其从事,四年南诏攻陷交趾,蔡袭战死,樊绰浮水渡富良江走免。此书即本其调查所得并参考前人著述写成,计分云南界内途程、山川江源、六诏、名类、六赙、云南城镇、云南管内物产、蛮夷风俗、南蛮条教、南蛮疆界连接诸番夷国名等共十卷,是研究唐代云南地区交通、山川、城镇,以及南诏和邻近各国的民族、物产、风俗、政治的主要文献。

版本 (1)明初以后此书失传,幸《永乐大典》中收有此书,清乾隆时四库馆从《大典》中抄出,并印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以后《知不足斋丛书》本、《琳琅秘室丛书》本、《浙西村舍丛书》本均出《聚珍》本。但《四库提要》说此本“文字已多断烂不可读,又世无别本可校,谨以诸书参考旁证,正其讹误,而姑阙其不可通者”,可见《聚珍》本并非善本。(2)1962年中华书局版向达《蛮书校注》,除对《蛮书》本文作了精密的校勘注释外,还附录了能收集到有关南诏的文献资料,创制了若干年表和地图,是研究南诏史以至云南古代史地必备的学术著作。(3)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赵吕甫《云南志校释》,《蛮书》在宋以后又有《云南志》、《云南记》、《南夷书记》诸名称,赵氏取《云南志》之称成此校释。

《北户录》三卷 唐段公路撰 崔龟图注

“北户”指中国最南方,古人以为南方在太阳之南,有“开北户以向日”之说(《吴都赋》)。《四库提要》谓:段公路,“《新唐书》艺文志称为宰相文昌之孙,……历仕始末不可考,惟据书首结衔,知官京北万年县尉,据书中称咸通十年,知为懿宗时人而已。是书当在广州时作,载岭南风土颇为赅备,而于物产为尤详,其徵引亦极博

北戶錄

唐萬年縣尉東牟段公璐撰

通犀

通犀置大霧重露下終不濡又堪辨毒藥酒藥酒生沫若貯米飼雞鷄見輒驚散一呼爲駭鷄犀或中毒箭刺于創中立愈蓋犀食百毒棘刺故也

孔雀媒

雷羅數州收孔雀羅養之使極馴擾致於山野閒以物絆足傍施羅網伺野孔雀至則倒網掩之無遺一說孔

洽。……条下注文颇为典贍，题登仕郎前参军龟图撰。”以本题崔龟图注，当也是唐人。

版本 (1)明嘉靖陆楫刻《古今说海》本，清道光元年西山堂覆刻《说海》本，清宣统元年集成图书公司排印本，民国四年进步书局石印本。(2)《学海类编》本，影印本。这两种本子皆经删节，且无注。(3)《十万卷楼丛书》本，依宋本校刊，有注，较善。(4)《丛书集成》本，据《十万卷楼》本。

《桂林风土记》一卷 唐莫休符撰

《四库提要》谓：“休符里贯未详。作此记时在昭宗光化二年，休符以检校散骑常侍守融州刺史，其终于何官，亦莫能考也。此记《新唐书》艺文志作三卷，今存者一卷。卷中目录四十六条，今阙‘火山’、‘采木’二条，盖残缺之余，非完书矣。”其书专记桂林一地名胜古迹、山川城址、名人轶闻，颇及在桂林任职的唐代官员。如记“李袭志，全州安康人也，仕隋始安郡丞。大业末，江外盗贼尤多，袭志散家财，召得三千人以守郡城。高祖受隋禅，降玺书劳问，编入属籍，授桂林总管，前后任桂州凡三十八载”，这是隋、唐之际桂林地方政权转移的唯一记载。此后见于此书的桂林长官桂管观察使还有宝历年间的李渤(从事有皇甫湜、吴武陵)，会昌年间的元晦，大中年间的张文规、令狐定、张固、韦瓘，光启年间的陈环，以及未记年月的张鹭、卢匡、陈恩应、褚公等人，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多所采用。此外还涉及杨国忠、张九龄以至李靖、褚遂良、吕才、袁恕已等人的事迹，也足资参考。

版本 (1)《学海类编》本，影印本。(2)《丛书集成》本，据《学海》本。

《岭表录异》三卷 唐刘恂撰

《四库提要》谓：“宋僧赞宁《笋谱》称恂于唐昭宗朝出为广州司

马,官满,上京扰攘,遂居南海,作《岭表录》。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昭宗时人。然考书中云唐乾符四年,又云唐昭宗即位。唐之臣子宜有内词,不应直称其国号。且昭宗时人,不应预称谥号,殆书成于五代时欤?”此书与《北户录》同系记述岭南异物异事,也是了解唐代岭南道物产、民情的有用文献。其中记载最多的是岭南人的食物,尤其是各种鱼虾、海蟹、蚌蛤的形状、滋味和烹制方法,岭南人喜食的各类水果、禽虫也有记述。由此书还可知岭南的一些特殊产业,如采珠、淘金、织布、养蛇、煮盐、藤编等,从事此业的人大多为政府服务并受政府控制,称作珠户、盐户、养蛇户。此外反映生产技术的记载还有造船、造笔、酿酒、制乐器、养鱼肥田等业。所载“夷人通商于邕州石溪口,至今谓之獠市”和广州酒市情态,则反映岭南的商业情况。

版本 (1)原本久已失传,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印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2)《丛书集成》本,据《聚珍》本。(3)鲁迅用类书、地志等作校勘,有1938年《鲁迅全集》本。(4)198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标点重印鲁迅校本。

谱牒及职官姓名类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把记述职官姓名的书和记官制的书同列入职官类,但今天把记载职官姓名的书和讲谱牒的书同样作为考查唐人姓名简历(尤其是两《唐书》中没有列传的人的姓名简历)之用,因此在这里并作一类来讲。

《元和姓纂》十卷 唐林宝撰

魏晋南北朝重视门阀的风气到唐代尚未完全消失,唐人保守者仍讲究谱牒之学,此书作者林宝即是一个谱牒专家,辑本《唐语林》卷二就说:“大历已后专学者,……氏族则林宝。”此书今尚存元和七年王涯序和林宝自序,自序谓:“元和壬辰岁(七年),诏加边将之封,酬屯戍之绩,朔方之别帅天水阎者,有司建苴茅之邑,于太原列郡焉,主者既行其制,阎子上言曰:‘特蒙涣汗,恩沾爵土,乃九族之荣也,而封乖本郡,恐非旧典。’翌日,上谓相国赵公(赵国公李吉甫):‘有司之误,不可再也,宜召通儒硕士辨卿大夫之族姓者,综修《姓纂》,署之省阁,始使条其原系,考其郡望,子孙职位,并宜总辑,再加爵邑则令阅视,庶无遗谬者矣。’宝末学浅识,首膺相府之命,因案据经籍,穷究旧史,诸家图牒无不参详,凡二十旬,纂成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声韵类集,每韵之内则以大姓为首焉。朝议郎行太常博士林宝撰。”王序谓:“赵公尝创立纲纪,区分异同,得之于心,假之于手,以授博闻强识之士济南林宝。”可见此书是在李吉甫指导下备政府封爵稽考而纂成的官书。

今天此书当然不是用于封爵,而是作为唐代的文献资料来使

用。(1)此书在两《唐书》有列传的人以外记录了大量人物的姓名和世系,有些还注明他做过什么官,不仅可以增补两《唐书》列传的不足,在研究唐代文献遇到生疏的姓名时也可试翻此书来查考(为此,应当为此书做一个详细的人名索引)。(2)《新唐书》里有个宰相世系表,大体同于此书,而又有增补(表记到唐末,而此书只到宪宗元和时),有些地方与此书还有详略出入,应该互相校补。(3)此书所记唐代部分的世系比较可靠,唐以前特别所谓古代某某人之后则多出于子孙贵显后伪饰,和南北朝隋唐碑志之侈陈世系同样不尽可信。

版本 宋以后门阀世系在实际生活中已不甚起作用,因此此书明初以后即失传。今可见的本子有:(1)散见于《永乐大典》,经四库馆臣搜集出来的,仍按自序及《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等所云分为十卷(《四库提要》作“十八卷”,当系笔误),收入子部类书类,而未印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2)嘉庆七年孙星衍据《四库》本和洪莹同加校勘后刊刻,未收入孙氏《平津馆丛书》及大小两种《岱南阁丛书》,较为少见。(3)光绪六年金陵书局据孙本重刻,今天一般都用这个本子。(4)民国三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所谓“四校”者,《四库》辑自《大典》,清臣所校,一校也;孙、洪录本刊布,始附入辑佚,二校也;罗振玉就局本成校勘记二卷,三校也”,而岑氏本书为四校。岑氏自谓校记所重者有四点,即芟误(正辑本讹误)、拾遗(补辑本脱失)、正本(移辑本冒文)、伐伪(辨后人附益)。缺点是不全录《姓纂》原文,使用时仍需置孙刻或局刻本查对。同时岑氏校勘还有不尽完善之处,近年来出土碑志极多,当可资补正。(5)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元和姓纂(附四校记)》,系以岑氏《四校记》编入正文,并附姓氏索引、人名索引,最便使用。

《翰林志》 唐李肇撰

《承旨学士院记》 唐元稹撰

《翰林学士记》 唐韦处厚撰

《翰林院故事》 唐韦执谊撰

《翰林学士院旧规》 后唐杨钜撰(或题李愚撰)

《重修承旨学士壁记》 唐丁居晦撰

翰林学士至中唐开始成为重要的职务,《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总序说:“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技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则附翰林院于中书省后,谓:“至德已后,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尤择名士,翰林学士得充选者,文士为荣。亦如中书舍人例置学士六人,增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难其选。贞元已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

上列六种均是唐人的原始记述。《翰林志》撰于元和十二年,李肇时由监察御史入学士院,此文是关于翰林学士制的沿革、学士

的职掌及待遇、学士院设施等最全面详细的记载。《承旨学士院记》撰于长庆元年,此年元稹升任翰林承旨学士,遂撰此厅壁记,记述宪宗之命郑絪为承旨学士及承旨学士的地位职权,并收录自郑絪等相继任承旨学士十五人姓名官职和任免年月。《翰林学士记》撰于元和十五年,韦处厚时为翰林学士,受院使委托重写题记,虽内容空泛,所说两宦官院使的官职和任职时间尚有史料价值。《翰林院故事》撰于贞元二年,韦执谊时任学士,述翰林院沿革并考录入院学士姓名,自开元至元和时的李肇共六十人,并注明所任官职。《翰林学士院旧规》记述翰林院若干制度,如撰写各类文书的规格、对见仪式、请假制度之类,虽撰于五代后唐,对了解唐翰林院制度仍有用处。《重修承旨学士院壁记》撰于开成二年,所录开元至咸通以后学士一百八十人姓名并任免官职,虽多非承旨学士,仍足资考证。

以上六种都收入南宋洪遵编集的《翰苑群书》中,洪书分上下两卷,这六种都在上卷中(上卷末一篇和下卷都是宋代的翰林院文献)。但洪氏编排没有严格按时代先后,按时代先后应为韦执谊《故事》、李肇《志》、韦处厚《记》、元稹《记》、丁居晦《记》、杨钜《旧规》。

版本 (1)今日流传的都是《翰苑群书》本,《翰苑群书》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影印本。(2)《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五本载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对丁居晦《记》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校注,并附有姓名索引。《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一本载岑仲勉《补唐代翰林两记》,卷上为补僖昭哀三朝翰林学士记、僖昭哀三朝翰林学士辨疑,卷下为翰林承旨学士厅壁记(元《记》)校补、补文宗至哀帝七朝翰林承旨学士记、韦处厚翰林院厅壁记摘校、《翰苑群书》跋、杜元颖翰林院使壁记(元和十五年,见《全唐文》卷七二四,洪书失收)、韦表微翰林学士院新楼记(文宗大和元年,见《全唐文》卷六三七,洪书失收)、唐人翰林嘉话诗节录、自撰唐朝翰林盛事类

比。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岑氏《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已将此两文收入。岑氏专长于唐人姓名、年里、官爵的考证,这两篇所提供的史料和唐人原记有同样价值。

《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三卷 清赵钺、劳格撰

唐御史台是监察机构,任职者很有威权。《新唐书》卷三八百官志说:“御史台,……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中丞为之贰。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凡冤而无告者,三司诘之,三司谓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也,大事奏裁,小事专达。凡有弹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有制覆囚,则与刑部尚书平阅。行幸乘路车为导,朝会则率其属正百官之班序。”御史台有台狱,狱旁有精舍,想用佛教来感化罪囚。武周时殿中侍御史崔湜撰《大唐御史台精舍碑铭》,开元十一年殿中侍御史梁升卿追书刻石,碑阴及两侧则为题名,碑今存西安碑林,《金石萃编》卷七四著录全文,据《萃编》统计,“碑阴题名上截凡侍御史并内供奉一百二十二人,殿中侍御史并内供奉四百九十七人,下截及左右棱不书官位者一百九十人,中间搀入郑韬会二十七日寓直一行,左侧题一百三十三人,左侧题侍御史兼殿中一百三十八人,碑额题监察御史四十二人,碑阴额题知杂事御史五十一人,而知杂事御史之下有云自天宝元载已后,则非开元十一年一时所刻矣。”

此《题名考》由赵钺草创,属稿未半,由劳格续成。赵、劳都是浙江仁和人,而劳在校勘考证上的功力更深更有名。劳家是清道咸时有名的藏书家,父经原(笙士),撰《唐折冲府考》,子三人,长检(青主)、次权(巽卿)、季格(季言)。权、格都喜校书,而格熟于唐代文献,所校尤其精密,后来藏书家称之为“劳校”(劳氏事迹见劳校《读书杂识》前所附劳撰《亡弟季言司训事略》及丁宝书刻书序,又

民国初吴昌绶撰《唐栖劳氏三君传》，见吴氏《松邻遗集》卷四）。此《题名考》实际上也是使用校书的方法，将与题名者有关有文献分别记在名下，积多就成为一部详博的资料书。后来岑仲勉整理唐代文献基本上走这个路子。

版本 (1)清光绪初丁宝书刻《月河精舍丛钞》本，丁氏是劳氏兄弟的朋友，劳格的遗著《读书杂识》、《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和下面要讲的《郎官石柱题名考》都收入这部《丛钞》。(2)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张忱石点校本，并附人名索引。

《郎官石柱题名考》二十六卷 清赵钺、劳格撰

唐尚书省是中央最高的行政机构，《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尚书都省”说：“尚书省领二十四司（原注：六尚书各分领四司）。”又说：“左右丞各一员，左丞掌管辖诸司，纠正省内，勾吏部、户部、礼部十二司，通判都省事，若右丞阙则并行之。右丞管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若左丞阙，右丞兼知其事。”这二十四司是：吏部的吏部、司封、司勋、考功（《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尚书省”原注说：“以本行为头司，余为子司。”例如吏部下面的吏部这一司就是头司，其余司封、司勋、考功都是子司），户部的户部、度支、金部、仓部，礼部的礼部、祠部、膳部、主客，兵部的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刑部的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工部的工部、屯田、虞部、水部。每司的长官是郎中和员外郎，又各有分工。尚书省在皇城中央，六尚书二十四司合署办公。开元二十九年立有陈九言撰张旭书的《尚书省郎官石记序》，原石今已不存，只有宋拓孤本流传（有两种不同的，都称宋拓，一原石拓、一翻刻）。今保存在西安碑林里的是题为“大中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书”的七棱形《郎官石柱题名》，都是尚书左丞所管吏部、户部、礼部诸司的郎中、员外郎的题名。可知当初本有两个石柱，左右对立，右边尚书右丞所管兵、刑、工部诸司一石毁失了，只剩下这左边的一个。

唐代郎中、员外郎是掌握实权的,其中有许多是知名人士,所以即使剩下这吏、户、礼一石也很宝贵。清乾隆时金石家赵魏就曾手拓全石,录文刻入顾修的《读画斋丛书》(并有《丛书集成》本)。《金石萃编》卷一一五也著录全文,卷一一六更用两《唐书》对题名之可考者逐个作考释,题为《郎官石柱题名考》,而此后由赵钺草创、劳格续成的《郎官石柱题名考》,更是一部和《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同样精密的专著。

版本 (1)《月河精舍丛钞》本。(2)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徐敏霞、王桂珍点校本,附张忱石编人名索引。

《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 岑仲勉撰

郎官石柱题名曾断而复接,各面错相配合,次序混乱,因此岑氏重新整录题名,撰《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收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一分册,近年又编入岑氏《金石论丛》),晚年又致力于考订错乱的原因,利用新见资料,全面订补,至逝世时尚未完稿,后由其学生陈达超整理出版,即此《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此书按十二个司的郎中、员外郎,加上左司郎中、员外郎,分列二十六个条目,每条之下,按阙文、备考、删补、存疑四类详列资料,提出订补意见。

《唐仆尚丞郎表》二十二卷 严耕望撰

此历史语言研究所严耕望所撰,考唐尚书省历任职官左右仆射、左右丞、六部尚书侍郎以及度支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的姓名和任免年月日,计成述制一卷、通表三卷、辑考十八卷。1948年搜集材料,1952年成初稿,1955年全书竣工。凡李唐显贵,几多在其中,为研究唐史必备之高水平参考书、工具书。

版本 (1)1956年台北出版,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十三。(2)1986年中华书局据台北版影印出版。

《登科记考》三十卷 清徐松撰

科举在唐代正式确立,成为中央政府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其制度极为复杂,以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〇章第五节所述最为详赅。记录各科姓名的专书称《登科记》或《科第录》。徐氏此书凡例谓:“唐人撰《登科记》不下十余家,见于新书艺文志者惟三家而已,曰崔氏(案新志原注失名)《显庆登科记》五卷,姚康《科第录》十六卷,李奕《唐登科记》二卷。崔氏书自武德逮贞元,《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崔氏《登科记》一卷,是其时已有残阙,后有续之者,迄周显德,见《书录解题》。姚南字汝谐,南仲孙也,其书自武德至长庆二年十一卷,续之自长庆三年毕天祐丙寅为五卷,洪兴祖作《韩昌黎年谱》尚引之,《书录解题》云洪忠宣仅得其书五卷,可见亦非全帙。李奕官兵部郎中、金吾将军,其书宋时已不存。最后有大中十年郑顥所进《诸家科目记》十三卷,自武德至大中,敕付翰林,每岁编次,见于《唐会要》,而艺文不载,盖亦久佚也。至赵宋时,乐史有《修定登科录》四十卷,作《崇文总目》时已亡。乐史又有雍熙三年正月所上《登科记》三十三卷,《郡斋读书志》作三十卷,起唐武德,迄天祐末。绍兴三十年十月洪适又重编《唐登科记》为十五卷,《书录解题》云‘洪忠宣得姚康书五卷于北方,丞相适又得别本起武德终大和于毗陵钱仲氏’,乃合崔氏之书,凡三本辑为一书。天宝前姚书为正,天宝后则三本合为一。晁氏书有乐无洪,陈氏书有洪无乐,《通考》始兼收入。自兹以后,惟见于《世善堂书目》及《玉艺堂谈荟》。”至清代再无人见过乐史、洪适以至唐人编辑的任何一种《登科记》。所以徐松撰辑这部《登科记考》可说是毫无凭藉,从头做起,而居然辑得三十卷,可见其功力之深厚。此书和《唐两京城坊考》当为徐氏所治李唐文献的两大名作,而此书的难度实更超《唐两京城坊考》而上之。

此书前三十六卷都是编年体,卷一至二四是高祖武德元年到

昭宣帝天祐四年,卷二五、二六是梁太祖开平元年到周世宗显德六年,实际上是唐五代的《登科记考》。每年下列举有关科举的沿革大事,知贡举的姓名,名科录取人数及可查考的姓名,可查考的试题和答卷原文,每条资料都注明见于何书(惜清人都不习惯注卷数)。卷二七为附考,将难确定中举年代的人按进士科、明经科、制科、诸科备列。卷二八至三〇是三卷别录,前二卷辑录有关唐五代科举的制度、掌故、议论等文献史料,最后一卷辑录有关科举的诗篇。取材精审,考订周密。如方志、谱牒不取明、清所编,而采《永乐大典》中所存宋、元旧籍,今《大典》多已毁失,则此书亦有保存文献之功。

版本 (1)清道光十八年徐松撰成此书,迄未刊刻,到光绪十四年王先谦任江苏学政时才把它刻入《南菁书院丛书》。(2)赵守俨用《南菁书院丛书》本点校,将《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一本所载岑仲勉《登科记考订补》收入作为附录,并由张忱石编制人名索引,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最便使用。

《唐人行第录》 岑仲勉撰

卷首有岑氏1960年自序,谓:“抗战前攻唐史,见唐人诗文喜以行第相称,苦于记忆,则取其常见者笔之别纸。1938年入滇,……八、九月间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初与陈寅恪兄会面,渠询余近状,余以拟辑《唐人行第录》对。布置稍定,历览《全唐诗》、《〔全唐〕文》两大巨帙,有见必录,资料已得十九,则又念短钉之功,非时所急,蓄之篋衍余廿年,故纸已渐霉烂矣。比岁,出版界多致力校勘工具之作,……乘馀暇,取此稿从新整理。结果‘张三吕四’,多半未知谁何,致用或不大,然孰能指实,孰无可考,或者借此以作进一步之研究,积极之用虽缺,消极之用仍存。”编例谓:“本录所据,除《全唐诗》、《全唐文》、两《唐书》、《太平广记》及唐人专集、唐人笔记(《唐语林》在内)等之外,如《唐文续拾》、《唐文拾遗》、敦煌抄本、近

年出土墓志等均就所见尽量采入。专集如《文苑英华》、《唐文粹》、《国秀集》、《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极玄集》、《盛唐四家诗》、《唐六名家集》、《五唐人诗集》、《唐人八家诗》、《唐四名家集》等,凡在手头,均与参校之列。”可见岑氏用力之勤。

此书和以上诸记性质不尽相同,但同有检索姓名之用,岑氏在自序中也说“《行第录》一类型作品,原始于唐人《登科记》”,所以把它附在这里讲。

版本 1962年中华书局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均有索引,并附有岑氏所撰《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

《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 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编撰

本书于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是一部大型的索引,共采用有唐五代人物事迹可考索的旧籍八十六种,包括:(1)两《唐书》、两《五代史》等正史和《元和姓纂》。(2)《全唐文》、《全唐诗》、唐人选唐诗、《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文学家传记资料。(3)《唐郎官石柱题名考》、《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三种有题名的翰林院记、《唐登科记考》、《唐方镇年表》等职官及科举中人传记资料。(4)《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两书目。(5)《历代名画记》、《宣和书画谱》等书画录。(6)《十国春秋》、《九国志》等关于五代时十国的史书。(7)宋、元方志。(8)佛教著作。虽其中个别书籍的取舍不无可商(如《郡斋读书志》只收袁本而遗漏衢本),大体则多精当。尤可贵者,对各书所记姓氏同异都尽量加以考证,用小注方式写出大量的考证成果,确是一部够水平的工具书。

《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 方积六、吴冬秀编撰

这是补《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不足的又一部大型索引(1992年中华书局版),编制范围包括《太平广记》、《类说》、《说郭》、《唐语林》以及《朝野僉载》、《隋唐嘉话》以下共书五十二种(大体与本《唐史史料学》杂史杂说小说类所开列讲述的名目相同),且间附考证。方氏熟于唐代史事,此索引也是一部够水平的工具书,极为有用。

杂史杂说小说类

四部分类法中史部的杂史类、子部的杂家类(尤其是其中的杂说类)、小说类(尤其是其中的杂事类)实在很难分,因此这里索性并在一起来讲,先讲专记一人一事的,再讲杂记若干事物的,最后讲《太平广记》等小说总集。前二类现存的数量还不少,这里只选择其较重要或较常见的讲解。

《贞观政要》十卷 唐吴兢撰

吴兢是武周、玄宗时的史官,曾参与修撰《则天实录》和国史,传见《旧唐书》卷一〇二、《新唐书》卷一三二。此书编纂的目的,见卷首自序,谓:“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以时逢圣明,位居宰辅,寅亮帝道,弼谐王政,恐一物之乖所,虑四维之不张,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未尝有乏。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备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摄其指要,举甚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贞观政要》。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四库提要》谓:“其书在当时尝经表进,而不著年月,惟兢自序所称‘侍中安阳公’者乃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者乃张嘉贞,考玄宗本纪,乾曜为侍中、嘉贞为中书令皆在开元八年,则兢成此书又在八年以后矣。”其实此书本有景龙三年正月上书表,是早在中宗时即已撰成,至开元年间

稍事修订重撰序文进上而已。《四库提要》所据元人戈直注本无景龙上书表,所以讲不确切。

至此书取材,陈寅恪认为此书实“《太宗实录》之分类节要本”(《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七德舞”节),亦即仅限于《实录》一书。但吴兢序云“缀集所闻,参详旧史”,似范围较广,不仅删节《实录》。观今存《顺宗实录》的体例,实录记事多于记言,诏令奏疏只择其要,而《贞观政要》则主要记太宗和大臣们的言论,收录的奏疏五百字以上的就不下二十篇,最长的达三千余字,知此书除取材《实录》外,还应“参详”了起居注、国史等“旧史”,其中颇多不见于两《唐书》、《通鉴》者(如贞观十三年魏徵疏旧传不录,新传虽有却大事删改,十四年魏徵事新、旧传皆不录)。但此书是歌颂祖德以资训戒的官书,自多隐恶扬善,绝不能表现贞观时政治的全貌。若单凭此书来评论唐太宗,便无史识。

版本 (1)今通行的都是元戈直注本,有戈氏自序,谓:“惜乎是书传写谬误,窃尝会萃众本,参互考订,而其义之难明,音之难通,字为之释,句为之述,章之不当分者合之,不当合者分之,自唐以来诸儒之论,莫不采而辑之,间亦断以己意,附于其后。”则已将原作窜乱(关于这点并可参考《元白诗笺证稿》“七德舞”节),并非善本。此戈注元刻已不存,今所传有明成化元年御制序的明经厂刻本,清中叶扫叶山房刻本,《四库》所收亦是戈注,当即用成化本,又有民国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成化本,较为易得。(2)但吴氏原本并未失传,有明洪武三年王氏勤有堂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有两部(一部抗战前入藏,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一《贞观政要》洪武本跋中提到,一部建国后翁同龢后人捐赠),清代又是乾嘉时刻本,也少见(也见傅增湘跋)。(3)197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照理标点重印此书应用明洪武原刻本为底本(戈注可附入),但此标点者连戈注之非原本、原本有洪武本等并一无所知,又把戈本自序及元至顺四年郭思贞序、明成化序一概删去,戈氏所采

貞觀政要卷第一

論君道一

論政體二

君道第一章

凡五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股一作脰。啖。食也。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擾亦作損。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讟音瀆。怨也。離叛亦興。朕每思

集的诸儒议论也一概删去,不知其意图何在?其实如说诸儒议论及戈、郭序立场观点有问题,那吴书本身立场观点难道就正确?前人因明末人为篡改古书而说明人刻古书而古书亡,近人这种类似明末人刻书的风气实不足取。(4)日本尚存有多种古抄本和元以后刊本,原田种成以建治元年(1275年)抄本为底本,用多种抄本、刻本并其他古籍参校,1962年刊印在无穷会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三辑,名《贞观政要定本》,校勘精审,当为善本。

《魏郑公谏录》五卷 唐王方庆撰

王方庆名缙,以字行,历仕高宗、武后朝,官至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传见《旧唐书》卷八九、《新唐书》卷一一六。魏郑公即魏徵,贞观十年魏徵主持修撰五代史成,进封郑国公。此书编录魏徵事迹,侧重其谏奏及与太宗的问对。卷首有自序,谓“采听人谣,参详国典,撰成谏录,凡为五卷,……兼叙其问对,各为题目,列之如左”,凡一百三十条。结衔题“唐尚书吏部郎中”,王氏传中未载此职,《四库提要》谓“盖高宗时所居官”,如此则成书甚早。《提要》又谓“《唐书》艺文志以为《魏徵谏事》,司马光《通鉴》书目以为《魏元成故事》,标题互异,惟洪迈《容斋随笔》作《魏郑公谏录》”,但《新唐书》艺文志只在卷五八史部故事类著录王方庆《文贞公事录》一卷,未见《魏徵谏事》一书,不知《提要》何所依据?又《宋史》卷一五六艺文志故事类、《中兴馆阁书目》皆著录王缙《魏郑公谏录》五卷,《提要》亦未徵引。不过《提要》对此书史料价值的评价尚属确当,谓其书“于徵谏争之语摭录最详,司马光《通鉴》所记徵事,多以是书为依据。其未经采录者,亦皆确实可信,足与正史相参证”。就魏徵事迹而论,此书所载远多于两《唐书》传、《通鉴》以及《贞观政要》,且常可考见被正史删略之处。如此书载:“或奏云,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奉使九成宫,还至围川县,有宫人先舍于令厅,靖等后至,乃移却宫人,安置靖等。又近有宫人使至始平县,县令已安置

讫，右丞裴载家口后至，移动宫人，不加礼敬。太宗闻之，大怒曰：‘此等官职都不由我，皆由李靖、王珪等乎？何见李靖、王珪等如此，见我宫人都不礼遇。’始平官处约等决杖一百，解官，仍案验围川官人及李靖等。”两《唐书》则只取李靖、王珪事而略始平县官之处置，苟无此书则难窥其事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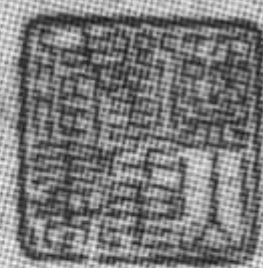
元至顺年间，翟思忠撰《魏谏公续录》二卷，明以后失传，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另行著录，但内容多和《谏录》重复。《畿辅丛书》删除重复后只余十八条，刻在《谏录》之后。明彭年又采《通鉴》、两《唐书》撰《谏录补》一卷，亦无甚价值。

版本 (1)通行《畿辅丛书》本。(2)《丛书集成》本，据《畿辅》本。

《安禄山事迹》三卷 唐姚汝能撰

唐人记安史之乱的专书，《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有此书及包诩《河洛春秋》二卷，《通鉴考异》所引又有《蓟门纪乱》，今仅存此书。《四库全书》入传记类存目，实不如《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入杂史类为妥。《提要》谓：“汝能始末未详，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官华阴县尉，未详里居，则宋时已无可考矣。”其实此书开卷即题“华阴县尉姚汝能纂”，新志也注“华阴尉”，何待据陈《录》才知，可见《提要》此条作者的荒疏。《提要》又说此书“琐杂可知”，也是妄加讥评。此书实是今研究安史之乱的第一手文献，《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较旧传增出处即多据此书。此书所提供的重要史料而为他书所不载者有：(1)讲清楚安禄山部队的主力是奚、契丹，所谓“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国之柄十得二三，行军用兵皆在掌握”，其他文献都没有这样明确。(2)详记安禄山历次受任的官衔，这对研究河北节镇的职责很有用处。(3)详记玄宗赏赐安禄山器物用具，其中提到“金银平脱”等，是研究唐代工艺的好资料。另外，此书记载时间也比较准确，常可订正两《唐书》之误。

安祿山事迹卷上



尉縣姚汝能纂

安祿山營州雜種胡也小名軋犖山母阿德氏為突厥巫無子禱軋犖山神應而生焉是夜赤光傷照羣獸四鳴望氣者見妖星芒熾落其穹廬時張韓公使人搜其廬不獲長幼並殺之祿山為人藏匿得免怪兆奇異不可悉數其母以為神遂命名軋犖山焉突厥呼鬪戰神為軋犖山

清道光勞叔抄本《安祿山事迹》

此书除正文外有时有低一字的注文。注文亦极详细,还常引安禄山的奏文疏语,可见撰者是广集有关安史乱事的多种记载,采用南北朝时流行的合本子注的方式撰写的。

版本 (1)《学海类编》本,影印本。(2)《藕香零拾》本,附缪荃孙撰校记,但缪氏非唐史专家,所校仍多漏略。(3)清宣统三年叶德辉刻《唐开元小说六种》本,据缪本重刻。(4)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收入此书,据缪本。

《高力士外传》一卷 唐郭湜撰

此书《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杂传记类著录,作“郭湜《高氏外传》一卷”,注:“湜,大历大理司直。”当是据传中所说“大理司直太原郭湜曰”云云而说。书中称代宗为“今上”,知此书撰成于大历年间。郭湜曾因得罪肃宗时宦官李辅国与高力士同贬居巫州,传所谓“况与高公俱婴谴累,每接言论,敢不书绅”,说明此书是郭湜笔记高力士口述的旧事。从开元后期写起,记到高力士被贬以至病死止,其中颇多有关朝政大事,而为两《唐书》所失载者,如:(1)“〔天宝〕十三年秋大雨,昼夜六十日,陈希烈罢相,韦见素持衡。上因左右无人,谓高公曰:‘自天宝十年之后,朕数有疑,果致天灾,以殃万姓,虽韦(见素)、陈(希烈)改辙,杨(国忠)、李(林甫)殊途,终未通朕怀,卿总无言,何以为意?’高公伏奏曰:‘开元二十年以前,宰臣授职,不敢失坠,边将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权假于宰相,法令不行,灾眚备于岁时,阴阳失度,纵为轸虑,难以获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实反映其时内廷宦官与外朝宰相之间的矛盾。(2)玄宗自蜀还京受到迫害,“〔至德二年〕十二月至凤翔,被贼臣李辅国诏取随驾甲仗”;“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温泉宫,二十日却归,因此被贼臣李辅国阴谋不轨,欲令猜阻,更树勋庸,移杖之端,莫不由此”;“上皇在兴庆宫先留厩马三百匹,欲移杖前一日,辅国矫诏,索所留马,惟留十匹,有司陈奏,上谓高公曰:‘常用辅国

之谋,我儿不得终孝道,明早向北内。’及晓,至北内,皇帝使人起拜云:‘两日来疹病,不复亲起拜伏,伏愿且留吃饭。’饭毕,又曰:‘且归南内。’至夹城,忽闻戛戛声,上惊回顾,见辅国领铁骑数百人便逼近御马,……”,从文字上透露出肃宗实是李辅国的幕后指使人。(3)肃宗朝曾大规模地清洗朝中官吏,“但经推案,先没家资,不死则流,动逾千计,黔中道此一色尤多,则三故相……一大夫……六中丞……七御史……三员外……一左丞……一郡王……一开府……遗评补博卿监司舍将军列卿州牧县宰已下,散在诸郡,不可尽纪。从至德至宝应向二千人,及承恩放还,十二三矣”,应是肃宗着意清除玄宗旧臣。凡此均不见于两《唐书》,足称第一手文献。后人不知道它的史料价值,往往把它当做小说看待(如《中国丛书综录》就把它分入小说类传奇之属,又《四库全书》不收此书,连存目都不载,当也是这个原因),实在是不应该的。

版本 (1)明嘉靖顾元庆刻《顾氏文房小说》本,民国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影印《顾氏文房小说》本。(2)《唐开元小说六种》本。(3)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收入此书,据顾本。

《奉天录》四卷 唐赵元一撰

唐德宗有志削平藩镇,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卒,子维岳请袭,不许,与魏博节度使田悦、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反,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亦反,德宗使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讨平梁崇义,以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与朱滔共攻李维岳,兵马使王武俊杀维岳降,神策军兵马使李晟、河东节度使马燧也讨破田悦,而朱滔、王武俊又叛与田悦合,李希烈在淮西亦叛,德宗发泾原兵讨李希烈,过京师,作乱,奉朱泚为主,德宗奔奉天(今陕西乾县),朱泚进攻奉天,赖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解围,而在神策军将领李晟媒孽下李怀光又叛,德宗再奔梁州(今陕西南郑),赦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朱滔、李纳(李正己子),而讨平朱泚、李怀光。唐人记载这场战乱的专书据《新唐书》

奉天錄卷一

唐 趙元一 撰

建中四祀先是襄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梁崇義自
阻兵不朝二十年矣上在春宮情深憤惋及登寶位
有誅四凶之志焉詔劔南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張延
賞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王邕洋梁節度御史大夫賈
耽江陵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張伯儀淮揚節度司徒
陳少遊淮寧節度同平章事漢南漢北招討使李希
烈克都統諸軍平襄大總管王命頒行分路齊進獸
奮龍驤謀臣盈幕武旅雲萃旗鼓纜施兇徒瓦解乘
勝逐北如巨海之沃螢光漢水浮屍似秋風之吹落



卷五八艺文志杂史类有“崔光庭《德宗幸奉天录》一卷，赵元一《奉天录》四卷，张读《建中西狩录》十卷，袁皓《兴元圣功录》三卷”，今止存赵元一此书。卷首有自序，称“起自建中四祀孟冬月上旬三日泾原叛命，终兴元二年孟秋月中旬有八日皇帝再复神都”，又称“夫史馆之笔，才、识、学也，……元一不敏，敢窃凤凰之一毛，以效骐骝之千里”云云，可见赵元一是史馆中人，就在乱事平定后撰写此书，当然是研究此次乱事的第一手资料。其体例是按日叙事，多记功臣勋业及逆臣言行，以示惩戒，并常作简短评论。其叙事记言往往较正史详尽可信，可据以考订事实真相，虽间有失实之处，不足为病。

版本 《四库全书》未收，当以明、清以来久无刻本，钞本亦极罕见之故，但《永乐大典》即收入此书，《四库》不为辑出著录，不能不说是疏忽。其后有(1)清道光十年秦恩复刻本，据《永乐大典》本。(2)清道光钱熙祚刻《指海》本，据旧钞本，并用秦刻校改。民国二十四年大东书局影印《指海》本。(3)《粤雅堂丛书》本。(4)清光绪缪荃孙刻《云自在龕丛书》本。(5)《丛书集成》本，据《指海》本，附有《指海》本和《粤雅》本异文校勘表。

《李相国论事集》六卷 唐李绛撰 蒋偕編集

此书《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集部著录曰“《李绛论事集》三卷”，注“蒋偕集”，《郡斋读书志》袁本卷四上别集类谓“《李绛论谏集》七卷，其甥夏侯孜所编，大中史官蒋偕为序”，《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五典故类谓“《李司空论事》一卷”，《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史部故事类谓“《李司空论事》七卷”，注“唐蒋偕编李绛所论”，书名、卷数均有出入。案原书卷首有大中五年史臣蒋偕所撰序，谓：“今中执法夏侯公乃授余以公平生所论谏，凡数十事，……始自内庭，迄于罢相，次成七篇，著之东观，目为《李相公论事集》。”自是由夏侯孜提供资料，而蒋偕排比而成，定名为《李相公论事集》，共七

篇亦即七卷。但到修《四库全书》时只余六卷,《提要》谓:“所存惟有翰林学士时四十六事、为户部侍郎时四事、为宰相时十五事,共六十五条。叙事朴拙,颇乏文采,谢状贺表之类杂录其间,多与论谏无关。又批答贺屏风一条、宣示李拭密疏一条、盛夏对宰臣一条,皆宪宗之事,尤与绛无涉,编次芜杂,亦乖体例。然遗风旧事,纪录颇详,多新旧《唐书》所未载,亦足以备考核。”其实李绛历仕德、顺、宪、穆、敬、文宗五朝,宪宗朝且任翰林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与机密决策,《旧唐书》卷一六四、《新唐书》卷一五二均有传,其奏疏论议自有较高史料价值。今本记事起元和二年,迄元和八年,是研究宪宗朝政治、经济的重要文献。如“论京西北两神策镇遏军事”条透露左右神策军京西北诸镇兵唯听令于身居京师的神策中尉,而不由节度使调遣;“上处分旧例户部有进奉事”条、“论户部阙斛斗”条反映当时的财政状况;“论元义方事”条、“论魏博”条涉及朝臣攀附宦官;而“论中尉不当统兵出征疏”条记载元和四年宪宗令左军中尉吐突承璀统神策军讨王承宗节制诸道兵马,翰林学士“前后谏论一十八度,后宰相论亦不允,遂依上旨,仍令学士李绛撰白麻。其日又进状,称事实不可。适有进旨召翰林〔使〕梁守谦,上手执一纸文书云:‘宰相悉言可任承璀,而学士不肯,如何?’遂令中使出敕”,则不仅可窥见宰相、翰林学士与皇帝的微妙关系,而且得知皇帝为能变易定制来实现自己的意志。此书中还言及时人对德宗政治的看法,如李吉甫对宪宗所说“德宗自用圣智,不任宰相,奏请皆有疑虑,别结他门,私恩信纳,事倾宰相,公道不行,所以下情不得上达,当时人情颇亦思乱”,凡此实均为有价值的史料。

版本 (1)《指海》本,影印本。(2)《畿辅丛书》本。(3)《丛书集成》本,据《指海》本,附《畿辅》本所载逸文。

以上是专记一人一事的,下面是杂记若干事物的,大体按撰人

时代先后为次序。

《朝野僉载》六卷 唐张鷟撰

《四库提要》谓：“此书《新唐书》艺文志作三十卷（案见杂传记类，实作二十卷，非三十卷），《宋史》艺文志作《僉载》二十卷又《僉载补遗》三卷，《文献通考》则但有《僉载补遗》三卷，此本六卷，参考诸书皆不合；晁公武《读书志》又谓其分三十五门，而今本乃逐条联缀，不分门目，亦与晁氏所记不同。考莫休符《桂林风土记》载鷟在开元中，姚崇诬其奉使江南受遗赐死，其子上表请代，减死流岭南，数年，起为长史而卒，计其时尚在天宝之前，而书中有宝历元年资阳石走事，宝历乃敬宗年号，又有孟宏微对宣宗事，时代皆不相及。案尤袤《遂初堂书目》亦分《朝野僉载》及《僉载补遗》为二书，疑《僉载》乃鷟所作，《补遗》则为后人附益，凡阑入中唐后事者，皆应为《补遗》之文，而陈振孙所谓‘书本三十卷，此其节略’者，当即此本，盖尝经宋人摘录，合《僉载》、《补遗》为一，删并门类，已非原书，又不知何时析三卷为六卷也。其书皆记唐代故事，而于诸噱荒怪，纤悉胪载，未免失于纤碎，故洪迈《容斋随笔》讥其记事琐屑撻裂，且多媿语。然耳目所接，可据者多，故司马光作《通鉴》亦引用之，兼收博采，固未尝无裨于见闻也。”案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指出张鷟事迹已见《旧唐书》卷一四九、《新唐书》卷一六一其孙张荐传，不必徵引《桂林风土记》，且《风土记》所说事实亦有违误，当以《僉载》今本卷一开元二年梁虚州条为准，又推测《僉载》亡于明代，今所存者是明人辑本，纠正《提要》所云均甚是。然《提要》对此书估价亦偏低，此书实是记述武周时事的第一手资料。因为所记多是其耳闻目见，如：（1）武后朝酷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侯思止、吉頊、王旭、李嵩、李全交、张孝嵩等的罪恶，多有两《唐书》失载者，得此可充实酷吏传。（2）武后朝滥任官吏之恶果，所谓“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选司考练，总是假手

冒名,势家囑请。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正员不足,权补试、摄、检校之官。贿货纵横,赃污浪藉。流外行署,钱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员外行案。更有挽郎、鞦韆脚、营田、当屯,无尺寸工夫,并优与处分。皆不事学问,唯求财贿”,可纠正今人对武周朝政治的片面认识。(3)武后朝大臣官吏的言行,并有撰者对娄师德、狄仁杰、李昭德,来俊臣、武三思、魏元忠诸人的评价,也多有价值。(4)反映的社会风俗习惯,如王公贵族奢侈、妒妇伤残婢妾、童谣民谚、占卜看相以及工商诸业等史料,均甚有价值。

版本 (1)《四库》所收即《宝颜堂秘笈》本,分六卷,实自《太平广记》辑录,又有石印《秘笈》本。(2)另一卷本,有《古今说海》本(覆刻本,排印本,石印本),明李栻刻《历代小史》本(民国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畿辅丛书》本均是,实源出《说郛》。(3)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赵守俨校点本,又从《广记》、《通鉴考异》等书中辑出近百条遗文,作为“补辑”附印,胜于旧本。

《教坊记》一卷 唐崔令钦撰

此书《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经部乐类著录。撰人崔令钦生平不详,《新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有国子司业崔令钦,郎官石柱题名有肃宗时礼部员外郎、肃代之间主客郎中崔令钦,似应为同一人,此书则题衔“著作郎”。记事最晚为开元二十一年,并称玄宗为“上”,则此书撰作当在开元、天宝之间。所记唐代教坊制度、曲调名称起源等都是极可宝贵的史料,为研究唐宫廷乐舞者所取资。

版本 (1)《古今说海》本(覆刻本,排印本,石印本)。(2)《古今逸史》本,影印本。(3)《丛书集成》本,据《说海》本。(4)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本,据《说海》本,1959年中华书局重印。(5)1962年中华书局版任半塘《教坊记笺订》,详加校订增补,并附录参考资料和研究成果。

《隋唐嘉话》三卷 唐刘餗撰

此书《四库》未收。刘餗是唐史学家刘知几之子，玄宗时人，传附见于《旧唐书》卷一〇二刘知几传，谓：“餗，右补阙、集贤殿学士、修国史，著《史例》三卷、《传记》三卷、《乐府古题解》一卷。”《新唐书》卷一三二则谓：“餗字鼎卿，天宝初历集贤院学士，兼知史官，终右补阙。”卷五九艺文志小说家类也著录“刘餗《传记》三卷”，注：“一作《国史纂异》。”都不说著有《隋唐嘉话》。到《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一一小说家类才分别著录《刘餗小说》三卷和刘餗撰《隋唐嘉话》一卷。案今本卷首有刘餗述曰：“余自髫髻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没有说到《隋唐嘉话》这个名称，所纪隋事且只有卷上开头不到十条。李肇《唐国史补》自序也说：“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可见此书本名《传记》，到宋代又称《刘餗小说》、《国史纂异》，又因开头讲到隋事改题《隋唐嘉话》。分三卷基本上仍是唐代旧式，但恐略有佚散或窜乱。

此书多记唐前期君臣的言行，间有书画家、艺技人的轶闻。刘餗史学世家，自己也职兼史官，所采集当有鉴别，故此书虽自谦“小说”，实有史料价值。如狄仁杰任江南安抚使毁淫祠事，两《唐书》传只说毁一千七百余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胥四祠，此书却记所毁淫祠为周赧王、楚王项羽、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吴夫概王、春申君、赵佗、马援、吴桓王等神庙七百余所，为研究唐代民俗保留了珍贵资料。如记尉迟敬德和齐王元吉比武之事中透露“元吉力敌十夫”，为认识元吉本来形象提供了线索。另外还有一些反映王公贵族生活的史料，如“景龙中，妃主家竞为奢侈，驸马杨慎交、武崇训，至油洒地以筑球场”；“薛万彻尚丹阳公主，太宗尝谓人曰薛驸马村气，主羞之，不与同席数日，帝闻而大笑，置酒召对，握槊赌所佩刀子，佯为不胜，解刀以佩之，置酒，主悦甚，薛未及就马，遽召同载而还，重之逾于旧”，均可补正史之不足。

版本 (1)《顾氏文房小说》本,影印本。(2)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本,据顾本。(3)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程毅中校点本,与《朝野僉载》合印,较为完善。

《封氏闻见记》十卷 唐封演撰

封演,两《唐书》无传,《四库提要》据此书考订其生平,谓:“书中‘石经’一条称‘天宝中为太学生’,‘贡举’一条记其登第时张缙有千佛名经之戏,然不云登第在何年。‘佛图澄碑’一条记大历中行县至内丘,则尝刺邢州。卷首结衔题‘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而‘尊号’一条记贞元间事,则德宗时终于是官也。”今人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序对此考订益详,文繁从略。至此书卷数,记载不一,《提要》谓:“唐宋艺文志、《通志》、《通考》皆作五卷,《书录解题》作二卷,殆辗转传钞,互有分合。”今本卷数既与原本不同,内容也多有散失,往往有目无文,脱落痕迹显然。

此书史料价值颇高,《提要》谓:“唐人小说多涉荒怪,此书独语必徵实。前六卷多陈掌故,七、八两卷多记古迹及杂论,均足以资考证,末二卷则全载当时士大夫轶事,嘉言善行居多,惟末附谐语数条而已。”实甚允当。全书编排也极有条理,凡一百门,皆两字为题,如道教、儒教、文字、贡举等等。所涉及范围很广,既有科举、铨选等政治制度,又有壁记、烧尾等官场习俗,也有婚仪、服饰、饮食、打球、拔河、绳技等社会生活,此外还有碑碣、羊虎、纸钱、石鼓等名物的讲说,缘此常为研究唐代文化之所取材。

版本 (1)《学海类编》本,影印本。(2)清嘉庆张海鹏刻《学津讨原》本,民国十一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此本。(3)《畿辅丛书》本。(4)《雅雨堂丛书》本。(5)《丛书集成》本,据《雅雨》本。(6)1958年中华书局版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据《雅雨》本,并补佚文,最为精善。

封氏聞見記卷第一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道教

本自黃帝至老君祖述其言故稱爲黃老之學戰國時
園冠蒙莊之徒著書咸以黃老爲宗師園冠天瑞篇引
黃帝之書曰谷神不死是爲元牝元牝之門是爲天地
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章黃帝之言而存五千之內
則老氏所書同出已明矣其後學道學儒學墨諸家分
明各爲一教漢武帝進用儒術黃老由是見廢後漢桓
帝夢見老子詔陳相孔壽立廟於苦縣刻石爲銘今一

《唐国史补》三卷 唐李肇撰

李肇唐元和时人，即《翰林志》的撰者，《新唐书》卷八五艺文志在此书下注：“翰林学士，坐荐柏耆，自中书舍人左迁将作少监。”《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下篇谓“元和中，中书舍人李肇撰《国史补》”，此书题衔则为“尚书左司郎中”。其卷首自序谓：“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仍分为三卷。”可知此书是续刘餗《传记》而作，连卷数也同于刘书，不过比刘书更少讲些怪异，多讲些史实习俗，当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全书共三百八条，卷首有目录，概括每条内容以五字为标题，如“鲁山乳兄子”、“崔颢见李邕”之类，前二卷记事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下卷则杂集各类典故制度。所记大体有：(1)官场中的制度习俗，如宰相沙堤、火城、堂案、堂帖之类，以及官场中的称谓，使职的设立及名目。(2)科举的典故，轶闻，多集中在卷下，后均收入《唐摭言》。(3)官吏、名人的轶闻，如韩愈登华山、李白脱靴等，为数最多。(4)社会风俗，如京城尚牡丹，一本有直数万者，流俗重碑志，以重价求文，以及达官争娶士族女之类。(5)各地物产，如酒、茶、纸的名品和产地。(6)流行游戏，如长行、双陆、弹棋、围棋、博戏。(7)工商业情况，如长安药商宋清、扬州王四舅、俞大娘航船以及安南、广州的外国船等等。凡此对了解唐代社会均甚有用。

版本 (1)《津逮秘书》本，影印本。(2)《学津讨原》本，影印本。(3)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本，据《学津》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用古典文学本重印。

《大唐新语》十三卷 唐刘肃撰

此书《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杂史类著录，作“刘肃《大唐新语》十三卷”，注：“元和中江都主簿。”今本卷首有元和丁亥（二年）自序，题“登仕郎前守江洲浔阳县主簿刘肃”，则新志“江都”当是“江州”之误。自序说“今起国初，迄于大历，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勒，成十三卷”，而仿照刘宋临川王义庆《世说新语》的体裁，分三十篇，篇名皆两字，如匡赞、规谏、忠列、著述等，每篇按时代先后排列。

此书以记言为主，但皆因事记言，即言行兼载，可由此窥知高祖至代宗朝诸政治事件和社会风习。有些记载与两《唐书》纪传大体相同，文字有时稍简略，亦有较胜两《唐书》处，盖二者所依据的史料相同，很多地方还可补两《唐书》的缺漏，如：（1）有一些为两《唐书》未载的重要人物事迹，如李靖在李渊起兵太原后，在长安捕杀李渊亲族，李渊克长安后欲杀之，临刑赦免，后李靖任岐州刺史时被诬告谋反，赖某御史解救，而两《唐书》传皆失载。（2）有不少两《唐书》无传的官吏的事迹，其人官职虽较低小，言行却并非无足轻重，由此可了解中下层官吏的动态。（3）有些不见于两《唐书》的疏奏、弹文、手诏、榜文的片段。（4）“著述”篇列述唐代撰著，如记《六典》时则云“迄今行之”，不同于韦述所称“亦不行”。此外，也有一些条目显然抄自《隋唐嘉话》，如安乐公主修定昆池、司农寺卖菜、姜师度一心看地之属。

《四库提要》谓：“是书本名《新语》，唐志以下著录并同，明〔万历时〕冯梦楨、俞安期等因与李昼《续世说》伪本合刻，遂改题曰《唐世说》，殊为臆撰。商濬刻入《稗海》，并于肃自序中增入‘世说’二字，益伪妄矣。《稗海》又佚其卷末总论一篇，及‘政能第八’之标题，亦较冯氏、姚氏（案：当作俞氏）之本更为疏舛。今合诸本参校，定为书三十篇，总论一篇，而复名为《大唐新语》，以复其旧焉。”则此书当以《四库》本为善。

版本：（1）明万历刻《唐世说新语》本。（2）明万历商濬刻《稗

海》本，实不善。(3)《丛书集成》本，据《稗海》本。(4)1957年古典文学刊行社本，据《稗海》本。(5)1984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以《四库》本补正《稗海》本缺失。

《次柳氏旧闻》一卷 题唐李德裕撰

此书《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杂史类著录，今本题“守太尉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李德裕编”。《四库提要》谓：“《旧唐书》文宗本纪载大和八年九月己未，宰臣李德裕进《御臣要略》及《柳氏旧闻》三卷，盖即其事。”前有李氏自记，谓：“〔文宗〕大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于紫宸殿听政，宰臣〔王〕涯已下奉职奏事，上顾为宰臣曰：‘故内臣〔高〕力士终始事迹，试为我言之。’臣涯即奏云：‘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窜黔中，时力士亦徙巫州，因相与周旋，力士以芳尝司史，为芳言先时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质疑者。芳默识之，及还，编次其事，号曰《问高力士》。’上曰：‘令访史氏，取其书。’臣涯等既奉诏，乃召芳孙度支员外郎璟询事，璟曰：‘某祖芳前从力士问觚缕，未竟，复著《唐历》，采摭义类相近者以传之，其余或秘不敢宣，或奇怪非编录所宜及者不以传。’今按求其书，亡失不获。臣德裕亡父先臣〔吉甫〕，与芳子吏部侍郎冕，贞元初俱为尚书郎，后谪官，亦俱东出，道相与语，遂及高力士之说，且曰：‘彼皆目睹，非出传闻，信而有徵，可为实录。’先臣每为臣言之，臣伏念所忆授者凡有十七事，岁祀久，遗稿不传，臣德裕……唯次旧闻，惧失其传，不足以对大君之问，谨录如左，以备史官之阙云。”从文字体式来看，此自记可信为李德裕手笔，但今本所记十七事却多荒诞悠谬之谈，如玄宗为太子时煮去胎药梦神人覆鼎，张果击齿复生，无畏三藏咒龙致雨，以及玄宗幸蜀前登兴庆宫花萼楼置酒歌《水调》之类，皆为事理之所必无，与真多出于高力士口述的《高力士外传》之翔实可信者截然不同，如何称得上“信而有徵，可为实录”，“以备史官之阙”，李德裕何至如此缺乏起码的史识。因此，可以认为此书真本久已

佚失，惟自记独存，后人因据自记，杂采小说传闻以足成之，而伪称原本。今利用时当有所别择。

版本 (1)《顾氏文房小说》本，影印本。(2)《学海类编》本，影印本，题改为《明皇十七事》，又多出二则，自亦后人妄加。(3)《唐开元小说六种》本，附叶德辉撰考异一卷。(4)《丛书集成》本，据顾本，又以《学海》本多出的二则作为附录。(5)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收入此书，据顾本，又从《类说》中辑录五条佚文，加上《学海》本的二则作为补遗。

《刘宾客嘉话录》一卷 唐韦绚撰

此书《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作“韦绚《刘公嘉话录》一卷”，注：“绚字文明，执谊子也，咸通义武军节度使。刘公，禹锡也。”卷首有大中十年二月朝散大夫江陵少尹上柱国京兆韦绚自序，谓：“自襄阳负笈至江陵，挈叶舟，升巫峡，抵白帝城，投谒故赠兵部尚书宾客中山刘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学问。是岁长庆元年春，蒙丈人许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与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与语论，大抵根于教诱、而解释经史之暇，偶及国朝。丈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或染翰竹简，或簪笔书绅，其不暇记因遗忘者不知其数，在掌中梵夹者百存一焉，今悉依当时日夕所话而录之，不复编次，号曰《刘公嘉话录》，传之好事以为谈柄也。”书中所记约百余条，均零星琐杂，未及重大事件，且多涉怪异，但亦自有特色：(1)颇记士人官吏的轶闻异事，如张巡守睢阳、李泌对肃宗巧言天宝年号来历等，可备参考。(2)有反映社会生活的资料，如“大司徒杜公在维扬也，尝召宾幕闲语：‘我致政之后，必买一小驷八九千者，饱食而跨之，著一粗布褌衫，入市看盘铃傀儡，足矣。’”“刘仆射晏五鼓入朝，时寒，中路见卖蒸胡之处热气腾辉，使人买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啖之，且谓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之类。

此书今传本又经后人窜乱,《四库提要》指出其中所载昭明太子胫骨等三十九条“皆全与李绰《尚书故实》相同,间改窜一二句,其文必拙陋不通”,“今悉刊除,以存其旧”。但至今尚未有取《四库》本刊刻者。

版本 (1)《顾氏文房小说》本,影印本。(2)《学海类编》本,影印本。(3)《丛书集成》本,据顾本。

《明皇杂录》二卷补遗一卷 唐郑处诲撰

此书《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杂史类著录。《四库》著录作“《明皇杂录》二卷别录一卷”,《提要》谓:“处海字延美,荥阳人,宰相余庆之孙,大和八年登进士第,官至检校刑部尚书、宣武军节度使,事迹附见《旧唐书》郑馀庆传(案:亦见《新唐书》卷一六五馀庆传)。是书成于大中九年,有处海自序。案史称处海为校书郎时,撰次《明皇杂录》三篇行于世,晁公武《读书志》则载《明皇杂录》二卷,然又曰‘别录一卷,题补阙,所载十二事’,则史并别录数之,晁氏析别录数之也。”案晁氏所谓“别录”是动词,即另外写录之意,其名称叫“补阙”,《提要》微有误解,而《四库》本径作“别录一卷”,不知是馆臣所加,抑旧本已如此。但此《四库》本并未刊印,今所通行只有《守山阁丛书》本,并无自序,而《杂录》二卷后有补遗一卷,所记正十二事,与晁氏所说相合。《丛书》编者钱熙祚并撰校勘记一卷,谓其本与《提要》所说又有出入,但钱氏并未能用《四库》本校勘,只用《太平广记》及诸类书等校补。

此书记玄宗朝的异闻琐事,以玄宗为中心,旁及周围的王公大臣、伎乐侍从,其中如王毛仲、王准跋扈,虢国夫人抢占韦嗣立房宅,公主们相效进食,乐工李龟年奢侈,玄宗设宴陈设百戏,华清宫所筑新汤,玄宗所驯舞马及其流散等,均从细微处体现了当时皇帝和官僚贵族的生活,是了解玄宗朝政治风貌和社会习尚的有用资料。

版本 (1)清嘉庆张海鹏刻《墨海金壶》本,民国十年博古斋影印《金壶》本。(2)道光时钱熙祚用张版编入《守山阁丛书》,并增校记,民国十一年博古斋影印《守山阁》本。(3)《丛书集成》本,用钱本。(4)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收入此书,用钱本,附补遗四则。

《羯鼓录》一卷 唐南卓撰

南卓两《唐书》无传,《四库提要》据《新唐书》卷四八艺文志南卓《唐朝纲领图》注语、《唐诗纪事》及本书,考知其字昭嗣,曾官拾遗、松滋令,宣宗大中年间为黔南观察使,此书即撰于大中时。《提要》谓:“其书分前后二录,前录成于大中二年,后录成于四年。前录首叙羯鼓源流、形状,次叙玄宗以后诸故事。后录载崔铉所说宋璟知音事(案:应为宋沈即宋璟孙知音事,《提要》误)而附录羯鼓诸宫曲名,凡太簇宫二十三调、太簇商五十调、太簇角四十调,……又有佛曲十调、食曲三十二调,调名亦多用梵语,以本龟兹、高昌、疏勒、天竺四部所用之故也。”此书所录故事及曲名亦是研究唐代音乐艺术、宫廷生活和社会风尚的有用资料。

版本 (1)《宝颜堂秘笈》本,石印本。(2)《墨海金壶》本,影印本。(3)《守山阁丛书》本,影印本。(4)《丛书集成》本,据《守山阁》本。(5)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本,据《守山阁》本。

《因话录》六卷 唐赵璘撰

此书《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赵璘字泽章,南阳人,徙平原,开成三年进士及第,大中时为祠部员外郎,历度支、金部郎中,大中七年迁左补阙,后出为衢州刺史,事迹见《郎官石柱题名考》及此书。此书结衔题员外郎,似成书不应晚于大中七年。《四库提要》谓:“其书凡分五部,一卷宫部为君,记帝王;二卷、三卷商部为臣,记公卿百僚;四卷角部为人,凡不仕者咸隶之;五卷徵部

为事，多记典故而附以谐戏；六卷羽部为物，凡一时见闻杂事无所附丽者亦并载焉。璘家世显贵，又为西眷柳氏之外孙，能多识朝廷典故，《东观奏记》载唐宣宗索科名记，郑颢令璘采访诸家科目记，撰成十三卷上进，是亦娴于旧事之明徵。故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其中宫部记玄宗至宣宗朝人君言行，商部记王公大臣妙语卓行，皆平实可信，时有自注，说明为亲所闻见。角部多透露民间流俗，如书生奔驰入京应不求闻达科，僧文淑借讲经论投世俗之好而听者填咽，至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又有记淮南裨将谭可则自吐蕃逃归述其见闻，言蕃法刻木为信，送信者为马使，掳华人无文化者黥其面充役使，粗有文艺有黥其臂补为吏者称舍人。徵部多记中央台省制度，尤以御史台为详，其注曰：“诸家《御史台记》多载当时御史事迹、戏笑之言，故事甚略，堂中有仪注，近渐遗阙，虽有版榜，亦但录一时要节，自此转恐磨灭矣，因与亲友话及此，遂粗疏之。”说明其时曾流行多种《御史台记》。羽部所录杂事涉及面更广，如透门剑伎、便换、割治眼瘤医术等条均是史料。故《提要》谓其书“实多可资考证者，在唐人说部之中犹为善本焉”。

版本 (1)六卷足本只有《稗海》本。(2)《丛书集成》本，据《稗海》本。(3)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本，据《稗海》本，用《唐语林》校改误字。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用古典文学本重印。

《大唐传载》一卷 唐缺名撰

《四库提要》谓：“记唐初至元和中杂事，唐宋艺文志俱不载。前有自序，称八年夏南行岭峤，暇日龙舟传所闻而载之。考穆宗以后，惟大和、大中、咸通乃有八年，此书不著其纪元之号，所云八年者亦不知其在何时也，所录唐公卿事迹言论颇详，多为史所采用，间及于诙谐谈谑及朝野琐事，亦往往与他说部相出入。”说亦平允。但书中尚记有宝历中李德裕事，并非止于元和。

书中所记中唐事迹，颇有关系朝政大事者，如记神策大将军、

神策中尉、中护军之设立,其年月日、姓名等均与史书吻合。又如所记肃、代、德三朝财政政策,有至德二年“勒以僧及道人入钱自度有差”,“乾元二年御史中丞元载为江淮五道租庸使,高户定数徵钱,谓之白著榷酤”,以及德宗建中年间的借商、省官、除陌、间架税等,都可与两《唐书》食货志参照利用。又如所记开元中宁王宪囑吏部给十名亲故升官,吏部侍郎诣宁王问能否酌减,答曰九人不可动,遂照此办理,亦研究唐代任官的可贵参考资料。故篇幅虽小,史料价值却高。

版本 (1)《守山阁丛书》本,影印本。(2)1958年中华书局本。

《幽闲鼓吹》一卷 唐张固撰

此书《新唐书》卷五九小说家类著录,不记张固生平,今传《顾氏文房小说》本亦只题“清河张固撰”。郎官石柱题名有金部郎中张固,《桂林风土记》载大中年间桂管观察使张固,不知是否一人。顾元庆跋谓:“固在懿、僖间采摭宣宗遗事,简当精覆,诚可以补史氏之阙。”《四库提要》则谓:“书中元和、会昌间事不一而足,非仅记宣宗事也。”其实书中还有元载、安禄山事迹,应说采摭玄宗至宣宗朝遗事,惟宣宗时事稍多而已。所记多珍贵史料,如裴休请立储君,宣宗曰“若立储君,便是闲人”,一语道出皇帝和太子的政治矛盾。再如李德裕节度淮南时贿赂赴京任枢密使的监军杨钦义而得其奥援入相,安禄山叛乱前召诸将设地图布置战略,皆有参考价值。

版本 (1)《顾氏文房小说》本,影印本。(2)《历代小史》本,影印本。(3)《宝颜堂秘笈》本,石印本。(4)1958年中华书局本。

《松窗杂录》一卷 唐李潜撰

《四库提要》谓:“此书书名、撰人诸本互异,唐志作《松窗录》一卷,不著撰人,宋志作《松窗小录》一卷,题李潜撰,《文献通考》作

《松窗杂录》一卷，题韦濬撰，《历代小史》则书名与《通考》同，人名与宋志同，盖传刻舛讹，未详孰是。此本为天一阁旧抄，书名、人名并与《历代小史》同，今姑从以著录，亦三占从二之义也。其文与《历代小史》所刻大概相同，惟多中宗召宰相一条及姚崇姨母卢氏一条，以司马光《通鉴考异》证之，其中宗一条实原书所有，知《小史》为佚脱矣。”案《郡斋读书志》袁本卷二上著录此书作《松窗录》一卷，唐韦睿撰，为《提要》所未检及。《顾氏文房小说》本与《四库》所据天一阁抄本书名、人名及多出二条悉同，惟所谓卢氏实狄仁杰姨母，《提要》涉其下姚崇条而误。顾本卷首有李濬自序，谓：“濬忆童儿时即历闻公卿间叙国朝故事，次兼多语其□事特异者，取其必实之迹，暇日辍成一小轴，题曰《松窗杂录》。”所记多轶闻秘事，以玄宗时为多，颇有可参补史传者，如叙玄宗内起居注之撰作、装裱、贮藏及焚毁始末，玄宗贵妃沉香亭赏牡丹事，皆详整可观。又如李泌对德宗详说玄宗得失，亦颇有见地（此条似应出于《邺侯家传》，但却未被史传所采入）。

版本 （1）《顾氏文房小说》本，影印本。（2）《历代小说》本，影印本。（3）清乾隆陆烜刻《奇晋斋丛书》本，民国元年冰雪山房影印《奇晋斋》本。（4）1958年中华书局本，实据顾本。

《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 唐段成式撰

《旧唐书》卷一六七段成式传谓：“成式字柯古，以荫入官，为秘书省校书郎。研精苦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累迁尚书郎。咸通初，出为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阳，以闲放自适。家多书史，用以自娱，尤深于佛书。所著《酉阳杂俎》传于时。”《新唐书》卷八九段成式传谓：“为吉州刺史，终太常少卿。”此书卷首有自序，谓：“饱食之暇，偶录记忆，号《酉阳杂俎》，凡三十篇，为二十卷。”《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为三十卷。今传本有二十卷本、有三十卷本（前集二十卷，续集十卷），盖撰自序时只有前集，续集后出。

西陽雜俎卷之一

唐瞿涵段成式

高祖



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十二人破草賊號無端兒數萬又龍門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

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箭長常箭一膚射洞門闔上嘗觀漁於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網而止

骨利幹國獻四百疋十疋尤駿上爲製名決波驗者

《四库提要》谓：“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徵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其曰《酉阳杂俎》者，盖取梁元帝赋‘访酉阳之逸典’语。二酉，藏书之义也。其子目有曰‘诺皋记’者，吴曾《能改斋漫录》以为诺皋太阴神名，语本《抱朴子》，未知确否。至其贝编、玉格、天咫、壶史诸名，则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盖莫得而深考矣。”

此书虽是录异志怪小说，但与《独异志》、《宣室志》等语多荒怪者不同，实有可用的史料。大体有：(1)不见于史传的事迹，如高祖、太宗之善用弓矢，段氏本人及父文昌与亲戚、同僚佚事。(2)社会风俗，如前集卷八、卷一三及续集卷四中所记的民间婚丧礼俗，以及都市恶少纹身刺膊的风习，还有不少反映当时服饰、饮食的风俗和民间各种迷信活动，并记及少数民族的风俗。(3)续集卷五、六“寺塔记”是段氏会昌三年考察长安十余所寺院后就《两京新记》、《游日记》所缺而撰写，记叙寺院的建筑、塑像和壁画。(4)前集卷一、七所记食品名称及制作方法，如蒸饼法、费字五色饼法、饴法之类，可为研究唐人饮食者利用。(5)还有一些有文学价值的民间传说，如续集卷一“支诺皋上”所记叶限故事，情节与西方灰姑娘故事大体相同，而时间则早出几百年，或许从中能找出中西文化交流的线索。(6)其他关于动物、植物、矿产的记载也很多，可了解其时的物产分布。

版本 (1)明万历常熟赵琦美等刻三十卷本，《四部丛刊续编》影印赵本。(2)《稗海》二十卷本。(3)《津逮秘书》三十卷本，影印本。(4)《学津讨原》三十卷本，影印本。(5)1981年中华书局点校本，据赵本。

《本事诗》一卷 唐孟棻撰

《四库提要》谓：“棻字初中，爵里未详。王定保《唐摭言》称‘棻

出入场籍垂三十余年,年稍长于小魏公,其放榜日出行曲谢'云云,则尝于崔沆下登第。书中韩翃条内称'开成中,余罢梧州',亦不知为梧州何官(案:自序结衔尚题'前尚书司勋郎中',《提要》漏引)。《新唐书》艺文志载此书题曰'孟启',毛晋《津逮秘书》因之,然诸家称引并作'棨'字,疑唐志误也。是书前有光启二年自序,云'大驾在褒中',盖作于僖宗幸兴元时。皆采历代词人缘情之作,叙其本事,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徵异、徵咎、嘲戏七类。所记惟乐昌公主、宋武帝二条为六朝事,余皆唐人。”案所记凡四十余事,间有失实之外,大体尚可信据。其中史料如韩翃条“留邸状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又请之,且求圣旨所与”之类,对考订朝章制度亦有用处。

版本 (1)《顾氏文房小说》本,影印本。(2)《津逮秘书》本,影印本。(3)清乾隆何文焕刻《历代诗话》本,无序目。(4)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据《历代诗话》本,用《津逮》本校补。

《杜阳杂编》三卷 唐苏鹞撰

《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苏鹞《演义》十卷,又《杜阳杂编》三卷”,注:“字德祥,光启中进士第。”《演义》考证典制名物,与唐史较少关系,《杜阳杂编》则悉记唐事。《四库提要》谓:“所记上起代宗广德元年,下尽懿宗咸通十四年,凡十朝之事,皆以三字为标目。”其中颇有叙事平实而为《新唐书》、《通鉴》所取者,如文宗朝王涯、郑注、贾餗、舒元舆四相,懿宗嫁同昌公主,西门季玄斥李可及,鱼朝恩为养子索紫服等事。至有关杂技、珍宝、奇物的记载,《提要》斥其“类涉不经”,但若善于利用,仍可资研究唐代文化艺术和中外交通。

版本 (1)《稗海》本。(2)《学津讨原》本,影印本。但以上二本都不如《提要》所说有三字标目。(3)《丛书集成》本,据《学津》本。(4)1958年中华书局本,亦无三字标目。

《桂苑丛谈》一卷 唐冯翊子子休撰

《四库提要》谓：“《新唐书》艺文志载《桂苑丛谈》一卷，注曰‘冯翊子子休’撰，不著姓名，晁公武引李淑《邯郸书目》云姓严，疑冯翊子其号，而子休其字也。陈继儒刻入《秘笈》，乃题为唐子休冯翊著，颠倒其文，误之甚矣。其书前十条皆载咸通以后鬼神怪异及琐细之事，后为史遗十八条，其十二条亦纪唐代杂事，余六条则兼及南北朝。……其甘露亭一条称吴王收复浙右之岁者，当为昭宗天复二年，时始封杨行密为吴王，故子休以此称之，然则作是书者其江南人欤？”所记虽多琐细怪异，然可佐证史乘者亦不乏见，如李德裕辩狱、赏心亭、李将军为左道所误诸条及“史遗”中王梵志、邹凤炽、顾况、崔膺、李钰、任迪简等人事迹，皆有参考价值。

版本 (1)《宝颜堂秘笈》本，石印本。(2)《丛书集成》本，据《秘笈》本。(3)1958年中华书局本，当亦据《秘笈》本。

《尚书故实》一卷 唐李绰撰

此书《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杂传记类著录。卷首有撰者小序，谓：“宾护尚书河东张公，三相盛门，四朝雅望，……绰避难圃田，寓居佛庙，……叨遂迎尘，每客侍话，凡聆徵引，必异寻常，足广后生，可贻好事，遂纂集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节，作《尚书故实》云耳。”《四库提要》谓：“绰仕履未详，考《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赵郡李氏南祖之后有名绰字肩孟者，为吏部侍郎舒之曾孙，书中自称赵郡人，或即其人欤？”对张尚书《提要》也作了考证，认为是张嘉贞四世孙彦远（《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天保、彦休和曼容四人之一。《四库提要辨证》对二者又作了补正，文繁从略。

此书记事芜杂，间有神异怪诞之说，但非虚妄，颇有朝野轶闻可采。《提要》已指出有十数事独见于此书，实则初不止此，如李抱真焚僧敛财、东都造防秋馆得蔡邕石经、宰相召对于小延英之始、

京城佛寺筑暗室藏奸诸条,以及一些名画书帖的流传轶事,均是有用资料。《提要》评价此书“在唐人小说中亦《因话录》之亚也”,要不为不诬。

版本 (1)《宝颜堂秘笈》本,石印本。(2)《畿辅丛书》本。(3)《丛书集成》本,据《秘笈》本。

《云溪友议》三卷 唐范摅撰

此书《新唐书》卷五九小说家类著录,注:“咸通时,自称五云溪人。”《四库提要》谓:“其书世有二本,一分上、中、下三卷,每条各以三字标题,前有摅自序;一为商濬《稗海》所刻,作十二卷,而自序及标题则并佚之。案陈振孙《书录解题》已称‘唐志三卷,今本十二卷’,则南宋已有两本矣。……所录皆中唐以后杂事,……诗话居十之七八,大抵为孟棻《本事诗》所未载,逸篇琐事,颇赖以传。”所考论尚平实(《四库提要辨证》于范摅生平有所考证,惜所获无几,且文繁,兹从略)。

此书所录晚唐人诗歌咏吟、遗事佚闻,除可供采辑唐代诗篇外,兼能考知其人生平事迹,以及社会风尚。如卷下“去山泰”、“因嫌进”、“沈母仪”等条透露科举得第内幕,“羡门远”条记纥干泉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事,“金仙指”条记僧道劣迹,“蜀僧喻”条收录王梵志诗,均可资采择。

版本 (1)民国十九年刘承干刻《嘉业堂丛书》本三卷,附校勘记三卷。(2)《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刻三卷本,附校勘记一卷,较为完善,(3)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本,据《四部丛刊续编》本而删去校勘记。(4)《稗海》十二卷本。(5)《丛书集成》本,据《稗海》本。

《玉泉子》一卷 唐缺名撰

此书《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小说类著录《玉泉子见闻真录》五卷,《通志》杂史类著录书名、卷数相同,并谓“记唐懿宗至昭宗时

雲谿友議卷中

葬書生 玉簫化 苗夫人 思歸隱

買山讖 吳門秀 錢塘論 辭雍氏

李右座 衡陽遁 三鄉略 狂巫訕

彰術士 雲中命 譚生刺 弘農忿

賢君鑒 澧陽讖 白馬吟 中山誨

贊皇勳 南黔南

葬書生

劉侍郎軻者韶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之書欲輕舉之便又於曹溪探釋氏關戒遂披僧服



事”，则与今题《玉泉子》之一卷本内容吻合。《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一一小说家类则谓：“《玉泉子笔端》三卷又别一卷，不著名氏，有序，中和三年作，末有跋云扶风李昭德家藏之书也，即故淮海相公孙。又称黄巢陷洛之明年跋，亦不知何人。别一本号《玉泉子》，比此本少数条，而多五十二条，无序跋。录其多者为一卷。”盖《玉泉子》、《玉泉子见闻真录》及《玉泉笔端》均一书之别称。又《宋史》卷二〇六艺文志小说类著录卢光启《玉泉笔论》五卷，当亦即此书，则撰人有可能是卢光启，卢氏为昭宗朝宰相，时代相符合。至今本《玉泉子》只存一卷，则必非足本。《四库提要》谓：今本“共八十二条，或即陈振孙所录之一卷，而《书录解题》讹八字为五字耶？”推测当近于事实。

此书记中晚唐政治传闻和人物佚事，多可与史传相参证，如记刘蕡“杨嗣复门生也，对策以直言忤时，中官尤所嫉忌。中尉仇士良谓嗣复曰：‘奈何以国家科第放此风汉耶？’嗣复惧而答曰：‘嗣复与刘蕡及第时犹未风耳。’可见当时宦官淫威。记晚唐以钱贿官之风“自宰相、翰林学士、三司使皆有定价，因此致位者不少。近人县令、录事参军亦列肆鬻之，至有白身便为宰相者”；记漕运费用“每年以江河淮运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斗四十”，均是研治中晚唐政治社会史有用的资料。

版本 (1)《稗海》本。(2)1958年中华书局本，实据《稗海》本，但出版说明却说成是用《读画斋丛书》本，因此册是和《金华子》合印，《金华子》用的是《读画斋丛书》本，写出版说明时，竟把二书的版本互相张冠李戴，自是编辑粗枝大叶所致。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中华书局本，出版说明中的版本错误已纠正。

《北里志》一卷 唐孙棨撰

此书《郡斋读书志》袁本卷三下小说类和《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一一小说家类均著录，而《四库全书》未收入，撰人孙棨见《新唐

书》卷一三下宰相世系表,谓“字文威,中书舍人”,据郑谷《偶怀寄台院孙端公棨诗》则昭宗时任侍御史,《唐语林》辑本卷七则称之为翰林学士。此书有僖宗中和四年自序,谓:“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第,……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然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由是仆马豪华,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仍岁滋甚,自岁初等第于甲乙,春闹开送,天官氏设春闹宴,然后离居焉。近岁延至仲夏,……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惜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固非兴致,每思物极则反,疑不能久,常欲纪述其事,以为他时谈藪。……俄逢丧乱,……前志扫地尽矣,静思陈事,追念无因,而久罹惊危,心力减耗,向来闻见不复尽记,聊以编次为太平遗事云。”可知此书为追记黄巢攻占长安前进士、官吏在京师平康坊饮宴狎妓之事,笔录成书。凡记二十事,多数有标题,“海论三曲中事”杂记平康里妓女的一般情况,“天水仙哥”记进士刘覃的豪奢,“楚儿”记妓女年老后的处境,并暴露万年县捕贼官的凶狠,郭锻“累主两赤邑捕贼,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惮焉”,“郑举举”记诸官僚饮宴实况,“张住住”则反映市民生活,故此书亦可供采集晚唐官吏士人事迹和长安社会风习之需。

版本 (1)《古今说海》本,覆刻本,排印本,石印本。(2)《丛书集成》本,据《说海》本。(3)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本,据《说海》本,1959年中华书局重印。

《乐府杂录》一卷 唐段安节撰

段安节为文宗朝宰相段文昌孙、段成式子,传附见《新唐书》卷八九段志玄传,谓:“乾宁中为国子司业,善乐律,能自度曲云。”此书《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经部乐类著录,卷首自序谓:“洎从离乱,礼寺隳颓,龔虞既移,警鼓莫辨,梨园弟子半已奔亡,乐府歌舞咸皆

丧坠。安节以幼少即好音律，故得粗晓宫商，亦以闻见数多，稍能记忆，尝见《教坊记》，亦未周详。以耳目所接，编成《乐府杂录》一卷，自念浅拙，聊且直书，以俟博闻者之补兹漏焉。”结衔题“朝议大夫守国子司业上柱国”，是成书亦在乾宁前后，其内容如《四库提要》所云：“首列乐部九条，次列歌舞俳优三条，次列乐器十三条，次列乐曲十二条，终以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然有说无图，其旧本佚之欤？《崇文总目》讥其芜驳不伦，今考其中乐部诸条与《开元礼》、杜佑《通典》、《唐书》礼乐志相出入，知非传闻无稽之谈，叙述亦颇有伦理，未知所谓芜驳何在。”所论极是。《提要》又驳正了《宋史》艺文志所记卷数之误，云：“《唐书》艺文志作一卷，与今本合，《宋史》艺文志则作二卷，然《崇文总目》实作一卷，不应宋志顿增，知‘二’字为传写误也。”此书实是研究唐代礼乐制度、音乐、舞蹈、百戏的专门资料书，所记雅乐部、云韶乐、清乐部、鼓吹部、驱傩、熊罴部、鼓架部、龟兹部等制度与两《唐书》音乐、礼乐志有异，可考知有唐一代的变化。其中“驱傩”条还讲述其排练程序和观赏盛况，“熊罴部”条说明乐具库、乐园新院、乐官院等机构的归属和位置，“拍板”条也记太乐署、鼓吹署的位置及乐工人数，歌舞、乐器诸条目中多铺叙艺人事迹和乐舞盛事，有驰名一时的歌手韦青、许永新、笛师李谟、箏师李青青、笙师尉迟章、琴师贺若夷等，“琵琶”条所叙贞元中长安诸琵琶高手于天门街斗技事尤为生动感人，可从中了解唐代艺术家和艺术成就。

版本 (1)《古今说海》本，覆刻本，排印本，石印本。(2)《古今逸史》本，影印本。(3)《学海类编》本，影印本。(4)《墨海金壶》本，影印本。(5)《守山阁丛书》本，影印本。(6)《丛书集成》本，用《守山阁》本影印。(7)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本，据《守山阁》本。

《东观奏记》三卷 唐裴廷裕撰

此书《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杂史类著录，原注：“大顺中诏修

宣、懿、僖实录,以日历、注记亡缺,因摭宣宗政事,奏记于监修国史杜让能。廷裕字膺余,昭宗时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贬湖南卒。”《四库提要》考知“其名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谓裴氏东眷者也。王定保《摭言》称其乾宁中在内廷,文书敏捷,号‘下水船’”。卷首有自序,详记其以右补阙与柳玭受诏专修《宣宗实录》时“日历与起居注已不存一字”,而“庭裕自为儿时已多记忆,谨采宣宗朝耳目闻睹,撰成三卷,非编年之史,未敢闻于县官,且奏记于监国史晋国公〔杜让能〕,藏之于阁,以备讨论”。新志注文即本此自序而说。

此书既是为纂修实录所预备,其撰作自然严肃不苟,内容也多属朝政大事或宫廷秘闻,史料价值颇高。所记如宰相马植与神策中尉马元贽交通等事,已为两《唐书》所采用。如宣宗命萧邺为相,遣枢密使令学士院草诏,因枢密使询问是否留其使职,宣宗惧有朋党,遽换崔慎由为相,亦为《通鉴》所取而稍作修饰,转不如此书讲得明白。此外有反映宣宗个人品行者,如晚年好仙道,疏远韦澳,赐卢甚死;有反映中朝大臣互相倾轧者,如令狐绹排挤毕诚;有反映朝章制度者,如入翰林院经二十五日才知制诰、柳公权于朝堂错言尊号被罚一季俸料等。关于宣宗之死及懿宗得立的内幕亦记述详尽。

版本 (1)《稗海》本。(2)《粤雅堂丛书》本,影印本。(3)《藕香零拾》本,较善。(4)《丛书集成》本,据《粤雅》本。

《开天传信记》一卷 唐郑繁撰

此书《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杂史类著录,作郑荣,当是“繁”字之误。郑繁传见《旧唐书》卷一七九、《新唐书》卷一八三,昭宗时宰相,所谓“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者即是此人。此书卷首署衔吏部员外郎,又有自序谓:“余何为者也?累忝台郎,思勤坟典,用自修励,窃以国朝故事,莫盛于开元、天宝之际,……因簿领之暇,搜求遗逸,传于必信,名曰《开天传信记》。”全书共三十二条,语涉神异者便有十四条,史料价值远逊于《明皇杂录》,惟由此可得知晚

唐时关于玄宗的传说,尚不无用处。

版本 (1)宋左圭编《百川学海》本,有民国十年博古斋影印明刻本,民国十六年陶湘影刻宋本配明弘治本。(2)《历代小史》本,影印本。(3)《学津讨原》本,影印本。(4)《丛书集成》本,据《百川》本。(5)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收入此书,据《百川》本。

《唐阙史》二卷 唐高彦休撰

此书《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小说类作高彦休《阙史》三卷,《四库提要》谓:“彦休始末未详。书中郑少尹及第一条有‘开成二年愚江夏伯祖再司文柄’语,考《旧唐书》高锴传,锴于大和三年以吏部员外郎奉诏审定敕试别头进士明经,开成元年以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寻为礼部侍郎,掌贡部者三年,出为鄂岳观察使而卒,鄂岳正江夏之地,所言官品事迹俱合,则彦休当为锴之从孙。……黄伯思《东观余论》有此书跋云:‘叙称甲辰岁编次,盖僖宗中和四年,而其间有已书僖号者,或后人追改之。’今考序中自言乾符甲子生,乾符无甲子,当为‘甲午’之讹,下距中和四年仅十年,不应即能著书,由是以后,惟晋开运元年为甲辰,上推乾符元年甲午生,年当七十一岁,尚有著书之理,然则彦休盖五代人也。”案今《知不足斋丛书》本正作“甲午”,不知是否据《提要》追改。但《四库提要辨证》已据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四《为高骈奏请从事官状》中提到“摄盐铁巡官朝议郎守京兆府咸阳县尉柱国高彦休”,此状是中和四年十月以前所作,说明中和四年高彦休决不止十岁,因而决不可能生于乾符甲午,自序原文作“愚乾符甲午岁生唐世二十有一”,当是乾符甲午岁高氏出生已二十一年之谓,故高氏仍当为唐人。案《辨证》此驳甚是。《提要》又谓:“是书诸家著录皆三卷,今止上下二卷,似从他书抄撮而成,非其原本。……然自序言共五十一篇,分为上下二卷,又似非有脱遗者,或后人并追改其序欤?”则说实允当。此书记

大历以后至乾符事,间有神异灵怪之说,多数仍平实可信,如文宗召见周墀条所述甘露之变后文宗心情,卢携商议镇州事条反映枢密使能奉旨至中书与宰臣协商国事,均可资采择。

版本 (1)《知不足斋丛书》本,影印本。(2)清乾隆马俊良刻《龙威秘书》本,据《知不足斋》本。(3)《丛书集成》本,据《知不足斋》本。

《资暇集》三卷 唐李匡义撰

此书《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小说家类著类为“李匡文《资暇》三卷”,《郡斋读书志》袁本卷三下则作李匡义。《四库提要》谓:“匡义始末未详。书中称再从叔翁沂公,知为李勉从孙。又称宗人翰作《蒙求》,载苏武、郑众事云云,则晋翰林学士李翰之族。其人当在唐末。《唐书》艺文志有李匡文《两汉至唐年纪》一卷,注曰‘昭宗时宗正少卿’,盖即匡义。书中但自称守南漳,盖所历之官,非所终之官也。”《提要》又谓《读书志》载是书有匡义自序曰“世俗之谈,类多讹误。虽有见闻,嘿不敢证。故著此书,上篇正误,中篇谈原,下篇本物”,但所著录之本“无自序,疑装辑者佚之,书中亦不标三篇之目,其所说之事则皆与目应,疑自序乃櫟括之词,原未标目也”。今通行本也无自序及三篇总目,每一条目下有数十字乃至百余字的考证,订正名辞、典故的讹误,解说其原委。其中虽有不尽确当之处,如《提要》所指出,但仍多“引证分明,足为典据”者,颇有参考价值。卷下还述及唐代的名物,如食物有毕罗、生肝饊聚、石馊饼,乐器有阮咸、琴甲,茶具有茶托子,酒具有注子偏提,家具有承床,衣物有席帽、被袋,文具有圻封刀子、门状、薛涛笺、稠桑砚等,均为研究唐代社会生活提供了有用资料。

版本 (1)《顾氏文房小说》本,影印本。(2)《学海类编》本,影印本。(3)《墨海金壶》本,影印本。(4)清高承勋刻《续知不足斋丛书》本。(5)《丛书集成》本,据顾本。

《刊误》二卷 唐李涪撰

此书《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四库提要》谓：“旧本前有结衔称国子祭酒，郭忠恕《佩觿》引此书亦称李祭酒涪，五代去唐末未远，当得其真。而陆游《渭南集》有是书跋，曰‘王行瑜作乱，宗正卿李涪盛陈其忠必悔过，及行瑜传首京师，涪亦放死岭南’，疑即此人，未详孰是也。”郎官石柱题名有金部郎中李涪，时间约在咸通以后。《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更有两李涪，一蔡王房，官詹事府丞，时代亦在唐末；一大郑王房，无官职，时代较早。上述国子祭酒、宗正卿、金部郎中、詹事府丞之李涪皆处同一时代，是否即为一入，还难断定。

此书有自序，云“撰成五十篇，号曰《刊误》”，今本止四十九篇。曰《刊误》者，考证典章制度、礼仪风俗的源流，以纠谬误之谓，即《提要》所云“引旧制以正唐末之失，又引古制以纠唐制之误”，故从中可考知唐代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如“二都不并建”条谈武后迁东都意图，“宰相不合受节察防御团练等使囊鞬拜礼”条考订节度使的设置和节度使拜礼宰相的起源，“都都统”条叙设立此职的原因，“压角”条叙宰相监临两省官判事的仪式，又“进献奇零”条云“戊戌岁阅报状，见润州节度进应天节白金二千六百五十七两”，“奉陵”条云“某自省事六十年来常见报状云内官某以某过奉陵，内人亦时有之”，均可资考订。还有考订唐人用字之误，如“近岁精用字者反以‘仅’为远近之近”，这种“仅”字的用法在唐人著作以至《旧唐书》中都极为常见，知此则不会误解文义。

版本 (1)《百川学海》本，影印本，影刻本。(2)《古今逸史》本，影印本。(3)《学津讨原》本，影印本。

《唐摭言》十五卷 五代王定保撰

此书无撰者序跋。《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一一小说家著录，

谓：“专记进士科名事。定保〔唐昭宗〕光化三年进士，为吴融子华婿，丧乱后入湖南，弃其妻不顾，士论不齿。”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刘毓松《通义堂集》卷一二《唐摭言跋上中下篇》、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都对王定保生平作了考证，并纠正了《四库提要》的一些错误，其结论是王定保为武周时宰相王方庆七世从孙，上代即侨居南昌，定保生于懿宗咸通十一年，后来南游先至湖南依马殷，又入广州事南汉刘隐，卒于晋天福五年，此书写成时唐亡不久，因此书中称唐为“国朝”、“我唐”云云。

此书是记述唐代科举制度掌故的唯一专著，每卷分若干标题，每个标题下或作综合的论述，或分记若干有关故实，大体前三卷汇录科举制度掌故，其余按类记叙科举士人言行，写得比较有系统，和其他杂记小说之无系统次序者不同。记叙也比较详尽，关于人物情态、言论、诗篇处不惜笔墨，但又很少神奇怪异。所取材可知者有唐实录、诏敕奏疏、唐格文以及《国史补》等杂史小说，还有不少出自传闻，即《四库提要》所云“据定保自述，盖闻之陆扈、吴融、李渥、颜荛、王溥、王涣、卢延让、杨赞图、崔籍若等所谈云”，故所述多徵实可信，是研究唐代科举、文学以至士人生活的必读书。

版本 (1)《稗海》本，不足。(2)清乾隆卢见曾刻《雅雨堂丛书》本。(3)《学津讨原》本，影印本。(4)《丛书集成》本，据《学津》本。(5)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本，据《雅雨》本，又用《学津》本校补，并附清蒋光煦《斟补隅录》中此书的校勘记，1960年中华书局、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均重印。(6)《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载岑仲勉《跋唐摭言》，对此书纪事本身的错误作了纠正。

《中朝故事》二卷 五代尉迟偓撰

此书《郡斋读书志》袁本卷二上杂史类、《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故事类著录，其实够不上故事，只是杂记小说性质。《四库提要》谓：“南唐尉迟偓撰，偓履贯未详。书首旧题‘朝议郎守给事中修国

史骁骑赐紫金鱼袋臣尉迟偓奉旨纂进’，盖李氏有国时偓为史官，承命所作，李昇自以为出太宗之后，承唐统绪，故称长安为‘中朝’也。其书皆记唐宣、懿、昭、哀四朝旧闻，上卷多君臣事迹及朝廷制度，下卷则杂录神异怪幻之事。”并举出其中不可尽据处，但也肯定“其时去唐未远，故家文献所记亦往往足徵”。其中所说如“中书政事堂后有五房，堂后官共十五人”，即为正史所不详。又说“每岁樱桃熟时，两军（即左右神策军）各排宴只候行幸”，“两军所置街巡一止军中凶暴，若乃百姓为盗，即属京兆府并两县捕贼司，军人、百姓不相参杂”，可供了解神策军和皇帝的关系以及神策军职权。唐朝士人惮于尚公主，已为人熟知，此书则评述其缘由，谓“搢绅子弟皆怯于尚公主，盖以帝戚强盛。公主自置群僚，以至庄宅库辇尽多主吏，宅中各有院落，聚会不同。公主多亲戚聚宴，或出盘游，驸马不得预之，相见即贤公简婢仆不敢顾盼，公主即恣行所为，往往数朝不一相见”。凡此均颇有用处。

版本 (1)《历代小史》本，影印本。(2)《丛书集成》本，据《小史》本。(3)民国初徐乃昌《随庵徐氏丛书》影刻影宋抄本，最善。(4)1958年中华书局本。

《金华子杂编》二卷 五代刘崇远撰

此书《郡斋读书志》袁本卷三下小说类作《金华子》二卷，谓“录唐大中后事，一本题曰‘刘氏杂编’”。《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一一小说家类作《金华子新编》三卷，《宋史》卷二〇六艺文志小说家类作《金华子杂编》三卷，明以后失传，清乾隆开四库馆时从《永乐大典》抄出，作《金华子杂编》二卷。《提要》谓：“崇远家本河南，唐末避黄巢之乱，渡江南徙，仕李氏为文林郎、大理司直，尝慕皇初平之为人，自号金华子，因以为所著书名（案以上均据自序）。崇远有自序一篇，颇具梗概，序末题名，具官称臣，不署年月，而书中所称烈祖高皇帝者，乃南唐先主李昇庙号，又有升元受命之语，亦南唐中

主李景纪年。”此书《四库》本编成同时周广业在京为之作校注，并有跋，谓：“崇远仕南唐为大理司直，马、陆二书（马令、陆游两《南唐书》）俱无传，据《稽神录》，知为广南节度崇龟从弟也。”

此书今本多记晚唐事，如《提要》所说“其中于将相之贤否、藩镇之强弱，以及文章吟咏、神奇鬼怪之事，靡所不载，多足与正史相参证”，且列举《通鉴》所采择诸事。此外有用史料还多，如记中尉杨复恭能改变翰林学士的除授、周宝以善打球得迁将军，可窥知晚唐政治面貌；记杭州端午彩船于钱塘湖竞渡，“安坊巷中有拦街铺，设中夜乐神，迟明未已”，“淮南，巨镇之最，人物富庶，凡所制作率精巧，乐部俳優尤有机捷者”，可窥知晚唐民俗。

版本（1）《读画斋丛书》本，有周广业注。（2）《丛书集成》本，据《读画》本。（3）1958年中华书局本，实据《读画》本，误谓据《稗海》本，《稗海》无此书。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中华书局本，并纠正若干错讹（上述版本错题亦已纠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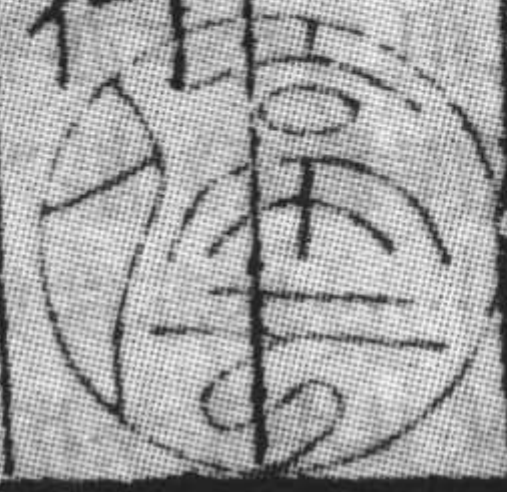
《开元天宝遗事》二卷 五代王仁裕撰

王仁裕唐末为秦州节度判官，后入蜀，蜀亡则历仕后唐、晋、汉三朝，至周显德三年卒，传见《旧五代史》辑本卷一二八、《新五代史》卷五七。此书《郡斋读书志》袁本卷二下传记类著录作四卷，谓：“汉王仁裕撰，仁裕仕蜀至翰林学士，蜀亡，仁裕至镐京，采摭民言，得开元天宝遗事一百五十九条。”《宋史》卷一五六艺文志故事类则作一卷（裕字误“豁”）。今有一卷本、二卷本，《四库》则为四卷本，但二卷本亦有一百四十六条，可见只是分卷不同，无大缺佚。《四库提要》谓：“洪迈《容斋随笔》则以为托名仁裕，摘其舛谬者四事，……然苏轼集中有读《开元天宝遗事》四绝句，司马光作《通鉴》亦采其中张彖指杨国忠为冰山语，则其书实在二人以前，……盖委巷相传，语多失实，仁裕采摭于遗民之口，不能证以国史，是即其失，必以为依托其名，则事无显证。”案此书实是晚唐五代时对玄宗

開元天寶遺事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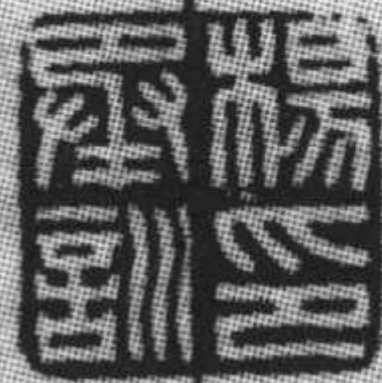
建業張氏銅板印行



玉有太平字

開元元年中因雨過地潤微裂至夜有光宿
衛者記其處所曉乃奏之上令其鑿地得寶玉
一片如拍板樣上有古篆天下太平字百僚稱
賀故之內庫

步輦召學士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之論時務七月十五日

时代的传说,作传说看不作历史文献看,还是有用处的。

版本 (1)《历代小史》本一卷,影印本。(2)《顾氏文房小说》本二卷,影印本。(3)《丛书集成》本,据顾本。(4)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据顾本。

《鉴诫录》十卷 五代何光远撰

《四库提要》谓:“光远字辉夫,东海人,[后蜀]孟昶广政初官普州军事判官。其书多记唐及五代间事,而蜀事为多,皆近诙谐之言,各以三字标题,凡六十六则。赵希弁《读书后志》(卷二)以为辑唐以来君臣事迹可为世鉴者,似未睹其书因其名而臆说也。旧本前有刘曦度序,亦见希弁《志》,《宋史》艺文志(卷二〇六小说家类)遂以刘曦度《鉴诫录》三卷、何光远《鉴诫录》三卷分为二书,益舛误矣。书中间有夹注,……皆驳正光远之说,不知出自何人。……此本析为十卷,有朱彝尊跋,称从项元汴家宋本影写,则犹宋人所分也。”案此书多记唐五代人诗篇,实与《本事诗》、《云溪友议》性质相近。亦有可参证史传者,如“九转验”记唐武宗服九转丹“遍体生疮,髭发俱脱,十日而崩,此唐实录隐而不书”,今两《唐书》亦不详此细节;“金统事”记黄巢金统年间有人贴诗于都堂门,丞相大怒,杀三千余人,其诗有“贵落深坑贱出泥”、“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斋”等语,可资认识农民政权性质;“判木夹”记唐末蜀与南诏的外交文书往来,木夹为南诏来书,判木夹则为复信,此类均甚有用。

版本 (1)《学海类编》本,影印本。(2)《知不足斋丛书》本,影印本。(3)《学津讨原》本,影印本。以上与《四库》本均同出朱跋本,后二本又经校勘。(4)《丛书集成》本,据《知不足斋》本,校以《学津》本。

《北梦琐言》二十卷 五代孙光宪撰

此书《郡斋读书志》袁本卷三下小说类、《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一一小说家类均作三十卷,《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小说家类作

十二卷,《郑堂读书记》说“皆字之误”,恐未必,因为《太平广记》中所收此书而为今二十卷本不收者极多,因此原书有可能真是三十卷,今本二十卷、《宋史》十二卷都是已残缺之本(《四库提要》对此卷数出入转不置一词,与同类他书的提要写法不同)。卷首有孙氏自序,谓:“唐自广明乱离,秘籍亡散,武宗已后,寂寞无闻,朝野遗芳,莫得传播。仆生自岷峨,官于荆郢,咸京(长安)故事,每愧面墙,游处之间,专于博访。顷逢故凤翔杨玘少尹,多话秦中平时旧说,常记于心。他日渚宫见元澄中允,款狎笑话,多符其说。……厥后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毫。……三纪收拾筐篋,爰自公退,咸取编连,先以唐朝达贤一言一行列于谈次,其有事类相近,自唐至后唐、梁、蜀、江南诸国所得闻知者,皆附其末。……《禹贡》云‘云土梦作义’,传有‘畋于江南之梦’,鄙从事于荆江之北,题曰《北梦琐言》。”孙氏有传见《宋史》卷四八三,入宋授黄州刺史以终,《四库提要》因说孙是宋人,“旧以为五代人者误矣”。其实据此书自序明谓撰于荆南,称五代有何错误?《提要》不过援明人人清者皆应为清人之例而已。

此书记唐武宗以后事,大体前十六卷记唐,后四卷记五代,涉及政治轶闻、士大夫言行和社会风俗民情,保存史料极为丰富,虽间及怪异,仍是重要文献,如:(1)所记晚唐政治,有致仕军容刘玄翼使士子为宰相,黄巢入长安后朝臣士人的出处,朱全忠迁唐室入洛赐凤翔驾前宰相百人自尽等,可参补史传。(2)所记晚唐社会,有“唐末举人,不问士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鱼,谓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卖奴婢而食也”,可窥知风习。(3)所记晚唐诗人轶事轶篇,涉及罗隐、皮日休、韦庄等人,也都可资考证。

版本 (1)《稗海》本,多脱误,不善。(2)《雅雨堂丛书》本,源出旧抄,但原缺卷十二,刊刻时用《稗海》本补入,《稗海》本本无标题,刊刻时一一妄加,见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大公报馆本此书跋,傅

氏得见吴騫拜经楼旧藏抄本则尚是二十卷标题完善之本,今不知所归。(3)《云自在龕丛书》本,经缪荃孙校勘,并辑《太平广记》所引此书不见今二十卷本者为逸文四卷,但仍有脱误未经校出者。(4)《丛书集成》本,据《雅雨》本。(5)1960年中华书局本,据缪本,而卷二十标题仍未找旧抄本改正。(6)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较善于1960年本,据拜经楼旧抄本补出卷二十本来标题。

《贾氏谈录》一卷 北宋张洎撰

张洎初仕南唐为知制诰中书舍人,入北宋为史馆修撰、翰林学士,后官至参知政事,《宋史》卷二六七有传。此书卷首有开宝三年自序,谓是张洎仕南唐使宋时记宋左补阙贾黄中所谈论掌故轶闻。原书佚失,《四库全书》所著录是辑本,如《提要》所说“晁氏〔《郡斋读书志》〕称原书凡三十余事,明陶宗仪《说郛》所载仅九事,宋曾慥《类说》所载亦仅十七事,惟《永乐大典》所载较曾、陶二本为详。今从各韵搜辑,参以《说郛》、《类说》共得二十六事,视洎原书,盖已及十之九矣”,《提要》又谓:“是书虽篇帙无多,然如牛李之党其初肇衅于口语,为史所未及。而《周秦行纪》一书,晁公武亦尝据此录以辨韦瓘之诬。他如兴庆宫、华清池、含元殿之制,淡墨题榜之始,以及院体书、百衲琴、澄泥研之类,皆足以资考核。”此外所述晚唐至北宋初长安情态,如“京兆户民尚斗鸡、走犬之戏,习以为业,罕有勤稼者,盖豪荡之俗犹存余态尔”;“贾君云:僖、昭之时,长安土族多避寇南山中,虽荐经离乱而兵难不及,故今衣冠子孙居户社间室庐相比”,亦甚有价值。

版本 《守山阁丛书》据《四库》本,又影印本。

《锦里耆旧传》四卷 北宋勾延庆撰

此书原本八卷,题“前荣州应灵县令勾延庆纂”。《直斋书未解題》辑本卷七传记类谓:“开宝三年,秘书丞刘蔚知荣州,得此传,其

词荒秽,请延庆修之,改曰《成都理乱记》,天成之后别加编次,起咸通九载,迄乾德四年,百余年蜀事大略具矣。”则勾氏此书是据旧本修改编次而成。其旧本据《通鉴考异》,为张彰所撰《锦里耆旧传》。《考异》谓:“张彰自言年纪八十,追忆为儿童以来平生见闻,为《耆旧传》,……勾延庆《耆旧传》止于钞改张传为之,别无外事。”又谓:“勾传取张传而改其年。”今所见勾氏改编本如《四库提要》所云“不以人系事,其体实近编年,所录两蜀兴废之迹亦颇简略,惟于诏敕章表书檄之文载之独详”,而书名则仍张氏原作曰《锦里耆旧传》,又前四卷已失去,止存五至八卷,记中和五年正月以后僖、昭两朝史事。所记王建挫败陈敬瑄割据全蜀之事,校正史尤为详悉。

版本 (1)《读画斋丛书》本。(2)《丛书集成》本,据《读画》本。

《南部新书》十卷 北宋钱易撰

《四库提要》谓:“旧本卷首题‘钱后人’,盖以姓谱载钱氏出钱铿也。易字希白,吴越王侗之子,真宗朝官至翰林学士,是书乃其大中祥符间知开封县时所作,皆记唐时故事,间及五代,多录轶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杂载其中,故虽小说家言,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于考证尚属有裨。晁公武《读书志》作五卷(袁本卷三下小说类),焦竑《国史经籍志》作十卷(案《宋史》卷二〇六艺文志小说家类作十卷,《提要》漏引),今考其标题,自甲至癸,以十干为纪,则作十卷为是,公武所记殆别一合并之本也。”所说尚为允当。惟此书卷首有嘉祐元年钱易子明逸序,明谓“列卷十”,《提要》漏引,可谓疏忽。

此书杂采诸书,行文简洁,罕涉怪异,史料价值较高。所述大体为:(1)唐代政治制度和官场典故,如“至德二年,宰相直主政事笔,每人知十日,至贞元十年,又分每人轮一日执笔”;“凡中书有军国故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著其名,谓之‘五花判事’;其舍人中选一人明练政事者专典机密,谓之‘解事舍人’”;“开元、天宝年

间有内三司,置于禁中,内职有权要者掌之,无下财谷著之簿间,毫发无隐”,均有裨于了解唐代官制的演变。(2)状、敕、令、式等原始史料,如辛部的户部式、壬部的公式令、癸部的大中九月十七日敕等,因唐代的令、式均已失传,诏敕也仅《唐大诏令集》传世,这类佚存的文书便甚珍贵。(3)人物事迹,如程元振帅兵经略河北、卢全甘露之变夜宿王涯宅被杀、吴行鲁攀附西门季玄、皮日休从黄巢遇祸等,皆可补史传。(4)其他如音乐百戏、节庆风俗、衣食器物等琐屑杂事,也可资研究社会生活。

版本 (1)明万历高承埏刻《稽古堂丛抄》本。(2)《学津讨原》本,影印本。(3)《粤雅堂丛书》本。(4)《丛书集成》本,据《学津》本。(5)1958年中华书局本,据《学津》本,用《粤雅》本校。

《近事会元》五卷 北宋李上交撰

李上交始末不详。卷首有自序,谓:“上交以退寓钟陵,静寻近史及诸小说、杂记之类,起唐武德而下尽周显德之前,撷细务之所因,庶闲谈之引据,……凡五百,厘为五卷,曰《近事会元》,尔时丙申嘉祐改元长至日也。”说明此书成于嘉祐元年,而专记唐、五代事。《四库提要》谓:“其书自一卷至三卷,首载宫殿之制,次载舆服之制,次载官制、军制,其次亦皆六曹之掌故。四卷为乐曲、为州郡沿革。惟五卷颇载琐闻,然如妇人檐子、兜笼、线鞵、线鞋、亲迎、举乐、障车、公主事姑舅、公主赐谥、山川岳渎封号、国忌行香、上元点灯、散从亲事官、处士谥先生律格、赦书、投匭、刑统、律令、死罪覆奏、断狱禁乐、逐旬问罪人、表状、书奏、制敕及始流沙门岛、始配衙前安置、始贬崖州诸条,亦皆有关于典制。大抵体例在崔豹《古今注》、高承《事物纪原》之间。其中如《霓裳羽衣曲》考证亦极精核,不可徒以杂事细务目之。”从史料角度看,此书与《南部新书》近似,皆杂采唐人记述,惟此书较有系统,且若干条目标记出处,如《唐书》志、《国史补》、《唐传载》、《卢氏杂说》、《翰林志》、李愚《翰林旧

规》、《因话录》、《唐嘉话录》、《谈宾录》、《尚书故实》、《唐两京记》、《乐苑》、《乐谱录》、《幽闲鼓吹》、《乐府杂录》、《甘泽谣》、《教坊录》、《羯鼓录》、《国史纂要》、《酉阳杂俎》等,其中不少今已散佚。如卷一所载“唐《卢氏杂说》云谏议无事不入,宰相每遇入省,有厨食四孔炙。中书舍人时谓‘宰相判官’,宰相亲嫌不拜知制诰为‘屣脚’,又云不由三省直押中书舍人者谓之‘挞额裹头’”,也见于《南部新书》,但据此书知原出于《卢氏杂说》。

版本 (1)《四库》本,据明万历十年玄素斋钞本。(2)《守山阁丛书》本,据《四库》本,用另一万历旧钞本校,附校勘记。(3)《畿辅丛书》本。

《太平广记》五百卷 北宋李昉等撰

此书和《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合称北宋初官修的四部大书。《四库提要》谓:“李昉奉敕监修,同修者扈蒙、李穆、汤悦、徐铉、宋白、王克贞、张洎、董淳、赵邻几、陈鄂、吕文仲、吴淑十二人也。以〔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奉诏,三年八月表进(原注:此据《宋会要》之文,《玉海》则作二年三月戊寅所集,八年十二月庚子书成,未详孰是),六年正月敕雕版印行。凡分五十五部,所采书三百四十五种(案《提要》此数是根据书前所列引用书目,实际有五百种左右),古来轶闻琐事、僻籍遗文咸在焉,卷帙轻者往往全部收入,盖小说家之渊海也。《玉海》称《广记》镂本颁天下,后以言者谓非后学所急,收版贮之太清楼,故北宋人多未之睹,郑樵号为博洽,而《通志》校雠略中乃谓《太平广记》为《太平御览》中别出《广记》一书,专记异事,误合两书而一之,是樵亦未尝见矣。其书虽多谈神怪,而采摭繁富,名物典故错出其间,词章家恒所采用,考证家亦多所取资。又唐以前书,世所不传者,断简残编尚间存其什一,尤足贵也。”案《郡斋读书志》袁本卷三下小说类和《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一一小说家类都著录此书,尤袤《遂初堂书目》也著录《京本

太平广记》，可见南宋时仍有刻本，惟流传不广而已（至于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条谓其时说话人必“幼习《太平广记》”，不过指师徒口传《广记》故事，未必真熟读此大书）。

此书价值在于：（1）书中所辑资料绝大部分是唐代的，其中有许多原书已失传，失传的唐人杂记小说可从此搜辑，未失传的也可用此校补（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汉魏六朝小说多据此书，《唐宋传奇集》的唐代部分也多用此书）。此书每条目后皆注出处，为辑佚、校补工作提供很大方便。但因传抄、刻印过程中的失误，少数条目失去出处，或将出处错乱，故使用时务应慎重考订，不可轻率凭信。（2）书中名贤、讽谏、廉俭、吝啬、气义、知人、精察、俊辩、幼敏、器量、贡举、氏族、诠选、职官、权倖、将帅、骁勇、文章、才名、儒行、奢侈、诡诈、谬误、治生、褊急、诙谐、嘲谑、轻薄、酷暴、妇人等类大体是真人，其中有许多还是真事，是有用的史料；其他神仙、道术、报应、徵应、定数、梦、幻术、妖妄、神、鬼、夜叉、妖怪、再生以及龙、虎、狐、蛇等虽然神奇怪异的色彩浓重，但也反应出唐代贵族以至平民的生活、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情况，只要能善于使用。（3）由于分类排列，同样类型的故事排列到一起，可以由此看出故事的分化与演变，对研究小说史以及民俗学的人很有用处。因此此书可说是一大宝库。但对它下功夫钻研利用的人一向不多，中华书局出版了钱钟书的《管锥编》，第二册有关于《太平广记》的二百十五条札记，钱氏学贯中西，但此札记只是着重从文学角度来探讨，如从唐史研究的角度，应可写出更多的札记，找出更多的宝贵史料。

版本 （1）宋刻本已全部失传，仅存清陈鱣校宋本，校于明许自昌刻本上，只校了一部分，未知所据，见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大公报本第一集，傅临校本今藏北京图书馆。（2）明嘉靖时沈与文野竹斋抄本，也藏北京图书馆。（3）明嘉靖四十五年谈恺刻本，这是现存最早的刻本，此本初印者原有缺卷，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说“阙嗤鄙类二卷、无赖类二卷，而酷暴类谈胡制等

五事、妇女类阙李诞等七事，谈谓遍阅诸藏书家悉然，宋世已亡”。后印本则已就史传抄出此所缺事实补刻成完书。谈刻有民国时北京文友堂书肆影印本，用初印本，缺卷据清黄晟刻本抄配。(4)明万历活字本，据谈刻初印本。(5)明万历许自昌重刻谈本。(6)清乾隆十八年黄晟槐荫草堂刻巾箱本，缺卷另从前人小说择取有关条目补入。(7)清道光二十六年三让睦记书肆覆刻黄本。《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二本载岑仲勉《跋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明末谈刻及道光三让本太平广记》，论谈刻、黄刻、三让刻缺卷增补异同。(8)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据谈刻，用野竹斋抄本、陈鱣校宋本及许自昌本、黄晟本校勘，注出异文，实较精善，1961年中华书局又用此版修订印行。(9)原哈佛燕京社出版有《太平广记引得》一册，分“篇目引得”、“引书引得”二部分，不是内容的引得，因为做内容引得实在不容易。1982年中华书局又据1961年版编制索引，仍分“引书索引”和“篇目索引”两部分。

《唐语林》八卷 北宋王说撰

王说不见于《宋史》，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九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〇考知其为吕大防子婿，元祐四年除国子监丞，改少府监丞（《四库提要辨证》对其事迹复稍有增补，但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郡斋读书志》袁本卷三下小说类著录十卷，谓：“未详撰人，效《世说》体，分门纪唐世事，新增‘嗜好’等十七门，余仍旧云。”《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一一小说家类著录八卷，谓：“长安王说正甫撰，以唐小说五十家仿《世说》分门三十五，又益十七为五十二门。《中兴书目》十一卷，而阙纪事以下十五门，又云一本八卷。今本亦止八卷，而门目皆不阙。”《宋史》卷二〇六艺文志小说家类亦作十一卷。《四库提要》谓：“武英殿书库藏有明嘉靖初桐城齐之鸾所刻残本，分为上下二卷，自德行至贤媛止十八门，前有之鸾自序，称所得非善本，其字画漫漶，篇次错乱，几不可读。今以

《永乐大典》所载参互校订,删其重复,增多四百余条,又得原序目一篇,载所采书名及门类总目,当日体例尚可考见其梗概,盖明初全书尚存也。惟是《永乐大典》各条散于逐韵之下,其本来面目难以臆求,谨略以时代为次,补于刻本之后,无时代者又后之,共为四卷。又刻本上下二卷,篇叶过繁,今每卷各析为二,仍为八卷,以还其旧。此书久无校本,讹脱甚众,文义往往难通,谨取新、旧《唐书》及诸家说部,一一详为勘正,其必不可知者则姑仍原本。”案此书原本盖十卷,合序目一卷为十一卷,《四库》分八卷只能说是还《书录解题》卷数之旧,但经四库馆臣这次搜辑重编,总算将此书复活了大部分,功实非小。书中所选以人物言论为主,同时也记述了政治史迹、名物制度、宫廷杂事、民间习俗。其所据五十种书有的今已失传,现存的也多残缺脱漏,很少善本,故此书一向是研究唐史常用的要籍。不足之处是所选引都不注明出处,不经考订不知原出何书。

版本 都从《四库》八卷本出。(1)《武英殿聚珍丛书》本,重刻《聚珍》本。(2)《墨海金壶》本,影印本。(3)道光李锡龄《惜阴轩丛书》本。(4)《守山阁丛书》本,附校勘记一卷,影印本。(5)《丛书集成》本,据《守山》本,(6)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本,据《守山》本,1958年中华书局、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均重印。(7)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周勋初《唐语林校证》,用《四库》辑本校以现存《永乐大典》残册及嘉靖齐刻,又疏注所引出处,并用这些原书和其他有关文献勘对,还增辑佚文,附加多种索引,实为此书最精善之本。

《续谈助》五卷 宋晁载之撰

此书是小型的杂记小说总集,撰集时间不详,明《文渊阁书目》始著录,《四库全书》未收。今本所集录有书二十种,其中唐代的有五种:(1)唐段安节《琵琶录》。段安节撰有《乐府杂录》,此书只抄录其中有关琵琶的五条,但文字间有增多,可资校补。(2)唐皇甫

枚《三水小牋》。此书成于昭宗天祐四年，今有《云自在龕丛书》单行足本和1958年中华书局本，因内容多怪异神奇，故本《唐史史料学》未予讲述。(3)唐李德裕《文武两朝献替记》。此书《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杂史类著录为三卷。李德裕在文宗、武宗两朝任宰相，此书即是他参与处理朝政大事的纪录，《通鉴考异》也引用来辨正史实。原书已佚失，晁氏抄录了四条，如记大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枢密使崔谈峻、王士政至中书，以文宗与枢密使手诏示诸相”，可知枢密使的职能；“先是，宗闵每置宴皆令京兆府主办，两县令官吏因缘求取，除羊酒外，每行又率见钱，所敛至厚”，可知京城工商业的组织及所受的剥夺；“会昌二年四月，……授〔王〕茂元河阳，仇士良甚怒，枢密使至中书，面如土色，谓德裕曰：‘缘相公用茂元，适军容于浴堂诟怒，称枢密使与宰臣相连，令大和中罪人领重镇’”，可见枢密使、神策中尉、宰相之间的关系。晁氏有跋语，谓：“右钞李德裕《文武两朝献替记》，其已为史官所取与挟党情者皆略之。”则今佚失者当已多为新、旧《唐书》所采用，惜已无从辨别。(4)唐刘轲《牛羊日历》。此书《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为一卷，注：“牛僧孺、杨虞卿事。檀栾子皇甫松序。”书题之“牛羊”即指牛僧孺、杨虞卿。书中所记皆牛、杨政治丑闻，诋毁、中伤色彩甚显明，自不堪尽行置信，但也有助于了解牛李党争之激烈。(5)唐杨华《膳夫经手录》。这是唐人讲饮食的专著，《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医术类著录为“阳晔《膳夫经手录》四卷”，《宋史》卷艺文志作“杨晔”。《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著录《膳夫经》一卷，谓：“唐杨煜撰。煜官巢县令，是书成于大中十年，详西楼跋。《唐书》、《宋史》艺文志并作《膳夫经手录》四卷，《通志》艺文略同，王尧臣《崇文总目》亦作四卷，‘手录’则作‘手论’，为转写之讹。此从旧钞本依样过录。书仅六叶，似后人摺拾成编，惟所载茶品甚详，分所产之地，别优劣之殊，足与《茶录》、《茶经》资考证也。”案此即从《续谈助》中抄出晁氏跋语，谓：“右钞唐巢县令杨华所撰《膳夫经手录》，大中十年六月成

书,迨今二百余年矣,……腊月八日西楼记。”《未收书提要》之语实悉本之。

版本 (1)《粤雅堂丛书》本。(2)《十万卷楼丛书》本。(3)《丛成集成》本,据《十万卷楼》本。

《类说》六十卷 南宋曾慥辑

此书是中型杂记小说总集,但不同于《太平广记》之分类,而止是按书名编排抄撮(如将称“记”的编排在一起,称“录”的编排在一起)。有自序谓:“余乔寓银峰,居多暇日,因集百家之说,采摭事实,编纂成书,书分五十卷(案宋本序无卷数,此据明本),名曰《类说》,可以资治体、劝名教、供谈笑、广见闻,……绍兴六年四月望日温陵曾慥引。”《四库提要》谓:“慥字端伯,晋江人。官至尚书郎,直宝文阁。……其书体例略仿马总《意林》,每一书各删削原文,而取其奇丽之语,仍存原目于条首(案原书各条或有目或无目,而此书每条皆有目,是多为曾氏抄撮时所拟),但总所取者甚简,此所取者甚宽,为稍不同耳。南宋之初,古籍多存,慥又精于裁鉴,故所甄录大都遗文僻典,可以裨助多闻。又每书虽经节录,其存于今者,以原文相校,未尝改窜一词,如李繁《邺侯家传》下有注云‘繁于泌皆称先公,今改作泌’云云。即一字之际,犹详慎不苟如此,可见宋时风俗近古,非明人逞臆妄改者所可同日语矣。”所抄书据《提要》统计共二百六十一一种,据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时所统计为二百五十二种。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唐代的或专记唐事的杂记小说,其他一些五代、宋人的杂记小说中也有关于唐代的内容。这些书今多已佚失,即未佚失者此书所引亦可资校勘。所引已佚书中如《邺侯家传》、《秦京杂记》、《秦中岁时记》、《景龙文馆记》、《金銮密记》、《献替记》等均较有高史料价值(《献替记》即李德裕《文武两朝献替记》,此书载五条,有两条为《续谈助》未载,另一条比《续谈助》所载多一段文字)。

版本 (1)宋刻残本,存二卷,今藏北京图书馆。(2)《四库全

书》本,《提要》云:“其二十五卷以前为前集,二十六卷以后为后集。”(2)明天启刻本,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并附印宋刻残本,此本无《四库提要》所说《邺侯家传》之曾慥注,也无前后集之分,显然为不同的传本。

《说郛》一百卷 明陶宗仪辑

陶宗仪字九成,是元、明间的著名文人,著有《辍耕录》、《书史会要》、《游志续编》等书。此书也和《太平广记》等一样是杂记小说的总集,而不是丛书,不过《广记》按内容分类、《类说》按书名编排,此书则毫无类例,以原书为单位,每书先列书名卷数和撰人,然后选抄几条至几十条,而且抄时不按原书时代先后,大概是随得随抄,且有一书分抄两处的情况(如《金銮密记》、《东观奏记》均分抄于卷四及卷七五),查找颇不方便。但其用处仍很明显:(1)全书一百卷,共抄书六百七十七种(一说七百二十五种),以杂记小说为主,其中宋人的最多,唐人的也还不少,有许多早已失传,依靠此书还能看到点片断,不致完全湮没。(2)有些书现在虽有传本,但也已残缺,此书所抄往往有出于今本之外的,可以增补今本。(3)此书元、明间抄成,所据都是宋、元刻本、抄本,在文字上往往有胜于今本之处。(4)此书所抄唐人著作中有些为《广记》所未采,可补《广记》的不足。当然,使用时要注意鉴别真伪,《广记》北宋前期纂成,所抄唐人著作不会假,此书便不一定都靠得住,如仅见于此书题为唐白行简撰的《三梦记》即是伪物。

版本 (1)清顺治三年陶珽重编,李际期宛委山堂刻本,此书把原本大事改窜,增至一百二十卷、一千二百九十二种,完全失去原本真面目,《四库》所收即是此本。(2)民国十六年商务印书馆本,这是一百卷的原本,抄校出自张宗祥之手,张氏民国八年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用馆藏明抄残本、傅增湘藏明抄三种配合本和另一明抄本、涵芬楼藏明抄本,一共六种明抄完本、残本,认真抄校,历时六年,写出

說郭卷第三

談壘 五卷

明皇雜錄

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貴妃賜以金粟裝臂環梨園弟子皆居
宜春北院時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洞知律度安祿山獻白玉簫
管數百事中官自蜀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邏紗檀爲之光潤如
玉有金縷紅紋蹙成雙鳳張九齡裴輝卿罷免之日二人鞠躬卑
遜李林甫抑揚自得觀者謂一鵬挾兩兔上置酒興慶宮有獻水
調歌頭者云山川滿目泪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如今汾水
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上問誰爲此詞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上幸繡
嶺宮宮隘而暑甚上使覘姚崇報曰乘小駟按轡木陰下上從之
頓忘溽暑帝爲皇孫時天后奇之曰此兒當爲太平天子以玉龍

定本,由商务线装排印,使用《说郭》只能用这个善本,不宜用经过改窜的陶珽本。(3)1986年中国书店影印商务本。(4)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说郭三种》本,将商务《说郭》一百卷本、宛委山堂《说郭》一百二十卷本和原附于宛委山堂本的《说郭续》四十六卷本汇集影印,附有索引。

诗 文 类

唐人所作的诗、文也是研究唐史所必用的重要文献,而且比起后人纂修的史书来,还是更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当然,唐人在作诗、文时不是为写历史,因此要善于从诗、文中寻找有用的史料,例如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以诗证史,以诗补史,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要做到这点,首先要真正读懂诗、文,有时要不依赖前人的笺注,从白文找出史料,看出问题;同时,也要对史书记载打过点基本功,在读诗、文时才能知道那点为史传所不记,那点与史传所记有异同出入。

唐人诗、文大体以两种方法保存下来:一是个人的诗集、文集或诗文集,四部分类称之曰“别集”;一是汇编或选编两个人以至许多人的诗文,四部分类称为“总集”。引用资料时有别集的最好用别集,没有别集的用总集,但有时虽有别集而总集所收与别集有异同或为别集所不收,则当然也得用总集。

唐人别集数量甚多,《四库提要》就有一百多家,加上近人编辑的,总数可达二百种左右,这里不能全部讲,只选史料价值较高或名气较大的来讲。这些别集的史料价值往往取决于作者的经历,因此,介绍时要讲点生平履历。至于版本,只注明易得的影印本和新印本,过去的刻本、注本品种太多,一般从略。

《王梵志诗》 唐王梵志撰

《太平广记》卷八二异人“王梵志”条引《逸史》:“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城东有王德祖者,当隋文帝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

斗,经三年朽烂,德祖剖其皮,见一孩儿抱胎,德祖收养之,至七岁能语,曰:‘谁人育我,复何姓名?’德祖具以实语之,因曰:‘双木曰梵,名曰梵天(后改曰‘梵志’);王家育我,可姓王也。’梵志善作诗,甚有旨趣。”《桂苑丛谈》略同。又日本东洋文库 1978—1980 年所印 *Tunhn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I Legal Texts* 的(B) Plates 中影印敦煌卷子伯 4978 号的背面有所谓《王道祭杨筠文》的游戏文字,说“维大唐开元二七年岁在癸丑二月,东朔方黎阳故通玄学士王梵志直下孙王道,谨清酌白醪之奠”云云,也可见王梵志出现时代已远在盛唐开元之前,生于隋文帝时自属可能。设剥去《逸史》所说神话外衣,其人当是好作五言通俗诗以讽世者。其诗过去仅见《鉴诫录》等徵引,后从敦煌遗书中发现多种抄本残卷。其中如《富饶田舍儿》说“里正追役来,……追车即与车,须马即与马,须钱便与钱,和市亦不避,索面驴驮送,续后更有雉,官人应须物,当家皆具备,……纵有重差科,有钱不怕你”;《贫穷田舍汉》说“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驱将见明府,打脊趁回来”;《天下恶官职》说“天下恶官职,不过是府兵,四面有贼动,当日即须行,有缘重相见,业薄即隔生,逢贼被打杀,五品无人诤”;《你道生胜死》说“十六作夫役,二十充府兵,碛里向西走,衣甲困须擎,白日趁食地,每夜悉知更,铁钵淹干饭,同伙共分诤,长头饥欲死,肚似破穷坑”;《天下浮逃人》说“天下浮逃人,不啻多一半,南北踰纵横,诳他暂归贯”,均是上好史料。

版本 原无整理单行本,1983 年中华书局出版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六卷,收诗尚多,但考证太粗疏,论王梵志生平及思想尤属牵强附会。199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项楚《王梵志诗校注》,辑集资料较详。

《东皋子集》三卷 唐王绩撰

王绩字无功,自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人,生于隋开皇五年,隋炀

帝时举孝悌廉洁，授秘书省正字，不乐在朝，求为六合县丞，不久去职，唐武德初，以原官待诏门下省，贞观初为太乐丞，后弃官还乡，贞观十八年卒。传见《旧唐书》卷一九二、《新唐书》卷一九六。《旧唐书》本传云有文集五卷，同书卷四七经籍志别集类著录相同，计赋一卷，诗、文各二卷，另又有删节的三卷本，赋、诗、文各一卷。诗文多描述山野之趣和饮酒之乐，很少涉及时事，但所流露出的感伤世态、厌弃功名的情怀，则反映隋末动乱对士人的深刻影响。如《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说“伊昔遭丧乱，历数闰当余，豺狼塞衢路，桑梓成丘墟，吾及尔皆亡，东西各异居，尔为背风鸟，我为涸辙鱼，……追念甫如昨，奄忽成空虚，人生讵能几，蹙迫常不舒”；《晚年叙志示翟处士》说“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弃繻频北上，怀刺几西游，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失路青门隐，藏名白社游”；《赠梁公》说“朱门虽足悦，赤族亦可伤，履霜成坚冰，知足胜不祥”；又《答冯子华处士书》说“独坐河渚，结构茅屋并厨厩总十余间，奴婢数人足以应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蓊蓂、黍稷而已，春秋岁时以酒相续，兼多养鳧雁，广收鸡豚，黄精白术、枸杞薯蕷，朝夕采掇，以供服饵”，则有助于了解其时士人的乡居生活。

版本：(1)《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抄三卷本。(2)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韩理洲五卷本会校《王无功文集》。

《幽忧子集》七卷 唐卢照邻撰

卢照邻字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人，生于贞观年间，曾任邓王府典签，调新都尉，因病去官，后不胜病苦自溺卒。传见《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新唐书》卷二〇一。《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著录《幽忧子》三卷、文集二十卷，已散佚。明张燮辑此集，计诗赋骚乐歌五卷、文二卷。其中《病梨树赋》序谈到孙思邈的才能、年岁及活动，《南阳公集序》赞叹贞观时文学之臣聚集朝堂的盛况，《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记述此观兴衰变化的历史及其背景，《与洛阳名流

朝士乞药直书》记获金花子丹方,其中丹砂需二斤,而时价一两丹砂二千文,凡此均可资考证。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明崇祯张燮刻本。(2)1980年中华书局《卢照邻集·杨炯集》点校本,据《四部丛刊》本。

《王子安集》十六卷 唐王勃撰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贞观二十三年生,年未及冠,应幽素举及第,高宗乾封时任沛王府修撰,因撰《檄英王鸡文》被贬职,后补虢州参军,上元三年卒。传见《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新唐书》卷二〇一。据杨炯《王子安集序》原有二十卷,《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三十卷,均已散佚。明张燮辑为十六卷,计诗赋三卷、文十三卷。此集重要史料不多,但亦有可资利用者,如《临高台》诗描写长安“旗亭百队开新市,甲第千甍分戚里,朱轮翠盖不胜春,叠榭层楹相对起”;《为原州赵长史请为亡父度人表》记赵长史父士达隋末“拥三河之士马,情思奉顺,……密归城款,登太行而耀甲,则建德离心,出函谷而扬麾,则王充破胆”;《常州刺史平原郡开国公行状》记状主武德、贞观、永徽、龙朔中的事迹官职,凡此均有助于唐初政治史研究。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明崇祯张燮刻本。(2)清光绪九年刻蒋清《王子安集注》二十卷。(3)民国七年排印罗振玉辑《王子安集佚文》一卷及校记一卷。

《杨盈川集》十卷 唐杨炯撰

杨炯,弘农华阴人,永徽初生,十岁举神童,待制弘文馆,后应制举,拜校书郎,永隆二年为崇文馆学士,迁太子詹事司直,武周初年贬梓州司法参军,官终盈川县令。传见《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新唐书》卷二〇一。《旧唐书》传云“文集三十卷”,后渐佚散,明童珮辑为十卷,计诗赋二卷、文八卷,张燮又辑十三卷。集中多高宗、

駱賓王文集卷第一

賦頌

螢火賦

蕩子從軍賦

靈泉頌

螢火賦

余猥以明時久遭幽繫見一葉之已落知四運之將
終悽然客之爲心乎悲哉秋之爲氣也光陰無幾時
事如何大塊是勞生之機小智非周身之防嗟乎緜
袍匪舊白首如新誰明公冶之非孰辨臧倉之愬是
用中宵而作達旦不暝觀茲流螢之自明哀此覆盆
之難照夫類同而心異者龍蹲婦而宋樹伐質殊而

蘇祥林

武后时碑志行状,所叙述还上及武德、贞观时期,为研究初唐史事之可贵资料。如中书令薛振行状之薛振即高宗朝宰相薛元超,两《唐书》本传只言元超,读行状始知名振字元超,所载事迹也与两传有出入。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明万历童珮刻本。(2)1980年中华书局《卢照邻集·杨炯集》点校本,据《四部丛刊》本。

《骆宾王文集》十卷 唐骆宾王撰

骆宾王,婺州义乌人,初为道王府属,历任武功、长安主簿,调露年间任临海县丞,后去官,光宅元年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署宾王为府属,主草书檄,敬业兵败,被杀。传见《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新唐书》卷二〇一。中宗时郗云卿辑其诗文为十卷,计诗赋五卷、文五卷。集中有不少高宗、武后时期的政治史料,较重要的如《姚州道破逆贼柳诺、设弄、杨虔露布》,记用兵南蛮的经过,说明官军多用府兵,战斗结果生擒四千余人、斩首五千余级;《又破没蒙俭露布》,记此战役动用军队二十万,斩甲卒七千余级,获装马五千余匹。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2)1961年中华书局印清陈熙晋撰《骆临海集笺注》十卷。

《陈伯玉文集》十卷 唐陈子昂撰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生于高宗显庆年间,文明初进士及第,历任麟台正字、右卫胄曹参军、右拾遗,武周万岁通天元年建安王武攸宜统军讨契丹,以子昂为管记,后辞官回乡,为县令构陷,忧死狱中。传见《旧唐书》卷一九〇、《新唐书》卷一〇七。卢藏用编其诗文为文集十卷,据明刻为诗赋二卷、文八卷。文中颇多武周时期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史料,如《谢衣表》、《为建安王破贼表》、《为河内王等论军功表》、《为建安王谢借马表》、《奏白鼠表》、《上军国机要事》、《为建安王与辽东书》等,都是记载武攸宜征

讨奚、契丹的文字；《为乔补厥论突阙表》详论北方匈奴、突厥的盛衰和边远地理环境，提出营田用兵之策；《上西蕃边州安危事》提供了安北都督府的情况和河西屯田的条件；《上蜀川安危事》和《上蜀中军事》都谈到四川松潘一带为防御吐蕃而进行的屯军和运粮事宜。武周时期日趋严重的逃户问题在此集中也有反映，如《汉州雒县令张君吏人颂德碑》记该县最初“万五千余家，历政侵残，逃者过半”，朝廷曾有敕令“归复旧业者免当年租庸”，该县又规定“归者免一岁租及征徭”，于是归附者七千余家；《上蜀川安危事》载“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征敛驱役，皆入国用。其中游手惰业亡命之徒结为光火大盗，依凭林险，巢穴其中”，并指出“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客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因即逃亡”。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明弘治杨澄刻本。(2)1960年中华书局点校本，据《四部丛刊》本。

《张说之文集》三十卷 唐张说撰

张说字道济，一字说之，洛阳人，生于乾封二年，永昌中举贤良方正，授太子校书郎，迁右补阙、凤阁舍人，又流放钦州，中宗朝召为兵部员外郎，转工部侍郎、弘文馆学士，睿宗朝任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升宰相、监修国史，玄宗朝以拥立封燕国公任中书舍人，一度贬为相州、岳州刺史，开元九年复为相，次年出任朔方军节度大使，十七年任右丞相、迁左丞相，十八年卒。传见《旧唐书》卷九七、《新唐书》卷一二五。《旧唐书》传云“有文集三十卷”，计诗赋十卷、文二十卷，今有旧抄本，藏北京图书馆，通行本则均据明嘉靖伍氏龙池草堂刻二十五卷本，实不足。其诗多奉制应和之作，从中亦窥知帝王活动和宫廷生活。文则史料较多，如《皇帝在潞州祥瑞颂》记录了景龙元年至唐隆元年中宗十多次行幸潞州的史实，为两《唐

书》纪所失载；《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校颂德碑》记载了唐代的养马机构及养马业的发展，且有具体数字，是研究唐代马政的重要史料；集中还多有高宗至玄宗朝的文武官吏的碑志，如《裴行俭碑》、《王方翼碑》、《郭知运碑》、《拨川郡王碑》、《颖川夫人陈氏碑》等，史料价值均较高。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伍氏龙池草堂刻二十五卷本，如上所说非足本。

《曲江张先生文集》二十卷 唐张九龄撰

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人，仪凤二年生，景龙初进士及第，任校书郎，玄宗朝历任左拾遗、司勋员外郎、中书舍人、桂州都督充岭南道按察使、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中书侍郎，开元二十一年任宰相，二十四年罢相，因举非其人贬荆州长史，寻卒。传见《旧唐书》卷九九、《新唐书》卷一二六。《新唐书》传云“开元后，天下称曰曲江公而不名”，故其文集称《曲江集》，集计诗四卷，赋、赞、颂一卷，文十五卷，含有开元时期的丰富史料。如卷七为制敕，其中几篇《敕处分十道朝集使》都谈到招抚逃户的问题，《敕置十道使》说明设置十道的本意。卷八至一二为敕书，大多是下达都督、节度使的，也有不少是给突厥、新罗、契丹、吐蕃、突骑施等部族首脑的，还有给日本、罽宾等的外交书信，从中既可了解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动态，也可了解当时的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如《敕河西节度使牛仙客书》记围歼突骑施的战略部署，《敕王斛斯书》、《敕北庭都护盖嘉运书》等都是朝廷对边防战役的指令，《敕突厥可汗》诸书皆谈唐朝与其交易马匹事宜，《敕吐蕃赞普》诸书反映边界冲突和边疆防御情况。卷一三至一五为表状，也多论及朝廷大事及边防战事，如《贺昭陵征应状》反映关中有小股盗贼，《让赐蕃口状》可知边军掳得的外族俘虏被赐与大臣作奴隶。此外各体文中也都有可用的史料，《上封事书》议论朝廷重京官轻外官的倾向，指出其根在于

“今大利在于京职而不在于外郡”，又论及选举之弊，谓“今则每岁选者动以万计，京师米物为之空虚”；《开凿大庾岭路序》记开元四年踏勘、年底动工修成的大庾岭道路，不仅便利岭南和江淮的交通，也使海外诸国的珍宝能达于朝廷；此外，《张说碑》、《裴光庭碑》等也都有史料价值。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邱丘濬刻本。

《孟浩然集》四卷 唐孟浩然撰

孟浩然，襄阳人，生于武周载初元年，四十岁时游长安，举进士不第，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任荆州刺史，召为从事，后归隐襄阳，开元二十八年卒。传见《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新唐书》卷二〇三。天宝四载宣城王士源编录孟诗二百一十八首为二卷，今传本篇数以至卷数均有出入。其诗多写山水景物和隐逸生活，史料价值不高，但其中记述与官吏士人的交往，以及所反映的在野士大夫的情趣，仍可为治史者所利用。

版本 (1)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蜀刻本。(2)《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四卷本。(3)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本。(4)1988年巴蜀书社版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

《李太白文集》三十卷 唐李白撰

李白字太白，武周长安元年生，天宝年间入长安任翰林供奉，后去职远游，安史乱起永王璘辟为从事，永王兵败被流放夜郎，遇赦还浔阳，又先后依宋若思、李阳冰，代宗宝应元年卒。传见《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新唐书》卷二〇二。今存《李太白文集》最早的是宋蜀坊刻三十卷本，包括集序和李白的碑记一卷、歌诗二十三卷、赋一卷、文五卷，元人、清人又多次改编。其诗多抒发个人情感，状物叙事甚少。其中间有反映现实之作，如《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十四所说“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可知

李太白文集卷第一

草堂集序

宣州當塗縣令李陽冰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
珪組世爲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爲名然自
窮蟬至舜七世爲庶累世不大曜亦可歎焉神龍之
始逃歸于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
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
不讀非聖之書取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
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已來風騷之後馳驅
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
岳銜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

当时确有以斗鸡而致显贵者；《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谓“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自河以南，孤城四垒，大盗蚕食，割为洪沟”，可窥见安史乱起后的形势；《任城县厅壁记》记此县“今乡二十六、户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一”，可补地志不记的乡户数；《武昌宰韩君志思颂碑》所云“居未二载，户口三倍其初”，反映动乱中人口南移的规模，又谓“特奏授鄱阳令兼摄数县”，可知其时有兼摄他县的措施；《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记李锡任赵州昭庆县令时“奉诏修建初、启运二陵，总徒五郡，支用三万贯”，可知营建的工程费用。

版本 (1)1985年巴蜀书社影印宋蜀刻本。(2)《四部丛刊》影印元萧士贇《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三十卷。(3)1977年中华书局印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三十六卷。(4)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三十卷，以王琦注本为底本。

《王右丞集》十卷 唐王维撰

王维字摩诘，开元九年进士及第，任太乐丞，历济州司仓参军、右拾遗、监察御史、库部郎中、给事中等，天宝十五年为安史乱军掳至洛阳，授给事中，乱平后在肃宗朝任太子中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给事中，官终尚书右丞，上元二年卒。传见《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新唐书》卷二〇二。诗文是王维弟王缙奉代宗之命編集，计诗六卷、文四卷，后来传本多有变动。其诗大多描写田园风光和山野情趣，其文也重文辞、少叙事，但一些碑志表状还能提供有用史料，如《裴仆射济州遗爱碑》叙及济州受洪水灾害之后筑堤防灾之事，《请回前任司职田粟施贫人粥状》可见职田授收及赈济工作。

版本 (1)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蜀刻《王摩诘文集》十卷本，其本已经窜乱，且多错讹，虽古实非佳刻。(2)《四部丛刊》影印元刻《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六卷本，无文。(3)1961年中华书局印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二十八卷，较善，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高常侍集》十卷 唐高适撰

高适字达夫，一字仲武，约生于长安元年，天宝八载举有道科，授封丘尉，后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下任左骁卫兵曹参军、掌书记，安史乱起，高适随哥舒翰镇潼关，拜左拾遗监察御史，潼关失陷，入朝任侍御史、谏议大夫，至德二载任淮南节度使，后贬太子少詹事，历任蜀州、彭州刺史，迁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还朝任刑部侍郎，官终左散骑常侍，永泰元年卒。传见《旧唐书》卷一一一、《新唐书》卷一四三。《旧唐书》传云“有文集二十卷”，《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同。宋以后只十卷本，计诗八卷、文二卷。其诗以反映边塞风情著名，可资考察开元、天宝时期的边防形势。如《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皮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可反映河北地区胡化状况；《贺斩逆贼徐知道表》提供了宝应元年四川徐知道叛乱情况，谓“逆贼前成都少尹兼侍御史、伪称成都尹兼御史中丞剑南节度徐知道，中官携养，莫知姓族，……杜塞剑道，拥遏朝经，部署凶残，统领州县，……臣与邛南邻境，左右叶心，积聚军粮，应接师旅，以今月二十三日大破贼众，同恶翻然，共杀知道”，可补史传不足。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明铜活字八卷本，无文。(2)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孙钦善《高适集校注》，诗、赋、文分别编年。

《颜鲁公文集》十五卷 唐颜真卿撰

颜真卿字清臣，开元中举进士，历任醴泉尉、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平原太守等职，肃宗朝历任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北采访招讨使、同州、蒲州、饶州、升州刺史、浙江西道节度使、刑部尚书、蓬州长史，代宗朝任利州刺史、户部侍郎、尚书左丞、硤州别驾、抚州、湖州长史、刑部尚书，德宗朝为太子少傅，出使李希烈处被杀害。传见《旧唐书》卷一二八、《新唐书》卷一五三。此集计诗一卷、文十四卷，有丰富之史料。如《与郭仆射书》议论鱼朝恩坐次过高，

以及对先前高力士、李辅国情况的追述,可补充两《唐书》宦官传不足;《吴兴地记》记唐朝湖州所管的乌程、长城、安吉诸县山川形势、名胜古迹,在乌程下还记乡里数和八到,而这些正是《元和郡县图志》所缺;《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记宋州官吏百姓为报答田神功灭刘展之功,在其患病期间各出钱设八关斋禳灾祈福,刺史徐向以俸钱三十万设八关大会饭千僧,长史苗藏实等设千五百人大会,副使孙琳等设五百人大会,百姓张烈等设五千人大会,可见唐代佛教斋会的规模;碑志中如《臧怀恪碑》记述了开元年间唐与北方民族的关系,《李光弼碑》、《鲜于仲通碑》等亦多有有用史料。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安国刻本。

《刘随州文集》十卷外集一卷 唐刘长卿撰

刘长卿字文房,河间人,约景龙三年生,开元二十一年举进士,天宝末任长洲尉,至德中摄海盐令,后贬南巴尉,大历中以检校祠部员外郎为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又贬为睦州司马,德宗朝擢为随州刺史,约贞元二年卒。存诗十卷,外集文一卷。其诗多表现士人情趣和个人感慨,反映现实之作甚少,但其赠答诗较多,题赠者多为因公务往来的官吏,故从诗题中可看到一些政治、军事活动,如《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勾当苗税充百官俸钱》、《行营酬吕侍御,时尚书问罪襄阳,军次汉东境土,侍御以州邻寇贼,复有水火,迫于征税,诗以见谕》、《送裴四判官赴河西军试》、《旅次丹阳郡遇康侍御宣慰召募兼别岑单父》等,对考证中唐史实自有裨益。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汤铤刻本。

《杜工部集》二十卷 唐杜甫撰

杜甫字子美,先天元年生,天宝末授左卫率府胄曹参军,至德二年奔凤翔谒肃宗,拜右拾遗,因为房琯事贬华州司功参军,上元二年至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大

馮心韋少府覓松樹子一首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盃一首

詣徐卿覓果栽一首

贈別何邕一首

贈別鄭鍊赴襄陽一首

重贈鄭絕句一首

杜工部集卷第十一

近體詩一百一十五首

此下本或都作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
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

色隔葉黃鸝空
好音

介處去映階隔葉一聯非此詩凡明而託意在其中

三顧頻繁

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

一作

身先死長使

历五年卒。传见《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新唐书》卷二〇一。《旧唐书》传云“有文集六十卷”,《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已散佚。今存北宋人所编二十卷,其中诗十八卷、文二卷。杜诗多反映现实,是人所共知的“诗史”,所记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军事、社会情况尤为珍贵,如《丽人行》描绘杨国忠兄妹炙手可热的权势和挥金如土的奢侈生活,《沙苑行》记沙苑牧监的情况,《留花门》反映了回纥兵对关中百姓的骚扰,“三吏”、“三别”记录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盐井》记录商贾自官井购盐倍价贩卖。文中如《东西两川说》和《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记述了西南边防和贡赋的情况,《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展示了乾元元年的战争形势,从所提议的攻守战略还可知其时能参战的兵力。

版本 (1)1957年商务印书馆《续古逸丛书》影印南宋刻本配影宋抄本,为最古、最善之本。(2)《四部丛刊》影印南宋建阳坊刻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二十五卷。(3)1958年中华书局印清钱谦益笺注本,题《钱注杜诗》,详于史事,最便治史者使用。

《岑嘉州诗》七卷 唐岑参撰

岑参,荆州江陵人,约生于开元三年,少时游于京洛、河朔,天宝三载举进士,任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八载随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赴安西充节度使府掌书记,十三载赴北庭,在封常清幕下充安西、北庭节度判官,肃宗朝历任右补阙、起居舍人、虢州长史,代宗大历初任嘉州刺史,大历五年卒。《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岑参集》十卷,今只存七卷本和四卷、八卷本。岑参与高适同以边塞诗闻名,从他众多的边塞诗中可了解西北边防的攻守形势和将帅文吏的生活,如《题铁门关楼》“铁关天西涯,极目少行客,关门一小吏,终日对石壁,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可知铁门关地势之险要,人烟之稀少,足补地志的疏略。还有很多送友人

出使赴任的诗,从诗题中也可考知人物、官职以及馆驿名目。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沈恩刻四卷本,不足,重印缩本《四部丛刊》(以原版四页拼一页的平装本)改用明正德熊相刻七卷本。(2)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五卷,前四卷编年。

《昼上人集》十卷 唐释皎然撰

皎然本姓谢,名昼,字清昼,吴兴长城人,谢灵运十世孙,中唐人,大历、贞元中与官吏士人频有交往,以诗著名一时,传见赞宁《大宋高僧传》卷二九。贞元八年湖州刺史于頔受集贤殿御书院之命编皎然禅师集得诗文五百四十六首,分为十卷,计诗八卷、文二卷。其诗疏淡清雅,可印证史实者不多。其文多为江南诸名寺高僧的碑塔铭,从中可知诸僧生平并涉及当时当地的州县行政长官。另外,卷首收录了令湖州编皎然集的敕牒,也是珍贵的文书。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影宋抄本。

《元次山集》十卷 唐元结撰

元结字次山,自号猗玕子、浪士、漫郎等,开元七年生,天宝十二载登进士第,肃宗乾元二年任右金吾兵曹参军,充山南东道节度参谋,在唐、邓、汝、蔡等州组织义军抗击史思明,因功升水部员外郎、荆南节度判官,代宗朝任道州刺史,大历三年任容管经略使,因母丧去职,大历七年卒。传见《新唐书》卷一四三。此集系后人重编,计诗三卷、文七卷。因元结在安史乱中任地方官,了解当时形势和民间疾苦,诗文中对此多有反映。如广德二年《奏免科率状》说“当州准敕及租庸等使征率钱物,都计一十三万六千三百八十八贯八百文,一十三万二千四百八十贯九百文,岭南西原贼未破州已前,三千九百七贯九百足,贼退后征率”;永泰二年《奏免科率状》说“当州奏永泰元年配供上都钱物,总一十三万二千六百三十三贯三

十五文,四万一千二十六贯四百九十九文,请据见在堪差科徵送,九万一千六百六贯五百四十六文配率,请放免”,都提供了道州每年的具体征税额,很有用处。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郭勋刻本。(2)1960年中华书局点校本,据《四部丛刊》本。

《毗陵集》二十卷 唐独孤及撰

独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阳人,开元十三年生,天宝十三载应道举,对策高第,授华阴尉,肃宗上元年间,江淮都统李峘辟为掌书记,代宗朝历任左拾遗、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吏部员外郎、濠州、舒州、常州刺史,大历十二年卒。传见《新唐书》卷一六二。此集是独孤及死后不久,由门人梁肃编录,计诗赋三卷、文十七卷。史料丰富,对研究肃、代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如《贺袁惨破贼表》记南方方清、陈庄起义及被平灭的经过,《谏表》揭露在京军将的暴行,《为杭州李使君论李藏用守杭州功表》和《为江淮都统使奏破刘展兵捷书表》透露刘展兵乱的细节,《答杨贲处士书》记舒州“据保簿数,百姓并浮寄户共有三万三千,比来应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余二万九千五百户蚕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钱以助王赋,……每岁三十一万贯之税悉锺于三千五百人之家,谓之高户者岁出千贯,其次九百、八百,其次七百、六百贯,以是为差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犹输四五十贯”,为赋税不均的最好例证,《吊道殣文》载“辛丑岁(肃宗上元二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亦啖其肉而弃其骸于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交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而两《唐书》竟失载。碑志中如《李遵墓志》记肃宗死后李遵贬谪的情况,是研究肃、代之际李辅国和张皇后夺权斗争的重要史料;《右金吾卫将军阎公墓志》则记述了以宦官代替三卫执扇登殿引蹕的经过,对研究唐代宫廷仪卫制度和宦官权

力的变化也有用处。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清乾隆赵怀玉刻本。

《钱考功集》十卷 唐钱起撰

钱起字仲文，吴兴人，约生于开元十年，天宝十载登进士第，任秘书省校书郎，乾元年间任蓝田尉，大历中任司勋员外郎中等职，是大历十才子之一。传附见《旧唐书》卷一六八钱徽传、《新唐书》卷二〇三卢纶传。其诗集《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作一卷，《郡斋读书志》袁本卷四上作二卷，今本十卷应是后人所分。其诗多为赠答应和之作，史料价值不高，只各诗题所叙人物、官职等尚可资利用。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本。

《韦苏州集》十卷 唐韦应物撰

韦应物，京兆长安人，约生于开元二十五年，十五岁即为三卫郎，侍卫玄宗，后入太学，永泰中任洛阳丞，因事弃官，大历末年任京兆府功曹，迁户县令、栎阳令，建中二年为尚书比部员外郎，后出任滁州刺史，转江州刺史，又入朝为左司郎中，贞元四年出任苏州刺史，约卒于贞元七年。诗集十卷系宋人编定，中多感慨时事、反映现实之作，如《广德中洛阳作》“饮药本攻病，毒肠翻自残，王师涉河洛，玉石俱不完”，抨击荼毒百姓的官军；《观田家》“仓廩无宿储，徭役犹未已”，记述农民之疾苦；《长安道》、《贵游行》等则讽刺权贵们奢侈豪华的生活。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华云刻本，改题《韦江州集》。

《孟东野诗集》十卷 唐孟郊撰

孟郊字东野，湖州安康人，生于天宝十年，贞元十二年登进士第，十六年为溧阳尉，后辞官，元和元年河南尹郑馀庆召为水陆转

韋蘇州集序

韋蘇州唐史不載其行事林寶姓纂系云周道遙公復之後左僕射扶陽公待價生司門郎中令儀令儀生變鑿生應物應物生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慶復李肇國史補云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詳其集中詩天寶時扈從遊幸疑為三衛永泰中任洛陽丞京兆府功曹大曆十四年自鄆縣令制除櫟陽令以疾辭歸善福精舍建中二年由前資除比部員外郎出為滁

运从事，试协律郎，九年郑出镇兴元，召为参谋，卒于赴任途中，友人私谥曰贞耀先生。传见《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七六。孟郊以诗闻名于贞元、元和中，与韩愈友好，当时以“孟诗韩笔”并称。今存诗集十卷是宋人所編集，其中颇有一些感叹时局、同情百姓之作，如《织女辞》“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机，如此织纨素，自着蓝缕衣，官家榜村路，更索载蚕树”，《伤春》“两河春草海水青，十年征战城郭腥，乱兵杀儿将女去，……千里无人旋风起”。另外，《长安旅情》“尽说青云路，有足皆可至，我马亦四蹄，出门似无地，玉京十二楼，嶷嶷依青翠，下有千朱门，何门荐孤士”，《再下第》“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登科后》“昔日齷齪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也反映士人科第得失的心情。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明弘治刻本。(2)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陆宣公翰苑集》二十二卷 唐陆贽撰

陆贽字敬輿，苏州嘉兴人，生于天宝十三载，十八岁登进士第，授华州郑县尉，又以书判拔萃授渭南主簿，德宗初年召为翰林学士，泾师兵变后随德宗避难奉天，起草诏敕，参与决策，人称“内相”，回京后任中书舍人，仍充学士，贞元七年为兵部侍郎，八年任宰相，十年罢相，十一年贬忠州别驾，顺宗朝卒，谥曰宣，故世称陆宣公。传见《旧唐书》卷一三九、《新唐书》卷一五七。《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著录其《翰苑集》十卷、《议论表疏集》十二卷，到宋代则合编成此集。前十卷为制诰，后十二卷为奏状，全是在德宗建中、兴元、贞元年间所写，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重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从制诰中可以看到许多朝廷不得不承认的弊政，以及为救弊而发布的政策，这些侵扰百姓的弊政有两税外科率差使、欠百姓和采价直、点召官健子弟（《贞元改元大

唐陸宣公翰苑集序

唐權德輿撰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
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
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
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
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
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旣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
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
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

陸宣公集序

一

赦制》)、和市和买(《冬至大礼大赦制》)、盐价太高(《议减盐价诏》)等。所谓救弊的政策诸如赦囚蠲免等,多属口惠,自不可尽信,但也有确能实施的,如贞元元年“令度支取江西、湖南见运到襄州米十五万石设法般运上都,以救百姓荒馑,如山路险阻,车乘难通,仍召贫人令其般运,以米充脚价”(《冬至大礼赦制》);以“江淮之间连岁丰稔”,“令制支于淮南、浙江东西等道量置场,加价和籴米三五十万石,差官般运,于诸道减价出粜”(《赈恤诸道将吏百姓等诏》);还有给京兆府和同州、华州百姓颁赐种子以备春播(《赐京畿及同华等州百姓种子赈给贫人诏》)。除了赦宥诏敕外,大量的除授官职的制敕,以及给少数民族政权的书信也很有价值。十二卷奏状多是纵论时局、献计划策,所提供史实更多。如《论关中事宜状》指出尽抽神策军和京西北诸藩镇东征的危险性,建议神策军退回关中,并停止税间架、榷酒、抽贯、贷商、点召士卒等扰民活动,这实际是讲出了泾师兵变的背景;《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叙二库建于开元,为天子私库,不归度支所管辖;《奉天论李晟所管兵马状》、《奉天奏李建徽、杨惠元两节度兵马状》分析李怀光和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之间的矛盾,反映朝廷对李怀光的看法和策略;《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谈到“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但因官吏侵刻过深,使“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分析边州军粮贫乏的原因,提出减少江南漕运,在江南受灾地区粜米,用所省脚价和粜米钱在关中及边地和籴充作军粮,并提供有关漕运制度和和籴的细节,如粮价、运费、漕运数量和各仓贮粮数量;《论缘边守备事宜状》历陈边防的种种弊端,如兵力分散,无统一指挥,边军镇兵、关东戍卒和神策军镇兵待遇不同,皇帝遥控而边将无主动权等,建议停止轮戍防秋制度,省其费用,资助移民戍边,在京西、京北、京东北设三个统管各镇兵马的元帅;《论度支令京兆府折税市草状》谈及京城每年需草数量、运草费用及草的估价;《均节赋税恤

百姓》六条从唐代赋税制度演变说到两税的诸弊端,提出拯弊之策。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重印缩本《四部丛刊》改用南宋刻本。

《寒山子诗(附丰干拾得诗)》一卷 唐释寒山子、丰干、拾得撰

此集前有台州刺史闾丘胤序,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考知胤刺台州在唐贞观时,而赞宁《大宋高僧传》卷一九封干(即丰干)传谓丰干于玄宗“先天年中在京兆行化”,又同书卷一一灵祐传谓祐“入天台,遇寒山子于途中,……祐旋造国清时,遇异人拾得”,《辨证》考知其时当是德宗贞元九年,足证闾丘胤序是后来伪撰。封干本是天台国清寺僧,寒山子、拾得则在僧人和隐士之间,因隐居天台山,所以凑到一起。寒山子诗今存最足的南宋浙刻本有三百十三首,据说写在树叶和村野人家屋壁上,后来抄录成卷,其中当然难免有伪作混杂。所附丰干诗二首则《辨证》已定为伪作。至拾得诗五十三首,在三十九首下注“下五首与前长偈语句同”,四十四首下注“此下寒山诗大同小异语意相涉”,则也应有伪作混杂。这些诗的风格内容大体近于王梵志的作品,从中也可窥见世俗思想和社会情态。如反映选举之弊的“书刺全非弱,嫌身不得官,铨曹被拗折,洗垢觅疮瘢,必也关天命,今冬更诚看,盲儿射雀目,偶中亦非难”;揭露借佛门营私的“语你出家辈,何名为出家,奢华求养活,继缀族姓家,美舌甜唇嘴,谄曲心钩加,……只为爱钱财,心中不脱洒”;描写穷人告贷艰难的“新谷尚未熟,旧谷今已无,就贷一斗许,门外立踟蹰,夫出教问妇,妇出遣问夫,怪惜不救乏,财多为累愚”;形容贫士参加科举窘状的“个是何措大,时来省南院,年可三十余,曾经四五选,囊里无青蚨,篋中有黄绢,行到食店前,不敢暂回面”,均不无可参考之处。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朝鲜旧刻本,附南宋释慈受诗一百

五十八首,较旧本又有窜乱脱漏。重印缩本《四部丛刊》改用民国十三年周暹影南宋刻本,存旧本面目。

《权载之文集》五十卷 唐权德舆撰

权德舆字载之,秦州略阳人,生于乾元二年,代宗大历年间为诸节度幕府从事,贞元初徵为太常博士,转左补阙,迁起居舍人兼知制诰,又迁中书舍人,贞元十八年升礼部侍郎,宪宗朝历任兵、吏部侍郎、太常卿,元和五年升宰相,八年罢相,出为东都留守,十一年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十三年卒。传见《旧唐书》卷一四八、《新唐书》卷一六五。《旧唐书》传云“有文集五十卷”,则今所传五十卷是足本。集有杨嗣复序,谓权德舆专掌制诰七年,还自编《制集》五十卷,惜已失传。此集是除了制诰以外的其他诗文,计诗十卷、文四十卷,是研究中唐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碑志十五卷史料价值最高,如《伊慎碑》谓“建中初,德宗训齐万方,端正百度,以梁崇义负阻江汉,未尝会朝,诏东诸侯分道问罪,公实领江西偏师而统于希烈,希烈以牒书署公汉南汉北兵马使,公明智牢让,独率所领兵大破翟暉于蛮水,俘徒三万,以至于斩崇义、平江汉,厥功居多。……兴元巡狩之岁,使臣底贡,次于蕲口,时希烈已屠陷大梁,遣其腹心杜少诚引劲兵绝江流,公以行师七千列树三栅,败之于黄岗,少诚遁走,斩骁将许少华,封其尸为万人冢,进围安州城”云云,即较两《唐书》所记详尽;又如《右神策中尉孙荣义碑》谓“贞元十七年充右神策护军中尉判官,才浹辰迁内常侍充副使,越翌日兼右卫功德副使,十九年拜右骁卫将军充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右街功德使,明年有诏知内侍省事”,可考知两《唐书》所失记的神策军系统官职。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清嘉庆朱珪刻五十卷足本。

《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唐韩愈撰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人,郡望昌黎,生于大历三年,贞元八年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一

晦庵朱先生考異

留畊王先生

留畊王先生

宋荅公云馮章靖親校舊每卷首具列卷中篇目馮悉以朱墨滅殺之惟存其都凡集外別有目錄一卷今按李漢所作序云摠七百首并目錄合四十一卷則正與馮合

賦

感二鳥賦并序

貞元十一年

歸感所賦二鳥而賦之時宰相趙憬嘗就盧萬也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

潼

關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

見行有籠白鳥白鸚鵡而西者號於道曰某士之守

使使疏吏者進於天子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

十四、書、卷五十五、典、五、四、水

登进士第,始为宣武军节度府观察推官,累迁四门博士、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贬为阳山令,顺宗朝任江陵法曹参军,宪宗朝历任国子博士、河南令、职方员外郎、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督师讨淮西,愈为行军司马,乱平迁刑部侍郎,十四年贬为潮州刺史,此后历袁州刺史、国子祭酒、兵部侍郎、京兆尹、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卒,谥曰文。传见《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七六。其诗文由门人李汉编四十卷,计诗十卷、文三十卷,宋人又辑包括《顺宗实录》在内的外集十卷。韩愈是唐代的大文学家兼政治思想家,文集中除《原道》、《原毁》等政治大文章,以及记张巡、许远遗事的《张中丞传后序》等脍炙人口的名作外,有些不为人们注意的文章也多含有史料,如《送水陆运使侍御归所治序》记振武军屯田的情况,《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叙在袁州刺史任上检得七百三十个沦为奴婢的良人,《董家贼事宜状》反映了朝廷用兵南蛮的困难,《论变法事宜状》批驳张平叔改变盐法的建议。凡此均甚可珍贵。至于碑志部分之可补史传,自更不待言。

版本 除《顺宗实录》条下已列举者外,尚有:(1)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版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八卷外集二卷,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有文无诗。(2)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版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十二卷,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修订本。

《张籍诗集》八卷 唐张籍撰

张籍字文昌,和州乌江人,约生于大历三年,贞元十五年登进士第,授太常太祝,元和十一年任国子助教,迁秘书郎,长庆元年为国子博士,次年迁水部员外郎,升主客郎中,大和二年为国子司业。传见《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七六。南唐张洎辑其诗四百余首,编为《木铎集》十二卷,已亡。今本是明人所编。诗中以乐府最为有名,多揭露社会问题。如《贾客乐》描述南方商贾用船贩

运可以“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而“农夫税多长辛苦”,《野老歌》也说“老翁家贫山下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依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筑城词》描写农民服徭役的痛苦,《山头鹿》反映农民因纳税不足而遭受官府迫害,《董逃行》记述战乱中人民之流离失所,《废宅行》和《洛阳行》描述了战乱对都城的破坏,《西州》、《陇头实》、《塞上曲》等描写了中唐以后西北边防的危机。另外还有许多描写长安城居生活的诗篇,如《和长安郭明府与友人县中会饮》“好在街西水县中”,《酬秘书王丞见寄》“街西借宅多临水”,《九华观看花》“街西无数闲游处”,《晚春过崔附马东园》“闲园多好风,不意在街东”等,对了解城居风光也有用处。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蒋孝刻《中唐十二家诗》本。
(2)1959年中华书局版《张籍诗集》。

《刘梦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唐刘禹锡撰

刘禹锡字梦得,大历七年生,贞元九年登进士第,任淮南节度使杜佑记室,随杜佑入朝任监察御史,顺宗朝迁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宪宗即位贬朗州司马,元和十年后历任连州、夔州、和州、苏州、汝州、同州刺史,文宗开成年间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会昌二年卒。传见《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六八。《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其文集四十卷,至宋初佚十卷,宋人又编其遗文为补集十卷,总计诗词歌赋十九卷、文二十一卷,均有史料价值。如《苏州谢赈贷》记因苏州遇灾,“敕苏州宣赐米一十二万石,委刺史据户均给”;任同州刺史时所撰《谢恩赐粟麦》云“以臣当州连年歉旱,特放开成年夏青苗钱并赐斛斗六万石,仰长吏逐急济用”,均是当时政府的赈灾措施;《观市》记元和三年沅南因不雨迁于城门之逵,当日市场贸易依然繁忙如常,可知当时当地的经济状况;《奏记丞相府论学事》谈到贞观以来学校的发展和经费;《国

学新修五经壁记》讲大历时在国学论堂东西厢墙壁书写五经,六十年后又用木板嵌于墙上重新书写,足见文宗开成时刻石经自有渊源;《和州刺史厅壁》记和州的历史沿革、户数、土贡、山水、名胜、可补《元和郡县图志》;《高陵令刘君遗爱碑》记高陵县令刘仁师整顿白渠水利,修建新堰,《福州刺史薛公碑》记述了贞元年间京兆水运使主持向北疆运粮事宜,均可补两《唐书》食货志。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民国二年董康影印南宋刻本。

《吕和叔文集》十卷 唐吕温撰

吕温字和叔,一字化光,河中人,生于大历七年,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又登宏词科,为王叔文引用,授左拾遗,贞元二十年出使吐蕃,元和元年归,任户部员外郎,又转司封员外郎,迁刑部郎中,元和三年贬为道州刺史;元和五年改任衡州刺史,次年卒。传附见《旧唐书》卷一三七、《新唐书》卷一六〇吕渭传。《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吕温集》十卷,今本诗赋二卷、文八卷。其诗文反映中唐时事甚多,有较高史料价值。如《吐蕃答退浑》诗注说“退浑部落尽在而为吐蕃所鞭挞,有译者诉情于予,因而答之”;《道州律令要录序》说“某顷累忝官尚书省、御史台,遍观诸曹,多书令式格律于其屋壁”;《代都监使奏吐蕃事宜状》告出使吐蕃的行程、活动和吐蕃方面的接待方式;《代郑相公求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记《大唐六典》和《开元新礼》撰成之后,“只令宣示中外”,“未有明诏施行”,虽“先朝所制,郁而未用”;《三受降城碑》叙三受降城始建之事,凡此均可资考证。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清述古堂抄本。

《李文公集》十八卷 唐李翱撰

李翱字习之,生于大历七年,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三迁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元和初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元和十五

年任考功员外郎兼史职,后历朗州刺史、礼部郎中、庐州刺史,大和三年任中书舍人,又出任郑、桂、潭等州刺史,检校户部尚书、山南东道节度使,会昌元年卒,谥曰文。传见《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七七。李氏是韩愈侄婿,又是韩门大弟子,此集卷一赋,卷二以下各体文,多重事实,少浮饰,史料价值较高。如《进士策问第一道》反映了两税法的流弊和土地兼并情况;《疏决进献》揭发各地官吏“有作官店以居商贾者,有酿酒而官沽者”;《百官行状奏》指摘“今之作行状者非其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徐申行状》记叙状主任韶州刺史时召百姓种公田,积粟兴建州城,“韶之人户仅七千,凡六年迁合州,其去也,倍其初之数,又盈四千户焉”,又任邕管经略使时,“大首领黄氏帅其属纳资供赋。黄氏、周氏、韦氏、依氏皆群盗也,黄氏之族最强,盘亘十数州,周、韦氏之不附之也,率群黄之兵以攻之而逐诸海,黄氏即至,群盗皆服,于是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蛮宁息无寇害”;《卢坦传》记郑滑节度姚南仲和监军使薛盈的矛盾,代北水运使薛蹇和韩重华营田畜马的功绩,以及卢坦任东川节度使时“绵、剑二州有通文成州路,每岁奏发二千兵以防西蕃,其实不过一二百人,坦乃奏,于冲地置戍镇之”;《柏良器碑》记碑主贞元二年以平淮西功任左神策军将军,八年迁大将军,“士卒之在市贩者悉挥斥去,募勇者代之,故为所监者不悦。明年,公之故人有犯禁宿于望仙门者,卫使奏言,遂转右领军卫大将军,所监者乃用其衙将魏循代为将军,自是军中之政不复在于将军”,是神策军权力演变的重要史料;《卢士琼墓志》揭露了司录参军侵刻下属的恶习;《来南录》是出行南方旅途记录,保存不少水陆交通的情状。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冯师虞刻本。

《柳宗元集》四十三卷别集二卷外集二卷 唐柳宗元撰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大历八年生,贞元九年登进士第,十二

河東先生集卷第一

雅詩歌曲

獻平淮夷雅表一首

按詩宣王能興
亂命召公

平淮夷注云淮夷東國在淮浦
而夷行也元和十二年十月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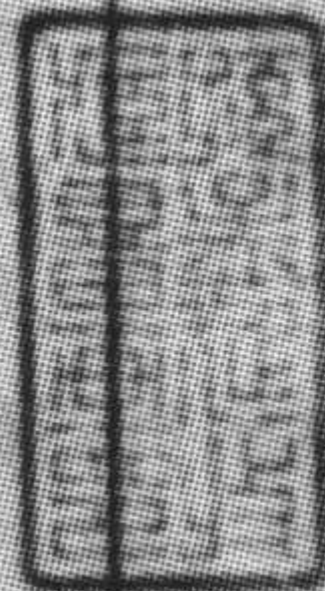
酉平吳元濟在淮蔡故曰淮夷
蓋公擬江漢之詩而作也與韓

文公平淮西碑同時作先儒穆
伯長云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

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制述如
經能萃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

談數云論柳文者皆以謂封建
論退之所無淮西雅韓文不逮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



年登博学宏词科,始为校书郎,转蓝田县尉,十九年迁监察御史里行,顺宗朝升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迁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卒。传见《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一六八。柳氏是大文学家,其诗文由刘禹锡编集成四十五卷,《旧唐书》传作四十卷,《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作三十卷,宋以后为四十三卷,并增《别集》、《外集》,其中诗赋四卷,余为各体文。其文有较丰富之史料,如《段太尉逸事状》记郭子仪所部在邠州祸害百姓的事实,以及泾州大将占田逼租的罪行;《先君表阴先友记》所记先友六十七人的名字、官职、性格和才能,可补史传;《武功铭》记柳公绰任湖南观察使平定蛮酋张伯靖事,也为本传所失载;《监察使壁记》、《四门助教厅壁记》、《武功县丞厅壁记》、《馆驿使记》、《邠宁进奏院记》等叙述这些职官的建置和职责,是研究官制的有用资料,《馆驿使记》还讲了关中的交通大道和驿站系统。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元建阳坊刻本《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2)1960年中华书局版《柳河东集》,据民国蟬隐庐影印南宋世綵堂刻《河东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本,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3)1979年中华书局版《柳宗元集》。

《欧阳行周文集》十卷 唐欧阳詹撰

欧阳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贞元八年与韩愈、李绛等同登进士第,十五年任国子监四门助教,享年四十余。传见《新唐书》卷二〇三。《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欧阳詹集》十卷,当即今所传之本,计赋一卷、诗二卷、文七卷。诗文多作于贞元年间,可提供此时期政治制度史料。如《右街副使厅壁记》记贞元八年长安右街副使的选拔过程,由此可知街使只是兼官,其职事全由副使承当;《同州韩城县西尉厅记》述唐县制的等级、各级县的数量,各级中名列最先的县以及任各级官的资格、县官的僚属职掌;《唐天志》记贞元七年在职的几个大臣及任官时间;《与郑伯义书》列述唐朝

人仕途经,“读往载、究前言则曰明经,属以词、赋以事则曰进士,中夫程度者,取政事最轻小者命以始。又令公侯子孙、卿大夫子弟能力役供给者曰千牛、进马、三卫、斋郎,限以年月,终亦试之,其有成则陟。……进士出身十年、二十年而终于一官者有之,明经诸色人仕,须臾而践卿相者有之”;《上郑相公书》记四门助教、太学助教、国子助教的任职资格;《鲁山令李胄三月三日宴僚吏序》记贞元年间朝廷规定的三节是二月一日中和节、三月三日禊饮节、九月九日重阳节,凡此均甚有用处。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刻本。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 唐白居易撰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大历七年生,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历任盩厔尉、翰林学士、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左赞善大夫、江州司马、忠州刺史、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造等职,长庆年间任中书舍人、杭州刺史、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中任苏州刺史,文宗朝任秘书监、刑部侍郎、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河南尹、同州刺史,会昌中以刑部尚书致仕,大中元年卒。传见《旧唐书》卷一六六、《新唐书》卷一一九。《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宋以后或曰《白氏文集》,或仍曰《长庆集》,止七十一卷。白居易历官中外,身经七朝,所撰诗文数量极多,多数有史料价值。如讽谕诗中《宿紫阁山北村》指斥神策军士仗恃恩宠以采造为名抢掠民财,《采地黄者》写农民采集地黄卖与富家喂马而换得残粟充饥,《村民苦寒》写农民雪天里无衣被御寒而烧蒿棘取暖,《纳粟》写官吏催纳税粮而迫使农民连夜张灯扬场,《秦中吟》十首中《重赋》写两税外又提征杂税以所谓“羨余”进贡皇帝,《不致仕》写朝官八九十岁仍念恋权势不愿致仕告退,《立碑》写无德无行之人立碑以事夸饰,《轻肥》写高品宦官养尊处优骄横一时,《赠友》诗五首也列数两税征钱加重农民负

白樂天文集卷之十一

浙東觀察使元稹微之纂集
太保武定侯鳳陽郭勛重編

奏狀

論孫疇張奉國狀

孫疇

右伏以鳳翔右輔之地控壓隴蜀又近國門最為重
鎮承前已來多擇有功勳德望者為之節使昨者孫
疇忽除此官臣緣素未諳知不敢輕議可否及制下

担,京兆尹颇繁更换政策不能一贯,以及因社会动荡而延误民间婚嫁等弊端,《新乐府》五十首中《新丰断臂翁》写农民自残肢体以避兵役,《缚戎人》讲唐廷将所虏蕃口徙送江南,《杜陵叟》讲百姓虚受朝廷蠲免,《卖炭翁》讲长安宫市强取豪夺,《阴山道》讲以绢帛市易回纥马之劳民伤财,《盐商妇》讲盐商不属州县而获利甚多。此外,闲适诗中谈到任校书郎和户曹的俸禄,以及比较具体的生活状况,如居室、仆役、交往等,也可资了解仕宦情态。文章中中书制诰多是委任官职文书,可找到不少史志不载的职官和机构,如各地盐铁转运巡院之类,翰林制诏可考知国家军政。又如《襄州别驾府君事状》谈到徐州的反叛和归顺,《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一道》论述中唐以来的社会矛盾,并探讨其根源和对策,《论和籾状》列陈和籾对百姓的骚扰,《论太原事状》述宦官刘贞亮任汴州监军时自置亲兵数千,任三川都监时专杀李康两节使等事,《论行营状》论元和初讨伐镇州事,谈及兵力配置和军需供应,《策林》七十五篇是元和初为应制举所拟策文,论及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也都有史料价值。

版本 (1)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南宋绍兴刻本《白氏文集》,改题《白氏长庆集》。(2)《四部丛刊》影印日本元和(明万历时)那波道圆活字本《白氏文集》,惜删落原注。(3)1954年北京文学古籍出版社版《白香山集》,实据《四部丛刊》本。(4)1979年中华书局点校本《白居易集》,据影印南宋绍兴刻本。

《元氏长庆集》六十卷 唐元稹撰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大历十四年生,贞元八年明经及第,十八年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历任右拾遗、河南尉、监察御史、江陵府士曹参军、虢州长史、膳部员外郎,穆宗朝任祠部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承旨学士,长庆二年任宰相,后出为同州刺史、浙东观察使,文宗大和三年入朝为尚书左丞,次年出为武昌军节度

使,大和五年卒。传见《旧唐书》卷一六六、《新唐书》卷一七四。《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又小集十卷,到宋代残存六十卷,明万历马元调刻本辑佚文编为补遗六卷。集中史料价值较高的是卷三二至三九的奏、表、状。《叙奏》记录了元和年间任御史时所奏所移的各种不法事件,有:东都百司皆设牢狱,有裁接吏械人逾岁而台府不得而知之者;浙西观察使封杖决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诬奏书生尹太阶请死之;飞龙使诱赵实家逃奴为养人;田季安盗取洛阳衣冠女;汴州没人死商钱且千万;滑州赋于民以千、授于人以八百;朝廷馈东师,主计者误命牛车四千三十乘飞鸟越太行,这些均为史传所不载。《钱货议状》是皇帝召百僚讨论革除货轻钱重、征税暗加的弊政时元稹提出的意见,认为自“元和以来,初有公私器用禁铜之令,次有交易钱帛兼行之法,近有税钱不得过数之限,每更守尹则必有用钱加除之榜”,但“行之不至”,毫无效果,藩镇节将和度支转运使大肆征敛,又是革除积弊的障碍,此状还谈到各地不同的交易手段,“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以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峡大抵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这些都是研究唐代经济、财政的重要史料。《中书省议赋税及铸钱等状》亦提供不少财政经济史料,《中书省议举县令状》透露一些选举、考课的情况,《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和《弹奏山南西道两税外草状》检举大批地方官于两税外征收百姓钱粮禾草的违法行为,文中列出了大量的数据可窥见两税法施行的真实情况,《论转牒事》谈及馆驿制度的规定和实际应用情况,《同州奏均田状》反映了百姓不堪承受的赋税徭役负担,《论当州朝邑等四县代纳夏阳韩城两县率钱状》列具了一些州县的征税数额。此外,集中还有大量的制诰、碑志、行状和序记,可供研究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之用。

版本 (1)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明弘治杨循吉影宋抄本。(2)《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董氏刻本,附校记。(3)1982年中

华书局点校本《元稹集》，据影宋抄本，又增辑明人补遗六卷为外集八卷。

《皇甫持正文集》六卷 唐皇甫湜撰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元和元年登进士第，任陆浑尉，迁工部郎中，求分司东都，东都留守裴度召为判官。传附《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皇甫湜集》三卷，今传宋本六卷。皇甫湜是韩愈门下的古文作家，其中《制策》全面评议时政，指出在中央是宦官弄权，“今宰相之进见亦有数侍从之臣，……未知为陛下出纳喉舌者为谁乎，为陛下爪牙者为谁乎？日夕侍从，扈从游豫，论臣下之是非、赏惩之臧否者复何人也？……夫裔夷云残之微、偏狭之徒、皂隶之职，岂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乎？此壮夫义士所以寒心销志，泣愤而不能已也”；在地方上是专擅赏罚，“伏见兵兴已来，开权宜之道，行苟且之政，台省之官、王公之爵溢于州郡，遍于舆台，将帅之臣借绯紫于使令，定官员而奏请，名器轻于土芥，操柄擅于爪牙，……州县之断狱，月以千数，连年累纪，未闻有一疑狱而决于朝者，未闻有屈人而诉于阙者，岂天下长吏如皋陶哉？律令格式具而不遵，乡县州府各自为制，所怒则专杀为常，臆断则自生愚意”；社会问题则是赋税不均、尤困农民，“商乘坚而厌肥，工执轻而仰给，兵横行而厚禄，僧道无为而取资，劳苦顿悴，终岁矻矻，殍刑死而为农者亦愚亦少矣，况乎两税不均，失变通救弊之法，百端横赋随长吏自为之政乎”；官场上则多因循苟且，“今职备而不举，法具而不行，谏诤之臣备员，不闻直声，殚察之臣塞路，未尝直指，公卿大夫则偷合苟容，持禄养交，为亲戚计迁除领簿籍而已，兴利之臣专以聚敛计数为务，共理之吏专以附上剥下为功，习而为常，渐以成俗”；至于朝廷拯救时弊的种种措施则实属口惠，“臣伏见赦令节文周备纤悉，空文虚声，溢于视听，如实功惠未有分寸及于苍生”，凡

此可谓中唐时局的忠实写照。此外,厅壁记和碑志也颇存史料,如《吉州庐陵县厅壁记》记此县“户余二万”,《韩文公神道碑》及《墓铭》所述可参订史籍。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宋蜀刻本。

《沈下贤文集》十二卷 唐沈亚子撰

沈亚子字下贤,吴兴人,生于建中二年,元和十年登进士第,任泾原节度使掌书记,入朝为秘书正字,长庆初补栎阳尉,四年迁福建团练副使,累迁殿中侍御史,为沧德宣慰使柏耆判官,大和三年改南康尉,官终郢州椽。事迹见《旧唐书》卷一五四、《新唐书》卷一七五柏耆传。《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沈亚之集》九卷,今本十二卷,卷一诗赋,余悉文,极多史料。其中《杂记》记沂州境内的著名淫祠及附近山川地形;《夏平》记平灭夏州杨琳叛乱时尽杀胁从、奴其家眷,致民有积怨,后李愿至始尽复为良人,又能缓和与党项的矛盾;《旌平卢等节士》记平卢军郭航等为唐军暗送消息以平李师道的义举;《万胜岗新城录》记元和十年秦州刺史李文通上任之始安定民心,又巧役官兵在霍丘西南临吴元济界处筑新城,成为御敌进攻的堡垒,并记叙了李文通与吴元济的一些战斗;《魏滑分河录》记元和九年为避免黄河泛滥冲毁南岸滑州,而在北岸黎阳西南凿堤分流,淹田七百顷;《学解嘲对》列陈漕运之弊并提出救弊策略,其中透露了漕运的一些情况,如沿途官署官吏的配置、岁漕运量、漕运费用,及因漕运而获罪的人数等;《寿州团练副使厅壁记》叙寿州地形及战略地位;《盩厔县丞厅记》叙本县地理、风俗、居民,可知此地有不少江南、四川移民,以及神策屯兵、工商杂业,还有太子家田和竹园,大户隐匿,号为难治;《淮南都梁山仓记》叙每年四至七月农事用水,则漕船不得行,船至干裂,元和九年李稼为盐铁官,建仓储粮,调节漕运,颇见成效,并及此仓在供军、防灾中的作用;《杭州场壁记》记

盐铁杭州场每岁收入及重要地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谓“今吏部之补吏，岁调官千余，其试以偶文俚语之书，程以二百字为准，考之能否以定取舍，直使其人真能，然何以补，况十九皆伪人手，以是而求其实不可得也”；《泾原节度使李常侍墓志》叙及泾原军士竟因缺粮无食而鬻卖子女；《柳晟行状》记汉中三千戍卒作乱之事，凡此均可备采择。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明万历刻本。

《李文饶文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 唐李德裕撰

李德裕字文饶，赵郡人，贞元三年生，以父荫补校书郎，元和中历任诸府从事，十四年任监察御史，穆宗朝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御史中丞、浙西观察使，文宗朝任兵部侍郎、郑滑节度使、剑南西川节度使，大和七年任宰相，次年出为镇海节度使，又任袁州长史、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武宗朝又入相六年，官至太尉，封卫国公，宣宗朝贬为崖州司户，大中四年卒。传见《旧唐书》卷一七四、《新唐书》卷一八〇。《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所撰《会昌一品集》二十卷、《姑臧集》五卷、《穷愁志》三卷、《杂赋》二卷，今传本有文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李德裕在文宗、武宗朝两度为相，特别是在会昌年间秉持大政，文集所存多涉及许多重要的政治、军事、外交大事，是研究文、武两朝历史的重要文献。其中文集多是会昌年间撰写的制敕、表状、论议、书册，以有关讨伐泽潞刘稹的居多，可以看到朝廷对各路军将领的指令和战役进行的过程。反映当时唐朝和周边民族关系的史料也甚丰富，如唐与回鹘关系的文书就有《讨回鹘制》、《安抚回鹘制》、《授某官为招抚回鹘使制》、《论回鹘事宜状》、《论回鹘石诚直状》、《讨袭回鹘事宜状》、《殄灭回鹘情宜状》等。在其他书信、议论事宜状中还反映了唐与吐蕃、黠戛斯、党项的关系。文宗朝吐蕃维州城副使悉怛谋降唐，朝廷却令送还吐蕃，德裕对此处理极为不满，在奏状中详述维州得失

的本末和利害。在奉敕修撰的《与黠戛斯可汗书》后附有两个进书状,从中可了解唐代草撰公文的程序。别集中有三卷为注、状、碑、赞,七卷为诗赋,较重要的史料有《马存亮神道碑》和《神弘规神道碑》,这二人在穆宗和敬宗朝相继担任左神策军中尉,碑文中谈到神策军的数字。外集四卷都是论,《奇才论》驳斥李训为奇才的说法,《近幸论》则否定了李训的谋划,对研究“甘露之变”有参考价值。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

《张承吉文集》十卷 唐张祜撰

张祜字承吉,生于贞元初,宪宗朝曾受令狐楚举荐,因元稹作梗未能入任,后干谒各节镇,卒于宣宗大中年间。《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张祜诗》一卷,今传宋蜀刻本有十卷,收诗四百六十八首。其诗亦能反映一些社会状貌,如《千秋乐》、《热戏乐》、《上巳乐》等表现了都市节日的伎乐活动和宫廷生活。

版本 (1)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蜀刻本。(2)1983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点校本。

《贾浪仙长江集》十卷 唐贾岛撰

贾岛字浪仙,一作阆仙,自称碣石山人,范阳人,初为僧,法名无本,还俗后屡举进士不第,后入仕,文宗时贬为长江县主簿,会昌三年以普州司仓参军迁司户参军,未任职即卒。传附见《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所撰《长江集》十卷、《小集》三卷、《诗格》一卷,今只传《长江集》。贾岛是著名的苦吟诗人,作诗注重词句锻炼,刻意求工,多写枯寂荒凉的自然景色和个人感受,史料价值不高。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明覆宋刻本。(2)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李嘉言《长江集新校》。

《李贺歌诗编》四卷集外诗一卷 唐李贺撰

李贺字长吉，福昌人，宗室郑王之后，生于贞元六年，因父名晋肃未能举进士，补太常寺协律郎，二十余岁即卒。传见《旧唐书》卷一三七、《新唐书》卷二〇三。其诗亦有一些针砭时弊、反映民间疾苦的内容，如《吕将军》、《感讽六首》之三讥讽宦官统兵，《秦宫诗》、《荣华乐》指斥贵族的奢侈，《黄家洞》揭露官军残杀南方土著，《感讽五首》之一展示了官吏催赋的场面，均可资参考。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蒙古赵衍刻本，《集外诗》配宋刻本。(2)1959年中华书局版《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汇印清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清姚文燮《昌谷集注》和清方扶南评注，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名《李贺诗歌集注》。(3)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叶葱奇疏注本《李贺诗集》，多据王琦《汇解》。

《玉川子诗集》二卷外集一卷 唐卢仝撰

卢仝自号玉川子，济源人，与韩愈、孟郊等友善，不仕，大和九年“甘露事变”中因留宿宰相王涯家而遭屠戮。传附见《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诗集一卷，今传本为二卷又外集一卷。其诗虽未记时事，但有影射政治和揭露社会黑暗面之作，如“尝为《月蚀诗》讥切元和逆党”（《新唐书》本传），《走笔谢孟谏议新茶》说“百万亿苍生命坠在巅崖受辛苦”，《冬行三首》诉说其赁买住宅之艰难。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旧抄本。

《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 唐杜牧撰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杜佑之孙，生于贞元十九年，大和二年登进士第，授宏文馆校书郎，历任江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从事，九年入朝为监察御史，又分司东都，后历任宣州团练判官、左补阙、史馆修撰、膳部员外郎，会昌二年以后任黄、池、睦、湖诸州刺史，大

李長吉歌詩卷之一

錢塘 王琦琢崖彙解

思謙蘊山較

李憑箏篋引

君王聽樂梨園暖翻到雲門第幾聲又曰花咽
 嬌鶯玉嗽泉名高半在御筵前漢王子工彈箏
 樂從造新聲墜九天李憑蓋梨園弟子工彈箏
 篋者也舊唐書箏篋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
 以祠太乙或云侯輝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
 坎侯聲訛為箏篋或謂師延靡坎坎樂非也舊
 說依琴制今按箏篋胡樂也漢靈帝好之撥彈之
 如琵琶通典登箏篋抱於懷中用兩手齊奏俗
 謂之擘箏篋按箏篋之器不一有大箏篋小箏
 篋豎箏篋隊箏篋鳳首箏篋數種觀詩中
 二十三絲一語知憑所彈者乃豎箏篋也

清乾隆王氏寶笏樓刻本《李長吉歌詩》

中年间入朝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官终中书舍人，大中七年卒。传见《旧唐书》卷一四七、《新唐书》卷一六六。其诗文由其甥裴延翰编成集，计诗赋四卷、文十六卷，均有论议时政、记述史实处，对研究文、武、宣三朝历史很有用处，如《李甘》诗记大和九年传言郑注欲登相位，侍御史李甘扬言要当众撕毁诏书而因此被贬之事。政论文中《罪言》分析河北藩镇长期割据的原因，提出上策为自治，即加强朝廷的治理，不去触动藩镇，中策是取魏，下策是浪战；《原十六卫》探讨府兵制崩溃的原因和危害；《战论》分析战略形势、将全国分为几个战略地区，一是割据如何北藩镇，二是抵抗河北藩镇的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六郡，三是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至海、西至洛阳地区，专以财力供应六郡，四是京西北兵镇和吴、越、荆、楚地区；《守论》反驳了对河北藩镇的叛乱实行姑息的意见。传记、杂文中《燕将录》记幽州军将谭忠忠于朝廷，使幽州、魏博讨伐成德，并诱导幽州归顺朝廷的事迹；《张保皋郑年传》中透露“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碑志中《韦丹碑》、《牛僧儒志》、《周墀志》、《歧阳公主志》、《韦温志》等多富史料，而《卢秀才志》记载中唐以后河朔三镇的文化风尚与中原的差异，尝为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引用。序记中《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记述武宗灭佛的情况，《同州澄城县户工仓尉厅壁记》描述澄城县的自然地理、经济状况及京畿地区神策两军和内诸司奴役百姓勒取民财的行为，《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记述淮南道形势、兵力及节度使和监军的地位。书中《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建议对泽潞用兵并追述了泽潞的历史和地形，《上李太尉论江贼书》述江南盗贼抢劫商船、草市并以赃贩茶，《上盐铁裴侍郎书》记述撤消盐铁转运使江淮留后一职后，诸盐铁监肆虐，致“土盐商不胜其苦”，并请求重置留后，《与汴州从事书》讲到州县征发徭役。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覆宋本。(2)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3)1962年中华书局版清冯集梧《樊川诗集注》，

樊川文集序

將仕郎守京兆府藍田縣尉充集賢殿校理
裴延翰撰

長安南下杜樊鄉鄜元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
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馬上五年冬仲舅
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奉錢扃
治其墅出中書直丞召昵密往游其地一旦談
啜酒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
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委於此得官受奉再治
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姚少监诗集》十卷 唐姚合撰

姚合，陕州硤石人，姚崇曾孙，元和十一年登进士第，授武功县主簿，又为富平、万年县尉，宝历中任监察御史，迁户部员外郎，出任金州、杭州刺史，又入朝任刑部郎中、户部郎中、谏议大夫、给事中，开成四年任陕虢观察使，位终秘书少监。传附见《旧唐书》卷九六、《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姚合诗集》十卷，今存。诗多闲适，间有反映社会现状的，如《庄居野行》“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官家不税商，税衣服作苦，居人尽东西，道路侵陇亩，采玉上山巅，探珠入水府，边兵索衣食，此物同泥土”，可见弃农经商的情状。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明抄配毛晋抄本。

《李义山诗集》三卷

《李义山文集》五卷、

《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 唐李商隐撰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人，大和三年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召为巡官，开成二年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会昌二年以书判拔萃，赴泾原节度王茂元幕任掌书记，大中元年为桂管观察使郑亚掌书记，后历任盩厔尉、武宁军节度判官、太学博士、东川节度判官等职。传见《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新唐书》卷二〇三。《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李商隐《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谿生诗》三卷，又赋一卷、文一卷。今存诗三卷，《樊南甲乙集》等均已佚失。清朱鹤龄等从《文苑英华》、《唐文粹》中辑出一百五十篇，编为《李义山文集》五卷，徐树穀等又增辑撰成《李义山文集笺注》十卷。嘉庆时编集《全唐文》又从《永

唐李義山詩集卷之一



大學博士李商隱義山

五言古詩

戊辰會靜中出貽同志二十韻

大道諒無外會越自登真丹元子何索在已莫問鄰
精璨玉琳華翔翔九真君戲擲萬里火聊召六甲旬
瑤簡被靈誥持府開七門金鈴攝群魔絳節何飀飀
吟弄東海若倚笑扶桑春三山誠迴視九州揚一塵
我本玄元胄稟華由上津中迷鬼道樂沉為下土民
託質屬太陰鍊形復為人誓將覆官澤安此真與神

乐大典》中增辑佚文二百三首,同治中钱振伦等据以编注《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诗文颇多史料,诗中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回顾开元以来的时局变迁,并记述其时“凤翔三百里,兵马如黄巾,夜半军牒来,屯兵万五千,乡里骇供亿,老少相扳牵,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盗贼亭午死,问谁多穷民,节使杀亭吏,捕之恐无因,咫尺不相见,旱久多黄尘,官健腰佩弓,自言为官巡,常恐值荒迥,此辈还射人”。文中如《为荜阳公贺幽州破奚寇表》记述“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奏破奚北部落及诸山奚,除旧奚王匿耶所管外杀戮首领丁壮老小,并杀戮牛羊、焚烧车帐器械等计二十万,刺史已下面皮一百具、耳二百只,奚车五百乘,羊一万口,牛一千五百头”,较《新唐书》卷二一九奚传为详,《代彭阳公遗表》说“臣当道兵马已差监军使窦千乘勾当,其节度留务差行军司马赵祝、观察留务差节度判官杜讷,有旧规模,无新革易”,《代安平公遗表》说“臣当道三军将士准前使李文悦例,差监军使元顺通勾当讷,……其团练、观察两使事差都团练巡官卢涇勾当”,均可见节镇各官的职掌和权力移交的过程。《补编》中的《为荜阳公论安南行营将士月粮状》评述了桂管道兵力配置,出界征戍及供应给养等情况,从中知道当道实际兵员远超规定兵额,及往安南发遣将士和钱粮经海运之艰难;《为荜阳公桂州署防御等官牒》和《为荜阳公桂管补逐要等官牒》是委任下属官吏的牒文,可了解地方设置官吏情况。

版本 (1)清宣统元年蒋斧影印清初钱谦益抄校本《李义山诗集》三卷。(2)清同治九年广州刻三色套印本朱鹤龄《李义山诗注》三卷,有朱彝尊、何焯、纪昀评点。(3)《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蒋孝刻《中唐十二家诗》本《李义山诗集》六卷,分体,窜乱原次。(4)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清冯浩《玉谿生诗详注》三卷,此注试为编年,已非旧本原次,古籍版改题《玉谿生诗集笺注》,又间有脱漏。(5)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三卷,据

朱鹤龄注本。(6)《四部丛刊》影印旧抄本《李义山文集》五卷。(7)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清冯浩《樊南文集详注》八卷、钱振伦等《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合题《樊南文集》。

《温庭筠诗集》七卷别集一卷 唐温庭筠撰

温庭筠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人,约元和七年生,屡举进士不第,大中十三年任隋县尉,后当襄阳巡官,咸通七年任国子助教,卒于咸通末年。传见《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新唐书》卷二〇三。《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其诗文有《握兰集》三卷、《金荃集》十卷、《诗集》五卷、《汉南真稿》十卷。宋以来止存《诗集》七卷。其诗多写艳情和个人沦落之感,较少涉及社会问题之作。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清初述古堂抄本。(2)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清顾嗣立《温庭筠诗集笺注》九卷。

《刘蛻集》六卷 唐刘蛻撰

刘蛻字复愚,自号文泉子,大中四年登进士第,咸通二年因弹劾令狐湣贬为华阴令,官终中书舍人。《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所撰《文泉子》十卷,已散佚。明韩锡辑《文泉子》一卷,吴骞辑《刘蛻集》六卷。其中多抒发其政治、道德观点,如《山书》中“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贵贱”之类,可资研究士大夫思想。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明天启吴骞刻本。

《丁卯集》二卷 唐许浑撰

许浑字用晦,一作仲晦,武后朝宰相许圜师后裔,大和六年登进士第,任涂县令、太平县令,大中二年迁监察御史,后历任润州司马、虞部员外郎、睦州刺史、郢州刺史。浑在润州丁卯桥侧有别墅,大中四年自编其诗为《丁卯集》。《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丁卯集》二卷,今本卷数相同。诗皆题赠感怀、状物抒情之作,

偶亦涉及时事，如《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所云“外监多假帝王尊，威胁偏裨势不存，才许誓心安玉垒，已伤传首动金门”之类。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影宋抄本。(2)民国二十五年吴庠影印元建阳坊刻本《增广音注唐郢州刺史丁卯诗集》二卷，收诗多于影宋抄本。

《孙樵集》十卷 唐孙樵撰

孙樵字可之，一作隐之，大中九年登进士第，在朝中任职，广明元年随僖宗奔岐陇，迁职方郎中，中和四年从所撰二百余篇文中选出三十五篇，編集十卷，即今所传之本。其中多记晚唐史实，如《大明宫赋》自注“开元中籍户九百万，今二百万”，“开元中籍府兵，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宝甲总六十万，今天下兵仰给疲农，而幕府多虚者也”，“开元中北庭拒邻门万三千，陇西、平凉、天水、金城四郡息马匹至七十万穀，四十八监以使董之，是时帛匹易马一”；《寓汴观察判官书》谓“大梁居东诸侯，兵最为雄，军候乘权肆豪，如视州县官，州县官即燮缩自下，美言立闻，观察使往往得上下考，即欲认官为治，必为军候所顷折，大者至夺观察使，小者至为军人所戏辱，州县官格失职，不敢与抗，由是军候得侵绳平民，鞠讯授辞，往往狱至数百不以时省，以故平民益畏军候，至不知有观察使，矧州县官耶？国家设州县官以治平民，岂以属之军乎？今京兆二十四县半为东西军所夺，然亦不过籍占编民，翼蔽垦田，其辞狱曲直尚归京兆，今汴军所侵州县者，反愈东西军”；《书田将军边事》论唐与南诏的战和关系，涉及南诏大掠成都之事；《书褒城驿壁》由官驿的残破不修，谈到朝廷任命县官的轻率，谓“今朝廷命官既已轻任刺史、县令而又促于更易，且刺史县令远者三岁一更，近者一二岁再更”；《梓潼移江记》记述开挖新河道的大型水利工程；《兴元新路记》记述关中通往汉中的新路，即宣宗大中三年郑涯所开文川谷道，从扶风东皋冈至兴元，详叙其间里途、驿站、地形和居民情况，其中还反映了

神策军籍占民户之事,所谓“郿多美田,不为中贵人所并,则籍东西军,居民百一系县。自郿南平行二十五里至临溪驿,驿扼谷口,夹道居民皆籍东西军”;《读开元杂报》记所获开元时杂报内容,并与当时条报朝廷事作对比。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明天启吴骞刻本。(2)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

《皮子文藪》十卷 唐皮日休撰

皮日休字逸少,后改字袭美,自号鹿门子、醉吟先生等,襄阳人,咸通八年登进士第,次年游苏州,刺史崔璞召为判官,后入朝任著作郎、太常博士等职,黄巢入长安,为翰林学士。《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皮日休集》十卷、《胥台集》七卷、《文藪》十卷、《诗》一卷。今存咸通七年皮氏自编的《文藪》,计诗一卷、赋一卷、文八卷,虽较少涉及具体史实,但大都渗透着对时政的针砭,使人感受到唐末动荡不定的政治局面和千疮百孔的社会经济。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2)1959年中华书局点校本,据《四部丛刊》本,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重印,并从《全唐诗》、《全唐文》中增辑《文藪》失收之篇。

《唐甫里先生文集》二十卷 唐陆龟蒙撰

陆龟蒙字鲁里,自号江湖散人、甫里先生、天随子,苏州吴县人,举进士不中,任湖州、苏州从事,后隐居松江甫里。传见《新唐书》卷一九六。此集为宋叶茵所辑,计诗十五卷、文五卷。其诗文多以其隐逸生活为题材,反映出乡间生活的一些情况,如从吟咏茶具、酒具、渔具等诗可见民间所用器物,此外也颇有讥刺时弊、揭露社会矛盾之作。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清黄丕烈校明抄本。

《司空表圣文集》十卷

《司空表圣诗集》五卷 唐司空图撰

司空图字表圣，自号知非子、耐辱居士，河中虞乡人，咸通十年登进士第，初为宣歙观察使王凝从事，召拜殿中侍御史，复授光禄寺主簿，分司东都，后任礼部员外郎、郎中，光启元年召为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归隐，卒于后梁开平二年。传见《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新唐书》卷一九四。《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其《一鸣集》三十卷，已佚，今文集为宋人所辑。其中颇存晚唐史料，如《经恩门王公宣城遗事》记述咸通四年池州一带的战事，指斥宦官监军使庸懦无能且干扰军政，《卢渥神道碑》也反映监军的骄横，“拜陕虢观察使兼御史中丞，前莅是邦或出禁旅，怕畏内臣，护军刘重美党类豪侈，傲视廉使，橐奸黠货，得以自专”，《华州许国公德政碑》论关中战乱，《解县新城碑》记此县中和二年兴修的新城。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旧抄本《司空表圣文集》十卷。(2)《四部丛刊》影印《唐音统签》卷七〇四至七〇八为《司空表圣诗集》五卷。

《桂苑笔耕集》二十卷 高丽崔致远撰

崔致远，高丽人，十二岁来中国，咸通十五年十八岁登进士第，曾任宣州溧水县尉，后任淮南节度高骈从事，僖宗中和四年回国，将其在淮南幕府时所撰表奏书启编为一集，名《桂苑笔耕集》，并其他诗赋进上。《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崔致远《四六》一卷，又《桂苑笔耕集》二十卷。《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别集类著录崔致远《笔耕集》二十卷，又《别集》一卷。但中国久无刻本，至近代始有朝鲜刻本和活字本《桂苑笔耕集》传入，得据以刻印。其中几全为公私文书，所含史料极为丰富，对研究晚唐史事甚有价值。如《贺收复京阙表》述黄巢之退出长安，《贺杀黄巢表》述黄巢之死，《奏诱成令瑰》述黄巢部下成令瑰率步军四万马军七千降于高骈，《贺处斩草贼阡能表》、《奉诏降福建草贼状》、《奏请叛卒鹿晏弘授兴元节度使状》

桂苑筆耕集卷之一

表一十首

賀改年號表

賀通和南蠻表

賀達王除魏博表

賀封公主表

賀殺戮黃巢徒伴表

賀處斬草賊所餘表

賀收復京闕表

賀殺黃巢表

賀降德音表

賀迴駕日不許進歌樂表

賀改年號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得進奏院狀報奉十一日宣下改
廣明元年為中和元年者展義龜城易名鳳紀美號

高麗刻本《桂苑筆耕集》

等则讲述各地小规模起义及兵变。又集中表奏说明朝廷举动皆由进奏院报知藩镇,即播迁时仍未间断,其中又有“史馆宰相”、“盐铁宰相”、“度支宰相”等称,这较史书之只载宰相兼使更为明晰。诸举牒所涉及的江淮应接使、催镇使、乐营使等亦可补官志。又从藩镇间往来书札可了解当时藩镇间的关系,所互赠物品如金银、服饰、锦帛、漆器等也是了解手工业技艺的宝贵资料。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朝鲜旧刻本。

《郑守愚文集》三卷 唐郑谷撰

郑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人,生卒年不详,黄巢占长安后入蜀,僖宗光启三年进士及第,授鄆县尉,迁右拾遗、左补阙、都官郎中,乾宁三年从昭宗避难华州,后归隐。自编诗三卷,名《云台编》,《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传本亦曰《郑守愚文集》。诗中多有反映动乱时事之句,如《顺动后蓝田偶作》“宫阙飞灰烬,嫔嫱落里间”,《长安感兴》“徒劳悲丧乱,自古戒繁华,落日狐兔径,近年公相家”,《初还京师寓止府署偶题屋壁》“秋光不见旧池台,四顾荒凉瓦砾堆”,《偶书》“不会苍苍主何事,忍饥多是力耕人”,《摇落》“故园无消息,流年有乱罹,……日暮寒蟬隐,边军在雍岐”,均尚可采择。

版本 《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蜀刻本。

《玉山樵人集》一卷

《香奁集》一卷 唐韩渥撰

韩渥字致尧,一作致光,小字冬郎,自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人,昭宗龙纪元年登进士第,始佐河中幕府,累迁左谏议大夫,天复元年为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从昭宗至凤翔,擢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学士,后贬濮州司马,再贬蒙懿尉、邓州司马,天祐二年再召为学士,不敢入朝,南依闽王王审知而卒。传见《新唐书》卷一八三。《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韩渥诗》一卷、《香奁集》一卷,

今存。前者今题《玉山樵人集》，颇有反映学士生活和乱离经历之作，后者则悉是香艳诗。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合两集旧抄本。

《徐公筠矾文集》十卷 唐徐夤撰

徐夤(一作“寅”)字昭梦，莆田人，乾宁元年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正字，后还乡为王审知幕僚。《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别集类著录其《探龙集》五卷、《别集》五卷。今传十卷本为后人综合重编，有赋五卷、诗五卷。诗赋多咏物写景之作，其中反映其长安赴举和为官生活者稍有价值。

版本 《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清述古堂抄本。

《唐黄先生文集》八卷 唐黄滔撰

黄滔字文江，莆田人，乾宁二年登进士第，光化中任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里行，天复元年为威武军节度推官。《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黄滔集》十五卷，已散佚，其后裔辑得八卷，计赋一卷、诗三卷、文四卷。其诗亦偶能反映唐末战乱景况，如《书事》“望岁心空切，耕夫尽把弓，千家数人在，一税十年空”，《寓题》“纷纷墨敕除官日，处处红旗打贼时”。其文也有史料价值，如《大唐福州报恩寺定光多宝塔碑记》述此寺建筑规模、所藏经卷，《灵山塑北方毗沙门天王寺》记述闽越王审知在天复年间所营造的新城，对城的规模及附属建筑叙述极详。从集中的书信、碑铭祭文等还可查考昭宗朝一些官吏的事迹。附录有《唐昭宗实录》一段，记载乾宁二年殿试进士之事。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明万历曹学佺刻本。

《甲乙集》十卷

《谗书》五卷

羅昭諫集卷之一

唐新城羅隱昭諫著

渤海容菴張璠訂

而益公

卓渭袁英

新城右菴袁弘器全校

賦

秋蟲吟 并序

秋蟲蜘蛛也致身羅網間實腹亦羅網間愚感其理有得喪因以賦之

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逝網也者繩其小而不繩其大吾不爾身之危兮腹之餒兮吁

五言古

清道光吳墉刻本《羅昭諫文集》

《两同书》二卷

《广陵妖乱志》一卷

《罗昭谏集》八卷 唐罗隐撰

罗隐本名横,字昭谏,自号江东生,新城人,好讥讽公卿,故十举进士不第,乃改名隐,僖宗朝依附镇海节度使钱镠,光启三年表奏为钱塘令,迁著作郎,天祐三年充节度判官,卒于后梁开平年间。其撰作甚多,今传《甲乙集》十卷、《谗书》五卷、《两同书》二卷、《广陵妖乱志》一卷,清张瓚又辑诗文杂著为《罗昭谏集》八卷。《甲乙集》存诗三百余首。《谗书》是咸通八年自编的文集,主要是政论、史论文章,从中可见若干唐人事迹。《广陵妖乱志》记高骈镇扬州时信道教而为吕用之等所惑,也是了解扬州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两同书》是一组政论文章。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南宋书棚刻本《甲乙集》。(2)1983年中华书局版《罗隐集》,包含《甲乙集》、《谗书》、《广陵妖乱志》、《两同书》及杂著。

《白莲集》十卷 唐释齐己撰

齐己本姓胡,名得生,益阳人,为僧后曾居南岳,自号衡阳沙门,与官吏士人颇多交往。身后门人编辑其诗八百余首,分为十卷,孙光宪撰序。其诗多寄赠题咏之作,但对唐末战乱的破坏有所反映,如《送人赴官》“兵荒经邑里,风俗久凋残”,《乱后经西山寺》“松烧寺破是刀兵,谷变陵迁事可惊,云里乍逢新住主,石边重认旧题名,闲临菡萏荒池坐,乱踏鸳鸯破瓦行”,《耕叟》“春风吹蓑衣,暮雨滴箬笠,夫妇耕共劳,儿孙泣对饥,田园高且瘦,赋税重复急,官仓鼠雀群,只待新租入”,均可择取。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明抄本,附《风骚旨格》一卷。

《禅月集》二十五卷 五代释贯休撰

贯休本姓姜,字德隐,婺州兰溪人,幼出家于兰溪和安寺,乾宁中曾谒钱镠和荆州刺史成汭,天复中入蜀。身后弟子昙域辑其诗歌文赞一千首,编为三十卷,后佚失文五卷,止传诗二十五卷。其诗题材较广,可考见晚唐各种情状,还有直接记录黄巢时战事及揭示黄巢起义原因的内容,如《东阳罹乱后怀王慥使君五首》“无人与奏吾皇去,致乱唯因酷吏来,剝剥生灵为事业,巧通豪潜作梯媒”之类,均是史料。

版本 《四部丛刊》影印影宋抄本。

《浣花集》十卷补遗一卷 五代韦庄撰

韦庄字端己,京兆杜陵人,黄巢入长安后曾东去润州依镇海节度使周宝,乾宁元年登进士第,任校书郎,李询为两川宣谕和协使,召为判官,奉使入蜀,归朝后任左补阙,天复元年入蜀为王建掌书记,建据蜀称帝后庄为宰相。此集为居蜀时所编定,记及黄巢入据长安的《秦妇吟》删去不收,止收五七言近体,大体以写作时期分卷。诗中颇有史料,尤为卷二《庚子季冬大驾幸蜀后作》、卷三《时大驾在蜀,巢寇未平,洛中寓居作》中所记述黄巢进入长安以及韦庄出长安东行辗转赴润州途中见闻,多可与两《唐书》等互证。黄永年并据以考知韦庄此时期行踪,撰成《秦妇吟通释》专文,收入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编《唐史论丛》第一辑,其中《韦庄在广明元年至中和三年的行迹》收入所著《文史探微》,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

版本 (1)《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朱承爵刻本。(2)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韦庄集》,增入《秦妇吟》及所撰词。

汇录唐人诗文的总集数量也不少,这里只讲几种最大、最常用的。

《文苑英华》一千卷 北宋李昉等撰

此书是北宋初年官修四部大书之一。其纂修经过,详见卷首南宋嘉泰四年周必大校刻时所集《纂修文苑英华事始》。《四库提

浣花集卷第一

杜陵韋莊

今體詩凡四十八首

章臺夜思

清瑟怨遙夜
遶弦風雨哀
孤燈聞楚角
殘月下章臺
芳草已云暮
故人殊未來
鄉書不可寄
秋鴈又南迴

延興門外作

芳草五陵道
美人金犢車
綠奔穿內水
紅落過牆華
馬足倦遊客
鳥聲歡酒家
王孫

明正德朱子儋刻本《浣花集》

要》谓：“宋太平兴国七年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奉敕编，续又命苏易简、王祐等参修，至雍熙四年书成，宋四大书之一也。梁昭明太子撰《文选》三十卷，迄于梁初，此书所录则起于梁末，盖即以上续《文选》，其分类编辑，体例亦略相同，而门目更为繁碎，则后来文体日增，非旧日所能括也。周必大《平园集》有是书跋，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今闽、蜀已刊，惟《文苑英华》士大夫间绝无而仅有。盖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间存一二，是时印本绝少，虽韩、柳、元、白之文尚未甚传，其他如陈子昂、张说、张九龄、李翱诸名士文籍，世尤罕见，故修书官于柳宗元、白居易、权德舆、李商隐、顾云、罗隐，或全卷收入。当真宗朝，姚铉选十一，号《唐文粹》，由简故精，所以盛行。近岁唐文摹印漫多，不假《英华》而传，其不行于世则宜’云云。盖六朝及唐代文集，南宋初存者尚多，故必大言如是。迄今四五百年，唐代诗集已渐减于旧，文集则《宋》志所著录者殆十不存一，即如李商隐《樊南甲乙集》久已散佚，今所存本乃全自是书录出，又如张说集虽有传本（案指缺最后五卷的二十五卷本），而以此书所载互校，尚遗漏杂文六十一篇，则考唐文者惟赖此书之存，实为著作之渊海，与南宋之初其事迥异矣。书在当时已多讹脱，故方崧卿作《韩集举正》、朱子作《韩文考异》，均无一字之引证，彭叔夏尚作《辨证》十卷，以纠其舛漏重复，然如刘孝威《绍古词》，一收于二百三卷、一收于二百五卷，而字句大同小异者，叔夏尚未及尽究也。”所论尚翔实。

从研究唐史的角度来看此书的價值，則：（1）此書有詩有文，雖說是續《文選》，但不象《文選》那樣是個謹嚴的選本，而是選得相當寬，作者近二千二百人，詩文近二萬篇，多少接近於清代的《全×詩》、《全×文》那樣的大型的匯編式總集，這對讀詩文的人未必方便（讀詩文要精選，所以後來姚鉉選編了《唐文粹》一百卷），但對研究歷史的人卻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所選從蕭梁到五代，而唐占十分

文苑英華卷第一

賦一

天象一

天賦二首

碧落賦一首

天行健賦一首

乾坤為天地賦一首

披霧見青天賦一首

鍊石補天賦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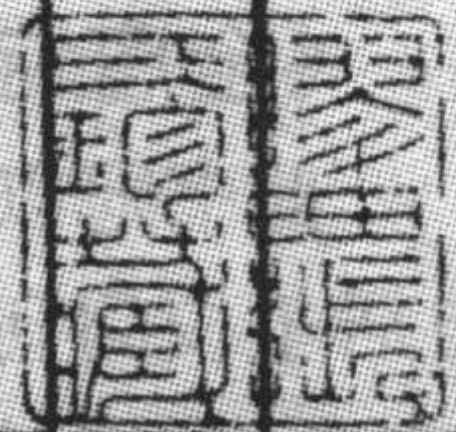
管中窺天賦二首

三無私賦一首

天賦

劉允濟

臣聞混成發粹大道含元興於物祖首自胚渾分泰階而立極光耀魄以司尊懸兩明而必照列五緯而無言驅馭陰陽戡成風雨叶乾位而凝化建坤儀而作輔錯落九垓岩堯八柱燦黃道而開域闢紫宮而為宇橫斗樞以旋運



之九,所以是研究唐史必备的文献。(2)有好多唐人的别集现在已失传,除《提要》所说李商隐的文集外,如李邕、李华、萧颖士等许多人的作品都依靠此书才保存了一部分。(3)有些唐人虽有别集流传,但未必是当初的足本,而此书在北宋初纂辑,去唐代为时不远,因此有些不见于别集里的诗文可在此书中找到。(4)在文字上,此书所收也往往和今天通行的别集有异同,而且此书本身还注有“某作某”保存异文,都可以校勘本集,清人给唐人别集作注时就往往利用此书,注出“《英华》作某字”,有时此书所收诗文还保存了作者的自注,而为今本别集所删脱的,如李商隐的诗就有这种情况。(5)清人纂辑《全唐诗》、《全唐文》虽大大依靠此书,但有个别诗文见于此书而为《全唐诗》、《全唐文》失收的,劳格《读书杂识》(《月河精舍丛钞》本)曾举出一些见于此书而《全唐文》失收的作品。此外,有些文章在收入《全唐文》时在文字上已有所改动(并不加任何说明),此书的异文原注也没有被《全唐诗》、《全唐文》都采注进去。因此虽有《全唐诗》、《全唐文》,此书仍不可废。

版本 (1)宋刻止有若干残卷,藏北京图书馆。(2)明隆庆元年胡维新刻本。(3)1966年中华书局影印宋本配明隆庆本(宋本止一百四十卷),又附印了南宋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辨证》十卷和清劳格的《文苑英华辨证拾遗》一卷,这对校正文字史实的错误很有用处,此外还编了作者姓名索引,每个作者下列举其作品篇名及所见卷次,是一个较好的本子。

《全唐诗》九百卷 清曹寅等纂修

此书冠以康熙四十六年御制序,纂修诸臣就尊之为“御定”而自居于校阅刊刻官、校对官,其实是由校阅刊刻官曹寅在扬州设立“全唐诗局”,带领校对官彭定求、杨中讷、潘从律、汪士铤、徐树本、车鼎晋、查嗣璩、俞梅等纂修,从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开始,四十五年

十月完工,把当时可见到的唐人诗篇基本上统统汇齐,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共九百卷,分十二函,每函十册,因为没有通排卷数,所以后来引用者一般只注明第几函第几册。

所以能用一年半时间成此大书,是因为有底本,曹寅等只稍尽整理修饰之劳。关于这点《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三分上曾发表过俞大纲的《纪唐音统签》,首先加以探讨,民国三十三年《文史杂志》第三卷第九、十合期“唐代文化专号”上又刊登朱希祖的《全唐诗之来源及其遗佚考》,近年《故宫博物院院刊》上更连续发表了介绍此书两个底本的文章《足本唐音统签全帙》(1979年第一期)和《两种全唐诗》(1979年第二期,不过这两篇介绍只提供资料,对此两书与今本《全唐诗》的关系只简略提一下,后一篇且对今本《全唐诗》大作过分的歌颂)。但朱文说《全唐诗》“未尝言及《唐音统签》,盖攘窃为己有者,必掩没原著者之名”,则似对康熙帝有所冤枉,因为康熙御制序中本老实地说:“朕兹发内府所有《全唐诗》(指季本《全唐诗》),命诸词臣合《唐音统签》诸编,参互校勘,搜补缺遗”,凡例中也提到此两书并提到《统签》编纂者胡震亨之名,可见当时并未隐讳,只是后人读书不细心而已。

要评价今本《全唐诗》,得把这两个底本简略作个介绍,这两个底本原都藏在清宫,现藏故宫博物院。《唐音统签》是明末海盐胡震亨所编纂,分甲、乙、丙、丁等十签,共一千三十三卷,仅戊签、癸签有刻本流传于世,而故宫所藏则是十签全书,其中甲、乙、戊、癸及丙之卷八七至九二、九六至一七一、丁之卷二一二为刻本,余均由同邑范希仁在清初时所抄配,当亦据胡氏原稿。其中甲帝王,乙初唐,丙盛唐,丁中唐,戊晚唐及余闰,己三唐杂诗,庚僧、道士、宫闱、外夷,辛乐章、杂曲、填词、歌谣谚语、谐谑、谜、酒令、章咒、偈颂,壬仙、神、鬼、梦、物怪,癸体凡、法微、评汇、乐道、诂笺、谈丛、集录。原本《全唐诗》则是清初大藏书家泰兴季振宜根据钱谦益的残稿修补而成,其自序谓:“常熟钱尚书曾以《唐诗纪事》为根据,欲集

唐人一代之诗，盖投老为之能事未毕，而大江之南不知有此书，予得其稿于尚书之族孙遵王，其篇帙残断亦已过半，遂踵事收拾而成七百十七卷”，“得人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得诗四万二千九百三十一首，经始于康熙三年，断手迄十二年，镇十年矣。”其原稿民国初为邓邦述所得，见邓氏《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卷六，此鬻存书抗战初以邓氏身故又散出，今藏台北中央图书馆，1976年已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以《全唐诗稿本》为书名影印公世。故宫所藏则是精写清本，《院刊》介绍说是进呈之本。朱文推测钱谦益原本即袭取《统笈》，但《统笈》各家诗一律按古、律、绝分体，季本只按本集不更事分体，看联经影印本，知是用明朱警刻《唐百家诗集》、蒋孝刻《中唐十二家诗集》、黄省曾刻《唐诗二十六家集》、许自昌刻《晚唐十二家诗》、龚贤刻《中晚唐诗纪》以至汲古阁刻众唐人集及其他明刻唐人总集、别集等剪贴编辑而成（贾二强撰有《〈全唐诗〉稿本采用唐集考略》，收入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1995年该校出版社版《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三集，可参考），朱文袭取《统笈》之说自不能成立。

弄清了这两部底本，则今本《全唐诗》之纂修刊刻实不值得如某些人那么大宣扬，因为：（1）今本基本照抄季本，多少参考一点胡本，如照季本只按本集不更事分体，可见今本实在没有花大气力。（2）胡本、季本诗前作者小传都较详细，并间有考证，今本删节得很简略，并全删考证，更无出处。（3）胡本引书多注出处，今本大多删去。至于其他误收、漏收、重出以及小传、小注的错误，编次的不当（见中华书局点校本说明），倒是在所难免。因此，今本实不是一个理想的本子，很有必要重新规划纂修，这当然是大工程，暂时做不到，能先把胡本、季本影印公世也很好。但如今常见的还只有今本，台湾虽已影印了季本，这里仍少流传，因此通常要利用今本。利用时要注意几点：（1）有别集的尽量用别集的善本，今本只能在文字上有较善于别集时引用。（2）不见于别集的诗，以及无别集流

全唐詩

相和歌辭

前苦寒行二首

杜甫 以後訪清調曲其器有笙笛下聲弄
高弄遊弄旋風印琴瑟等琵琶八種歌弦四弦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楚江巫峽冰入懷
虎豹哀號又堪記秦城老翁荆揚客慣習炎蒸歲締絡
玄冥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縮
寒刮肌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無晶輝
三足之鳥足恐斷羲和送將安集作何所歸

後苦寒行二首

杜甫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已來無尺雪蠻夷長老怨苦寒

传的人的诗,力求弄清楚它的出处,大体总见于总集、汇刻、诗话(如唐孟棻《本事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小说(如《云溪友议》、《鉴诫录》、《唐摭言》、《太平广记》等,神、仙、鬼、怪的诗尤多出于《广记》)以及石刻文字,不弄清楚有时要闹笑话(如武则天的《石淙》七律,是从河南登封石淙山的石刻拓本抄来的,美化武则天者却一无所知)。(3)小传也是如此,一般不宜引用,应该引用两《唐书》、《唐诗纪事》及其他较原始的文献。(4)注意其中是否有错误。

版本 (1)康熙四十六年刻本,通常称之为武英殿刻本,实际是扬州诗局刻本,刻成后版送武英殿大量印刷。(2)覆刻本。(3)清光绪同文书局影印本,缩小剪并,把原来十二函改题四函,另有其时某书局影印本也同此格局,引用时要注明是影印本第几函第几册。(4)1960年中华书局标点本,文字作过很少一点校订,十二册,每册另编细目,并附印《知不足斋丛书》本日本上毛河世宁所辑《全唐诗逸》三卷,书后附编作者索引,原来的函、册都废去,按九百卷改编卷次,如引用此本时应注明是中华书局本第几卷。(5)岑仲勉撰有《读全唐诗札记》,附印在《唐人行第录》后,对部分作品、作者作了考订并校正其错误。(6)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全唐诗外编》,将王重民《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孙望《全唐诗补逸》、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合印成编,便于查阅。三家所补都不尽精核,好在都注明出处,其中辑自地方志之类的诗篇的可信与否虽成问题,有了出处使用时就可注意。(7)1992年中华书局又出版《全唐诗补编》,即将《全唐诗外编》校订后再加上陈尚君的《全唐诗续拾》成此《补编》。《外编》的校订是将原有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换成经刘修业整理的王重民的《补全唐诗拾遗》,并将此《外编》改正误字,补记异文,补引书证,考订作者事迹,补原辑遗缺,删误收唐前后人诗及与《全唐诗》重出诗。《续拾》则多至六十卷,作者逾千人,诗有四千三百余首。最后并附孔沂澜编“全唐诗补编作者索引”。有了这《全唐诗补编》,就不必再用1982年版的《全唐诗外

编》了。

《全唐文》一千卷 清徐松等编

此书是清嘉庆时官修，书前有“奉旨开列编校全唐文诸臣职名”，有正副总裁官、总阅官，都是高官挂名的，有提调官，是负责行政工作的，只有提调兼总纂官、总纂官、纂修官、协修官才是真正从事编纂的，此外还有收掌官是办事员，监刊官、刊校官是负责刻印的人员。提调兼总纂官以徐松为首，其他知名人士也不少。

书前有嘉庆十九年御制序，其中有关系的几句是：“予近得唐文一百六十册，几暇披阅，觉其体例未协，选择不精，乃命儒臣重加厘定，每得数卷，亲定去留，仍从《四库全书》及《永乐大典》、《古文苑》、《文苑英华》、《唐文粹》诸书内搜罗采取，普行甄录。而原书内亦有误收之文及有关风化之作，悉删除不载。伪周编造之字，皆改正之。累月经年，共成书千卷，文万有八千四百八十八篇（案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命名曰《全唐文》，敬遵圣祖仁皇帝命名《全唐诗》之意也。”其中除“每得数卷，亲定去留”是假话外（当时在扬州开《全唐文》馆纂修，如何能每得数卷就送嘉庆帝亲定去留），都是实在的情况。可见此书也和《全唐诗》一样是有底本作为纂修的依据，但后来没有听说从故宫发现此一百六十册的唐文，殆已佚失。

书前还有凡例三十条，这里挑重要的讲几条：(1)“是书卷帙繁重，故变自来总集之体，以文从人，谨遵《全唐诗》例，各自成卷，其文体分类诠次，仍依《文苑英华》，以昭画一。”(2)“唐人别集《四库全书》所载多至九十余种，其中专以诗行者不过十之三四，其余文集悉行甄录。”(3)“文集外总集如《古文苑》、《文苑英华》、《唐文粹》、《崇古文诀》、《文章辨体汇选》等书，凡唐人之文悉行甄录。”(4)“总集外文之散见于史、子、杂家记载、志乘、金石碑板者，概行搜辑，惟文出谱牒私录，无可徵信者不滥登”。(5)“《永乐大典》为遗书渊藪，除《四库全书》所已采外，单篇断简，搜辑无遗。”案这是

此书最有用之点，如李商隐文集久失传，清代前期传本注本《樊南文集》都是从《文苑英华》抄出的本子，而此书则又从《永乐大典》辑出多篇，钱振伦兄弟即据此作《樊南文集补编》的笺注。今《永乐大典》已残存无几，所以《全唐文》的这部分特别珍贵。(6)“文字异同，碑碣以石本为据，余则择其文义优者从之，若文义两可则著明一作某字存证。”(7)“金石之文类多剥蚀，……凡石本剥蚀而板本完善足信者即据以登载，其无可据则注明阙几字存证。惟残阙过甚仅留数字无文可寻者不录其文。非金石单词只句见于后人援引无首尾可编者亦同此例。”(8)“原书编载《文苑英华》诸文所据系明刊闽本，其中讹脱极多，今以影钞逐篇订出，补出脱字，又以元祝尧《古赋辨体》补出诸赋撰人姓名。”(9)“唐人说部最夥，原书所载如《会真记》之事关风化，谨遵旨削去，此外如《柳毅传》、《霍小玉传》之猥琐，《周秦行纪》、《韦安道传》之诞妄，亦概从删。”(10)“小传无取繁见，载里居科第后略序历官始末，其事迹见史传及习见之书者概不叙入，惟其人事迹不经见，则搜访遗佚，间采琐事，以备掌故。”(11)“唐人世次前后最难分析，今谨遵《全唐诗》例，以登第之年为主，其未登第及虽登第而无可考者以入仕年为主，处士则以所卒之年为主，若无考则参稽其同时往来酬酢见于诗文中者据以定其时代(案此事有唐史专家《登科记考》的作者徐松在，自优为之)。至五季诸人身历数朝，难据登第入仕以定世次，今略依靠薛史序例，以终事之朝为主，十国诸人或著名唐末、或逮仕宋初，以其文作于伪朝，因人叙人，概次五季之末，其文作于入宋以后者不录。”至于此书的缺点，则是所辑的文章和《全唐诗》一样都不注出处，这是官书的通病，因而收入的有些文字，如卷四三〇许子真《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卷七九三刘汾《大赦庵记》等必须从内容上才能发现其为伪作，如果注明其出于不可信据的地方志之类，辨伪就更为容易。

版本 (1)清嘉庆十九年扬州全唐文局刻本，版入武英殿。

(2)光绪时广州重刻本。(3)1983年中华书局影印嘉庆本,并附影光绪时陆心源的《唐文拾遗》七十二卷和《唐文续拾》十六卷,全部施加断句。(4)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嘉庆本,附《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以及劳格、岑仲勉的两种《读全唐文札记》,但除岑氏《札记》原有标点外,均未加断句。

《全唐文纪事》一百二十二卷 清陈鸿墀撰

此书撰人陈鸿墀是《全唐文》的总纂官之一,此书有自撰凡例,谓:“鸿墀久预编摩,获窥美富,……积前后采辑各书,凡有关于唐人文字者,勒成此编。”所采辑自唐至清的书籍共五百八十一一种,其中虽无佚字秘笈,但能把唐文及作者有关的资料搜辑到一起,便于观览,确系做了一件大好事。缺点是不分人而分门类,分体例、帝制、述德、纪功、纳言、威远、政治、典章等八十个门类,反不便查考。同时,所引用之书只注书名,不注卷次,如《册府元龟》有一千卷,不注卷次要查覆原书就颇困难。应做一个索引,以唐文原作者为条目,把此书有关作者的材料卷次条数开列其下,即可补救此书的这个缺点。

版本:(1)清同治十二年方功惠广州刻本,据陈鸿墀之子陈子因所藏原本刊刻(事详同治十二年陈澧序及方功惠跋)。(2)1959年中华书局印本,白云凡书中徵引订的文字有原书可资核对的,均尽可能找出原书作了校勘。1987年重印。

类 书 类

类书最早是编了为做诗文备查找用的,和西方的百科全书实质上不是一回事。是由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文章流行骈体文,诗也讲究辞藻,都要多用典故,于是从前此的书籍包括经子史书诗文集里抄出种种可用于诗文的故实,分类編集,所以叫做类书。有些还常常附上诗文的片断,以便模仿甚至剿袭。编入《隋书》的《五代史志》经籍志中就收有曹魏时所编《皇览》等类书,附在子部的杂家里,《旧唐书》经籍志在子部中独立成“类事”一类,《新唐书》艺文志改称“类书”类,以后就相沿不改。今存早期的类书有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徐坚的《初学记》和白居易的《白氏六帖事类集》,欧、虞是唐初人,《北堂书钞》更编成于隋朝和《艺文类聚》里都是前朝的典故诗文,与唐无关,徐、白两家才有唐代的故事,而且所引用的很多书久已失传,研究唐史者应予利用。北宋官修四大书中《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都是类书,有很多失传的唐代史料,对研究唐史有用。南宋后期王应麟編集《玉海》是为应考博学宏词科者参考之用,其中失传的唐代资料研究唐史时也应用上。以后明成祖时官修《永乐大典》是按洪武韵抄集的,本不能算作类书,其中虽有失传的唐人文字,清人纂修《全唐文》时已多利用,加之今中华书局影印的残存《大典》为数无多,远非全貌,所以这里就不讲了。清前期官修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等所引用唐代资料则原书均在,自更用不上亦不必讲。

《初学记》三十卷 唐徐坚等撰

此书是玄宗时官修的类书。《四库提要》谓：“《唐书》艺文志（卷五九类书类）载玄宗《事类》一百三十卷，又《初学记》三十卷，注曰：‘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烜、李锐、孙季良等分撰。’似乎二书皆说总其事，而坚等分修。晁公武《读书志》（袁本卷三下）则曰‘《初学记》三十卷，唐徐坚等撰。初，张说类集事要以教诸王，开元中诏坚与韦述等分门撰次。’又似乎《事类》为说撰，而坚等又奉诏择其精粹编为此书。考《南部新书》（卷壬）载：‘开元十三年五月，集贤学士徐坚等纂经史文章之要，以类相从，上制曰《初学记》。’则晁氏所言当得其实。《唐》志所注，叙述未明，偶合两书为一耳。”案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载：“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案：指北齐祖珽等编辑的《修文殿御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以《初学记》为名。”说较艺文志及晁氏更为明确。至书成徐坚等署名者，则以編集实出徐坚诸人之手，故张说不更署名以尸其功。

此书分二十四部，三百十三个子目，每个子目先分“叙事”，再“事对”（即可以成对的词及其原文），再是“赋”、“诗”、“颂”、“赞”、“箴”、“铭”、“论”、“书”、“祭文”等各体诗文，大体同于其时盛行的《昭明文选》的分类，所引也多整段整篇。对唐史研究者来说，其用处是：（1）叙事部分谈及唐代制度，有时可补两《唐书》志的疏略。如职官部所记高宗武后时职官名称、机构的变动，有些就较职官志为详。帝戚部“公主”条载“唐神龙初又置府属，景龙末复省”，两《唐书》皆失记。（2）诗文部分有多有初唐君臣的唱和诗和诏册制敕，唱和诗虽语多空泛，也不无史料可取，诏册制数中不少是任职、封号的文书，可以得知某人履历。（3）从岁时、居处、器物、服馔、果木等部的类目和内容，可以窥见其时社会生活，知悉名物品种。

版本 （1）日本宫内省书陵部藏有南宋绍兴十七年余四十三

初學記卷第一

光祿大夫行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

勅撰

晉陵楊鑑

天部

天第一

日第二

月第三

星第四

雲第五

風第六

雷第七

天第一

河圖括地象云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為天偃

明嘉靖九洲书屋刻本《初学记》

郎宅刻本,应属善本,惜尚未影印。(2)明嘉靖安国桂坡馆刻本,原缺卷七、一〇、二一至二五及三〇下半,安氏补足后刊刻,以后多种明刻均从此出,清乾隆内府刻古香斋巾箱本也从此出。(3)1962年中华书局本,据古香斋本,每卷末附校勘表,列严可均、陆心源校所谓宋本的异文,卷二五、二八至三〇因严、陆校文与古香斋本出入甚多,则另附印严、陆校本该卷全文。但严、陆所见是否宋本仍成问题,应用日本所藏宋刻对勘方可判断。1980年中华书局重印时又编制索引一册。

《白氏六帖》三十卷 唐白居易撰

《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类书类著录《白氏经史事类》三十卷,注曰:“白居易。一名《六帖》。”这《六帖》当是原名,是白居易为作诗文方便随便纂抄成书的,不分部只列门,每个门先列词语,有些词语还作对偶,有点像《初学记》的“事对”,在词语之下用小字注出原文,但又不注此原文的出处。其后给原文注了出处的,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是他的曾祖父秘阁公即晁仲珩。这种有注的宋本,一种叫《新雕白氏六帖事类添注出经》,存卷一至二十八;一种叫《白氏六帖事类集》,三十卷完全,有一千三百六十七门,又附五百零三门,只是所注出处不如上一种多。其书所收录唐代文献中最可贵的,是律、令、格、式的若干条文,律有擅兴律、贼盗律等,令有乐令、选举令、考课令、封爵令、丧葬令、户令、授田令、祠令、杂令等,格有仓部格、金部格、户部格、祠部格等,式有兵部式、祠部式、吏部式、考功式、户部式、主客式、水部式等。唐律尚存,而令、格、式则原书已佚,此书所引虽是片断,仍可据以考知性质内容,且可以此为线索勾稽其他令、格、式遗文。如敦煌遗书中的唐代水部式残卷,即据此书卷二三所载水部式条文始得判定。

版本 (1)民国二十二年张芹伯影印傅增湘藏南宋绍兴刻本《白氏六帖事类集》。(2)1987年文物出版社影印同上本《白氏六帖

事类集》。

《白孔六帖》一百卷 南宋缺名编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六引《复斋漫录》说：“东鲁孔传，字圣传，先圣之裔，……续唐白居易《六帖》，谓之《六帖新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曰《后六帖》，也是三十卷。后人又把它和《六帖》合并编成《白孔六帖》一百卷，王应麟《玉海》已著录，则当是南宋末年时人所为。这合并后的《白孔六帖》是一千三百九十九门，文字亦有改窜。在《白氏六帖事类集》的宋本未影印前，人们用的只有这《白孔六帖》，但其中孔续部分多诗文，不如《六帖》收律、令、格、式之有价值。

版本 (1)明嘉诸刻本。(2)影印本《四库全书》中收有此书。

《太平御览》一千卷 北宋李昉等撰

此书是北宋前期官修四部大书之一。《四库提要》谓：“宋李昉等奉敕撰。以太平兴国二年受诏，至八年书成。初名《太平编类》，后改为《太平御览》。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谓书成之后，太宗日览三卷，一岁而读周，故赐是名也。凡分五十五门，徵引至为浩博，故洪迈《容斋随笔》称：‘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书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诗赋又不能具录，以今考之，不传者十之七八。胡应麟《经籍会通》则以为是编所引，大抵采自类书，非其书宋初尚存，力驳迈说之误，所言良是。然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辑本卷一四类书类）曰：‘或言国初古书多未亡，以《御览》所引用书名故也。其实不然，特因诸家类书之旧耳。以《三朝国史》考之，馆阁及禁中书总三万六千余卷，而《御览》所引书多不著录，盖可见矣。’是迈所云云，振孙已先驳之矣，应麟特剿其说耳。”但这里辩论存亡与否的古书只是指唐以前的典籍，所徵引唐代的文献，自然还多取自原书，所以颇有不见于《初学记》等书里的。至于卷首

唐采白孔六帖卷第三十九

表奏一

對見二

對問三

諫諍四

表奏

自

上聞

上言

白奏

青蒲

伏事

起草字誤

漢石建為郎中今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曰馬與尾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諍死也

章奏

漢陳湯字子公常受人金

錢作一

削藁

漢孔光時有所言輒起一草

持被覆之

後漢馮豹字仲文為尚書郎忠

對不懈每奏事未報嘗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

一草

豹救令勿驚

削草本

後漢樊宏

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

一草

後漢皇甫嵩義直前後上表陳

諫有損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

失輒手自書寫

不宣

焚草

魏志荀彧文若以書陳事臨藁其故奇策密諫不得盡聞

一文

魏志陳羣長文

“经史图书纲目”所列徵引书目，实甚粗疏，有一书多名的，又有漏略未载的，不能完全凭信。

此书分五十门，四千五百五十八子目，子目下按时代先后排比引文，在引文上冠以书名。从研究唐史的角度来看，此书的用处是：(1)可勾稽久已佚失的唐代史料，如《玄宗实录》、《开元录》、《唐杂制》、《唐职员令》、《两京新记》等，清人就曾从此书中辑出《两京新记》佚文。又所引题为《旧唐书》、《唐书》的条文也很多，前面讲《旧唐书》岑建功刻本时就说过刘文淇等辑这些条文为《逸文》十二卷，岑仲勉则认为是旧国史、实录之类，不论如何都甚珍贵。(2)因为此书类目全、资料多，可利用来研究唐代服饰、饮食、器物，往往一检即得。

版本 (1)南宋蜀刻残本分藏日本皇室图书寮、京都东福寺，另一南宋刻残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2)明万历周堂活字本、清嘉庆鲍崇城刻本，均欠善。嘉庆张海鹏刻本较善，但印本极罕见。日本文久(清咸丰时)喜多氏活字本，从南宋蜀刻本出，较善。(3)《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日本藏南宋蜀刻本，配静嘉堂文库藏南宋刻本及喜多氏活字本，1960年中华书局又缩印，最便使用。(4)原哈佛燕京社出版有《太平御览引得》，系篇目引得和书名引得。

《册府元龟》一千卷 北宋王钦若、杨亿等撰

此书为北宋四部大书中字数最多的一部。今传本已无纂修原序，《四库提要》谓：“真宗景德二年诏编修历代君臣事迹，以钦若提总，同修者十五人，至祥符六年书成，赐名制序。周必大《文苑英华》跋、王明清《挥麈录》并称太宗太平兴国中修者误也。其书分三十一部，部有总序，又子目一千一百四门，门有小序，皆撰自李维等六人，而审定于杨亿，又命孙奭为之音释。其间义例多出真宗亲定，惟取六经、子、史，不录小说，于悖逆非礼之事亦多所刊削，裁断极为精审。考洪迈《容斋随笔》，谓其时编修官上言，凡臣僚自述及

太平御覽卷一

虞山張海鵬較梓

翰學詹素奕空部尚書制誥廷閣直學士身賜紫綬安李昉纂
纂

天部一

元氣

太易

太初

太始

太素

太極

天部上

元氣

三五歷記曰未有天地之時混沌狀如鷄子溟滓始牙濛

莫孔鴻胡孔切滋萌歲在攝提元氣肇始

又曰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人故天

地含精萬物化生

子孙追叙家世如《邺侯传》之类，并不采取，遗弃既多，故亦不能赅备。袁氏《枫窗小牍》亦谓开卷皆目所常见，无罕覩见闻，不为艺林所重。夫典籍至繁，势不能遍为掇拾，去诬存真，未可概以挂漏相绳。况纂辑诸臣皆一时淹贯之士，虽卷帙繁富，难免牴牾，而考订明晰，亦多可资览古之助。张耒《明道杂志》称杨亿修《册府元龟》，数卷成即奏之，每进本到，真宗即降付陈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发，故谬误处皆签贴，有小误差必见，至有数十签，亿心颇自愧，乃盛荐彭年文学，请与同修。其言虽不可尽信，然亦足见当时校核讨论务臻详慎，故能甄综贯串，使数千年事无不条理秩然也。据《玉海》，此书凡目录十卷，音义十卷。今有目录而无音义，盖传写久佚之矣。”案《提要》此条搜辑有关此书故事略备，但对此书评价则全未抓住要点。

此书本旨是编录历代君臣事迹，其实就是用类书的体裁编纂一部通史。全书三十一部为帝王、闰位、僭伪、列国君、储宫、宗室、外戚、宰辅，将帅、台省、邦计、宪官、谏诤、词臣、国史、掌礼、学校、刑法、卿监、环卫、铨选、贡举、奉使、内臣、牧守、令长、官臣、幕府、陪臣、总录、外臣，其范围正与纪传体史大体相当。其史料价值，因其取材的不同而有两种情况：先秦部分少现成史书可采，故多采六经、子书；秦汉以下、隋以上则正史纪、志、传具在，可供采辑，经、子、正史自是常见之书，故《枫窗小牍》谓开卷皆目所常见。唐五代部分则不然，修此书时实录、国史以及唐令、诏敕奏疏、诸司吏牒等尚在，故这部分除本《旧唐书》、《旧五代史》外并可直接采用这些较原始的史料，这些决不是目所常见。试取此书与《旧唐书》对勘，即知此书记载往往比《旧唐书》详尽，以《旧唐书》编纂时有剪裁润色，而此书则直接移录原始史料。如大和五年郑注构陷宋申锡与漳王谋反事件，《旧唐书》卷一七五怀懿太子传只录几十字的告变文，而此书却有上千字的审理此案的档案。再如关于大和九年十一月“甘露之变”的记载，此书所叙也较两《唐书》、《通鉴》详尽。至于典

册府元龜卷第九百一

總錄部百五十一

語

公直

直

服義

語

公直

滅私之謂公正曲之謂直君子之懿德也自上古之世移至公之道廢則情勝於理恩克於義心由利易政以勢遷自非時獻中庸好是正直執不田之道守無頗之性則焉能獻替可否不以讎而掩賢閱實憲章不以親而害法臨事盡節靡顧於妻孥當官而行罔避於權右刑奏列而無隱斥問遺而不通故能成剛毅之風全忠信之行先聖所以嘉歎良史所以攸書宜乎為後世之懿範也

史魚為衛大夫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

叔向為晉大夫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

章制度方面,此书也多有《通典》、《唐会要》所不载者,即或相同,但文字详略互有出入,可互相校补,故此书可称最为充盈的唐史史料库。此书缺点是类目繁杂,体系不够严整,史料重出现象颇多,使用时不易检寻择取,今人也未为之编制索引。

版本 (1)宋刻本仅存几个残本,分藏北京图书馆和日本静嘉堂文库。(2)明崇祯十五年黄国琦刻本,这是宋刻后唯一的刻本,书版至清嘉庆时尚存,曾几次修补印行。此明刻本较宋刻本有脱误处,但也有校正宋本讹误之处,见陈垣《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3)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明刻本,脱误处已据残宋本补正。但残宋本仍有优点,1989年中华书局另行影印。(4)周绍良辑出此书唐代史料,按《旧唐书》纪、志、传编列,稿盈数尺,有待刊布。

《玉海》二百卷 南宋王应麟撰

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居士,淳祐元年举进士,宝祐四年中博学宏词科,历任太常博士、秘书郎、著作郎、中书舍人兼国史编修、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等职。《宋史》卷四三八本传载有所著书二十三种,其中以《玉海》最为巨制。《四库提要》谓:“宋自绍圣置宏词科,大观改词学兼茂科,至绍兴而定为博学宏词之名,重立试格,于是南宋一代通儒硕学多由是出,最号得人,而应麟尤为博洽。其作此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故胪列条目率巨典鸿章,其采录故实亦皆吉详善事,与他类书体例迥殊。”说甚允当。

此书分天文、律历、地理、帝学、圣文、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共二十一门,门下分类,共二百四十一类,每类再按时代分列细目,排比资料,常有概述,间作考证。其中关涉唐代典章、文化处甚多,如艺文部汇集宋以前文集、类书的修撰情况,唐代要籍均列条目,多采自《新唐书》艺文志、列传及《唐会要》、《中兴书目》等书,甚便查阅,而《中兴书目》今已不传,尤可宝贵。又如唐列朝实录此

欽定四庫全書

玉海卷一百八十四

宋 王應麟 撰

食貨

倉庾

史記注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漢志胃為天倉
其南衆星曰膾積晉志天囷十三星在胃南為倉廩
之屬石氏星經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南四星

书也多引用,并注明“《会要》兼实录”或“纪兼实录”,这就更可考知《会要》及《唐书》本纪的史源。再如卷一三八徵引大段《邳侯家传》论府兵部分,虽非府兵制的原始资料,也可供参考,《家传》原书佚失,研究唐代兵制者就常从此书引用。

版本 (1)元后至元庆元路儒学刻本,为此书初刻,有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2)清嘉庆康基田刻本。(3)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上海书店影印。

金石类

《新唐书》艺文志史部设立目录类,所收多是书目(也有画录),《郡斋读书志》还是如此,《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才把金石书收入目录类。正是因为金石之学在北宋后期才兴起,才有这方面的专门簿录和著作。元、明时讲金石之风似不如宋代,但到清代又大盛,所以《四库总目》就在史部目录里分两个小类,一为经籍,一为金石,以后编目录的一般都把书目和金石目分开。

所谓“金石”的“金”主要是指商周青铜器,“石”指秦汉以来有文字的石刻。现在青铜器及金文的研究已成为考古学、古文字学中的专门学问,研究的人比较多,而石刻研究者却甚少,有些所谓考古学的教科书竟对此只字不提,因此迫切需要把这门历史悠久而且对研究古代历史、艺术(主要是书法,还有碑额、碑侧装饰的浮雕和花纹等)极其有用的学问恢复起来。这里限于篇幅,不能有系统地讲述这门学问,只能就提供唐代文献资料的角度来讲金石书。金石书也太多,当年容媛就编过一厚本《金石书录目》(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民国二十五年商务印书馆本),这里只选择最重要而且常用的讲几种。这几种虽以“金石”为名,但主要是石,石中间唐代占了绝大部分,对研究唐史者特别有用。

《集古录》十卷 北宋欧阳修撰

此书是现存的研究石刻文字的最早的专著。欧阳修是《新唐书》的纂修者,又是金石文字爱好者、收藏家。《集古录》是汇集所作的金石拓本的题跋,主要谈石刻文字的史料价值,以及可补正

史传之处,后六卷都是题跋唐代的石刻。这些石刻中有大部分后来已毁失,连拓本也不传,多幸《集古录》把这部分石刻史料多少保存了一些,这是此《录》最大的功绩。

《集古录》的传本问题较为复杂。此书有欧阳修自序,序后有嘉祐八年题记,又附其子棐熙宁二年《集古录目》题记,其中说:“《集古录》既成之八年,家君命棐曰:‘吾集录前世埋没缺落之文,……尝序其说而刻之,又跋于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所谓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已粗备矣。若撮其大要别为目录,则吾未暇,然不可以阙而不备也。’棐退而悉发千卷之藏,……各取其书撰之人,事迹之始终,所立之时世而著之,为一十卷,以附于跋语之后。”这里所说的“尝序其说而刻之”,当即刻入《欧阳文忠公集》里的《集古录跋尾》,再加上“跋于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卷”,成为今传世的《集古录》十卷,今传本《集古录》书末有不著姓名跋语,说明編集方法,是“于逐篇各注何本,若异同不多则以真迹为主,而以集本所改注其下,或繁简辽绝则两存之”。这跋语当出宋人手。至欧阳棐編的目录“一十卷”,即是《集古录目》。今传本《集古录》卷首又有不著姓名的题记,说明重編《集古录》的办法,是“自周秦至于五代皆随年代为之序,庶几时世先后秩然不紊,间有书撰出于一手,其岁月相迹,则类而次之,又于每卷之末备存当时卷帙之次第,既以便今,亦不失其初云”。说明原传本《集古录》及《目》都不按时代次序,重編《集古录》则按时代次序重排过,又在每卷列出本卷所收碑石在《目》中的原次第。此重編题记也应出于宋人手。宋以后到清初顺治时才有谢启光刻本,就是这个宋人重編本。《四库提要》说“近年刻本乃以时代先后为序”云云,似乎是清人所重編,显然是错误。清道光时又有黄本骥本,光绪时又有朱记荣刻《行素草堂金石丛书》本。朱本又把谢本的原次序更动,并删去每卷末的原次第,不知是否本之黄本骥刻。

版本 从以上所述,当以(1)清顺治时谢启光刻本为善,因能

保存宋人重编的旧式,但此谢刻传本极少。(2)清道光黄本骥刻《三长物斋丛书》本。(3)清光绪朱记荣刻《行素草堂金石丛书》本。(4)《集古录目》在宋人编《集古录》及重编《集古录》时尚完好,但已作二十卷,不像欧阳棐《目》记中所说是“一十卷”,《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八目录类也说二十卷,今此二十卷本也已失传,清道光时黄本骥从陈思《宝刻类编》中所录《集古录目》辑成五卷,和《集古录跋尾》同时刻入《三长物斋丛书》,《行素草堂金石丛书》也据黄辑重刻。缪荃孙又辑《集古录目》十卷,刻入《云自在龕丛书》,于黄辑外再从《隶释》、《輿地纪胜》等收辑,并加有跋尾碑目,共得七百三十九种。

《金石录》三十卷 北宋赵明诚撰

此书一向和《集古录》齐名,前人往往称金石学为“欧赵之学”,即指此《集古》、《金石》两录而言,近代则因有赵明诚妻李清照的后序而知名。赵氏夫妇收集金石拓本、书籍、古器以及最后逐次散失的经过已详记《后序》中,《后序》是常见文字,不必徵引。这里只简单说一说此书的体例和价值。体例是仿照《集古录》,不过是把目和题跋合为一书。全书三十卷,前十卷是目录,一共著录二千卷,实际不到二千种,因为少数大碑是一碑分为二卷或多卷的,但已比《集古录目》的一千卷多出许多,这二千卷都按时代先后排列,比《集古录目》的不按时代也是后来居上。后二十卷是题跋,不是二千卷都题跋,只题跋了五百零二种,但已是很有用的历史文献。因为和《集古录》一样,这《金石录》所收所题跋的大部分原石及拓本都已不传,其中唐代的占有很大部分,靠这《金石录》把其中部分内容保存下来。

版本 (1) 有一部宋刻至清代残存十卷,先后经冯砚祥、阮元、韩泰华、潘祖荫等收藏,极为有名,建国后归上海图书馆。另一部宋刻三十卷全本是道光时南京甘氏津逮楼所藏,一向珍秘不为

清呂無黨手抄本《金石錄》

金石錄卷第二十四

跋尾十四唐

唐益州學館廟堂碑

唐萬年宮碑陰題名

唐薛收碑

唐崔敦禮碑

唐贈左僕射楊達碑

唐李靖碑

唐辨法師碑

唐蘭陵長公主碑

唐清河公主碑

金石錄

卷第二十四

一

清呂無黨手抄本《金石錄》

世人所知,1950年由赵世暹在南京论斤收得,经张元济、顾廷龙等鉴定是宋本(可能是龙舒本,即此书第一刻),即捐献国家,今藏北京图书馆,1983年中华书局《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是最古、最善之本。(2)清顺治谢世箕刻本,世箕为刻《集古录》的谢启光之子,《金石录》此刻在当时是最善之本,但传本亦极稀少。(3)清乾隆卢见曾雅雨堂刻本,据几个明抄本、影抄谢世箕刻本、何焯校本等汇校刊物,是最通行的善本,但未收入《雅雨堂丛书》中。(4)《行素草堂金石丛书》重刻卢本。(5)清光绪朱澂辑刻《结一庐朱氏剩余丛书》本,附缪荃孙撰札记一卷、今存碑目一卷,此版又编民国时刘承幹《嘉业堂丛书》中。(6)《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清吕无党抄本,附校勘记一卷。(7)1985年上海书画出版社《金石录校证》,用雅雨堂本作底本,校以《三长物斋丛书》和《四部丛刊续编》本,惟仍未能参校宋本。

以上就宋人金石书里讲最主要的两种,下面讲清人的金石书。清人的金石书数量更多,只讲一部《金石萃编》,再附带举几种续《萃编》性质的。其他只记某一省区的,以及只有目录的、只录文字无考证的、只有考证不录文字的,这里都从略。

《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 清王昶撰

这是讲石刻文字(有很少一点金文)的一部空前的大书,当然不好说是绝后,但至今还没有出一部超过它的大著作。卷首有嘉庆十年王昶八十二岁时的自序,实际是讲此书的规模和体例:(1)“古金石书,具目录、疏年月、加考证焉尔,录全文者,惟洪氏《隶释》、《隶续》为然,而明都氏穆(《金薤琳琅》)、近时吴氏玉搢(《金石存》)等继之,然洪氏隶书之外篆与行楷屏而不载,都氏止六十八通,吴氏止一百二十余通”,而此《萃编》多至一千五百余通,都写录目录、年月、全文并加考证。(2)“欧、赵所采止于五代,后之著录者

取以为法焉，然欧公上至五代仅及百年，《金石录》以刘跂作序之岁数之亦百有五十年耳，而宋末辽金迄今至历五百余年之久，其未可引欧、赵之例斤斤以五代为断明矣”，因此《萃编》本收至元代，后因省刻书工值至宋末而止。(3)录全文的办法是“缺其漫漶剥不可辨识者，其文闻见于他书，则为旁注以记其全，秦汉、三国、六朝篆隶之书多有古文别体，摹其点画，加以训释，自唐以后，隶体无足异者，仍以楷书写定”。(4)“凡额之题字、阴之题名、两侧之题识，胥详载而不敢以遗”。(5)碑制之长短宽博，则取汉建初虑僂尺(《萃编》卷五著录)度其分寸，并志其行字之数，使读者一展卷而宛见古物焉”。(6)原序还漏讲一点，即在每种石刻之下都注明原石在什么地方，原石所在不详或已佚的则注谁家藏拓本。(7)“至题跋见于金石诸书及文集所载，删其繁复，悉著于编。前贤所未及，始援据故籍，益以鄙见，各为按语”。最后并说“余之为此，前后垂五十年矣，海内博学多闻之彦，相与摩挲参订者不下二十余人，咸以为欲论金石，取足于此，不烦他索也，然天下之宝日出不穷，其藏于嗜古博物之家，余固无由尽睹，而丛祠破冢继自今为田父野老所获者又何限，是在同志之士为我续之已矣”。对本书的评价很确当，对后人的希望也很恳切。

此书从卷四一到一一八共七十八卷都是唐代的，为研究唐史提供了最可信据的第一手文献。除自序所说外，还有两个优点：(1)所录石刻原文一般都比较认真详密，而且王氏是乾嘉时代人，所用的拓本起码是乾嘉拓本，比新拓本往往多字，有的甚至用明拓、宋拓。不足之外是没有注明拓本的时代，有些石刻文字还没有能用较好的宋、明拓本(如昭陵石刻，罗振玉《昭陵碑录》就重新根据宋明拓、精拓作了较好的录文，当然罗《录》也非尽善尽美，还可以找旧拓校补)，某些录文也有粗疏之处，据说是他晚年精力不济，诱之门生所致。(2)广搜了诸家的题跋考证，和王氏同时代的名著如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跋尾》等也都收了进去，一种石刻之后名

家之说罗列,可互相补充对勘,而王氏自己所作的案语(实即题跋)也多数极精审,其中还有若干综合性论述,实际是单篇论文,对唐代制度名物有很多发明(也有写得较差或有错误漏略的,可能是出于门生之手,也可能仍是王氏手笔,一个人精力思虑总难免有局限)。至于王氏未收入的以及王氏以后的石刻题跋,则有杨殿珣编《石刻题跋索引》,民国三十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57年商务又出增订本,增订本所根据有石刻题跋的著作共一百三十六种,可据此索引再查找原书。

版本 (1)清嘉庆十年王氏刻本。(2)光绪十九年醉六堂影印本,清末民国初扫叶山房影印本,1985年中国书店影印本。(3)此书编至元代,稿本后为罗振玉所得,整理为《金石萃编未刻稿》三卷,民国七年石印小本三厚册,都是元代石刻,和唐史无关。

续《金石萃编》的有好几家,都各自续作互不相谋,编成刊印的主要有:

《金石续编》二十一卷 清陆耀遹撰 陆增祥校订

版本 清同治十三年双白燕堂刻本,民国十三年罗振玉校补印本,醉六堂影印本,扫叶山房影印本,中国书店影印本。

《金石萃编补正》四卷 清方履篋撰

版本 醉六堂石印本,扫叶山房石印本,中国书店影印扫叶山房本。

《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目录三卷祛伪一卷札记四卷元金石偶存一卷 清陆增祥撰

版本 民国十四年刘承幹嘉业堂刻本,1980年文物出版社用原版刷印,1985年文物出版社又出缩印本,惜断句错误太多,几无

页不有。

以上三家都是道光、咸丰到同治初年时人，书中都著录有若干唐代石刻，尤以《八琼室金石补正》唐石刻达五十卷为最多。

案自王氏《萃编》成书以后，到同、光时新发现的碑志不算很多。大量发现是从清末到民国二十年左右，在洛阳发现了大批魏墓志、唐墓志，其中唐墓志光张昉个人就收集了上千种，在其故乡河南新安铁门建立了千唐志斋，1983年文物出版社将全部藏志拓片影印出版，计有唐志1209种。建国后在西安以及关中地区又有大批唐墓志发现，尤其昭陵新出土若干唐碑唐墓志，都是当时的显贵人物，非千唐志斋藏品之多普通官吏墓志之比。“文革”前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李果（字子春）专门整理墓志，已全部完成录文并考释，惜未刊行，李氏且已在1966年“文革”初被迫害去世。改革开放后出版的大型唐墓志录文，则有：

《唐代墓志汇编》 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

此书计著录唐墓志3607方，按年号先后编号排列。录全文加标点，并注明石藏何地、拓本藏何处。拓本中以周氏自藏为多，无拓本可寻则注明志文录自何书，个别伪造之物也收入而加注“伪”字，其编纂始于1984年，作为文化部文部局古文献研究室的工作，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氏精熟李唐文史，此书编录精审，是治唐史者必备之书。

书 目 类

以上各类的唐史史料,都是原书现存或原书虽佚而已有辑本单行的。还有很多原书已佚仅有片断记述为其他旧籍所引用,这些书的撰人、卷数和内容大概也就有需要了解。再有许多原书已全部佚失,但了解其书名撰人、卷数以及内容大概,对研究唐史也不无用处。为此,在这里就得把有关的旧书目择要讲解。因为这些旧书目中除现存的古籍外都有大量已经佚失的唐人撰述或有关研究唐史的撰述,都著录了书名、卷数和撰人,有些还讲了内容大概,多少可满足点研究时所需要。至于这些书目中所载今存之书其书名、卷数间或与今本有出入可资考证这点,则已久为治目录学者所熟识,自毋庸多说。

《旧唐书》卷四六至四七经籍志

此志前有总序,说明这实际上是开元时皇室内库的收藏书目。开元“九年十一月,殷践猷、王愷、韦述、余钦、毋暉、刘彦真、王湾、刘仲等重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自后毋暉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今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就是把毋暉的《古今书录》精简一下撰成此经籍志,从古著录到开元时代,开元以后的撰著在这个志里就看不到。再则《古今书录》所著录之书本都有内容提要,所以有四十卷之多,经籍志精简成二卷,就只有书名、卷数和撰人姓名了。

《新唐书》卷五七至六〇艺文志

此志优于《旧唐书》经籍志,所著录自古直至唐末,有些部类唐人撰著占了大多数,而且除书名、卷数、撰人姓名外,有时还注上一两句撰人的官职和撰作原委,因此较《旧唐书》经籍志更常为研究唐史者所翻检引用。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一卷 日本藤原佐世撰。

日本嵯峨天皇贞观十七年(唐僖宗乾符二年)储御书处冷然院罹灾,秘阁藏书多毁,遂命藤原佐世以见存书编为此目,成于宽平年间(唐昭宗龙纪元年至乾宁四年)。分类一遵《隋书》中《五代史志》经籍志,即书名下的注语也多抄录《隋》志。所著唐人之作,则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相出入,缺点是止有书名、卷数、作者姓名而无内容提要,但仍可与两《唐》志同样利用。

版本 (1)《古逸丛书》影刻日本室生寺旧抄本。(2)1928年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印《日本古典全集》第二回中有狩谷掖斋撰《日本现在书目证注稿》,即用《隋书》、《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作注。

《崇文总目辑释》五卷补遗、附录一卷 北宋王尧臣等原撰 清钱东垣辑释

《崇文总目》是北宋皇家崇文院的藏书目录,王尧臣、欧阳修等奉诏于仁宗庆历元年编成,有六十六卷,叙录一卷,除书名、卷数、撰人姓名外尚有提要。惜原本久佚,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文编成十二卷,但《大典》仍只是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采录。嘉庆四年钱东垣又从《欧阳文忠公集》、《玉海》、《文献通考》等书增辑编成五卷,及补遗、附录一卷。

版本 (1)《粤雅堂丛书》本。(2)《丛书集成》据《粤雅》本。(3)1987年现代出版社《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影印《粤雅》本。(4)民国初陈汉章撰《崇文总目辑释补正》四卷,《缀学堂丛编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二卷鈔本 張英川藏書

紹興年改定

直齋書錄解題秘書省闕書目一卷亦紹興改定其闕者註闕字
於逐書之下又玉海紹興初改定崇文總目秘書省續編四庫闕
書又云紹興十七年鄭樵按秘書省所頒闕書目錄集為求闕記
七卷當即此本書目凡錄三千八百餘種按秘書省元改行中書
省明為布政使司當時秦燴主提調殆從事於此耳未有隆慶辛
未閏月讀三復傳錄一過并識包山陸治又道光癸巳李兆洛題
題記

初集》排印本,《书目丛刊》第一辑影印本。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二卷 南宋兴初改定
清叶德辉考证**

此是南宋高宗绍兴时所编官书目,传有影宋抄本,止有书名、卷数,间冠有撰人姓名。清末叶德辉用《郡斋读书志》等为每书作考证。

版本 (1)叶德辉《观古堂书目丛刊》本。(2)《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影印《观古堂》本。(3)1957年商务印书馆《宋史艺文志·补·附编》本。

**《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五卷
《中兴馆阁续书目辑考》一卷 南宋陈騵、张攀等撰
赵士炜辑考**

南宋孝宗淳熙五年秘书少监陈騵等编成《中兴馆阁书目》七十卷,序例一卷,宁宗嘉定十三年秘书丞张攀等又奉诏编成《中兴馆阁续书目》三十卷。这两部书目均有书名、卷数、撰人姓名和提要,但久已佚失。民国时赵士炜从《玉海》、《直斋书录解题》等辑得若干条,并略作考证。

版本 (1)民国二十二年北平图书馆、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刊《古逸书录丛辑》排印本。(2)《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影印《古逸书录丛辑》本。(3)1957年商务印书馆《宋史艺文志·补·附编》本。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袁本四卷、衢本二十卷 南宋
晁公武撰**

《附志》二卷、《后志》二卷、《考异》一卷 赵希弁撰

此书简称《郡斋读书志》。当初井宪孟任四川转运使,家多藏

书,后全部赠与晁公武,绍兴时晁守荣州,据以撰成《郡斋读书志》四卷,有书名、卷数、撰人姓氏,还有内容提要,杜鹏举为之刊刻,世称“蜀本”。理宗淳祐九年黎安朝在袁州重刻,命赵希弁校勘,赵也多藏书,就所藏择晁志所未及者补撰《附志》二卷,一并刊刻,世称“袁本”。前此晁公武门人姚应绩又编有二十卷本《郡斋读书志》,同在淳祐七年由游钧刻于衢州,世称“衢本”。淳祐十年黎安朝得衢本,又命赵希弁与袁本对勘,赵抄出衢本比四卷本增多之条目编成《后志》二卷,并撰写四卷本与二十卷衢本之异同为《考异》一卷,合前所刊《志》四卷、《附志》二卷行世。至衢本比四卷本增多之条目据黎安朝推测是晁公武自藏之书,当初为井氏赠书撰《读书志》四卷时尚未暇撰写提要并入《志》中。又衢本和四卷本相同条目也间有提要文字较四卷本增多处,或是晁氏后来添改,赵希弁未能将这些增多的文字补入袁本,这是袁本美中不足之处。今袁本、衢本均有流传,最初的四卷蜀本则已失传。但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三百八十卷,其中经籍考有七十六卷,每条常称“晁氏曰”、“陈氏曰”而不更多着一语,这“陈氏曰”是引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氏曰”则引用《郡斋读书志》,其文字又和袁本略有异同,可能就是录自蜀本。

《郡斋读书志》的最大优点是有内容提要,胜于无提要之两《唐书》志。《崇文总目》等官修之本虽本有提要,但原书已佚失,今止辑存片断。而《郡斋读书志》则袁、衢两本以至《文献通考》所引之本至今完好无缺,因此历来受到学人重视,与《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同为研究唐史者所常利用。

版本 (1)袁本,向仅有清康熙六十一年陈师曾据旧抄刻巾箱本,但有颠倒脱误处。民国时故宫发现南宋淳祐原刻袁本,商务印书馆《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三编》以及《万有文库第二集》均有此原刻袁本之影印本,《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又影印《续古逸丛书》本。(2)衢本,向仅有抄本。清嘉庆二十四年汪士钟刻本,即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第二上
史部其類十有三一曰正史類二曰編年類三曰實
錄類四曰雜史類五曰偽史類六曰史評類七曰職
官類八曰儀注類九曰刑法類十曰地理類十一曰
傳記類十二曰譜牒類十三曰目錄類後世述史者
其體有三編年者以事繫日月而總之於年蓋本於
左氏明紀傳者分記君臣行事之終始蓋本於司馬
遷實錄者近起於唐雜取兩者之法而為之以備史
官採擇而已初無制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編年紀傳
則各有所長殆未易以優劣論雖然編年所載於一

宋淳祐袁州刻本《郡齋讀書志》

清李富孙、黄丕烈用旧抄校刻,但仍有错失处,详顾广圻《思适斋集》卷一五《衢本郡斋读书志考辩跋》,当据以校正。(3)清光绪十年王先谦编刻《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二十卷附志二卷,以二十卷之衢本为主,用袁本校注,袁本中为衢本所未有的赵希弁《附志》二卷则转附其后,但所用袁本止是康熙陈刻,衢本亦悉从汪刻而止以顾广圻说入小注,实难称精善。《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又影印此王刻本。(4)《文献通考》经籍考部分,198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校古籍研究所点校本《文献通考经籍考》,用清武英殿本校以元刻本和明弘治单刻本,惜未用《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原书对勘引文异同。(5)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以衢本为基础,合校袁本,并广采各家成果及异文,且编有索引,较便利用。

《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 南宋陈振孙撰

陈氏此书当成于理宗淳祐年间(详陈乐素《直斋书录解题作者陈振孙》文,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本《解题》附录中),已是南宋末叶,和南宋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堪称双璧,至后人有“晁陈之学”之称。其优长之处也在于有内容提要,可与晁《志》相互补充。又其中还间或有署名“随斋”的批注,清人考证应是《雍录》撰人程大昌之孙程棨,但所批注实浅陋不足重。

此书原本,清卢文弨曾作考证,谓“唯别集分三卷,诗集分两卷,其余每类各自为卷,虽篇幅最少者亦不相为联属,余得据之定为五十六卷”(卢氏《抱经堂文集》卷九《书新订直斋书录解题后》)。但此种原本在清代已只存几种残抄本,今通行之本悉是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抄辑之本,由馆臣随便分为二十二卷,并无任何依据,惟与原本残抄对勘,内容尚无出入。

版本 (1)《武英殿聚珍版书》本,是《四库》辑本的第一次印本,《聚珍版书》有多种重刻本,《丛书集成》本也据《聚珍》本。(2)

直齋書錄解題卷首

楚辭類

楚辭卷七

漢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集後漢校書郎南
郡主逸叔師注知饒州曲阿洪興祖慶善補注逸
之注雖未能盡善而自淮南王安以下為訓傳者
各不復存其目僅見於隋唐志獨逸注幸而尚傳
興祖從而補之於是訓詁名物詳矣

離騷釋文一卷

古本無名氏洪氏得之吳郡林處德祖其篇次不
與今本同今本首騷經次九歌天問次章遠遊下



明光一第即本撰《元抄本《直齋書錄解題》英苑》(1) 本號
(2) 本《急果》撰出本《如菓神丛》,本號重林之官《許淵急果》,本

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徐小蛮、顾美华点校本,以《聚珍》本作底本,校以北京图书馆藏卷四七至五〇之元人抄残本和上海图书馆藏卢文弨《新订直斋书录解题》五十六卷之稿本(缺卷八至一六)以及《文献通考》经籍考引文,并辑有关资料为附录,且编有索引,实精审可据。

《宋史》卷二〇二至二〇九艺文志

此志多根据《中兴馆阁书目》等南宋所编官书目,并删除提要止有书名、卷数及撰人姓名,芜陋欠精审。但由于此等官书目均已佚失,辑本如前所说止存片断,而此志究属完整,因此也常为研究者翻检引用。

版本 (1)北京图书馆藏元刻残本,艺文志部分已缺失。此部分现以明成化朱英刻本为最古。(2)明万历时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本。(3)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二十三史》本,又有各种覆刻本、影印本、排印本、缩印本,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本。(4)民国时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史》用元刻本配明成化刻本,艺文志是成化刻本。(5)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本。(9)1957年商务印书馆《宋史艺文志·补·附编》本。

《元史》无艺文志,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只录元人著作,《明史》艺文志也只录明人所作,均与唐史研究无关涉。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即通称为《四库提要》者尽是现存之书,《提要》语之可取者已分别采入本《唐史史料学》之有关条目,其失当者亦间作批驳,于此均不更赘。

敦煌吐鲁番文书类

以上各类包括金石类书目类所讲的,都是比较传统的史料,绝大多数即使清代学人也已经常使用。本世纪以来考古事业发展迅速,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而其中可用来研究唐史的史料甚多,因此需要在最后专作一类来讲。先大致讲一点这两处文书的概况,然后着重讲刊布这些文书的书籍。

敦煌唐代属沙州,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门户,当时佛教在此盛行,形成规模宏大的莫高窟石窟寺群,清光绪二十六年在一个小石窟内发现大批经卷和书籍簿册约四万件以上,世称“敦煌文书”,也称“敦煌遗书”。除国内保存一部分外,大部分已流入海外,目前收藏情况大体是:(1)北京图书馆藏 9871 号摄照片 98000 张,另有数千号残卷尚未公布。(2)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南京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台北“中央图书馆”、敦煌研究院、西北大学图书馆和台北历史博物馆也均有少量收藏。(3)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藏“斯坦因文书”,有汉文写本文书 7599 号摄照片 87493 张,刻本文书 20 卷及小碎片摄照片 800 张,非汉文文书摄照片 21281 张。(4)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文书”,有汉文文书 5579 号摄照片 24907 张,吐蕃文和贝叶写本摄照片 21770 张,西域各种古文字文书摄照片 4000 余张。(5)俄国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所藏,已编目者有 2953 号摄照片约 10000 张,未编目者数量逾 10000 号。(6)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龙谷大学、中村不折、滨田德海等公私所藏亦有不少。此外美国、德国亦略有收藏。

吐鲁番唐代属西州,其地气候干燥,墓葬中当年被制成鞋、帽等物的文书,以及寺院、石窟遗址所藏文书、经卷,时逾千年,掘出仍未腐烂,可资研究之用,世称“吐鲁番文书”。建国前所掘出的大部分流散国外,以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和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为多,建国以后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则多人藏新疆博物馆。

这两处文书之可供研究唐史利用者大体有如下六类:

(1) 法令。敦煌文书中有《律》和《律疏》多种残卷,有《永徽职员令》(斯 1880 等)、《天宝官品令》并附有《假宁令》、《公式令》、《田令》、《禄令》(伯 2504)、《神龙散颁刑部格》(伯 3078、斯 4673)、《户部格》(斯 1344)、《水部式》(伯 2507),吐鲁番文书中有《度支式》(阿 230 墓)。唐令及格、式久佚,律虽存而唐写本亦可资校勘。

(2) 地理。敦煌文书中有《西州图经》(伯 2009)、《沙州都督府图经》(伯 2005、伯 2695)、《沙州地志》(斯 0367)、《敦煌录》(斯 5448)、《贞元十道录(?)》(伯 2522)、《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伯 3532),均为唐人撰写有关西陲地理书籍,可用以研究其时地形、交通、水利、物产和社会组织。

(3) 籍账。敦煌、吐鲁番文书中都有大量“手实”、“户籍”、“户口账”、“点籍样”等籍账文书,可了解唐代户籍制度以及人口分布和土地占有情况。还有大量的请田、授田、退田、欠田文书,究属何性质尚待研究。各种配役名籍、征镇及诸色人名籍、差科簿则可了解当地兵役、劳役情况,政府、寺院以及私人财物账对研究社会经济也很有用处。

(4) 契约。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大量契约,如买卖田地、住宅、车牛、奴婢契,租地、典身、典儿契,雇工、雇牛、雇驴、雇驼契,借粮、货绢契,以及分家、遗书、放良、放妻等契,对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都极有用处。

(5) 其他官方文书。有行政部门、军事部门的档案,如州县判文集、审理诉讼的案卷、军队屯田营田的文案,有公务往来的敕帖、

符、牒等文书,有个人或单位向上级部门申请、申诉的状文,还有官府签发的证明文书如公验、过所、市券、告身之类。这些文书上往往钤有政府官印,记有日期和主管官员批示,为研究唐代行政制度和文书程式提供了实物资料,且可以从中考察唐代西北地区馆驿、烽燧、屯田等多方面情况。

(6) 诗文。敦煌文书中含有大量唐人诗文作品,其中富于史料价值的也不少,如《张淮深墓志铭》(伯 2913)、《张淮深碑》(伯 2762 等)、《张延绶别传》(伯 2568),以及《张议潮变文》(伯 2962)、《张淮深变文》(伯 3451)等,可供研究晚唐沙州地区历史。如唐刘邰所撰《甘棠集》早已散佚,敦煌则出土了四卷本的《甘棠集》(伯 4093),存有表状八十八通,记载了宣、懿、僖三朝的许多人物和事件,为研究晚唐史提供了有用的史料。晚唐诗人韦庄所写《秦妇吟》久已失传,而敦煌文书中竟有十种抄本。其他民间说唱材料和实用文牒也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生活状况。

当然,要能利用这些文书来研究唐史,还得首先对两《唐书》、《通鉴》等史书下功夫,因为史书是全面系统的,而这些文书则一般都是零散的记载甚至是断片残卷,没有全面系统的知识如何读得懂,更如何谈得上研究利用。正确的应是以史书为主、这些文书为辅,切莫赶时髦而主次不分,本末倒置。

这些文书中如前所说已有大量的拍摄照片,制成缩微胶卷或图录,但购置得费巨款,不以研究敦煌为专业的机构很少备有,因此一般得利用刊布这些文书的书籍。这里就其中可资利用研究唐史者略按出版先后,择要讲述,最后再讲两种目录性质的以为寻找文书提供线索。

《敦煌石室遗书》 罗振玉辑

此书是国内最早刊布敦煌文书者,收录十余种,属唐代者为《沙州志》残卷、《西州志》残卷、《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温泉

铭》、《沙州文录》等。

《沙州志》即前述《沙州都督府图经》(伯 2005),因此卷首尾缺佚,据内容拟名《沙州志》,后发现另一残卷(伯 2695)题“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文与此卷正合,遂得知原名。罗振玉跋谓:“其存者长不逾三丈,始于水渠,竟于歌谣,叙述详瞻,文字尔雅。其所记水渠、泊泽、池堰,如苦水、独利河、兴胡泊及三泽二堰,均不见于他地书。七渠之名,仅都乡渠一见于《使于阗记》;盐池三所,《元和图志》则举其一而遗其二。所记城塞驿路,如汉武之长城旧塞、十九驿之名称建置,均为古今地志之所不及。”此外还记学校、祠庙、古迹、祥瑞,和风俗使所采的歌谣,其中还空列十余项名目,如监牧、羈縻州等,后曰“右当县并无前件色”,可知唐代各地撰写图经要按统一的规格。此图经撰作年代,据罗振玉考订为开元、天宝年间,王重民认为应在武周时期,通观全文似以后者为是。

《西州志》即前述《西州图经》(伯 2009),亦是首尾均缺,无书名。其中可补正两《唐书》地理志、《元和志》处甚多。如罗振玉所跋谓:“两志均言西州领县五,《旧》志为高昌、柳中、蒲昌、天山(《通典》及《寰宇记》无此县,《元和志》有之)、交河(此名见柳中注中);《新》志则有前庭,无高昌,而于前庭注曰‘本高昌,宝应元年更名’(《元和志》作天宝元年更名)。今此卷所载凡六县:曰高昌、曰前庭、曰柳中、曰蒲昌、曰天山、曰交河,高昌、前庭并载,疑《唐》志及诸地志误也。……至卷中所载十一道,《唐》志及诸地志均不载。”此书撰作年代,罗氏以为“乾元以后,陷蕃以前”。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是继《大唐西域记》后又一部记载中亚南亚地理的游记。罗振玉跋谓:“此卷首尾残缺,……记周游五天竺行程及国土、宗教、物产、民风。初不省其书名及作者之姓氏,检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就其《音义》,证以此卷,……知此即慧超《传》矣。……慧师行业,释氏记录多弗及,其成此书殆在玄宗朝。书中有‘开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至西

安’云云，其明证也。书中记述，不能如《西域记》之详赡，然如称‘胡密国北山中有九识匿国，国有一王’，与《唐书》外国传五识匿各有酋长之说不合；谓‘疏勒，外国人呼伽师祇离国’，证以《唐书》疏勒传足正慧琳《音义》‘伽师佶黎即葱岭’之非。”其他可资考证者尚不少。

《温泉铭》是唐太宗亲自撰文并书写的温泉碑铭，石刻元以后即佚失。此拓本割裱成卷，铭前碑文开端大半缺残，纸尾有墨题一行，曰‘永徽四年八月三十日围谷府果毅见（下缺）’，知是唐初所拓。

《沙州文录》是由蒋斧收辑的一组碑文、牒状、赞记。有唐《右军卫十将使孔公浮图功德铭》，叙其曾祖为唐邠州良杜府折冲都尉，祖父为丹州长从府折冲都尉，父为京兆恒王府折冲都尉，可资府兵研究。唐《陇西李家先代碑记》，卷子本存前半，碑刻存后半，遂拼成全文，碑立于大历十一年，文中叙其祖父为大黄府车骑将军、父为昭武校尉甘州和平镇将，还提到当时的节度使观察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御史大夫蔡国公周公，检《唐方镇年表》，此节度正是周鼎，知《年表》考证不误。《吴僧统碑》，称其父为前唐王府司马，授建康军使廿余载，又隐约叙述沙州陷于吐蕃的变故，知是吐蕃统治时期所作。《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称其曾祖为唐正议大夫检校豆卢军事兼长行坊转运支度等使，祖父为唐右骁骑守高平府左果毅都尉，父为唐游击将军丹州长松府左果毅都尉，吐蕃陷沙州后任前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其弟嘉义为大蕃瓜州节度使行军先锋部落上二将，弟嘉珍为大蕃瓜州节度使行军并沙州三部落仓曹及支计等使，可据以了解吐蕃官制。《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称其祖父天宝末为左金吾会州黄石府折冲都尉，兄为沙州防城使，兄小子忠信“奉元戎而归阙，臣子之礼无亏，回驾朔方，被羈孤而日久，愿投桑梓，未遂本情”，似指张议潮入朝事。《李氏再修功德记》，记主李明振即张议潮之婿，曾朝见宣宗，授凉州司

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兄为河西节度衙推兼监察御史,另一兄任沙州录事参军,长男为沙州刺史兼节度副使,次男瓜州刺史,次男甘州刺史,次男左神武军长史,记中还透露张议潮赴阙后,此地曾有权力之争,后张淮深获胜,又提到宦官曾抵敦煌颁宣圣旨,碑末有张淮深等题衔,故此碑对考证晚唐史事甚有价值。所录状牒、赞记多为五代时物,唐代状牒止《瓜州牒状》一件,似在张议潮时期。

版本 (1)清宣统元年罗振玉排印本。(2)1970年台湾文华出版社版《罗雪堂全集》三编本。(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版《敦煌丛刊初集》本。

《敦煌石室真迹录己》二卷 王仁俊编

此书止录《开元律疏名例》一种,上卷为影写卷子本原文,其文从“又云先以高者当”始,至“律疏卷第二名例”终,计二千余字,未有刊定官职务姓名,作“开元廿五年六月廿七日知刊定中散大夫御史中丞上柱国臣王敬从上、刊定法官宣义郎行滑州酸枣县尉明法直刑部武骑尉臣俞元祀、刊定法官通直郎行卫州司户参军事明法直中书省护军臣陈承信、刊定法官承议郎前行左武卫胄曹参军事飞骑尉臣霍晃、银青光禄大夫守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知门下省事臣牛仙客、兵部尚书兼中书令集贤院学士修国史上柱国成纪县开国男臣李林甫”。下卷为“唐开元律疏案证”,先补写卷子本所缺之前文,从“以官当徒问案曰”始,至“又云先以高者”,然后将写本与流行旧疏对勘,述其异同,再将《通典》、《会要》、两《唐书》等书中有关修开元律疏之文录出,最后是王仁俊按语,谓:“此唐写《开元律疏名例》卷,乃尚书都省写五十本之一,发于沙州,而张义朝等所尊藏中朝墨迹,为释吏传录者。察行式结衔,确是开元奏上如此。俊既罗列此事本末,私论此卷有五善:一、可考王敬从等删缉之法意也。……一、可辑开元律佚文也。……

一、可订刊定官之姓名也。……一、可补史志传之阙也。……一、可论断开元时政也”云云。

版本 (1)清宣统三年国粹堂石印本。(2)1974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本。

《鸣沙石室佚书》 罗振玉辑

此书收录十八种,属唐代者为《阆外春秋》、《张延绶别传》、《水部式》、《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残地志》、《沙州图经》、《西州图经》、《太公家教》、《星占书》、《兔园策府》、《唐人选唐诗》计十一种。

《阆外春秋》,原本十卷,唐李筌撰。《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一二兵书类谓:“唐少室山布衣李筌撰,起周武王胜殷,止唐太宗擒窦建德,明君良将战争攻取之事,天宝二年上之。”原书已佚,此录有敦煌出土两残卷,一为卷一及卷二前段(伯 2668),记周秦,首有天宝二年李筌进书表,一为卷四、卷五(伯 2501),记两汉,记唐初部分惜已佚失。

《张延绶别传》(伯 2568),河西节度判官张球光启三年冬撰。罗振玉跋谓:“传称延绶为河西节度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河西万户侯南阳张公字禄伯第三子,以光启三年三月授左千牛兼御史中丞,……是光启三年延绶之父方任节度,西河无事,延绶且以荫得官,岂有如吐蕃传咸通十三年曹义金已代张氏之理?且《旧五代史》吐蕃传称‘唐庄宗时回鹘来朝,沙州留后曹义金亦遣使附回鹘以来,庄宗拜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使’,是义金之守归义军在同光之初,上距咸通将六十年,……以此证之,《唐书》之讹成铁案矣。”可知此传价值。

《水部式》(伯 2507),此卷首尾俱残,未见篇名,对照《白氏六帖》所引文,知为唐水部式,存近三千字,内容关乎渠堰、漕运、桥梁、关津的管理。罗振玉用以对勘《唐六典》及《新唐书》百官志,发现可订正其疏误者至十处。此卷还有不见于史籍的海运制度史

料,如“沧瀛贝莫登莱海泗魏德等十州共差水手五千四百人,三千四百人海运,二千人平河,宜二年与替”,“安东都里镇防人粮,令莱州召取当州经渡海,得助人谳知风水者海师贰人,拖师肆人,隶蓬莱镇,令候风调海晏,并运镇粮”。

《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伯 2511),罗振玉跋谓:“《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残卷,开首断缺,存河东道州府八:曰晋、曰太原、曰代、曰云、曰朔、曰岚、曰蔚、曰潞。其体例,前述建置沿革,次事迹,次郡望地名,次水名,次山名,次人俗,次物产,为后世地志体例所自昉。《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著录凡九卷,韦澳撰,一作‘处分语’。今以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中所记建置沿革皆本《图志》,其事迹、山川、风俗、物产则有损益。”此残卷可校补《元和郡县图志》和两《唐书》地理志。

《残地志》(伯 2522),存十六行,记剑南道姚、协、曲、悉、柘、静、保、霸、维、真、恭、翼十二州,每州之下记所管县名、土贡及距两京与县距州之里数,与《通典》、《元和志》、两《唐书》志多有不同,罗振玉跋有详细考订。从所记事实看,此书成于贞元时期,故此书应即是已佚之贾耽《贞元十道录》。此书重出,对考订唐代地理提供了新史料。

《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已见于前书,此不赘叙,但此为影印,可见原写面貌。

《太公家教》,是唐、宋时期民间流行的童蒙读物,讲授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多作四字韵语,浅显通俗,是了解唐代世俗思想的珍贵资料。其书久佚,亦不见于书目,但敦煌就发现写本三十余种,足见其时之盛行。此卷为罗振玉所藏,王国维跋谓:“前题存一卷字,篇首阙五字,余均完好。共一百二十七行,每行自十八九字至廿四五字不等。行书拙率,似出中唐以后。”

《星占书》(伯 2512),卷中有“自天皇已来至武德四年二百七十六万一千一百八岁”云云,知撰于唐初,首尾不全,不知原书名、

撰人。

《兔园策府》(伯 2573),为唐杜嗣先所撰类书。《困学纪闻》谓:“《兔园策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原书久已失传,此残卷也仅存序文一部分。

《唐人选唐诗》(伯 2567),原卷无标题,此为罗振玉所拟,其跋谓:“诗选残卷,其存者凡六家。前三首撰人名在断损处,不可见,今据《全唐诗》知为李昂。其名存者,曰王昌龄、曰邱为、曰陶翰、曰李白、曰高适。都计诗数,完者七十一篇,残者二篇。今以诸家集本传世者校之,李昂诗《全唐诗》载其一而佚其二。王龙标诗卷中十七篇,见于集本者四篇,其八篇则今见《孟浩然集》。邱为诗六篇、陶翰诗三篇,载《全唐诗》者各一篇。太白诗三十四篇,又古意以下九篇误属入陶翰诗后,共得四十三篇,则悉载集中。高常侍诗二篇,则今集本一存一佚。至卷中诸诗,虽今集本尚存,而异同至多,篇题亦有异同。”可据以校补传本唐诗。

版本 (1)民国二年东方学会影印本。(2)1972年台湾大通书局版《罗雪堂全集》四编本。(3)《敦煌丛刊初集》,所收为1928年东方学会摹抄本,非原卷。

《敦煌零拾》 罗振玉辑

此书汇录敦煌所出的文学作品,有韦庄《秦妇吟》、《云谣集》、杂曲、俚曲、小曲等唐代作品。这些不仅是研究唐代文学,特别是唐代俗文学的珍贵资料,也可利用来了解当时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

版本 (1)民国十三年罗振玉排印本。(2)1972年台湾大通书局版《罗雪堂全集》三编本。(3)《敦煌丛刊初集》本。

《敦煌石室碎金》 罗振玉辑

此书收文书十七种,属唐代者为《敦煌录》、《职官书》、《唐律疏

议》、《食疗本草》等四种残卷。

《敦煌录》(斯 5448)是敦煌地志,记敦煌一地的山川地形、城址祠庙,其中叙莫高窟佛寺的建筑形式和规模,是研究敦煌石窟的重要史料。书中还叙武周、玄宗时张孝嵩破除每年向玉女泉献童男童女祈丰收的陋俗。

《职官书》(斯 1880),实即《永徽职员令》,王国维跋谓:“所录共二十八行,前后阙,存亲王国、三师三公府、亲王府、上柱国以下带文武职事府官属。其体盖唐时所谓令,而此残卷则《职官令》之一也。……当为唐初之制,故与《六典》及新旧两书志又大不同。”

《唐律疏议》两种,一即王仁俊所印《开元律疏名例》,另一种为“杂律下”,罗振玉跋谓:“存‘杂律下’凡八十行,以今本校之,起‘毁人碑碣石兽’条,迄‘得宿藏物’条。今本每条有小题,而此无之。又今本律文顶格,疏议低一格;又律文大字,注皆小字夹注,此本则律与疏平列,而疏文每条上加‘议曰’以别之,注文亦大字,与律文接书,但加‘注云’二字以示别。至此本可勘正今本误字者三,衍文者一”云云。

《食疗本草》,唐孟诜撰。原书已佚,止见诸旧医药书引用,此卷存二十四味药,其中不少是瓜果,每味药先用小字注药性冷热,然后列出治病健身功效。

版本 (1)民国十三年罗振玉排印本。(2)《敦煌丛刊初集》本。

《敦煌掇琐》 刘复辑

敦煌石窟所藏佛经外的汉文文书多为伯希和所得,藏巴黎国家图书馆,刘复留法四年,从其中抄录大量佛经外敦煌汉文文书,回国后分类排比,编成此书。计录敦煌文书一百零四件,分为三辑:上辑为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绎、艺术,中辑为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诉讼、官事、婚事、教育、宗教、历史、迷信、杂事,下辑为语言文

字。有蔡元培序论其学术价值,谓:“就中如家宅图可以见居室的布置,舞谱可见舞蹈的形式,各种借券可以见借贷实物与罚去利息的习惯,通婚书、签婚书可以见结婚的仪节,劝善经、劝戒杀生文与历书、解梦书、吉凶避忌条项等可以见信仰佛教与保守古代迷信的程度。其他杂文以此类推都是很有益于考察当时社会状况的。”

版本 (1)民国十四年刻本。(2)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修补印本。(3)《敦煌丛刊初集》本。

《敦煌遗书》 法伯希和、日本羽田亨辑

此书影印四种,唐代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又排印九种,唐代有《沙州地志》、《张氏勋德记》、《敦煌名族志》残卷。《张氏勋德记》,首尾俱残,碑主为张议潮之侄,任沙州刺史左骁卫大将军,其父张议潭曾任沙州刺史,入朝,授左金吾卫大将军,老死长安,记谓“太保(张议潮)咸通八年归阙之日,河西军务封章陈款,总委侄男淮深”,可补正史籍。《敦煌名族志》,记敦煌诸大姓世系、履历,存张氏、阴氏和索氏,张氏残余数行,索氏残去后部,惟阴氏获全,所记人物多中唐以前者,可见其时唐诸军府及职官名称。

版本 (1)民国十五年上海东亚考古学会本。(2)《敦煌丛刊初集》本。

《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 许国霖编

此书是许国霖从北平图书馆所藏的9000多号敦煌卷子中抄出的资料。写经题记,共有四百余条,胡适撰序说“是一组最有趣味又最有历史价值的材料”,据此可确知佛经的抄写年代、抄写人及有关情况,且可考证史籍记载。《敦煌杂录》汇集了佛经以外的其他文字,有变文,偈赞、音韵、文疏、契约、传记、目录等,以唐代民间通俗之作为多,其价值如许氏自序所去:“可以考谣谚之源流,窥俗尚之迁易,欲知千年社会之演进及经济之转变者,此是重要之史

料。”对于治唐史者来说,其中的各类契牒和《贞观氏族志》尤为可宝。契牒类有借麦种牒、典儿契、卖地契、贷丝契、雇人力契、雇牲畜契,多方面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关系。《贞观氏族志》(位字 79 号),残去前半,故无篇名,卷末有记,云:“以前太史因尧置九州,今为八千(十)五郡,合三百九十八姓。今贞观八年五月十日壬辰,……光禄大夫兼吏部尚书许国公士廉等奉敕令臣等定天下氏族。”案贞观五年唐太宗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至贞观十二年书成,名《氏族志》,诏颁于天下,此残卷应即其书,但撰于贞观八年,或是试行之本,所残存有六十余郡、二百余姓和完整的后记,为研究唐初氏族问题和《氏族志》一书提供了宝贵资料。

版本 (1)民国二十五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2)《敦煌丛刊初集》本。

《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 罗振玉辑

此书汇印了罗氏所藏的数十种敦煌文书,除儒、道、佛经外,有医方、历书、书仪、卜法、占书、尺牍、残律等,于唐史研究最为有用的是唐先天、大顺等年的户籍四件和开元残牒。

版本 (1)民国二十八年罗振玉影印本。(2)台湾大通书局版《罗雪堂全集》三编本。(3)《敦煌丛刊初集》本。

《流沙遗珍》 金祖同辑

此书汇录日本中村不折所藏的二十五件敦煌、吐鲁番文书,前半影印图版,后半录文,每件录文后并有跋语。所录悉为官私实用文书,有帖、牒、买牛契、租田契、春衣历、诉状、买练收据、柴米帖、寺院出纳账等。

版本 (1)民国二十九年印本。(2)《敦煌丛刊初集》本。

《敦煌石室画象题识》 史岩辑

此系史岩自敦煌莫高窟一百零九个窟壁画上所抄录的九百四十条供养画像题记，“其中题名居八百七十则，题记二十三通，发愿文十六通，功德记十通，功德铭一通，题梁四通，题额一品，榜记十四品，题字一品”，每篇题识前注明何窟何壁、画像何状、题识高广、字迹大小、用何书体等。其价值如自序所云：“西土边臣，史每失书，或书而不详，详而不实，莫高题名中存此独多，足补职方之记载，订史官之疏漏。……其姓氏可知敦煌世族而益姓谱，于名字可订史误，于称谓可窥各朝当地俗尚之变迁；题名多系结衔，可考官爵，斗筲之禄史或不详，则更可以补阙，藩镇僭号之盛亦可于此洞晓之；……州郡井里诸名可考求其省并变迁，以补邑乘地志之不足；……各窟之同窟主者可考其人官职递嬗之迹，其祖孙母女姻戚牵连并列者更可考见其家乘世系，其以宾僚并存者复可徵其从臣幕友之史迹。”自序中并考述敦煌画像艺术、题识类别、敦煌伽蓝、敦煌世家、洞窟创修之时代诸问题，正是有效利用画像题识的范例。不足之处是未能将原画、原题摄影印入。又史氏自编窟号不同于今通行窟号，查对亦殊不便。

版本 (1)民国三十六年比较文化研究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华西大学博物馆合印本。(2)《敦煌丛刊初集》本。

《敦煌秘籍留真》 日本神田喜一郎辑

此书汇印六十三种敦煌文书，唐代有《常府君碑》、《唐永徽令》、《唐律》、《唐律疏议》、《散颁刑部格》、《天宝六载敦煌县户籍》等。其中《常府君碑》(伯 2640)是李义府所撰常何墓碑，常何曾充武德后期禁军将领，此碑亦是研究“玄武门之变”所当参考。《散颁刑部格》(伯 3078)存某卷残篇，首题“散颁刑部格卷 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右丞上柱国臣苏瓌等奉敕删定”，正文存十四条，全是惩办违法行为的规定。据《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中宗神龙元年，……敕中书令韦安石、礼部侍郎祝钦明、尚书右丞苏瓌、兵部郎中狄光嗣等，删定

垂拱格后至神龙元年已来制敕,为《散颁格》七卷”,则此卷正是神龙《散颁格》之一部分。唐格早无传本,偶有佚文,亦只言片语,此卷则是目前所见最长的格文,对研究唐代法制甚有参考价值。

版本 (1)民国三十六年国立台湾大学用日人影印散页装册发行。(2)《敦煌丛刊初集》本。

《敦煌曲子词集》 王重民辑

《敦煌曲校录》 任二北校注

《敦煌曲》 饶宗颐辑

隋唐以来西域音乐盛行中国,成为所谓“燕乐”,为配合燕乐曲调而编写的歌词就称“曲”或“曲子词”。敦煌出土大量曲子词,多是未见传世的作品,对研究唐代文艺固极为宝贵,同时所反映民众的生活、意识亦可为治史者参考。前述《敦煌零拾》、《敦煌掇琐》都收录若干曲子词,这几种书则集其大成。王书(195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录一百六十一首,任书(1955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收录五百四十五首,并有详细校注。饶书晚出(1971年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出版),有订正前书讹误处,先用法文排印,后影印中文手稿,并附有部分原件图片。

《敦煌变文汇录》 周绍良辑

《敦煌变文集》 王重民等辑

《敦煌变文新书》 潘重规辑

变文是在敦煌文书中发现的一种俗文学作品,即配合图画(变相)说唱表演的脚本,内容多是讲述故事,中间穿插唱词。其中如《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描述了晚唐沙州政权抗击吐蕃、回鹘的战斗,以及和唐朝廷的联系等情况,对治史有参考价值。其中,周书为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王书为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潘书为 1981 年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

《敦煌资料》第一辑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

此书是专为历史研究者利用而汇编的敦煌文书录文,1961 年中华书局出版。本辑刊布社会经济方面文书,分成五类:第一类是户籍,连附录计四十一件,大部分是敦煌县户籍,少数是柳中县户籍,可定为唐代的有二十余件。第二类是名籍,连附录计十五件,有团头名籍、买菜人名目、兵役名目、差科簿等。第三类是地亩,有四件,记载各户占有田亩数,有的还注出所纳粟麦数。第四类是敦煌寺院僧尼等名牒,共五件。第五类是契约文书,有买卖契约二十五件、典租契约八件、雇佣契约十五件、借贷契约四十九件、其他契约文书二十八件(如分家书、放良书、养男契,以及各种文书的样文),又附录新疆、甘肃、内蒙古发现的契约、文书三十七件。其分类及编排间有问题,惟录文尚可供检读引用。

《西域文化研究》 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编

此书是日本学者整理、研究大谷文书的主要成果。1902 年至 1914 年,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教主大谷光瑞三次组织探险队,到我国西北地区考察,先后在敦煌、吐鲁番等地猎取了大批文物,其中包括几千件汉文文书和古少数民族文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批文书藏于京都龙谷大学,称作“大谷文书”。1953 年在日本政府文部省资助下,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一批日本学者组成“西域文化研究会”,对大谷文书进行整理研究。将全部文书编号,共得 7733 号,包括汉文书 4830 号,回鹘文书 978 号,梵藏、西夏、蒙古等文书 425 号,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字合璧文书 530 号,此外尚有佉卢文、于阗文、焉耆文、龟兹文等文书。其中汉文文书大部分出自吐鲁番,少数出自敦煌。从 1958 年至 1963 年,相继编辑

出版六大册《西域文化研究》：第一卷《敦煌佛教资料》，第二卷《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第三卷《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第四卷《中亚古代语文献》，第五卷《中亚佛教美术》，第六卷《历史与美术诸问题》。每卷收论文、资料和目录若干篇。治唐史者可藉此书利用大谷文书，诸论文利用大谷文书对唐代敦煌吐鲁番地区均田实施、租佃关系、户税、徭役制度、驿传制度等所作的研究也有可资采择之处。

版本 (1)1958年至1963年日本法藏馆本。(2)1985年甘肃人民出版社版《敦煌学译文集》，即是从此书第二、三卷《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所选十篇论文的译文。

《吐鲁番考古记》 黄文弼撰

民国十七年和十九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两次考察西北，在吐鲁番地区地行考古发掘，此书实参加者所撰写的考察报告。分三部分：一是记述吐鲁番考察经过，其中对吐鲁番地区的古城址、旧寺庙、墓葬群等都有详细说明，并附有路线图和古城图，可供了解此地古代文化遗存的概貌；二是遗物说明，即对考察所得的古文书、绘画等文物进行诠释和考订；三是遗物图版，可与遗物说明相对照。其中古文书有三十余件，多为公元7世纪后半期及8世纪唐朝统治西州时期的遗物，如缴纳地租、户籍、军屯、诉讼牒状等，对研究西州的社会经济很有价值。本书于1954年由中国科学院出版。

《吐鲁番出土文书》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

1959年至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县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葬区进行十余次科学发掘，掘得近万片汉文文书。1975年，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博物馆和武汉大学历史系组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由唐长孺主持整理，拼得文书近

一千八百件,编印十册。文书均按照原式抄写影印,有关文书情况如墨色、缺残等也一一标明,对字迹模糊、缺笔、残坏之字则尽可能推断注出。本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81年出版前三册,1983年出版第四、五册,1985年出版第六册,1986年出版第七册,1987年出版第八册,1990年出版第九册,1991年出版第十册。文书以墓葬为单位,按年代先后排列。最早的文书是前凉时代的,唐代的文书应从贞观十四年算起,因这一年唐灭高昌国,以其他置西州,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城成为西州都督府治。按这一标准,从此书第四册起,基本是唐代文书,文书类型有居民、匠人、僧侣的户籍名册,各种租佃、借贷、买卖、雇佣的契卷,以及上下行公文、公私杂物账、家书、医药方、随葬衣物疏等,都是当时研究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地理、文化、风俗的珍贵资料。另外,这批文书中还有来自其他地区的,如敦煌、庭州、伊州乃至洛阳、长安,其价值还不限于研究西州历史之用。

《中国古代籍账研究》 日本池田温著

著者收集研究敦煌、吐鲁番籍账文书有年,曾编集《中国古代籍账集录》,1971年刊于《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一九卷第四号,后复扩大写成此书。前为“概观”,考论中国古代籍账制度的形成、变化和崩溃。后为“录文”,分“籍账、差科簿”(又细分“敦煌籍账”、“吐鲁番籍账”、“差科簿”)和“诸种文书”两部分,共集录文书三百十六件,上起汉景帝四年,下迄北宋至道元年,百分之八十以上属于唐代。虽其中真系籍账文书止七十四件,与书名之专言“籍账”似未相一致,但“差科簿”及“诸种文书”中之状牒、簿册、凭契、政府文案、州县判集等实亦极有用处。文书录文上均标出原卷的种种情况,如破损、朱字、朱点、朱勾、朱印、抹消文字、捺印、原纸缝之类,并附印原件照片一百十六帧作为插图,印制精美,至便使用。

版本 (1)1979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本。(2)1984

年中华书局版龚泽铎中译本,惜录文部分只印目次而文书原件录文全部略去,资料价值尽失。

《敦煌宝藏》 黄永武编

此书是迄今规模最大的敦煌文书总集,计划影印世界各地收藏敦煌卷子缩微照片约 20 万张,及画本、刺绣、壁画、塑像等图片千余帧。所收卷子主要是汉文,各卷次序沿用斯坦因、伯希和编号,国内卷子遵陈垣《敦煌劫余录》次第。1981 年起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出版,每辑十册,共十四辑,计一百四十册,每册附有敦煌壁画、塑像等图片若干。第一册至第五十五册为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所藏卷子,包括 7599 号经卷文书,碎片 200 种,木刻 19 种;五十六册至一百一十一册为北京图书馆所藏的 8738 号卷子;一百一十二册至一百四十册为巴黎图书馆所藏伯希和 2001 至 6038 号卷子及 1608 号散卷。用此书较用缩微胶片自更方便,惜无录文,有些字迹模糊者不易辨认,黄氏又编制总目录,名曰《敦煌遗书最新目录》。

《敦煌丛刊初集》 黄永武编

此书将各种敦煌资料之已刊印成书者和诸目录汇集影印(1985 年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实为一部敦煌资料丛书。所收入如序言所云多为“民国以来中外重要之敦煌学工具书或经典之作,均为坊间绝版或难以购得之珍贵典籍”,故实用价值很高。其细目为:

第一册《英伦博物馆汉文敦煌卷子收藏目录》,英国翟尔斯撰。附《英伦所藏敦煌未知名残卷目录的新探索》、《敦煌六百无名断片的新标目》,黄永武撰。

第二册《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王重民等编。附《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之订补》,黄永武撰。

第三、四册《敦煌劫余录》，陈垣撰。

第五册《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史岩辑。《流沙遗珍》，金祖同辑。《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李证刚辑。

第六册《敦煌石室遗书百廿种》上，罗振玉辑。

第七册《敦煌石室遗书百廿种》中，罗振玉辑。

第八册《敦煌石室遗书百廿种》下，罗振玉辑。

第九册《敦煌杂抄》，清常钧撰。《敦煌随笔》，清常钧撰。《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王重民撰。《石室秘宝》，存古学会编。

第十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敦煌杂录》，均许国霖撰。

第十一、十二册《苏俄所劫敦煌卷子目录》，苏联孟列夫撰。

第十三册《敦煌遗书》，日本羽田亨辑。《敦煌秘籍留真》、《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均日本神田喜一郎辑。

第十四册《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最新增订本)，蒋礼鸿撰。

第十五册《敦煌掇琐》，刘复辑。

第十六册《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

《敦煌古籍叙录》 王重民编

此书将敦煌遗书中佛经以外约二百种典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每种记收藏编号，已刊布者并说明刊于何书，然后汇集各家题跋或节录有关论文。其撰写者除著者本人外尚有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陈寅恪、向达诸专家。题跋、论文多记述卷子形式、内容，考订其篇目、作者、年代，并论证其价值，实为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汇编，初学读之当大有裨益。195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重印。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商务印书馆编辑

此书是整理和研究敦煌遗书的重要工具书，也是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史的工具书。书分“总目”和“索引”两部分。总目部分由

四卷组成,按遗书收藏地点不同而分为四种目录,即叙例所云:“一、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八千卷,陈垣先生曾编印《敦煌劫余录》,著录极详。兹为检查方便,依北京图书馆原藏号码(千字文编号)易为简目,而注《劫余录》页数于后,以备相互参考(续收的一千多卷,因尚未经整理,暂未列入),题为‘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目’,列本编卷第一。二、斯坦因劫走的七千卷,今藏英国伦敦博物院图书馆,从来没有完备目录(案 1957 年伦敦出版翟理斯所编《伦敦博物院藏敦煌卷子目录》较为完备,叙例后文有说明),前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获得全部显微胶片以后,由刘铭恕同志统阅一过,依据原卷内容,编成‘斯坦因劫经录’,列为本编卷第二。三、伯希和劫走的二千五百卷(藏文卷不包括在内)今藏巴黎国立图书馆,虽有目录发表,既不完备,且有误差,1934 至 1938 年间王重民先生在该馆统阅一过,编成‘伯希和劫经录’,列为本编卷第三。四、敦煌遗书之发见实在 1899 年,斯坦因、伯希和未劫之前已稍稍散出,既劫之后更有大量散佚与盗窃,……这些流散的卷子为数大约在三千卷上下,为了收藏或售卖,曾编有不少的目录流传,兹把它们汇编起来,总称为‘敦煌遗书散录’,列为本编卷第四。”案卷四所收有佛经、变文、曲子词等专类目录,计十九种。“斯坦因劫经录”和“伯希和劫经录”著录都很详细,有题记的经卷,全录出题记,另加说明,佛经以外的资料,有时还抄录部分或全部文字。至于索引则是按书目篇名以检索遗书编号之用。书后并摘录翟理斯目录的精华部分,为博物馆藏敦煌卷子分类总目,博物馆藏敦煌卷子笔画检查目录,及斯坦因编号和博物馆新编号对照表。本书于 1962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3 年中华书局重印。

书名索引

二 画

- 丁卯集 233
 十七史商榷 49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113
 八琼室金石补正 273

三 画

- 大唐开元礼 77
 大唐六典 72
 大唐传载 153
 大唐西域记 108
 大唐创业起居注 60
 大唐新语 147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110
 广陵妖乱志 241

四 画

- 云溪友议 160
 元氏长庆集 220
 元次山集 202
 元和姓纂 120
 元和郡县图志 90
 开元天宝遗事 171
 开天传信记 165

- 太平广记 178
 太平御览 258
 太平寰宇记 93
 廿二史札记 50
 廿二史考异 48
 韦苏州集 204
 王子安集 190
 王右丞集 197
 王梵志诗 187
 中国古代籍账研究 300
 中国印度见闻录 115
 中朝故事 169
 中兴馆阁书目辑考 278
 中兴馆阁续书目辑考 278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276
 长安志 98
 长安志图 98
 文苑英华 242

五 画

- 玉川子诗集 226
 玉山樵人集 238
 玉泉子 160
 玉海 264
 刊误 168

本事诗	157
东观奏记	164
东皋子集	188
北户录	116
北里志	162
北梦琐言	173
司空表圣文集	236
司空表圣诗集	236
甲乙集	239
册府元龟	260
旧五代史	35
旧唐书	3
旧唐书经籍志	275
皮子文藪	235
白氏文集	218
白氏六帖	257
白孔六帖	258
白莲集	241

六 画

西域文化研究	298
孙樵集	234
权载之文集	210
吕和叔文集	214
吐鲁番出土文书	299
吐鲁番考古记	299
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	295
贞观政要	131
安禄山事迹	135
因话录	152
曲江张先生集	194
刘宾客嘉话录	150

刘梦得文集	213
刘蜕集	233
刘随州文集	199
全唐文	251
全唐文纪事	253
全唐诗	246
乐府杂录	163
次柳氏旧闻	149

七 画

两同书	241
两京新记	95
杜工部集	199
杜阳杂编	158
杨盈川集	190
李义山诗集	230
李义山文集	230
李文公集	214
李文饶文集	224
李太白文集	195
李相国论事集	140
李贺歌诗编	226
酉阳杂俎	155
张司业诗集	212
张承吉文集	225
张说之文集	193
陈伯玉文集	192
陆宣公翰苑集	206
岑嘉州诗	201
近事会元	177
沈下贤文集	223
宋白续通典辑本	68

宋史艺文志 283
初学记 254

八 画

直斋书录解题 281
奉天录 138
武氏诸王表 53
松窗杂录 154
欧阳行周文集 217
罗昭谏集 241
鸣沙石室佚书 290
明皇杂录 151
岭表录异 118
承旨学士院记 122
孟东野诗集 204
孟浩然集 195
陔余丛考 50
尚书故实 159
金石录 269
金石萃编 271
金石续编 273
金石萃编补正 273
金华子杂编 170
河南志 101
郎官石柱题名考 125
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 126
郑守愚文集 238

九 画

封氏闻见记 145
柳宗元集 215
南部新书 176

括地志 88
骆宾王集 192
昼上人集 202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 278
毗陵集 203
幽忧子集 189
幽闲鼓吹 154
重修承旨学士壁记 122
香奁集 238
顺宗实录 62
皇甫持正文集 222
说郛 184
类说 183
类编长安志 104
姚少监诗集 230

十 画

贾氏谈录 175
贾浪仙长江集 225
桂林风土记 118
桂苑丛谈 159
桂苑笔耕集 236
通典 64
钱考功集 204
徐公钧砚文集 239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 278
浣花集 242
流沙遗珍 295
资治通鉴 55
资治通鉴补 59
资暇集 167
高力士外传 137

高常侍集	198
唐人行第录	128
唐大和上东征传	112
唐大诏令集	84
唐书兵志笺正	46
唐书注	45
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	43
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	129
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 索引	129
唐仆尚丞郎表	126
唐方镇年表	53
唐功臣世表	52
唐代墓志汇编	274
唐令拾遗	82
唐会要	69
唐边镇年表	52
唐折冲府考	54
唐折冲府考补	54
唐折冲府考校补	54
唐两京城坊考	104
唐甫里先生文集	235
唐国史补	147
唐语林	180
唐律疏议	79
唐将相大臣年表	52
唐宦官封爵表	53
唐诸蕃君长世表	53
唐黄先生文集	239
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	124
唐阙史	166
唐摭言	168

唐镇十道节度表	52
唐藩镇年表	53

十 一 画

教坊记	143
隋书	33
隋唐两京丛考	107
隋唐嘉话	144
崇文总目辑释	276
谗书	239
续谈助	181

十 二 画

朝野僉载	142
韩昌黎集	210
寒山子诗(附丰干拾得诗)	209
温庭筠诗集	233
游城南记	102
禅月集	241
集古录	267
蛮书	116
敦煌古籍叙录	302
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 杂录	294
敦煌石室画像题识	295
敦煌石室碎金	292
敦煌石室真迹录己	289
敦煌石室遗书	286
敦煌丛刊初集	301
敦煌曲	297
敦煌曲子词集	297
敦煌曲校录	297

敦煌变文汇录	297
敦煌变文集	297
敦煌变文新书	297
敦煌宝藏	301
敦煌资料	298
敦煌掇琐	293
敦煌零拾	292
敦煌遗书	294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302
敦煌秘籍留真	296

十三画

新五代史	38
新旧唐书互证	52
新旧唐书合钞	43
新旧唐书合钞补注	44
新唐书	18
新唐书艺文志	275
新唐书纠谬	46

鉴诫录	173
锦里耆旧传	175
雍录	103

十五画

樊川文集	226
樊南文集补编	230
颜鲁公文集	198
羯鼓录	152

十六画

翰林志	121
翰林学士记	122
翰林学士院旧规	122
翰林院故事	122

十七画

魏郑公谏录	134
-------------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唐史史料学 1 1 5 0 4 8 1 0 黄永年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2 0 0 2

s s 号 =

书籍地址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次
自序
纪传类
 编年类
 典章制度类
 职官类
 仪注类
法令类
诏令类
地理类
 谱牒及职官姓名类
 杂史杂说小说类
 诗文类
类书类
金石类
书目类
 敦煌吐鲁番文书类
 书名索引